

成仿吾文集

山东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 吴富恒

责任编辑 史若平

装帧设计 刘乐一

成仿吾文集

《成仿吾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济南山东大学新校)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5 插页3

字数340千 印数1-15,000

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10338·1 定价: 平2.20元



成仿吾同志在工作。（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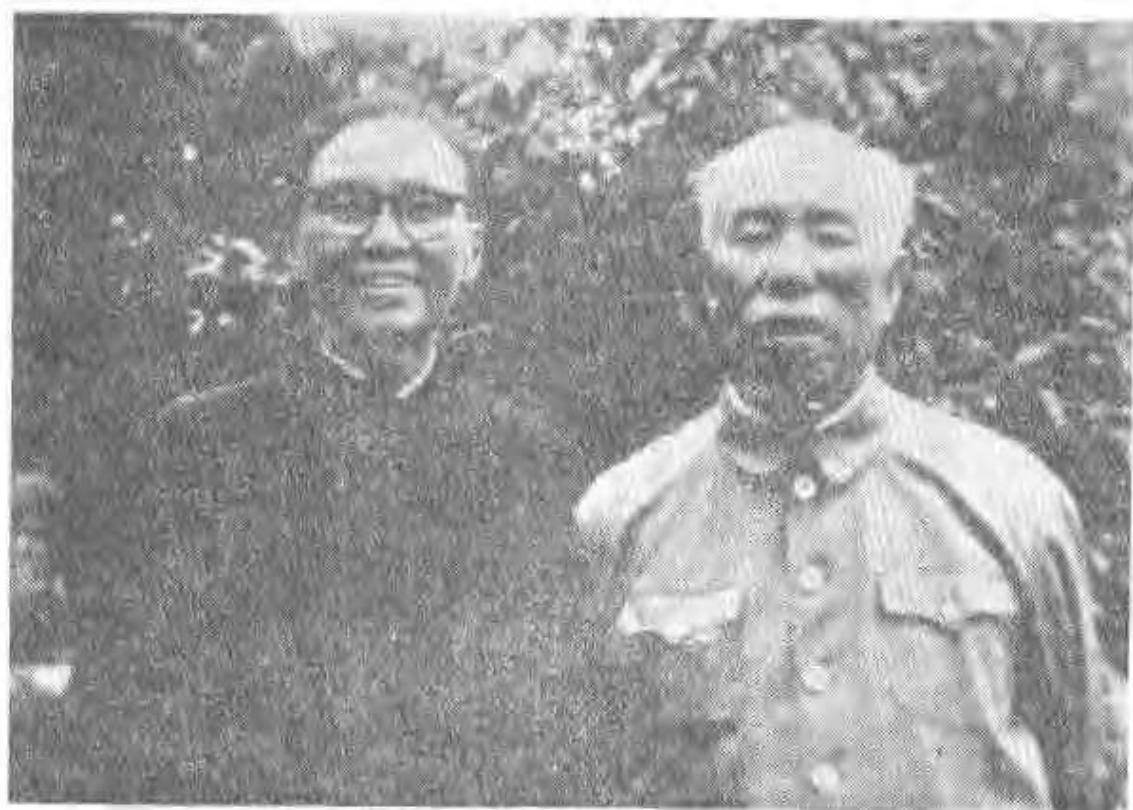
创造社时期。右起：成仿吾、郁达夫、
郭沫若、王独清。（1920年）



成仿吾同
志（左一）在
德国。左三为
章文晋同志。
（1930年）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
（1936年）





成仿吾和张琳同志。（1978年）

怀念仿吾同志（代序）

丁 玲

一九三六年十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驻在陕北定边县绍沟沿村。这时正准备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指战员都很忙，没有时间与我交谈，我抢在这个间隙随几个同志去定边县城。别的同志去都有工作，我呢，只是怀着急切的愿望想去看慕名已久的董老（必武）和成仿吾同志，还有我在上海平民女校的同学钱希君。

这绍沟沿是个小村，离沙漠区很近。虽说叫村，实在地面上没有房屋，只有几十孔窑洞散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的一条小沟里。沟里没有水，是一条干沟。人们用水都是在一些深窑里把头年冬天埋下的积雪汲出来用。积水中杂有枯树叶子、碎纸头、破布片、驴粪羊粪……。除做饭、饮马外，每人每天限用一小盆。水成了最珍贵的东西，好象这时人们才懂得生活是不能没有水的。好在我是带着最丰富的幻想和热情投奔到这不毛之地的。尽管朔风习习，满目荒凉，我在全是陌生人中却处得愉愉快快，整天沉醉在这广大自由的天地里，感到四处都洋溢着勃勃生机。

这天，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棵，偶然看见几棵长不大的杨树。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如火，倒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既淡又薄

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的温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情。我极目环宇，悠然自得，脑子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是遨游；是战士，又似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到我是在那里，正向那里去。

忽然，从我右边跃过一匹枣红马，而且传来一声挑战的颤抖的声音：“丁玲！敢撒开缰绳跟我们跑几步吗？”这是贾拓夫同志，一个温文尔雅的陕北干部。他曾经告诉我，一九三四年陕北红军为了取得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派他到上海，辗转到了江西，而后随中央红军长征，绕了一个大圈子，胜利完成了任务回到陕北。在这两年的艰难跋涉中，他从一个知识分子学生变成了一个老练的革命干部。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怎么今天也向我挑战了，欺负我是一个刚刚坐在马上的人吗？不行。我现在也骑着一匹马，也是一匹枣红马；是头一天任弼时同志批给我的，是一匹草地来的马呢。我不答话，真的撒开马缰，站在马蹬上，夹紧马肚子放马驰骋。于是我前边的马，后边的马，都跑开了。我们正走在大沙漠的边沿上，我只看见细沙象水似的在沙漠上流淌，风在耳边轻扫，象腾云驾雾一样。我渐渐松弛了第一次跑马的紧张。过不一会儿，我的手没有劲了，腿也软了下来，可是我不服输，浑身无力地坐在马上，心中晃悠着望着遥遥跑到前边去了贾拓夫。他忽然把马停了下来，哈哈大笑：“好样的，丁玲！”马都停了下来，我的马也挤上前去。我安定了，赧然地傻笑起来，感谢那个聪明的贾拓夫同志。大家都兴致很好，缓缓地策马而行，不觉地到了定边城，时间才

下午三点，太阳已经挂在西边的天际，这里日照真短啊！

晚上我住在钱希君的家里，又疲惫又舒畅地酣睡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她陪我去拜访董必武和成仿吾。董必武同志过去早有人向我介绍过，但讲得较简单。这次见面，觉得更加亲切。他嘱咐我：“丁玲！到了这里，你一定不要‘客气’，想什么，需要什么，都说出来。你讲客气，就要吃亏了。”他送给我一件整狐狸皮，火红火红的，好看极了。后来一位女同志被派到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正用得着，我把狐皮转送给她了。董老给我的印象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对人亲切，很会体贴人。当我要去见成仿吾同志时，我的想象却很丰富。从创造社最初的老一辈作家留给我的一些印象，我对成仿吾同志是有所想象的：在文学上，他主张浪漫主义，创造社最早就是这样主张的。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定很洋气，很潇洒。因为我见过一些这样傲气十足的诗人，他们趾高气扬，高谈阔论，目中无人。他在国外学军械制造，或许是庄重严肃。又听说他在过黄埔军校，那一定又是一种军人气概。是的，他写过火气很重的文章，是不是有点张飞李逵式的气质呢？他是我们湘南人，是不是也有一点本乡本土的南方蛮子的倔强脾气呢？没有见到他之前，我确实对他作过各种揣测。但当我一见到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象的全都错了，错得简直有点失望的样子，他怎么只是那样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呢？我后悔，为什么我单单忽略了他是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一个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呢？我们一谈话，我就感到舒服，他是一个使你可以在他面前自由谈话的人。他不会花言巧语，也不是谈笑风生，但他使任何见到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尊重别人，对什么人都平等对

待的人。他是一个普通人却又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够做到的那么热情、虚心。这便是我在定边第一次见到的成仿吾同志。

后来，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主持陕北公学的时候，我去看他，他还是这样。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他主持华北联大的时候，我们又相见了，他还是这样。一九四七年我随华北联大的同学参加土改工作后，回到正定联大，住在文学院，虽不是天天见到他，却感到了他同联大师生们的亲密关系。他的原则性很强，态度却平易近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对他总是这样认识，这样说的。当面是这样，背后也是这样。我以为这是极不容易得到的评论和鉴定。

成仿吾同志过去写过不少文章，有一部分是一九二八年前他很年轻的时候写的。有一些是充满着革命的热情，但也有几篇是属于论争的文章，其中有的对鲁迅先生有所责备。其实，这一争论属于革命文学队伍内部的论争，而且很快就达到了同志间的一致。一九三一年仿吾同志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和红安县委书记时，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政治思想水平得到提高，对鲁迅先生有了比较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就痛感自己少年时的高傲和偏激；三六年鲁迅逝不久，他就为文热情颂扬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有着“划时代的功绩”，“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如果有人以为仿吾同志是一个狭隘偏激、成见很深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成仿吾同志在这里正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品格高尚。一九二八年他在欧洲加入共产党，参加编辑党的刊物《赤光》，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提高了他的理论水平，打开了他的眼界，他看得更远了，也更实际了。一九三一年回国后，在苏区做实际工作，他洗涤了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常有的思想上的片面性。他深

入下层，勤勤恳恳，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过去年轻人容易有的那一点意气，偏激，他早就抛弃了。反之，旁人对他的一些评论、指责，即使有过甚之处，他也超然豁达，不斤斤计较，不存在芥蒂。一九三四年底，张国焘借口到苏区外围打击敌人，带着主力部队和仅有的四部电台，离开鄂豫皖，擅自远走四川，使留在鄂豫皖坚持工作的同志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仿吾同志受命去上海找党中央，恢复联系。他转辗跋涉，从秋到冬，好不容易才到达上海，但找不到规定的接头人，找不到党组织。在贫病交加的关头，他想起了鲁迅，他认为这是唯一可靠的战友。果然，他找着鲁迅，他们见面了，热情握手，一同在咖啡馆里亲切密谈。这便是伟大的见证。成仿吾同志全然不是一般人揣度的那种狭隘的讲究派性的人，过去的那一点争执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了，现在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大同，他们是革命同志，是亲密战友。鲁迅帮助成仿吾同志找到了地下党的关系，仿吾同志平安到达中央苏区。党中央和鄂豫皖苏区恢复了联系，仿吾同志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他从此专门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开辟和领导，在教育战线上建立了功勋。五十年来，桃李满天下，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坚定、作风扎实，具有真才实学的革命和建设人才。

我过去很早就认识仿吾同志，对他很尊敬，但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多，同他接触很少。他平时是一位不爱多说话的人，我也是个不爱无事奔走，浪费别人时间的人，我们即使偶然相遇，也很少机缘深谈，但我常常感到他对我的关心和友好。一九八二年春节，一位住在党校的朋友来告诉我，成仿吾同志要同他的老伴张琳同志来看我。这使我惶恐不安，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他，我却是几次都想去看他，只因为

怕妨碍他的工作，听说他每天都仍在翻译校订马列著作；我也不愿占去他很少有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一直迟疑没有去。结果还是由于他的坚持，他们老夫妇俩光临我的住宅；我实在不敢当。事后传话的那位朋友告诉我：“成老一直对你很好，但他这人向来不愿表示自己，他不会对你说什么的。五八年他听说你去北大荒后，心里常为你不平，挂念你，为你难过落泪。他说过丁玲是不搞宗派的人。”这些话就象一盆火放在我心上，常在我心中燃烧。只有真正以党的事业为重的人，才会顾念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干系的平凡的在痛苦中生活的人。这意外的奖赏真使我承受不住。我只有勉励自己，为党多做点事才对得起他对我的信任，才能不辜负千万个象仿吾同志这样对我怀有希望的人。今年三月间，山东大学出版社约我为成仿吾同志的文集写序。出版他的文集，我是欢迎的，但为他作序，我不敢答应。我以为和仿吾同志在创造社一同战斗过的、也是我的前辈的还有人在；仿吾同志在教育界也有许多老同事；我自问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我正拟婉辞，山东大学负责编辑的同志又来了，他们说这是仿吾同志自己的意思。这样我是不敢，也不应该再推辞了。我不顾自己有病，也不注意医生的劝告，我决心动笔。那几天正当六届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之际，听了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好象又回到四十八年前那样，我骑着枣红马，撒开缰绳，驰骋在无涯的沙原，春水在我的坐骑下缓缓流淌，软风在我耳边轻扫，我心情荡漾，想念着仿吾同志漫长的一生，我要写出他美丽的一生，写出他纯洁的心灵。成仿吾同志是座尊严的雕像，就在前边吸引着我。我以为在这种心情下我很可以为他精细描写，表达我对他的爱和尊敬。可惜啊！痛心啊！正当我执笔的时候，

一声霹雳，一道闪电，乌云布满天际，环宇大雨滂沱：“成仿吾同志逝世了！”我惊愕了。霎时，那天边的红霞，那马前的雕象都消失了，我从哪里再去寻找那书写的热情！我才发现我这个人真蠢，我追寻着的东西，却常常失之交臂，只落得无穷的悔恨和无限的怅惘。仿吾同志，我应该在您生命活跃的时候去做的事，却没有去做。我应该在您生前写出的文章，却留到了现在，一切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我为了对许多怀念您的学生和怀念您的读者践约，我仍不敢写序，只能留下我的一点印象和敬意。

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

成仿吾同志生平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成仿吾同志，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成仿吾同志，1897年8月24日出生于湖南新化县，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同志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参加创办了多种文学刊物，撰写与翻译了许多论文、小说、诗歌，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是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

成仿吾同志1925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广东大学教授和黄埔军官学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离国赴欧。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回国后，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兼红安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受省委派遣到上海找党中央，历尽艰难，经鲁迅先生帮助与中央取得联系。1934年1月到达瑞金中央苏区，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并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参加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同徐特立同志一起任干部团政治教

员。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同志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年他带领几千名青年学生奔赴敌人后方，创建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华北大学副校长等。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成仿吾同志是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是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第一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屆全国政协常委。

成仿吾同志从1934年在瑞金中央党校任教以来，一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他强调教育要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规律，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坚定、作风求实、具有真才实学的革命和建设人才。

成仿吾同志潜心学习，知识广博，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和徐冰同志合译了《共产党宣言》。直至晚年，还重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成仿吾同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撰写了《长征回忆录》。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他衷

心拥护、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成仿吾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矢志不渝。他具有坚强的党性，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论是党安排他什么工作，他总是竭尽全力，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一贯爱护青年，不断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关怀干部，热忱地培养干部。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为人忠诚老实，正直无私，深受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尊敬和爱戴。

成仿吾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目 录

怀念仿吾同志(代序).....	丁 玲
成仿吾同志生平.....	(8)

一、评论

学者的态度

——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	(3)
编辑余谈.....	(18)
歧路.....	(20)
评冰心女士的《超人》.....	(26)
《沉沦》的评论.....	(34)
《残春》的批评.....	(39)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	(45)
编辑纵谈.....	(54)
《命命鸟》的批评.....	(58)
“雅典主义”.....	(64)
《一叶》的评论.....	(69)
诗之防御战.....	(75)
新文学之使命.....	(89)
士气的提倡.....	(96)
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	(99)
新的修养.....	(104)

评《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	(107)
批评与同情	(114)
作者与批评家	(118)
论译诗	(121)
秋的诗	(129)
《创造日汇刊》终刊感言	(137)
真的艺术家	(139)
国学运动的我见	(143)
《呐喊》的评论	(146)
批评的建设	(153)
建设的批评论	(160)
艺术之社会的意义	(165)
民众艺术	(170)
文学界的现形	(174)
批评与批评家	(177)
一年的回顾	(180)
今后的觉悟	(186)
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	(190)
文艺批评杂论	(197)
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	(205)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	(209)
打倒低级的趣味	(215)
文艺战的认识	(218)
读了《广州事情》	(220)
中国文学家成仿吾鲁迅等 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223)

文学革命与趣味	
——复远中逊君·····	(229)
《使命》序·····	(233)
文学家与个人主义·····	(235)
祝词·····	(240)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241)
全部的批判之必要	
——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	(248)
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	(256)
知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257)
编辑后记·····	(259)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261)
革命文学的展望·····	(267)
东方艺术研究会春季习作展览会印象记·····	(271)
纪念鲁迅·····	(276)
写什么·····	(278)
祝沫若五十寿辰·····	(281)
在北岳区党的文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282)
《北方文化》创刊的话·····	(284)
中国青年要走自己的道路·····	(286)
中国著名作家丁玲肖三成仿吾等致电美文化界	
呼吁美国友人制止援蒋法案·····	(289)
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	
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	(290)
郭沫若《英诗译稿》序·····	(295)
人生的开始·····	(297)

《张闻天早年译剧选》序·····	(306)
怀念郭沫若·····	(309)

二、小说

一个流浪人的新年·····	(315)
深林的月夜·····	(321)
灰色的鸟·····	(325)
牧夫·····	(335)

三、诗歌

诗十六首·····	(345)
长沙寄沫若(外一首)·····	(363)
诗三首·····	(371)
白云·····	(373)
海上的悲歌·····	(374)
诗人的恋歌·····	(378)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	(380)
不朽的人豪 ——纪念孙中山先生·····	(382)
《流浪》序诗·····	(384)
清明时节(外二首)·····	(387)
早春及其他九首·····	(391)
陕北公学校歌·····	(397)
给毕业的同学们·····	(398)
爱国犯·····	(399)
毕业上前线·····	(401)

华北联合大学校歌·····	(402)
山东大学校歌·····	(403)
八十自述·····	(404)
徐冰同志追悼会车中口占·····	(405)
中国人民大学校歌·····	(406)
人民大学校庆偶感·····	(408)
为圆明园倡议题诗·····	(409)
稻草人·····	(410)
鄂豫皖纪行·····	(411)
为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题诗·····	(413)
为荆州地区博物馆题诗·····	(414)
为湖北省博物馆所编《董必武传》题诗·····	(415)
为纪念红军巧渡金沙江48周年而作·····	(416)

四、散文

东京·····	(419)
太湖纪游·····	(426)
江南的春讯·····	(435)
矮丑的说道者·····	(440)
春游·····	(442)
万水千山只等闲·····	(448)

五、剧本

欢迎会·····	(461)
编后·····	(477)

由

一、评论

学者的态度

——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

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有人在那里讨论辩驳，就是这件事情有进步的证据。这是极可喜的一种现象。可是当我们为讨论或辩驳的时候，总应当以真挚的热忱，持研究的态度，时时刻刻把问题的本体拿稳，放在我们的心头——这才是学者的态度。

我们要留意下列的几点：

第一，要知道我们的讨论，为的是图谋进步。

第二，要知道我们的讨论，为的是人类全体的利益，因为进步是对于人类全体有益处的。

第三，要知道我们的讨论，为的是朋友的切磋，因为与我们研究同一问题的，都是我们的一些好朋友。

第四，要知道我们的讨论，最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身，不是微末的枝叶。

我们不要忘记下列的几点：

第一，我们不要忘记研究的态度。

第二，我们不要忘记感情这条恶狗，是想往斜路上走去的。

第三，我们不要忘记问题的本体。

我们不可有下列的几点：

第一，不可有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

第二，不可有攻击人身的论调。

第三，不可有捉人话头的毛病。

总而言之，我们每为一次的讨论，便应当使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往它应当归宿的地点，永进坚稳的一步，才算对于这问题之解决，真有所贡献，才算不枉费了这场讨论的辛苦。可是要想办到这种地步，非以真挚的热忱持研究的态度不可——换一句话，就是要取学者的态度。

离上海的评论界，又是一年多了。这回从湖南来，在船上还想起我们评论界的进步，定会是很愉快的。可是抵沪后第二天，看见了《努力周报》标题《骂人》的编辑余谈，却不由得大失所望了，尤其因为它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的大作。

并不因为郁达夫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才跑出来替他说话。贤明的读者或许还记得署名“损”的在《文学旬刊》上骂我（关于《创造》第一期），我自己因为光阴太可惜了，还不曾同“损”先生辩驳。可是这一回的事情关系重大，我何忍不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呢？

我觉得有几点不可不向胡先生和读者诸君请教。

第一，胡先生所取的是不是学者的态度？胡先生教人莫骂人，他自己骂人没有？郁达夫是骂人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条恶狗，走到斜路上去了吗？我要请教胡先生，国语的文学运动以来，几本书是深奥有聊的创作？这感情的恶狗把它所处的时代都忘却了！胡先生是文学运动的先进，既然看见了“浅薄无聊的创作”，怎的不出来指示何处浅薄，何处无聊，怎的不出来作一个典型，教人知道怎样才是深奥，才是有聊？这难道不是很有价值的事业？

应当做的事情既不做，教人不可骂人，却倒先自己开口便骂人，由这些地方看起来，我们纵或不能说胡先生大言不惭，我们总不能不说胡先生所取的态度为非学者的态度。这是我自己最引为深恨的一个结论，因为我对于胡先生素来是抱有极大之希望的，如今这无辜的希望也破产了！在不重学术缺少学者的我们现在的国家，这是很可悲观的事实！并且胡先生的这篇文章，在学术的进步上，不仅没有何等的贡献，反直接间接地把学术的前途阻塞了。关于学术上的错误（《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开端五句之中，胡先生所译的，差不多句句是大错的），我且留在下面再谈。我现在专就胡先生所取的态度，可以证明他直接间接地阻塞了学术的进步。

（1）胡先生抹杀了他人的论旨——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我想必是有感而作。他所攻击的是“文艺思潮书籍的乱译，与各种小说诗词的粗制滥造”，“日本有一本西书译出来的时候，不消半个月工夫，中国也马上把那一本书译出来，译者究竟有没有见过那一本原书，译者究竟能不能念欧文的字母，却是一个疑问”。他所主张的是“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过是他偶然举出来的一例，他说他“看了那一本中文的译本，甚么也不能理会”，随便指出了几个错误的地方，顺便把它改了。他这《日记》的重心，完全不在这译本，更完全不在他自己的译文。他最后的一句，还在那里问：“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有进步呢？”可见他是因为希望中国进步过于是性急了，才说得那般利害。我们都觉得是被他骂在一团的了。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倒不能以为这种敏捷的感觉，是自己或谁的特别可夸的天赋呢！可是我要请教胡先生，我们这些都把介绍所谓新文化为己任，你不让

我、我不让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应当责问的？对手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的先生们，应不应当唤起他们的责任？胡先生忍不忍“使我国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之一日”？胡先生把他人的题目看错了，把人家的意思弄错了，我还很愿意替他辩护，说他实在没有看到那些紧要的地方去；然而他为什么于所引用郁君的文，故意把那最紧要的“我真不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之一日”抹杀了呢？胡先生真的把这篇骂人的大作，认为是政治上的辩论了么？胡先生既然承认“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胡先生自己的话），为什么偏要抹杀他人的论旨，捉人话头来大啸特啸呢？

（2）胡先生压沮了他人的言论——言论的自由，对于进步是绝对必要的，即如郁君的言论，固然不免是过分的了，然而他的心目中，为的只是我们中国思想界的进步；并且郁君骂了一大批人，与骂人当然又是两样，这一点我们不可不严格地分别。比如我们说中国的政府坏，社会坏，胡先生总不能说是骂了自己或别的谁，跳出来张喉大骂。怎么郁达夫刚由愤慨作了这一篇有益的文章，遂被抓着了痛处似的，值得胡先生出来破口大骂呢？那么，被军阀把一切当然应享的权利都褫夺了的，我们这些小百姓，遂连这一点自由都不能保有了么？我要问问胡先生从那里得了压迫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照胡先生说起来，攻击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的先生们，只有胡先生有这权利，别的人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么？

（3）胡先生忘记了将来的流弊——象胡先生这般抹杀他人的论旨，压迫他人的言论自由，名为教人莫骂人，实是自己

在那里骂人——这种高明的学者，何幸亦何不幸而只有胡先生这么一个。我们来说几句笑话，假使大家都学会了胡先生的态度与语言，象大家学胡先生作诗一个样，那么我们的学术界，一定会热闹起来；大家都带上一副假面孔，不是今天你骂我，就是明天我骂他，这才好看啊！有胡先生在里面作一个总指挥，我们这场把戏，是不愁看不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心啊！然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声明一句，就是，这一切的责任，也是要请胡先生担当的啊！

由以上所说的归纳起来，我们不能不说胡先生所取的态度，不是学者的态度。他故意抹杀了他人的论旨，故意压迫了他人的言论。他没有真挚的热忱，只知逞一己的意气，贪一时的快感，把无穷的流弊忘记了！我得到这种结论，我很悲观，不知道胡先生能不能为我作出一种反证。

第二，胡先生怎么不就德文的原文加以研究？郁达夫那篇文章的主要点在“大凡我们译书，总要从著者的原书译出来才好，……”他把余译本与英文对照，便自己把它翻译出来，虽然是要证明余译本的错误，然而已是第二义的目的。他说：“我读了那一本中文的译本，甚么也不能理会，所以就去买了一本英文的译本来对看。因为我所有的德文本，是一九〇九年改正的第三版，德文本的文章，同中译本，并无一句相同，所以我疑思译者对于英文本倒反忠诚，对于原著者，倒反有漠不相关的样子。英文本买了来一看……”。与原文大不对了，才下一步去把英文来考证，而余译本与英文又是那般不对，郁君才不得不把他做“无理的供给”的样本了。然而最后的解决，总当把一九〇七年的德文原本来考证。胡先生既慨然觉得“余先生

固然也不免有错误，郁先生的改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何以吝惜几分钟的工夫，不把德文原本翻翻，却把本来就是译得不好的英文去再把他颠倒错译呢？（胡先生的译文错的厉害，下面再讲）郁君并不是和余君较量英文，胡先生的英文好得很，是谁也知道的，也犯不着同他们赌气斗嘴，只要把德文原本看看，把他们的错处指出来，译成更确的文句，作一个最后的解决，岂不是大家都好，我更可以省这一番口舌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学界怕不能不埋怨胡先生不早给他们一个真确的解释，反又多给一种错误的翻译去扰乱他们；我更不能不埋怨胡先生多给我这样难于立言的一宗差事呢。

闲话休谈，现在让我把德文的原文与拙译写在下面罢。

“Wer heute die Frage aufnimmt, ob das menschliche Leben einen sinn und Wert hat, der kann nicht zweifelhaft darueber sein, dasz es hier nicht einen vorhandenen Besitz zu beschreiben, sondern eine Aufgabe zu bezeichnen gilt, eine Aufgabe, die fuer uns nicht geloest ist, auf deren Loesung sich aber unmoeglich verzichten laeszt. Dasz der heutige Lebensstand uns hier keine sichere und freudige Bejahung zufuehrt, das wird genauer zu zeigen sein;

“处现在的时代提起‘人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没有’的疑问的人，定会是很明白这不是要叙述一个实在的所有物，反是在表出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是还没有解决的，然而它的解决是决不容放弃的。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没有引到何等确实而可喜的肯定于我们，这是下面还要详述的，……”

原文中的der kann nicht zweifelhaft darueber sein, 本

来是“他不能对于这一点怀疑”，因为与下文不好连结，直译为“定会是很明白”了。hier 字在这地方，本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译作“在这地方”，不仅使语句太长，更会使人难懂，所以把它丢了。es...gilt. 表示要点与目的，这个es我把它译作一个“这”字，因为意义与性质都与原文还不远。

我们看了德文，定会吃惊怎么英文把它截得那般零乱。我是上过英译本的当的，然而也觉得它未免太无聊了。那under no illusion 与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拿译错了的英译文来争论，我真不解胡先生怎的有这种余闲。胡先生把“郁君把五句看作四句，把第二句看作承上的，便错了”很得意似的在那里说，其实德文只有一句半，这真是何苦呢。

这德文的开端一句，长得很，不好译，我的译文虽然译出来了，我没有胡先生那样的余闲去推敲几次，怕是不好懂的罢。而我是素来不知道把错译来骗人的，来自鸣得意的，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

第三，胡先生自己的译文好不好？从德文的原本看起来，英译文，余译，郁译，与胡先生的译文，是都错了的；那么胡先生的译文，由英文看起来，又译得好不好呢？胡先生说这个人译得不好，那个人译得不好，于是乎他自己卷起袖子来译了一个，到底他自己的译得好不好呢？我的可怜的英文，固然是望胡先生的腹胸都望不着，然而侥倖还没有一齐给英文先生拿去了呢。我现在把英译文、余译、郁译，与胡先生所译，都写在下面，并且指出他们的错误。

(一) 英文 Has human life any meaning and value?

In asking this question, we are under no illusion. We know that we can no pose today as possessors of a truth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 The question confronts us as a problem that is still unsolved, whilst we may not renounce the attempt to solve it. That our modern era lacks all assurance in regard to its solution is a point we shall have to establish more in detail; ……

(二) 余译 “人生有无何等意义与价值? 有此种怀疑的, 并非为幻想所支配。我们有自知之明, 知道我们不能冒充真理的主人, 不过必须从事于真理的发见而已。烦扰我们的, 是这个未曾解答的问题, 然而我们对于解决的尝试, 决不可以厌弃。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以前各派说全无一点确实, 往后我们要详细的指明。”

(三) 郁译 “人生究竟有无什么意义与价值? 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是明白的了。目下我们只能求那一种真理的发明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装作已经是会得那一种真理的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面前, 还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来拒绝了。我们现代,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还缺少种种确实的地方, 这就是教我们将来不得不更加详细造就之处。”

(四) 胡译 “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 我们发这疑问时, 并不存什么妄想。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能自以为已得了一种真理, 只须把他发挥出来就是了。我们虽不可把解决这问题的尝试抛弃了, 然而这个问题现在还只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竟全无把握, 这一层是我们往后要详细说明的。”

费尽大力把这几种译文抄完了。英文译得不好，我在前节已经说过，余译本的“自知之明”“烦扰我们的”“以前各派说”真是烦扰我们的，太不成话，已经郁胡两先生指出了，我现在写得疲倦了，我只就郁先生与胡先生的译文谈谈罢。

胡先生说：“这里共五句，第一句是独立的，第二句是起下的，不是承上的。郁君把五句看作四句，把第二句看作承上的，便错了。第二句余译‘有此种怀疑的’确是错的；但under no illusion 余译尚无大误，郁译为‘大家都是明白的了’却是错的”。

德文的原本只有一句半我在前节已经说过，英文把来译成五句，本来是不好的。郁君也把开端的问语做了一句，何尝说是四句呢？他或者把余译的中文看做了四句，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要余先生才能决定的。胡先生竟说是错了，未免寻得太费力了罢。

“第二句是起下的，不是承上的。”我不知胡先生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我不知胡先生是怎样妙想天开，忽然把第二句抬头另写的。在德文的原本内，第一句问语固然是第二句的子句，即英文的this question亦明明表示第一第二句的关系很密切。胡先生的看法，我总想不出一个理由来，胡先生是译它呢，还是改它呢？未免太武断了罢。

“第二句余译‘有此种怀疑的’确是错的。”余译不仅与德文巧合。即把英文来说，这句英文应当译作“我们发这疑问，并非为幻想所驱使”而“有此种怀疑的”与“我们发这疑问”不过直译与意译之别，比胡先生的“我们发这疑问时”好得多，我倒不能不替余先生叫屈了。

“under no illusion”胡先生谓郁译“大家都是明白的了”

是错的。我不解胡先生为什么这等不赞成意译，偏要主张自己的“妄想”。“大家都是明白的了”紧接第三句的we know比“并存什么妄想”怕弊病还要少一点罢。

胡先生说：“郁君的改本竟是全不通了。他把句末的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一个形容词的分句，搬到前面去，变成表‘时候’的副词分句，更是错的。”

第三句的这个分句，余先生与胡先生都弄错了，并且都是错在把一个说明的分句，看做了一个对立的文句。但郁先生于文意语法尚无错误（参看德文与英文的拙译），并且他的“日下”、“时候”与原文today相关，也并不是把这分句变为表时候的副词分句；“日下我们只求那一种……”的“那一种”，便是英文的which呢。胡先生既知道这是一个形容词的分句，怎么又把它译作“我们现在不能自以为已得了一种真理，只须把它发挥出来就是了”，使一个分句变成一个对立的文句呢。这样的豹变，不仅语法上错了，意义的轻重不更是大错特错吗？

胡先生说：“此字（whilst）在此地与although相等，当译为‘虽’，在中文里‘虽然’的分句应该移在前面去。”

假使胡先生所说whilst = although是真的，那么，英文的“……unsolved, although we may not renounce……”应当译作“我们虽然可以不抛弃……，然而……”即是“我们虽然不抛弃……然而……”即是“我们纵然不抛弃……，然而……”怎么胡先生的译文，又偏偏不是这样的呢？

假使胡先生所说的whilst = although是错了的，那么，这英文的第四句应当译作“这个问题现在（虽然）还只是未曾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我们不可把解决这问题的尝试抛弃了。”

怎么胡先生的又偏不是这个样？这一句重在后半句，我真不解胡先生为什么要一只手把英文的前半句拉下来，一只手把后半句顶上去自寻烦恼呢。郁先生把whilst译作“所以”确是错的，然而于英文意义上的轻重，却没有颠倒改变。象胡先生这般把人家的文句，译得七颠八倒，轻人之所不轻，重人之所不重，这种错误比错十个单字还要厉害呢。

综合以上各点看起来，郁君的译文中的错的是：

1. whilst不应译作“所以”。

2. 第五句的establish不应译作“造就”。然而我们翻转来看胡先生的错误是：

1. 第二句不应由第一句分开，擅改原文，这是大错。

2. “In asking this question, ……”不应译作“我们发这疑问时”。这不是叙述发疑问时的心理，仅是说明发疑问的原动力，所以应当译作“我们之发这疑问”。

3. “under no illusion”不是“并不存什么妄想”这语意是under the influence of no illusion 即是“并不为幻想所驱使”。“妄想”二字也不对。

4. “which we have but to unfold”是一说明的分句，不应当译作“只须把它发挥出来就是了”，使与“我们现在不能……”为并立句。并且“我们现在不能自以为已得了一种真理”。之后，接着就是“只须把它发挥出来就是了”真是笑话。无中也会生出有来，真是新的笑话。which这时候也没有continuative的性质。

5. 第四句不应当把原文先后颠倒，使轻重异地。照胡先生的译文，似乎这句的要点，全在“这个问题现在还只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了。这是什么话？

明出来（表明它是这般那般的一个东西）倒是我们（在这地方）要做的事。这个疑问在我们面前……”

我在上面说了许多话，现在把我所说的要点再写出来谈谈：

第一，我认为胡先生所取的，不是学者的态度。

第二，我说胡先生对于一个德文的问题，应就德文去研究。

第三，我说胡先生的译文，由英文看起来，也错得太厉害。

我对于一切的问题，都主张取学者的态度。象胡先生这种抹杀他人的论旨，压迫他人的言论，凡是研究学问的人，都是应当自行禁止的。因为这种闹意气的非学者的态度，是必然地阻碍进步的。

不论什么东西与事情，总有他们的轻的与重的方面；我们要先把轻重分别出来，方去议论才好。比如郁君的那篇《夕阳楼日记》，明明在对向那些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的先生们，要求他们悔改；明明说“因为没有工夫去看近来出版的书籍杂志，所以也不能举出确实的例来，但是偶然买了一册……”。胡先生既知道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的是误人子弟的事情，当然是没有话说的了，怎么偏要把无关紧要的一例拿来驳，临到辩得高兴，率性跳出轨来说什么“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呢？我不解胡先生为什么总辩不出事情之轻与重。我们只就胡先生这圈了又圈的名句，都可以看出胡先生缺少轻重的判断力。因为译书的后面，常有庄严的偶象俯瞰着，对于人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至于创作呢，胡先生既加了他一顶刻有“浅薄无聊”四大

金字的帽子，别的人对于那些“燦光灿烂”的陈尸，都还有应接不暇的形势，谁来理它，更谁来受它的误呢？所以这两种东西，是绝对不可把来同日而语的。并且这里面还有一层时代的关系，创作是时代的出产，被时间严格地限制了。译书当然也免不了时间的束缚，然而这是由我们的努力可以征服的。即如余先生的译本，假使他稍有一点责任心，决不会生出把confronts认做confrond与那些“自知之明”、“以前各派说”的笑话。即如胡先生的译文，假使胡先生稍把原文的线索轻重分别出来，决不会有那种使人莫名其妙的错译。所以创作与译书，是决不可同一视的。总而言之，胡先生既把他人一篇日记的轻重看错了，又把几句英文的轻重译错，把来出版，又把创作与译书的影响的轻重弄错——这种种的弄错，是我所不能不引为遗憾的。而我所最引为遗憾的，尤其是胡先生把满足一时的快感，与畅发一己的意气看得太重，把借端反噬、靛颜护短、鄙夷创作、滥事重翻等种种埋伏着的隐忧看得太轻了。

我想胡先生是决不会为那些“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的先生们来辩护的，因为他们实在没有辩护的可能性，胡先生的意思也未必就在这里。不过我们说话，还是直言不讳的好，假使胡先生的意思，在为他们辩解或是另外在什么地方，倒是爽爽直直地说出来的好罢。

胡先生是我们学界的名人，谁都知道的。可是我始终愿他莫丢掉了学者的态度，因为这是使学问有进步的关头，也是使学术有威严的要点。我们中国现在进了步的地方，如包办国家、包办政治等等固然很多，然而最不进步的，就是我们的学界。多少错误的译书，横行海内，莫之敢指，间或指出来，还要挨一顿骂，这真怪不得郁达夫要发“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

进步呢？”的感慨呢。

写了这许多，也不知道写了什么不对的话没有。我相信我的主张，大体是不错的。若是有对不起胡先生的地方，我先在这里告罪了。可是如果再有人跳出来骂人，那我预先在这里告了恕不奉陪的罪罢。

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1922年12月《创造季刊》1卷3期）

编辑余谈

我们这种小杂志，自从达夫编了第一期，放出了呱呱落地声之后，接着就由沫若编了第二期，现在又由我接生第三个畸形儿了。第一卷的一、二、三期，就接连换了三个人来编辑，我们的爱儿，也就可谓难产了。我们深深领会了创业之艰难，然而这怕不是将使我们的爱儿，在爱他的人们面前，更增加他的重要与意义之宠赐？

关于我们这个小社，沫若在第二期中，已经说得很明显，我们是没有何等的限制的。朋友们！请说：这是我们大家的公有。我们最初发起的同人之中，就含有医科、法科、理科、工科各方面的人在里面，所以我们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们希望把我们真挚的努力，贡献于我们全国界的同胞，我们也欢迎各界同胞有益的批评与优秀的作品。

本期的内容，一半是第二期剩余的几篇小说，一半是新加的几种，所以小说特多，诗、戏剧与批评却甚寥寥，这大约是这几个月间同人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倾向小说方面的缘故。

从本期起，每期于“杂录”栏中，新加各国名著的翻译，因为优秀的译品，本来不啻是一种创作。然而，我们的努力，终当以创作为中心，间登翻译，不过为的增加爱读者诸君的兴会罢了。

我在本期的杂录栏中，做了一篇攻击下等出版物的《歧路》。这是我个人的紧急的独断的一弹，关于这方面的行动，

我还不曾与同志们商量，然而我深信他们一定会承认我这一弹是很得当的。我们一方面与全国的同志们，建设我们的新文学，一方面对于我们前面的妖魔，也应当援助同志们，不惜白兵的猛击。这丑恶的妖群，固然不免可惜了我们贵重的弹药，然而他们的横奔，是时代的污点，是时代的奇辱。时代要求我们把它的污点揩了，把它的奇辱雪了。朋友们！请来同我们更往前方追击，把他们的战线，一条条的夺了，把他们由地球上扫除了罢！

第四期想出一个雪莱纪念号，纪念英国天才诗人P. B. Shelley的百年忌。同人中已有多人担任撰述。国内外朋友们如惠赐稿件，不论撰述评论、翻译，均所欢迎。

我编好了本期的时候，很觉得我们的季刊中，还缺少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关于文艺上的意见与近来的研究，然而不论用主观或客观的方法来为文艺的理论或实际的讨论，总是有益处的事情。所以我很希望同志们，以后逐渐把自己的研究或心得发表，大家来研究。

以后稿件，请直寄：“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东五弄一二一成仿吾”。第四期定于十一月二十以前付印，请大家莫忘记了。

（原载《创造季刊》1卷3期，1922年12月）

歧 路

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女神》五面

我们一个人日常所做的事情，若不特别注意看起来，真是平常得很，真是寻常茶饭事一样。然而假使我们仔细看起来，人生才真是比在一个广漠的平原里行路，还要人思量，还要复杂；我们的一举一动，不仅碰着了一些层出不穷的歧路，不仅由他们中间取了唯一的一条，与其余的分别了，而且我们取这一条，同时就在我们面前，新创了无穷的歧路。一件件事情，一个个的地方，没有一分钟，在我们的面前，不形成一些层出不穷的歧路；没有一分钟，不要求我们为紧急的思考，与适当的选择。然而我们日常所做的事情，却少有经过我们的思考与选择的。这有点似乎不是合理的事情，然而确是事实，并且我们的社会，为的这种事实，已经受苦不少了。

譬如手里闲着没有事情，随便抽抽烟卷，却不道几千万个的“袁头”，轻轻地跳进了外国人的袋子里。

譬如在小店子里买得出来的东西，偏要往大洋货店里去多孝敬孝敬；譬如坐黄包车可以了事的地方，偏要往大车行里雇一辆汽车挥阔挥阔，一方面却含着雪茄，皱着眉黛去思索：“社会的分配之不平均，怎的只管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呢？”

我们中国人现在一齐站在一个很重要的分歧点！守旧呢，

还是革新？向尊贵的军阀拍马屁呢，还是与污秽的同胞一路走？甘愿穷苦终身呢，还是去伴火打劫？甘愿埋头去研究呢，还是出出风头，学学时髦？……

现在的时代，一天天跑到我们的门口，催促我们为紧急的选择。顽皮、愚蠢、懦弱无能的小伙伴们，却还没有十分的勇气，当面把这问题来思考，只想一天天把它延挨下去。然而我们纵然可以糊涂一时，这笔账总是逃不了的；我们的将来，在那边做了抵押品，这笔账若不完清，我们不可不知道我们的将来一定是不能再为我们所有的！

这是对于一般的人说的话。现在的时代，还在我们新的青年面前，设了一条更费人思考、更加重要的歧路。关于这歧路的选择，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应当如何重视，应当如何急起——这便是我在这里所觉得不能不说的话。

这是怎样的一条歧路呢？

世间不少奇怪的事情，然可最奇怪的，莫过于我们文学界的现状。象革命时的满清督抚一般，一时抱头鼠窜，逃得无影无踪了的。《礼拜六》自从去年复炽以来，几个月的工夫，就把它的一些干儿干女、干爹干妈之类的东西，差不多布满了新中国的全天地，到了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之中，一天天增加的，几乎尽是这些卑鄙寄生虫拿来骗钱的齷齪的杂志。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这是何等的时代错误！复辟真的成功了么？

我说他们卑鄙，我说他们的出版物误人，除了少数自觉了的青年之外，多数的不自觉的青年，与一般老妖恶少，还许说我是说过了火。我们知道这些卑鄙的文妖，不仅有一般老妖恶少，为他们的中坚，他们还用种种下贱齷齪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的浅薄劣等的心理，把多少无知的纯洁的青年蛊惑

了。然而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惜最后的一弹的。

这些《礼拜六》、《晶报》一流的东西，虽然也是应运——应恶浊的社会之要求而生的，然而他们已经积成应运以上的流毒了。他们的罪恶，可比天上的繁星，我现在只略举其大一点的：

第一，他们是赞美恶浊社会的，他们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

第二，他们专以鼓吹骄奢淫佚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教育。

第三，他们专以丑恶的文章，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他们是我们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奇耻。

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只就这三项之中，你们能宽容那一项？现在的时代在你们面前设了的，一条重要的歧路，就是这里！

你们能赞成他们么？你们能宽容他们么？

现在的时代要求你们火急的决断：

“往他们的路上走么？不然就断断乎反对他们罢！”

这些卑鄙的文妖所出的恶劣的杂志，我因为不甘糟踏了宝贵的光阴，所以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然而我们只要把它翻一翻，就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评语——就是“该死”二字。

他们的流毒，我已经说过了，我现在专就他们的文字谈谈。他们的文章，固然不是文学的作品，只能说是文字的游戏，本来没有何等的真价，值得我们来批评，然而若有人问我“他们的文字到底那些地方不好？”我却也不妨略举几点出来说说。

第一，文学是批评人生的，他们不仅没有高级的批评的眼光，颠倒把人生最贫乏的种类，社会最丑恶的地方，只就表面

去描写，尽力去赞扬，尽力去美化。这是思想的缺乏与态度的“不诚”。

第二，文学的真价在有特创（Originality），象他们这等思想上手腕（Technique）上都是千篇一律，没有特创的东西，当然是没有价值的。新的文学作品，纵令如何不好，作者的个性总会看得出来，只有这些先生们的东西，不论是谁作的，就好象一块印版印出来的，不差一点。这是因为他们甘愿把自己埋灭了，去迎合社会一般人的浅薄的心理之结果。那些为妓女们做起居注的先生们，就是这种卑劣得最可怜的心迹之皮囊罢。

第三，这些皮囊除了种种中国人固有的缺点与他们特有的丑恶之外，别的东西是一点都没有的；换一句话，就是他们没有文学家应有的素养，够不上冒充文学家，他们的无聊的作品，也够不上冒充文学的作品罢。

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这些文妖在社会上的流毒既然那般大，在文学上的价值又那般少，你们还要天天去买他们的东西来看么？那么，你们毕竟也是不经思考，就决定同他们一路去不惜阻碍我们社会的进步么？

你们多以为国语的文学，是应该人人看了都能了解的。我们的新作家的作品，有许多人说看了不甚透彻，你们把这一点做理由，就把新的创作丢了，去着旧的皮囊么？那么，我大胆在这里叫一声：“这是你们自己的学识不充足罢！”

我们现在的新作品，或许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这里面当然也有许多的理由存在），然而时间是要使将来的新作品与将来的你们互相接近的，并且你们切不可忘了，你们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分歧点上。你们不要不加思考，顺势同那些老妖恶少，

走上那条歧路，因为新中国的将来，也是依你们的决断而左右的啊！

还是替那些无耻的文妖，多销一份么？

那么，我劝诸君想起把害人的文字换了钱，吃得猪一般肥的作家们，想起他们那油滴滴的厚脸，想起他们那快心的冷笑，想起他们无时不在笑话：“铜香的宝贵的字儿！现出来，一个一个连贯起来，给那些不尽的蠢东西们拿去读来罢！”

我还劝诸君一想：诸君丢钱给他们，这们更要加胖，排泄作用的结果，更会产出一些《礼拜五》、《月报》、《绿》等类的东西来。诸君纵或甘心同他们一路走，至少对于诸君的子弟教育上的影响，怕应当把一点良心出来负责任罢！

我还劝诸君一想：我们现在的青年，随便把外国任意一国的青年来比，不论学问、精神、体格，没有那一点不教我们放声痛哭的。他们的青年作的是什么事，读的是什么书？我们的青年读的是什么书，作的是什么事！堕落到这层光景，还不快去饱享精神的粮食，还要去嚼猪粪么？我们，我们最亲爱的东方的文明古国，终不能不止于是时代错误的象征么？

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现在的时代在你们面前设了这样的重要的一条歧路。

现在的时代要求你们即时的决断，禁止你们助恶的行为！

现在的时代要求你们去读更有益更有价值的书，万一你们不能读，要求你们去打开你们的黄金时代很丰富的典籍！

现在的时代要求你们唱的诗歌，是这般的：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中华的改造
正赖吾曹！”

——《女神》一〇〇面
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原载1922年12月《创造季刊》1卷3期）

评冰心女士的《超人》

冰心女士在《小说月报》的第十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超人》的短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我也觉得这标题新颖得很，便也怀着一肚子好奇心，把它翻看了一下。我记得那时候的感想，第一，觉得有点被那个标题骗了似的；第二，我总觉得这里面穿了几个大孔，作者本人似乎始终没有把它看出。近来又在《小说月报》的第十三卷第九号上，看见了署名剑三的一篇批评的文字，又在第十二卷第十一号的《小说月报》里，也寻出了潘垂统君的评论，好象都说冰心女士的这篇作品，是她整个思想的最高的表现，所以我又把那篇小说翻出来看了。可是我第二次把它看完了的时候，我仍觉得一年多以前的感想，依然没有多大的变化，很顽固地主张自己，虽然中间夹着了两篇还不能说是文艺批评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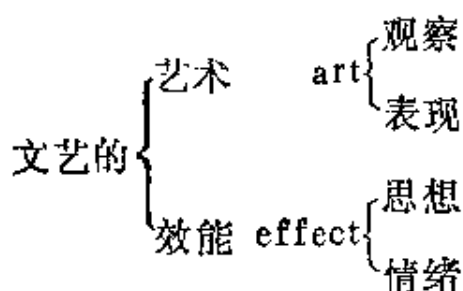
这小说为什么要叫做“超人”，虽然冬芬君的附注上说：“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我却至今还是不懂，但这是作者的自由。作者对于“超人”这个字，或许有特别的见解，不过我们要知道作者在这篇作品里面，实在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超人，并且她也无须告诉；所以若有人说何彬就是作者意中的超人的表现，说这样才是超人，那样不是超人，那就不仅是武断，而且要被作者暗笑了。（题目与本文，本来没有关系，不过许多的人，每每把它们误解了，我才顺便说及。）

就上面的两节看起来，倒象是我在做批评的批评了。批评

家的观察与表现对不对，本也可以把做对象去批评，不过我的目的，是在这里想把冰心女士的《超人》评论一下。——象其余的批评家一样，把话说谦恭一点，那么，我是想在这里把我一个人关于《超人》的意见说说。

冰心女士的作品，我看得不多，但是我仅由她的小说，都可以看出她的诗人的天分很高，艺术家的手腕很足，就是她这篇小说，都比那些诗翁的大作，还要多有几许诗意。她那丰富的想像力与真挚的心情，都很可爱，精细的描写与伶俐的笔致，也都把女性的特长发挥得出。但《超人》这篇小说，我却不敢说是成功的作品，我现在取纯正的态度，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供大家的参考。

凡由一种文艺我们能取为批评的对象的，是：



效能与艺术虽然不是可以独立分离的，然为文艺批评时，便宜上却不妨分别出来研究。

《超人》这篇小说的宗旨，有人说作者的意思，是想表示由否定Verneinung达到肯定Bejahung的一种经过。就是：

否定——>肯定

这种经过，本可以由种种的路途达到，《超人》指示我们可以达到的方法，却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爱的实现。那么，这种经过是：

否定——>爱的实现——>肯定

假使我们把《超人》依这种形式分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各部分的表现，工夫还没有做到。作者的观察不仅没有深入，反有被客观的现象蒙蔽了的样子。

譬如写何彬的否定的时候，作者的描写止于是一些客观的可见的现象；主观的心的现象，少有提起。这确是表现上的一个缺陷。并且开首第一句就说：“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后面又说他面色冷然，好象作者真的想把何彬写到极端否定的样子，这是不对的。近代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不在于把一切都否定了。而在于只是怀疑与苦闷，什么也不能肯定。否定是负号的肯定，近代人若能真的否定起来，倒也可以减少多少痛苦，可是近代人之不能否定，正犹如他之不能肯定。真的近代人只是怀疑，只是苦闷，苦的是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何彬对程姥姥所说的话，很显出了他的怀疑，只是不甚深刻，也没有把他内在的苦闷写出来，看去时只越发增高了他的冷度。我在这地方觉得作者的观察不深，不出客观的现象以外，反被客观的现象瞒过了。并且由极端的否定转入肯定，不是经过一种媒介Medium所能办到的。这样的由这边转到那边，必先有它的可能性Possibility，就是要先到一个可以左可以右的一个零点Zero Point，这样的零点，就是近代人的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的怀疑与苦闷的状态。由零点进而肯定，不可不有一种媒介，由否定达到零点，也不可不有另一种媒介。所以把否定到肯定的全过程写出来的时候，就是：

否定——→媒介甲——→零点——→媒介乙——→肯定

换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由否定达到肯定，不可不先由媒介甲的作用由否定离开，达到可左可右的零点，然后再由媒介乙的作用，离开零点，直达肯定。所以象《超人》那样

把主人公写到极端否定，不仅理论上说不过来，还使结构上生了一层缺陷。凡我们对于一个现象，不应当只就他的表面观察，应当把藏在表面下深处的实在看出来，才能够不为客观的现象所蒙蔽了。何彬这样的人，就《超人》的后半看起来，确是易于感动的人，他的泪珠好象不时充满了他的双眼，只等盛泪的东西现出；他确是应当是在零点。若象《超人》这样写出来，那就不过是一个神经质的感伤主义者Sentimentalist了。所以《超人》若真是想表现达到肯定的经过，就还应当把怀疑与苦闷的热与力写出来，不要把他们看脱了，更不要说那些冷心肠的话。《小说月报》上的一个批评家很称赞这个冷字，说：“是作者苦心用力写的，十分伤心，包含着许多眼泪，读完这篇东西，细想这个冷字而不哭，那真是全没心肝的人。”这种旧式的、不讲道理的、狂热的批评，不仅于文艺批评没有丝毫的益处，反易使人把文艺批评误解了。为文艺批评的人，应当还要冷静一点，应当还要严肃一点，应当深就全体的效能与艺术观察——用冷静严肃的态度观察，也用冷静严肃的态度表现出来才好。

又如写爱的实现的时候，用了一场梦境，这自然是很经济的写法；但这场梦境偏插在“至人无梦”以后，这确是自己无故把“三夜的往事”筑起来了的效能，削成强弩之末了。那梦境前的“睡下的时候，他觉得热极了”，虽然即刻用“累了两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之类的女性特有的逻辑logic来注解，却也掩不了勉强的痕迹。禄儿的那封信，有人说是不大近现实，本来我们现在的社会程度太低，他们表现自己的能力太薄弱，原不仅一个无知识的禄儿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的上流阶级以及知识阶级，我们都不能在他们的言论中，表现我们

所要表现的思想与情绪。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却不仅不说作者不好，因为时常感觉同样的苦处，我反不禁要表示同情于作者。我想可以在这里警告我们的青年作家，不要再想在现在的一般人的言论里面，织入高深的思想，我们暂时不能不丢了这条路，我们以后只能在干燥浅薄的言行的全部之中，取曲径把我们的思想徐徐地暗示。既要顾及实情，又要不堕入浅近的自然派的临写，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他法，这固然是很难的事情，不过我想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最后作者写何彬肯定的时候，我觉得热有而力实不足。本来最初写得那般冰冷，接着又勉强布了一回梦境，又使禄儿写了一封很勉强的信，这全体的效能已经是很勉强的了；而作者写何彬肯定的时候，又只用了他一封感伤的Sentimental的信，与满面的泪痕，他的举止，却仍没有洒脱最初的灰色与冷度。我们由他的肯定，丝毫都看不出肯定的动力的效果，所以这全经过倒象微风偶过，在水面上吹起一层涟漪，不久又仍归寂静了。真的肯定应当在本人的一生中，涌起永难消减的一回激荡，而以余力深深地给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于读者的心里。关于这地方，冰心是疏忽了一点的了。有人说看了何彬的信，就觉得非哭不可，但这是这封信的Sentimentalism的成功，不能扯到全体的效能上去。小说家最大的努力，应当注在小说全部的Dramatic effect，批评家也应当持冷静的态度，在这些地方注意，不要学那些旧戏迷的喝彩。旧戏迷不解艺术，也不讲效能，唱得又高又久，舞得又奇又怪的，便不惜高声的喝彩，至于这些歌舞对于全剧的艺术与效能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不管的。真的艺术作品，决不靠哪一部分的完善；艺术作品的完善，也在它的各个，也在他的全体as a whole。这全体应是多样的

统一，一部分的出风头，弄得不好，便会把统一破坏。《超人》的这封信，能使人不禁哭起来，实是它意外的成绩，然而专就这封信说，我都觉得热有而力不足。

以上所言，是依许多批评家的评论，把《超人》作为描写一个人由否定达到肯定之经过的作品，再把它剖解考究所得。究竟冰心女士作这短篇时，她自己的意思如何，我们无从详悉；所以这样批评，究竟有什么意思，完全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我们由一篇作品，也不是决不能看出作者作那篇东西时的意思，我们多少是可以看得出的。我们所看出的作者的意思，与作者自己当时的意思，是不是一样，能不能一致，是在批评家的观察力的大小，与作者自己的意识明显的程度；有时批评家竟能看出作者自己还没有觉到的地方，也是有的。冰心女士作《超人》这篇小说时的意思，许多的人都由事件的进行与结果，说她是想描写一个人由否定达到肯定的经过；然而这种观察的方法，难免过于是印象的，难免不使旧的远的印象为新的近的印象所蒙蔽了，所以我想最好还是用一种归纳的方法。

当我们把《超人》仔细读过一遍的时候，奔涛一般起伏的诸印象之中，超群出类的共有三个：第一、没有爱的（孤独的）生活；第二，过去的追忆；第三，爱的实现Realization。它们的关系是：

没有爱的生活——>过去的追忆——>爱的实现

就是从没有爱的（孤独的）生活，由过去的追忆，达到爱的实现的一种经过。我在这里提出过去的追忆，或者有人不赞成，然而我敢说《超人》的最重要的内容就在这里。我想作者当时的意思，也不外是想描写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永远相牵，永无中绝的关系。我不想在这里说及我们一个人怎样忘不

了自己的过去，怎样眷恋，怎样渴想；然而我们一生的历史，很无情地一页页翻过来了，永无回复的可能性，事越不能，我们越想只在我们这种想念之中。我们回复了多少过去的我们，寻着了多少过去了的悲哀与欢喜——那一样地要求我们感激的！当我们表出这种陶醉的感激的时候，谁能不被波起狂热的共鸣？《超人》得力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而就我所新提出的经过看起来，《超人》的艺术，也仍不免有我前面说过的几层缺点。她写没有爱的生活，也只就客观的现象描写，也错在把何彬写到了极端的否定；她写过去的追忆，也很安插得勉强；她写爱的实现，也是热有而力不足。并且作者似乎没有把爱的真谛看出。真的纯洁的爱，在授而不在受，在兴to give而不在取to take。爱好比黄昏时分的飞鸟，是要寻出可以栖息的一枝的，不得其所，是不能安息的；然而何彬是何等的无气力，何等的冰冷！

此外还有最后的，或者真与作者的本意一致的，一种观察。何彬的信中说：“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她带了你的爱来感动我”。就这些地方看起来，似乎作者的意思，不过是想描写一个没有爱的人，如何想起了慈母的爱情的一种经过。如果作者的意思，真是这般的，那就未免更琐碎了。

我写这一篇东西，丝毫没有把《超人》故意说坏的成见，不过想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有许多的话一定有人不赞成，也有许多的话，说得不十分彻底。冰心女士的诗人的天分是很高的，我在前头说过，不须再说了。不过她的作品，不论诗与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缺点，就是她的作品，都有几分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了的模样。一个作品的戏剧的效能，不

能靠抽象的记述，动作action是顶要紧的，最好是把抽象的记述投映Project在动作里。我们的旧小说多被动作(实事)胀坏了，然而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也是过犹不及。这许是冰心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的结果，我在这里顺便谈谈，也许不无益处。

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原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1卷4期)

《沉沦》的评论

郁达夫的《沉沦》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他不仅在出世的年月上是第一，他那种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就是一年后的今天，也还不能不说是第一。他的价值是大家多已经知道的了，我也不须再说。我在这里只想把我对于《沉沦》的观察写写。

我们于读完一篇作品之后，回头来追究他所写的是什么的时侯，有的一目便能了然，有的却也很不容易决定。譬如神秘的、象征的或讽刺的作品，每每甲看了这样说，乙看了却那样说。就一般的情节说起来，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作品是很容易决定的，然而也不一定都是这样。

《沉沦》出世之后，有许多的人说他是描写灵肉冲突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没有听见人家说过什么别的意见。那么，他真是描写灵肉冲突的作品吗？我对于这一点，是很怀疑的。

假想灵与肉是两个独立的东西，那么，灵肉的冲突应当发生于灵的要求与肉的要求不能一致的时候。但《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做描写灵与肉冲突的作品，那不过是把我们这世界里所谓灵的观念，与这作品的世界里面的肉的概念混在一处的结果。一篇作品自有它自己的世界；它有它自己的标准，有它自己的尺度。把另一世界的东西与它自己的混在一处思量，是犹如想把斤两换算为尺寸，不仅

是徒劳而且未免太无意义了。

假想灵与肉不是两个独立的東西，假想灵的要求只能由肉的满足间接地得到满足的（在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这是很可相信的一个见解）。那么，灵肉的冲突，应当发生于肉的满足过甚的时候；因为一方面满足的过甚，未有不引起他方面的痛苦的。然而《沉沦》的主人公，我们很知道他是因为肉的要求没有满足，天天在那里苦闷的。

固然我们的主人公，因为他的种种犯罪，时常后悔，也时常自责；然而这都不过是因为他的满足是不自然的，是变态的，决不是一方面那般热烈地要求着，他方面却又自己把他的要求否定了。因为既是自己全身心的要求，则这要求的满足，为超过一切关系的绝对的必要；如果有这种人——一方面把自己否定着，他方面却热烈地要求的人，他如不是一个懦夫，便是一个伪善者。我们的主人公不是懦夫，也不是伪善者。

所以《沉沦》这篇作品，是不是描写灵肉的冲突，差不多可以说是不成问题。我们既不可就已成的形式来分别作品，也不宜强他迁就，我们只是老老实实地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的好。老实无论何时，都是最可靠的政策。

肉的要求在《沉沦》各篇里面，差不多是一种共同的色彩；但这个名称是对于灵的要求用的，现在我们既不要说及灵的要求，而我们的主人公的要求，却也不尽是肉的，不专是肉的，所以我想《沉沦》的主要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 *Liebe—beduerftiges Herz* 来表示。

我们的主人公是对于爱的缺乏感觉最灵敏的。孤独的一生与枯槁的生活，也使爱的缺乏异常显明，也使他对于爱的要求异常强烈。他是一个“生的门脱列斯脱 *Sentimentalist*”，他

的感情，不仅比我们平常的人强烈，是忍不住要发泄出来的。除此之外，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失败者，——至少他自己是这般想象；他以冷眼轻视那些“浮薄的尘环，无情的男女”，他要“从那绝顶的高峰，笑看你终归何处”。“但是他的心里，却很羡慕那间壁的几个俗物”，他们有的是欢笑，有的是“温软的肉体”，倾我们的主人公的美好的心情与超等的学识，倾他所有的一切的总和，还换不到他们的生活的一片！我们的主人公时常准备着——并且很愿意地——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倾了，都倾了来装一个对于他更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只看他说：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沉沦》十六——十七面

肉的满足，我们的主人公也并不是绝对的没有：他每闻到“肉的香味”，就要“不知不觉把这气息深深的吸了一口”才肯舒服。然而从这一阵气味的压迫，恢复了他的意识的时候，他每觉得画虎不成，反得一犬，便早悟到“我所求的爱情，大

约是求不到了”。这时候社会生活的失败，也如黑夜的行云，把它最后的希望的星光都遮蔽了，促他往那唯一的长途上去。

我们只看他说：

“……我就在这里死了罢。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呢！”

《沉沦》七〇——七一面

由以上所说的看起来，我们的主人公所以由这条没有用蔷薇花铺好的短路，那般匆匆弃甲曳兵而逃的，是因为他所要求的爱没有实现的可能，决不是为了什么灵肉冲突。他是以全部的热诚肯定他的要求的，他还鄙薄自己胆小，鄙薄自己是一个懦夫。只有不自然的满足与变态的欢娱，引起了她多大的恐怖与不少的后悔。

以上是专就《沉沦》一篇而言的。其余的两篇——《南迁》与《银灰色之死》——所现的也是同样的彩色。我这种观察，记得在东京时，曾与达夫谈过，达夫似也首肯。后来出这部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他自己在序文上又说是描写灵肉的冲突与性的要求。是故意装聋的呢？还是他自己作序当时真的是这般想？我可不知道。不过我这种观察，我想现在都还可以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沉沦》的艺术，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不过它也有它的缺陷，却是的确的。譬如《沉沦》的结尾缺少气力，确是美玉的微瑕。除此之外Wordsworth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与歌德的《迷娘歌》都译得不甚好，《迷娘歌》的末句，是不可

那般译出来的。《迷娘歌》本来不好译，我试了一下，也难得恰好；《孤寂的高原刈稻者》却把他译了出来，觉得比达夫的好一点，我现在抄在下面，希望达夫于四版时改正。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看她，独在田陇里！
那孤独的高原的女孩儿！
看她刈着还歌着，一人独自，
为她止步，或轻一点儿！
她一人割下还把来捆了，
又歌起她的哀调；
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歌唱的清音。

谁能相告，她唱的什么？
她那朴质的清歌，
许是过去的劫磨
 与酣战的前朝；
或是一些坊间的小曲，
现时的风俗？
也许是自然的痛苦与悲哀，
几回过了，今却重来！

圣诞节前日。

（原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1卷4期）

《残春》的批评

对于一种文艺作品，有许多的人，每喜欢从外界拿一种尺度去估价，每喜欢拿一种固定的形式去强人以所不能。这种行为，酷肖我们的专制君主，拿一只不满三寸的金莲，去寻他梦里的尤物。这不仅要强人以削足适履，而且于美好不美好，也丝毫没有关系；而且这种估价的可靠性与结果，我们生在这美好的时代的人，是天天有耳闻目见的光荣的。

究竟对于一种文艺作品，我们应当怎样估价？我想凡是研究文艺的人，总应当早有心得，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谈。然而假使有人要我设一个比喻来说明，那么我可以不迟疑地说：“好象我们举一个人做大总统，看他处这种时势，能成就多少事情。”这便是我们时常说的：“看他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之中，能够有意识地成就多少。”再用浅近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就是看他是不是把他的材料，对于可能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有效地用了；或如Walter Pater所说，看一个作品，对于它的材料履行责任的程度。

一方面我们对于一篇作品，不可把外界的任何形式去束缚它，他方面我们对于作者也不可干涉他的inventive or creative handling 新发明的或特创的方法。他的方法有效没有效，可以成问题，然而不能因为不多见的缘故，就把他鄙弃了。

郭沫若在《创造》第二期上，发表了一个叫做《残春》的

短篇。这篇小说若不注意去看时，是很平淡的，然而过细看起来，才不能不说这正是它的妙处了。它的内容很平凡，很使人不容易知道它的脉路在哪一块；然而它的精神，很明明白白可以用第五节的“S……呈一种非常愉快的脸色，Medea的悲剧，却始终在我心中来往”两句来代表。

S虽是残春时候的一朵可怜的花，却还嫣美恼人，好象丝毫不知春色将残，莺声渐老的样子。可怜的是我们的主人公，Medea的悲剧不住地在他的心中来往！他隐隐感受着一种动摇，急忙离去了，“心里虽然总觉得遗留了什么东西在门司的一样。”

这便是《残春》的缩写。我这样说了出来，就好象一个医生在解剖室研究一个骷髅的样子。其实这骷髅，本来是用超等的技术与优美的表情装饰好了的。

我们主人公的心情是何等的优美！他好象无念无想的世尊，偶动尘心，随即自抑了，更激发了热烈的慈悲。我们只看他回家之后，接了白羊君的信，“不觉起了一种伤感的情怀”，便写了一首诗寄去：

“谢了的蔷薇花儿，
一片、两片、三片，
我们别来才不过三两天，
你怎么便这般憔悴？——
啊，我愿那如花的人儿，
不也要这般的憔悴！”

这是何等热烈的慈悲，何等优美的心绪！

讲到技术上来，《残春》更是没有缺陷的作品。我们只看他用不到一千字，便创造了一个活泼泼的S。除此之外，贺君

的跳水与作者的音容，都是很活泼泼的。

我很觉得在我们今日贫乏极了的文艺界，这篇总不能不说是有特彩的一篇作品。然而十月十二日的《学灯》上，有一篇摄生君的《读了创造第二期后的感想》却单把这篇说得很坏。我看了虽然即刻觉得摄生君的主张，有许多地方很不对，却也打起精神重把《残春》翻出来看了。可是我看了《残春》，又回头把摄生君的批评看了的时候，摄生君的主张，才越觉得没有成立的可能了。我现在且把摄生君批评《残春》的全文抄在后面，然后再把他的主张所以不能成立的理由谈谈。

摄生君说：

“郭沫若的那篇《残春》，除了句子构造艺术手段尚好外，我个人是不赞成这篇作品的。我从第一章第二章继续看下去，简直不知道全篇的Climax在什么地方，都是平淡无味。不过在每章每节里发表他的纪实与感想罢了，而且他，Conclusios也没有深的含意与连络。”

据摄生君的文章看起来，似乎他很主张一篇作品非有一个单独的Climax不可。这种主张，我是认为说不过去的。

摄生君单说全篇的Climax，没有说是什么东西的，然而一个文艺的作品，总离不了内容（即事件）与情绪。在中国一般人的心理，他们所认为不可少的，自然是内容的Climax（最高点）。摄生君的意思，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样，但做一个文艺的理论研究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不可不把两方面拿来作一番严密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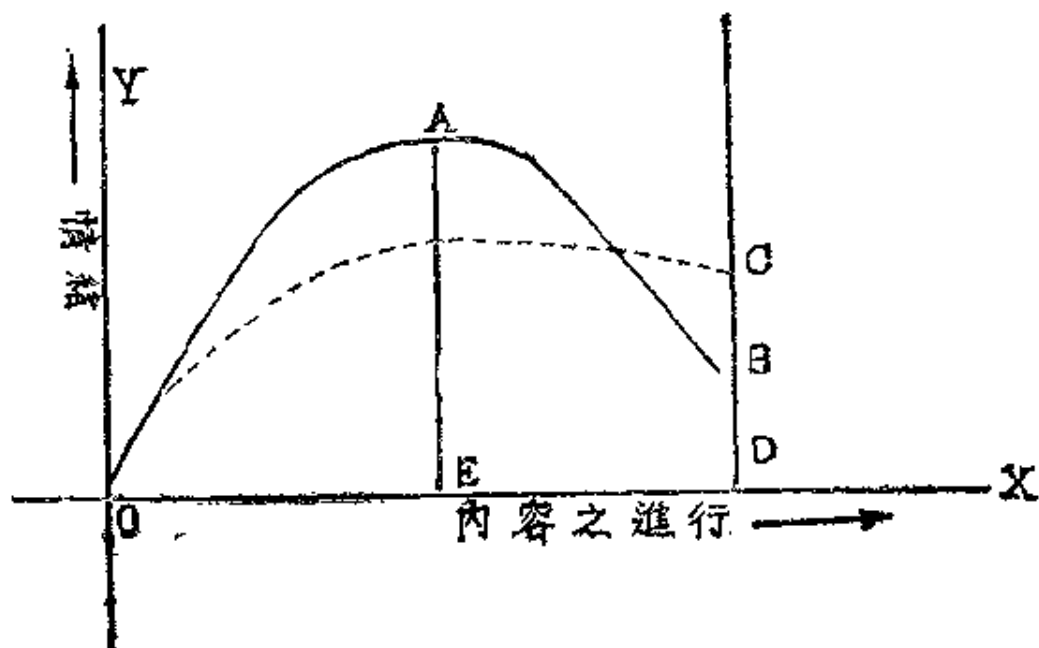
第一，我们先考察一种文艺的内容（即事件）应不应当有一个最高点。

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讲究等级程序的，所以中国人对于一切作品，都很严密地要求形式上的完备，而最要紧的又莫过于宾主君臣的观念了。纵或作者在创作中没有何等君臣的意识，而读者凭自己的主观，在作品中认定一种君臣的关系——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的文艺界里，几乎是大家都认为了一种天经地义的。然而不论什么事情，什么物体，总少不了要他们的Milien（环境），他们决不能离开Milien而犹存在。他们是存在Milien之内。所以一个作者写一件事情或一个物体的时候，只应当看他在他的Milien之内是一种如何的关系就如何写，就是，如他实是asitis。譬如掘根，作者只要使树根由土中现出，任它尚夹在土里，任它还带些土泥放些土臭，如实地描写，既不要把它由土里分出来，也不要用特种强烈的光把它单独地照彻。固然，在我们的心象之中，一个单独的东西，在某一个时候，也会单独地站在意识的最高点，然而就意识的全经过看起来，他也只能够如在他的Milien之内。固然作者凭自己的主观为Milien的选择的时候，由他的选择，可以使单独的一个耸立全体之最高点，然而这种有作用的选择，最容易伤及作品的真实与丰富。所以作者对于他的内容，只要如实地描写，不可把单独的一个，由别的分了出来，用特别强烈的光线来把他显出，就是，文艺的内容纵不能说不应当有一个单独的Climax，总可以说最好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第二，我们再考察一种文艺的情绪，应不应当有一个最高点。

由一般的人看起来，一篇作品应当有轰轰烈烈的内容，这轰轰烈烈的内容，应当有轰轰烈烈的情绪。这种见解，由我们的文学家发表出来的，就是情绪的Climax的主张。这种主张之

错误，我们最好是用一种几何作图来详细注解。



假设文艺的内容（即事件）之进行为横轴，情绪之变迁为直轴。那么，内容之进行而渐次变化的情绪之全变化，当如下图之OAB曲线（假想有一个最高点的时候）：

用文字说出来的时候，就是作品的内容由O点进行到D点之间，内容所诱起的情绪，亦由O经过最高点A到B点。在这种有最高点的变化，有一个最可注意的地方，就是情绪由O变到A之间，情绪是与内容并长，因为这时候 $\frac{dy}{dx}$ 是正符号；情绪由A变到B之间，内容虽渐增，情绪却反而渐减，因为这时候 $\frac{dy}{dx}$ 是负符号。由文艺的原则说起来，情绪不可不与内容并长，因为内容增加时，情绪若不仅不与他同时增加，反而减小，则此内容之增加，个画蛇添足，所以一篇作品的情绪，如果有一个Climax则OE以后之内容，为有害无益的蛇足。固然，我们可以尽力把最高的A点往右边移去，使情绪减少的总和渐小，

使全部的情绪还有赢余，然而这ED部分，无论如何短少，总不免是蛇足。所以与其有一个有害的最高点，我们宁可欢迎没有最高点的文艺，在没有最高点的文艺，情绪是如点线OC那样，与内容渐增，没有减少的时候。固然不免要如摄生君所说，多少是平淡的了，然而由全部的情绪说起来，却比那有最高点的，还要饶有余味，还更有使我们低徊享玩的余音。

最后摄生君说《残春》的 Conclusion 没有深的含意与连络，我不解摄生君所谓深的含意是教训的道学呢？还是呜呼哀哉的哀悼呢？至于连络，我不知道摄生君的意思，是要怎样才算有连络，怎样就不能算是有连络。在我的意思，以为间隔几天也不能说是没有连络。

我看了摄生君的批评，深自觉得拿一种固定的形式去批评文艺作品，是很容易陷入错误的。我不由得要把我的意见写了出来，使大家知道拿一种固定的形式或主义来批评文艺，是很容易把它误解了的，我希望大家先对于文艺的诸原理，还用一种批评的精神，加一番自由思索之后，方去批评文艺上的东西。不要把错误的见解与不精密的理论去批评，去迷惑别的读者。至于摄生君对于我们《创造》的批评，不论是褒是贬，我们都是感激的，而他给了我一个思索文艺批评的机会，我尤感激得很。

一九二二年最后的一日于上海

（原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1卷4期）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

第五十五期的《文学旬刊》上，馥泉君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会的提议》里，说及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打架，雁冰君与振铎君也在后面排了许多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不仅与事实不合，并且有许多地方把两方面都冤枉了，所以我在这里想同馥泉君说说。

关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交涉史，馥泉君似乎没有听见说过，所以他所举出来的理由完全错了。我现在把他的错误一条条指点出来，除去一切的理解。

第一，馥泉君说：“创造社后起，”这确是错的。沫若与我，想约几个同志来出一种文艺上的东西，已经是三四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胡适之才着手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研究会这团体还没有出世。我们的进行很缓，然一直等我们渐次积极进行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才如春笋一般，钻出了土。这谁先谁后的问题，本来无说及之必要，不过与下文有关，不得不从这里说起。

第二，馥泉君说：“他们起初大不接近，这是最大的原因。”这与事实恰恰相反。记得在东京时，有一天在田寿昌那里看见了文学研究会的一个人（郭绍虞君？叶绍钧君？沈泽民君？或别的什么人，我都记不清了），给寿昌的两封信。一封是求他转约沫若同入文学研究会的，一封是骂他为什么不回信的。骂他的那封信，厉害得很，寿昌为了那封信，好象很不好过。由我

们旁观的人看起来，田寿昌接了人家的信，既不回答，也不转告郭君，使人家觉得他骄傲，也使人家疑到郭君也骄傲，在道德上说起来，实在是很不好的事，然而因为这一点，就大骂特骂起来，也不是绅士应取的态度。至于田君没有写回信，我想大约是因为他已经入了创造社的缘故。总而言之，我们由这地方看起来，可以知道馥泉君所说的不是事实，可以知道文学研究会也曾向我们社里拉人，也可以知道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打架的原因，不在起初不大接近，而在起初他们来拉人时，有了这么一个不幸的Prologue，也可以知道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不幸的Prologue，文学研究会对于我们才不惜他们种种无聊的军事行动。他们对于我们所怀着的敌汽心，完全是发源于这一点。这种经过，达夫恐怕还是一点都不知道，沫若也是去年我才告诉他，资平更是一点都不知道了。这些地方，因为与下文有关，要请馥泉君特别注意。

第三，馥泉君说：“文学研究会提倡自然主义，创造社底重要分子，很明白颓废派。”文学研究会提倡自然主义，只要他们不挟多数来压迫他人，我们是不必出来反对的。至于创造社与颓废派的因缘，完全是馥泉君的误解。沫若在《创造》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中，也曾说过，我们并不主张什么派什么主义，我们只须本着内心的要求，把我们微弱的努力，贡献于我们新文学的建设就是了。我们同人之中，有“狄卡丹”的嫌疑的，就只有郁达夫一人，其余都是很健全的罢。我们的取材，多关于两性问题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些求活的青年，都还没有达到鼓吹严肃的教训的道德之高龄罢。并且“狄卡丹”这名称，原是旧派嘲笑新派时用的，译为废颓二字，本来就不好，郁达夫的小说也没有几多“狄卡丹”的气味，更说不到颓废了。他

自己所描写的质夫，不过是一个青年赤条条的自白罢；关于他的作品，一般的人都把他误解了，我在《创造》第三期内有致沫若的一函，关于这一点稍微说了几句，《创造》第三期不日可以出版，请馥泉君参考参考罢。

第四，馥泉君说：“对于文学研究会没有好创作，也是很瞧不起。”文学研究会（只据他们的会章，莫论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行事）总要算是我们的同志罢。我们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创作出来，他们就没有好创作，只要他们诚心在那里创作，我们是决不会瞧他们不起的。馥泉君这几句话很有语病。好象我们创造社的同人也害了中国文人的遗传病——文人相轻——了。我们创造社的同人，最厌恶一般文人社会的种种劣迹，所以我们都怀有不靠文字吃饭的意志。（因为一靠文字吃饭，就难免不堕落了）虽说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同人中差不多各有各的专门科学，所以决不至于故意相轻，故意瞧他们不起。既如现在有许多人笑沈雁冰君只会批评别人，自己不能创作，我现在正在这里作一篇《批评家与创作家》，说明批评家自有他的职务，并不要同时是一个创作者。总而言之，我们只爱真理，也不自矜，也不记人家的旧恶。

第五，馥泉君说：“《创造》创刊号郁达夫兄出来开了一炮，就是暗暗意见变成亮亮的打架了。”据馥泉君这样说起来，似乎这场打架是来自我们了，馥泉君大概把前后的事情忘记了罢。馥泉君！打开窗子说亮话，由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人看起来，我们真是一些闯入者（不瞒你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好笑得很），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些可恶的闯入者，所以只等我们现出头来，他们就恶狠狠地要加我们以凶猛的打击。郁达夫是受他们的攻击最多的了，所以《创造》出世时，他也就开始了

他的防御的炮击。达夫的这种行为，在当时或实在是忍无可忍，然而我想是可以不必的。我们的使命在把他们的大帝国打倒，我们的格言是“沉默”与“战胜”。

第六，馥泉君说：“郁达夫疑心很重。”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人对于我们不怀好意，已经是隐无可隐，加之善于变化的沈尹冰君，实在那里指挥一切。这时候，假使馥泉君处了达夫的地位，不知馥泉君终能不怀疑否？关于《小说月报》的那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我还没有听见达夫说过什么；不过我想馥泉君若真是达夫的好友，听达夫说了那样的话，便应当指出他的误解，使他不致于一误再误。即不然，也可不必告诉那些等着在的人，因为这不仅使两方面更加隔离，且活活地使达夫陷入了他们的陷阱，更送给他们一个快心的话柄，并且他们也不是做不出那种事情的人呢！馥泉君怎的忘了达夫所处的地位，怎的把在他前面的敌人的种类也忘了？馥泉君既这般宣布出来了的时候，我倒要再多谈几句：入陷阱的人是好人，是最后的胜利者！可怜的人们，你们的处心积虑，不过是对于胜利者的无益的反噬啊！

综合以上所说各条看起来，文学研究会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拼死拼命地与我们打架的原因，一是因为田寿昌没有理他们，所以疑及我们的全体；二是因为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气焰正盛，一见我们没有理会他们，很觉得我们是一些大胆的狂徒，无聊的闯入者，就想只等我们把头现出来，要加我们以凶狠的猛击。我们对于这种天外飞来的奇冤与无故相加的狂暴，据我一个人的意思，实在没有值得去理会的价值；不过郁达夫或者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开始了我们的防御工事；而我们的行为，始终是防御的——正当的防御的。以后他们的攻击一天天加劲

起来，达夫才有时候取了攻势的防御。本来防御自己是很正当的事情，并且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我们若不出来主张自己，盲目的人们，说不定还真的把我们当做了劣败者；然而我一个人始终不赞成这种行动，我认为这种事情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可惜了。所以虽说他们与我们打架，其实还没有正式打过，我想也永远不会有，因为他们只从黑暗里放冷箭，我们却要求他们到光明的地方来对打。一个不敢出来，一个不屑进去，热心观战的人们呀！恕我们不能如你们所希望！

馥泉君！你虽然也说了许多未经人道过的公道话，可惜你还是把他们对于我们的不正义unjustice与他们的卑鄙的战术忘记了。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的人数，与他们那么多的机关，但是我们随便到那里，都用我们的真名字，他们却今天用一个假名，明天又新造一个，这里放一枪，那边放一炮。馥泉君！这可说是绅士的行为吗？我们都是些很真挚的青年，正义的面孔，道德的衣裳，一刻都不许我们取与他们同样卑鄙的态度。然而他们当而很笑嘻嘻的，转过脸皮，却又忙着去赶造假名，忙着去安排冷骂。馥泉君！不料文学研究会真被他们弄得似政党一般了！象那署名“损”的先生，如果有人说起就是《小说月报》的某君，我初听了一定不相信，一定以为是政潮中的一个老手，本来他真未免是大才小用了呢！

然而我很感谢馥泉君，我也替他们感谢。因为馥泉君把他们似政党，把他们没有好创作，把他们蹩脚的译本都揭出来了，可以使他们觉悟，可以使他们迁改。不过当《意门湖》被沫若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损”先生还在那里高吹他的“半斤八两”，可见这些人是已经不可救药了的；所以我个人倒希望馥泉君以第三者的资格，为以下的事情：

一、以第三者的资格要求他们用真姓名或一定的雅号。

二、以第三者的资格，忠告文学研究会早自振起，慎选几个能真为文学界出力的人来严校会员的翻译品。如《意门湖》之类的书，可以不必再出。

这里面的第二条若有涉及他们的内政之嫌疑，我情愿即刻取消，或负荆请罪。然而我觉得我们新文学的前途很暗淡，我们这个弟兄不大得力，别的人又没有我这般蠢，不肯出来作丑。说这样的话，所以我竟不及避什么嫌疑，在这里把我的希望写下了。馥泉君如能作到这两件事情，我相信他对于文学界的功劳，一定有可以大书特书的。

馥泉君不要以为我说了这些话，有什么矜高的意思。我们才是真的弱者，并且也很甘心是这样。他人对于我们所加的不正义，我们不能把一只眼睛来还一只眼睛，他人对于我们的欺侮，我们只好无言地忍受。一切不正义的行为，我们是被禁止了的。我们但愿我们有客人之雅，但愿我们有创作之能。此外只希望压迫我们忌妒我们的人，也早归正路，与我们一路唱着战胜的军歌前往。

关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交涉史，几回想要写出来，一方面告诉我们的同人，要他们以后原谅文学研究会会员诸君的误解，一方面也使文学研究会会员诸君，洞悉此中的真象，不要被几个好事的人播弄了；然而我至今没有写出来。我很感谢馥泉君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我还希望馥泉君恕我文中许多不妥当的话，恕我有许多地方唐突了他，恕我扯住他说了这许多的话。因为我只好同他谈谈，文学研究会的那一部分人，我实在怕他们的人多，怕他们的变装术，怕他们的冷箭，一句话，我真望见了他们的背部有一点心寒，而且我也犯不着同他们说

话。

关于我这些话，馥泉君或别的人有什么意见时，我都可以领教。只是文学研究会的那一部分人，若出来多言，纵有千万个“损”先生来辱骂，我是只以免战牌对付的。我是口直心直的人，恕我在这里先说明白了。

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篇东西是我看了馥泉君的文章，马上写好，想在报纸上发表的。最初我把他送到了时事新报《学灯》栏的柯一岑君那里，不料过了将近十天，柯君忽把它退了回来，说是我的误会。我又把他送到别的一家报馆，这一家的主笔竟说是“恶声必反，恐又引起文坛长时间的笔战”，也把它退回来了。这种经过，我在这里发表出来，我自己不仅不觉得有什么可耻，我还觉得不可不表示我的感激于这两位很亲切的主持笔政的先生。他们不仅只使用了他们自有的权利，他们还热心地把我所不曾知道的、社会的情形告诉我了。象我们这种才从学校门口跳了出来的，才在国外长大了回来的人，应得受一种切实的教训才是。而就我一个人说起来，关于我们的社会现形的知识，我简直是连一个小学程度都够不上，这回的事情，倒实在有屈他们两位先生为小学教员了。

然而我始终不承认我这篇东西是出于误解，我始终不承认它是恶声，所以我把它在这里发表了。我深信从此我们大家都可以除去以前的误会，可以明白是什么人在穿着黑衣激起风波。至于那些生就了色眼的人，我们大家也只听他们去瞎闹罢。

这篇东西虽然现在才登了出来，然而送到了柯君那里之后不久，那位善于变化的沈雁冰君居然就指定了“玄珠”二字的雅号；这是自动的行为也好，是他被动的行为也好，我这篇东西的任务，算已完成了一部分，所以我现在就在这里把前面希望馥泉君做的两件事情撤回了罢。

我想在这里同馥泉君还说几句话。我觉得馥泉君说的话，未免太不注意了。不论关于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总要先把它调查清楚。若是没有查得清楚，最好是不说，就说也不要说某某兄长、某某兄短的，使人家看了以为是千真万真。馥泉君说话用什么字，固然有他的自由，然而因为他所用的字与所说的话，致伤及事情的真象，却断断乎不可。我此刻连馥泉君的贵姓，还没有知道的光荣，以后我们还要互相多知道一点才好。

最后我要同我们创造社的朋友们说说。人生不是用蔷薇铺好了的广道，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尤其是荆棘多得很，象我们没有经过这种特别的锻工房烤炼过的人们，只有同“失败”结了婚，不则趋那孤竹君之二子的后尘罢。不论对于一种什么事情，能随时随地，把Cynicism, Macchiavellism等等尽量地发挥出来，象我们黄帝子孙似的，是再没有的了。我们只要任意把社会的任意一角拿来查看，就可以知道它是政局的忠实的缩写。我们的文学界又安得不是一个政界的舞台？然而我们决不要为这种原因，先自短气了。纵令我们的前途阳光还是很熹微的，这不仅不足使我们悲观，反益发可以鼓舞我们，使我们自己去创造些光明来，充满我们的前路。假使这是我们的命运啊，假使与恶魔死战，终究还归于失败，是我们的命运啊，我们却也不要由它逃避了。就让我们与“失败”的姑娘成了百年的好事罢，就让我们与孤竹君之二子，结了万古的佳缘罢！

于我搁笔之先，我还要说几句很紧要的话。凤举兄教我“人家逼迫我们去打笔墨官司，是一件最不艺术的事，最不合算的事。有时候实在无法。然而我还望我们能够高超，能移这个和Dilettante和Philistine角力的时间到生产方面去。他们未免太够不上了”。这么一来，我未免又开了戒了。然而我决意使这回为最初的，同时又为最后的一回事。以后非有关于文艺本身上的事情，我决不再浪费我的纸笔，也决不再耗费我们的篇幅，致扰乱读者诸君的澄净的心境。但是以后遇有攻击我们的非文艺的文章，如果他说得不错，我们自己出来承认，出来感谢他；如果他说得不对，我们却决不牺牲宝贵的光阴去与他理论，那时候我们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认错了——这一点我要请亲爱的读者诸君牢牢记在心上。

一九二三、一、九

（原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1卷4期）

编辑纵谈

我这次来上海，在三个月之内，要把《创造》第一卷的第三、四两期弄出来。把第三期麻麻糊糊弄出来了的时候，除了几篇不太满意的诗，差不多没有丝毫的贮蓄，我着实担心不小。然而发出了几封急信之后，便天天有东西寄来，到了后来，竟超过又超过了。资平一个人共寄来了三篇，我因为想多介绍几个新登坛的作家，竟把他的一篇顶好的《双曲线与渐近线》也割爱抽出来了。朋友们这种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很使我感到一种安慰的力量。这样看起来，我们为什么还怕办不到改为月刊的地步？但是我们还只是求精不求多，我们从第二卷起，还要更加精选我们的作品，一方面也要增加各期的分量。我愿我们这个小Oasis，一天天往完善之域接近起来——在内容上，在分量上。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全体，虽是一期比一期好，也一期比一期多，却也有共同的或个人的缺点在里面。我们虽时常彼此通信讨论，我还希望研究文艺的朋友们，大家不要客气，多赐以切实的指点。

这回的雪莱纪念号，我曾竭力想在阳历年底弄出来，可惜一天天的挨过，不知不觉之间，这光荣的一九二二年，早飞的一般过去了。然而时间的潮流是用一样不变的速度，往一样不变的方向流去，而在它的进行中，只做一些一样不变的玩意儿，使人生厌的。百年以前和百年后的今日，并没有何等差异在那里。不过是我们所任意采用的尺度，偶然遇着了他的一个

简单的整数倍罢了。并且他们说在百年以前，雪莱正在做他的《生的凯歌》The Triumph of Life的时候，无端Hades(死神)叫Poseidon(海神)把他请了下去，其实雪莱在宇宙间所吹起的生命，正与从前一样地生存，倒是那些妄信他死了的人，与那些我们天天在街上看得见的人，才不知道已经在Hades的口中，销了多少时日。所以我们虽然不免有负朋友们的期待，还是请这个可爱的诗人践约登坛了。至于那两篇介绍的文章，因为两个作者，一个在北京大学，一个在北京高师教书，他们自己说愈写愈长，又要授课，一时不能完篇，只好下期再继续登出。他们自己既不怕把他写长，我们断无愿他写得短短的道理，并且这种研究或介绍之类的东西，横竖与创作栏没有关系，我们的创作栏决不会被他们挤得缩小丝毫的，所以我不仅望他们继续写下去，还希望别的朋友们也多多做些别的研究或介绍之类的作品。

已经有许多的人，说我们是一些复古派或古典派了。不知趣的沫若与达夫，偏好象约定了似的，一个寄来了一篇《孤竹君之二子》，一个寄来了一篇把黄仲则做主人公的《采石矶》。

大胆的狂徒们！看他们请“主义”先生来诅咒你们啦！

然而我劝你们暂时任他们说些什么，只当是不曾听见，任他们做什么，只当是不曾看见。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坛——不是，我说错了，我们现在的政界，越是名人，越坏得厉害，越是什么也不懂；越是有名的学者，越是伟大的文化运动家，他们的浅薄无聊，越是比我们这些浅薄无聊的人，还要超过了几千万基罗米突。人道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好，新浪漫主义也好，瓊瓊派也好，立体派也好，未来派也好，X光也好，W光也好，啊哪哒也好，吧吧咯咯吧吧，哪哒咕哪达，吧哩吧更好！真的！

宇宙的本体是好的，全我万能的唯一神是好的，照唯一神的样子翻了出来的人也是好的，人所做的一切的罪恶也是好的！听呀！听他赞美人类一切罪恶的高调！

现在我们文学界最可伤心的事，第一是没有几多好作品，第二是没有几多真的批评。我在本卷第二卷里，想竭力怂恿朋友们多作一些介绍与研究，或竟出一个《文艺原理研究号》与一个《文艺批评研究号》。创造社在一九二三年总能出一部《文学概论》与一部《文艺批评论》，以补这方面的缺点。

我们以后想每期介绍几个新的作者。达夫从安庆跑了来，我便与他把投稿的办法确定了。以后对于热心文艺的朋友们的投稿，可不至于没有一点酬报。（请看特别启事）

杂录栏中的《俄国文学便览》的第一章，是何畏君试译出来的。我已经劝他把全本译出来，大约不久可以产出。

我们现在又发起了一个《创造社科学丛书》，我们想从今年起，每年弄出几部。国内出版的科学丛书，差不多把中学程度，做了他们的最高点。我们想把这种界碑打碎，把程度渐次提高。又现在专门以上的学生，能看英文以上的原本的颇多，而能看德、法文原书的很少，我们如果有时间，还想把德法文的科学上的文献Literature多多翻译出来，以向我们一天天进步的青年学子。

资平开了一张很长的单子来，并且提议把这丛书扩张，叫做《新智丛书》。我想最好还是把内容是科学的做科学丛书，内容是通俗的做新智丛书。

沫若说科学丛书的第一种要一本科学概论，我看这话倒很不错。如果暂时没有人敢担任这种苦工，我想就选择一本，也不妨事。

我们的戏剧，并不阻止他人为文艺或慈善事业的目的拿去表演，我们并且欢迎实演的机会。但是近来有许多的学堂，不仅不先通知我们，并且有时写信要他们寄入场券来，他们竟置之不理。我们的创作，我们决不据为我们私有，决不出来主张什么所有权，但是为文艺的进步起见，我觉得他们总应当给我们一个参观的机会。我想这不仅是他们应做的事情，并且还有两种（文艺上的）利益在里面：

第一，我们可以由作者的立脚点，把我们的批评说给他们知道；

第二，我们也可以由一番的实验，作出更好的戏剧给他们表演。

以后要演我们的戏剧的人们，我希望他们先给我们一个信。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原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1卷4号）

《命命鸟》的批评

我非轻易不看现在的新小说，我们现在的出版界差不多天天有新的短篇小说给我们；一二千字的小说，差不多是和那些两三行的所谓哲理诗与那些铸在诗型里面的散文，在那里比赛他们的数量的样子。我并不是不想知道我们的文学界，一天天在怎么样变迁，也并不是不想注意现在大家所公认的几个大作家（固然是就数量论的大作家，因为我们现在的群众，只要你的出产率大，便谁也要称你为大作家，自己便也可以名人自命），一天天在怎样变化。然而我总不高兴去看这些作品，偶然拿来一看，也多半是不能看完，至多只看到一半，便决然将它们丢在一旁，以把宝贵的光阴由浪费之前救出了，为自己无上的安慰。前天我闲着没事，把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小说汇刊》里面的《命命鸟》无意中翻出来看了。几回我想把它丢了不看，然而一想我既有闲工夫，再想大家说是很好的东西，说不定还有好的在后面，所以我竟破一个例，一口气把它看完了。可是看完之后，虽不觉得他把我本来闲着的光阴怎样了，却也觉到了一种淡薄的失望，尤其是它把群众的鉴赏能力的度数告诉了我，使我觉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悲痛。我现在重把《命命鸟》翻看一遍，随把我的意见写出来，质诸亲切的读者。

我读第一段的时候，读到“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便觉得作者许地山君的观察

未免太不准确了。早晨很微弱的阳光，并且只射在脸上，就能照得全身全然变成黄色——这种现象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早晨底日光里，敏明——我们的女主人公——如果穿了特别颜色的衣服，也还有映成黄色的可能，作者既没有把它先写出来，不免要使人发生一种意外之感。

第二段有了“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地上铺了日本花席……”之后，我们已约知道这小说的背景在一个信佛教的国家。然而在次页（一百二）写了加陵——我们的主人公——的奇怪的服装之后，接着就是“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的一句。我由这一句得到了两样的推想：第一，我想我们的背景不是缅甸；第二，我想加陵不是什么世家子弟，因为他只“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我们看了这“俨然是”三个字，我想谁也要发生这样的感想。其实我们的背景实在缅甸，加陵也实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都可以由后文看出来。许君这种写法错在“以马喻马”。作小说的人所以能由一些死文字，演出活跃的现象在读者心中的，是因为作者的一字一句，能在读者想象中，诱起不断的预想，而作者于小说的演进中，除自己一个人之外，鬼不知、人不觉地，使读者的预想取自己所预定的方向。作者之于作品，犹舵工之于行舟；作者之于读者，犹舵工之于旅客。旅客看了大姑山，又看了小姑山，决不会想到这些都是舵工要他看的。他方面舵工不能指着下关，说它俨然是南京的下关，因为旅客会把眼前的口岸，当做不是下关。通过《命命鸟》这篇小说，许君不幸没有把作者的职务放在他的意识里，下面还有更重大的缺陷，这地方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罢了。

最紧要的地方利用了一场幻境。但这幻境的开端（一百六

十四面)用了“她定神瞧着围绕瑞大光底彩霞,不理睬那塔底金光向她眼脸射来,她的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里底感想,和目翳的光融洽,精神上现出催眠的状态”。几句话,是似巧而实拙的。我在这里面看不出一点必然性来。本来使敏明站着入了一场幻境,已经是很不自然的,而这幻境的开端,索性写为神秘也好,偏又不是这样,偏要加上一些很浅薄的心理的说明。许多精神上的问题,是不能用那样的幼稚的心理分析来说明的。愈想构成一种因果,便愈削减它的根据。索性说“那塔底金光向她眼脸射来,她便入了一种催眠的状态”,倒是没有话可说的了。

敏明醒来后的心理,有两段记叙(一百十九面):

“……心中好象觉悟他们两个是这边的命命鸟,和对岸自称为命命鸟底不同。她自己笑着说,‘好在你不在那边,幸亏我不能过去。’

“她自经过这一场恐慌,精神上就起了莫大的变化。对于婚姻另有一番见解,对于加陵的态度更是不象从前。”

这两段相连的记述,是何等奇怪的自相矛盾!隔得远犹可说,这两段中间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我疑这中间丢了什么,却又不象。既说“好在你不在那边”,为什么又说“另有一番见解,对于加陵的态度,更是不象从前?”我真不知道作者在自己的意识里面,把这两段的关系弄清楚了没有。

敏明的死,又是一件更大的奇事。在她的祈祷之前,只有前面说过的“对于婚姻另有一番见解”,与那几句佛问摩邓的经,是关于她的记述。但这两种记述,不仅不告诉我们她会决死,反使我们疑她会到尼庵里去实行她的独身主义,如加陵当

初疑她那般。并且佛教的真谛，实在苦行，象敏明这种行为，实不似我们意中的佛陀的信女，而且“我今悔悟，誓不再恋天人，致受无量苦楚”，也不能使我们预想到一个“死”字。许君不知道作者的职务在于暗示Suggestion，太把读者的预想蔑视了。这是《命命鸟》在技术上的第一大缺点。

敏明与加陵的同死，作者也错在想把她在一理论上面实现。这样的事情，最好是在感情的或神秘的氛围气里面实现。愈想把理论来促成，便是自己愈在那里破坏。他们周围的空气太冷，而且那世界的诱惑，也不强烈。这些地方是与最初所写的加陵的服装一般，使我们觉得很奇怪的。

以上是我把《命命鸟》翻看时随时发生的感想。至于把它做一个全体看起来的时候，更有许多不好的地方。

第一，有人说它模仿《红楼梦》，我想实在也有许多地方可疑。这场幻境固然是《红楼梦》里面的太虚，即加陵的触犯，也可比宝玉的冒失；而且写法差不多尽是《红楼梦》式，反把《红楼梦》的好处丢尽了。

第二，这篇东西差不多是纯客观的描写。若专论这些地方，差不多可以与那些恶劣的旧派小说同视。比如歌舞之后，敏明与加陵的对话（一百十面）完全是客观的临写。作者把一切做了客观的对象，有的用撮象器摄了，有的用留声机收了，而这中间只插了一些论理的连络。《红楼梦》还有不少的心理描写，这一篇却没有一处，有的时候，也不过一些论理的结果。

第三，敏明的决死，不过是因为她由那场幻景悟到了感情的反复无常。然而她既悔悟，当然更可以入空门，可以不死。并且她既是佛教徒，当然是以由苦行得正果为目的，断不至于决死。所以我想在这地方应当加上敏明不能忘情的苦恼。一方

面不能忘情，他方面又悟到感情的易于反复，这样才可以使她不得不死。这样写去的时候，不仅可以免得许多思想与技术上的矛盾，还可以使敏明更近于人性more human。

第四，敏明与加陵同死时的氛围气太冷淡，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样写出来，只显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宗教的色彩，并且只是色彩，没有传出什么情绪。我想最好是使敏明于确知加陵不是对岸的命命鸟的时候，两人由欢情狂焰，抱拥着同投湖水，高歌着死的胜利。这样写出的时候，可以把全篇由无意义的宗教小说救起，变为近代的情绪。

这篇小说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除了我自己一篇被人家拿出了，不知道发表了没有的《深林之月夜》之外，是近来的创作中唯一的异乡的exotic作品。它的背景是异乡的，它的人物也是异乡的。本来真的艺术，决不为地方色彩所污损，并且为补救国民艺术的单调起见，这种异乡的情调，也实不可少。不过这篇小说，不幸被地方的与时代的色彩蒙蔽了，它所写的东西，是在地方与时代的薄膜上现出了的假象。它丝毫没有把这层薄膜下的实在教给我们；而最不幸的，是我们由这篇作品，寻不出作者自己想揭起这层薄膜的何等的努力。所以这篇作品，不仅技术是旧的，即观察也是旧的；它的人物不仅与我们是异乡的，而且都是还没有发见人性的旧的人物。在狂热与神秘的氛围气之外，我们希望一切的现象，由人性的各种本能发展；我们决不能把现象的再现暂时满足，我们要求作者把现象里面的人性的本能之发展进行，也写给我们看。这篇作品从这些地方说起来完全失败了，而他所预想的宗教的色彩，也没有可以挽救的实力。

《命命鸟》里面的最重要的关键，是那场幻境，而尤其是

这边的命命鸟与那边的命命鸟的对照。自欺欺人的虚伪的人们，固多如那边的命命鸟反复无常；然而这边不唱的一对呆鸟，我们由敏明把他们的性质反求出来时，却也免不了是自欺的，不过一方面是老老实实的自欺欺人，他方面是在宗教这种假面下自欺罢了。我并不是在这里想说些反对宗教的话，不过这种浅薄的信仰心，我想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宗教徒可以肯定罢。

我把这篇《命命鸟》看完了之后，这世界文学丛书之一的《小说汇刊》就再没有引力使我翻看了。我只好等下次的机会，更Miraculous的机会。

二月七日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2卷1期）

“雅典主义”

朋友从北京写信来，问我看见了《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期上的雪莱的“雅典主义”没有。这期的《小说月报》载有雪莱的肖象与署名佩韦的一篇《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我本知道，佩韦君在那篇文章里面，有关于雪莱的文章，我也曾看见过，只是没有看过他的内容罢了。既说是雪莱的“雅典主义”，又指明了是《小说月报》的这一期；我就知道这“雅典主义”一定载在佩韦君的文章里头，但我当时很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去年年底想做一篇雪莱的评传，自谓把这位诗人的历史，看了不止一回，看的也不止一种，却从来没有发见他有这样一种主义。我想我的记忆力纵令如何不好，刚看不久的东西，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人家说雪莱有这样的一种主义，我却不知道，这一定是我所有的参考书太不行了。我重新感到自回国以来，什么好一点的书也买不到、也看不到的痛苦，不禁对于做那篇介绍文的佩韦君起了一种不能自己的羡慕，与一种自然而来的钦仰，我从羡慕而钦仰，从钦仰而大发感慨了。我并且想：象佩韦君这样的博学，我们现在还少有人知，反而那些拿蹩脚的翻译如“意门湖”之类的东西出书的人，已经有不少的人闻名了；我们的文学界，真与我们的政治界一样，越是好人，越没有出息；越是坏东西，越是贵不可量。

我一方面这样想，一方面把那本《小说月报》翻了出来，一翻便把雪莱的肖象与纪念碑翻出了。我默默地望着我们的天

才诗人，不由得叹口气道：“雪莱，啊，你竟有这样的一个主义！”我把诗人的肖像看了许久，又把他的纪念碑看了一忽，才慢慢地把佩韦君的那篇名文翻着了。

我一行一行的寻找下去，在第二段里面——啊，这里写的不是“雅典主义”吗？——我发狂一般的跳起来了。这一跳不打紧，倒把在楼下看报的一位朋友惊得飞也似的奔上楼来了。

——C君，什么事？

——啊，真有这样的一个主义！

——什么主义？

——你自己看罢！——我一面这样说，一面把“雅典主义”四个大字指给他看了。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却一点也不现出惊奇的样子。他只轻轻地道：

——我忘记对你说了。前回我看时，也很觉得奇怪，再过细看时，才知道是他们弄错了。你把他们的文章一看便知道。我们的翻译界，这样的瞎闹，多得很呢。你不要自己大惊小怪罢！

我这冷静的朋友，说完了话，便扬长而去了。

——我这朋友的话是从来不错的——这样一想，我才重把《小说月报》拿起来，高声朗诵了。

——啊，这真是奇怪的事！——我读了第二段时，不觉很惊异地说了——怎么雪莱为的“雅典主义”从牛津大学开除出来了？这样看来，什么“雅典主义”原来是Atheism（无神论）的错误！哈哈哈哈哈！——

我这忠实的朋友，在楼下听见了我的笑声，便高声喊道：

——不要那样高声大笑，把肠子笑断了，怎么办呢？

这是我月前的一个小小的冒险，当时那种因为买不到好书

的悲哀，那种不能自己的羡慕，那种自然而来的钦仰，那种说不出来的惊异，与那种怪解人颐的高笑，现在每想起来，都活泼泼地好象呼唤得出来的样子。虽然我那位朋友时常把我们翻译界的趣史，说了不少来解闷，可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要算这回最离奇了。我现在这样写出来，恐怕读者诸君都要觉得有点近于滑稽罢。然而我当时虽则笑了，可是一想到我们翻译界的丑态，却早悲从中来，不禁要放声大哭了。

从前见过一位姓常的所译马克思的什么，一位姓余的所译倭铿的什么，一位姓唐的所译意门湖，都是蹩脚的译品。这位唐先生在《意门湖》里面，把点头译作摇头，把蜜蜂认作梨子。郑振铎君把客厅Drawing-room译成了绘画室，伍剑禅君译雪莱的《西风歌》竟把to be的第二人称art译成艺术(arts)。这样的便是现在的翻译界！

在把武人政治译成了共和政体，把坐地分赃译成了省自治制——在这样的时代与国家，本来这些先生们也许是为时代所误，不论倒也罢了。这回佩韦君的雅典主义，何独不然？并且这样的翻译界我们久已苦于没有一个相当的尊称奉敬，佩韦君既自己创出了一个“雅典主义”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们也不必再悬赏了，以后就尊称这样的翻译为“雅典主义的翻译”罢。现代的东西总得有个“主义”。雅典主义的翻译，与自然主义的文学，倒也门当户对，将来再加上些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与哥林多主义的社会经济，更可以给乐儿多Nordeau与乱不啰吵Lombroso两位先生（什么主义的先生？对不住，忘记了）一点材料。

《意门湖》出世时，大登广告说“与郭沫若君等所译的《茵梦湖》颇有不同。”这期《小说月报》的这篇介绍文，又与

创造的雪莱纪念号的内容，颇有不同，可是我不解为什么没有把颇有不同的广告打出。《小说月报》的通信栏，素来是最喜欢登出一些各方面的奇问，与沈雁冰君的奇答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向沈雁冰君问雅典主义是什么，我也觉得有所不足。郭沫若把“意门湖”洗剥了的时候，沈雁冰君说那是半斤八两，不知沈君以为无神论是几两几斤，雅典主义又是几斤几两。

啊，我怕是不当这样说笑话的罢，我怕不当再是这样任兴头写了。这个问题很重大。胡适之君说为糊口或介绍译书，译错了也可以原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讲。我想不论目的是什么，总要自己先懂了，才能介绍。有许多人今天胡乱看了一页书，便把这一页书拿去介绍，自己懂不懂倒丝毫不管，这样的介绍家我是极端反对的。我们现在所谓新文化书籍之中，所以没有几本好书的，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著作家，大多数只有一分学识，偏要吹成十二分；第二，是因为我们的翻译家，大多数自己还不懂，倒先出来拼命的翻译。这两种人我觉得非有人出来痛击一番不可。固然，他们还是些耕土的人，不是栽种的人，然而若因为他们耕得不好，至于种不出好东西来，却实是一件最可忧虑的事。

佩韦君译出这样的东西来，我们只把那一小段看了，就可以看出：（一）佩韦君不懂英文；（二）佩韦君关于雪莱差不多什么也不懂。“无神论”的原文Atheism是从希腊文滋乳出来的，是等于A + theos + ismos，A是表示否定、theos是神，-ismos或-asmos在拉丁文是-ismus或-asmus，是表示构成抽象名词的语尾词，连接起来，所以便成为“无神论”。雪莱的无神论，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很要紧的，而且他也因为有了这种主义，才有后来那许多的波澜；所以连这个地方都不知道

的佩韦君，只好说他关于雪莱什么也不懂罢。

不懂倒也没有办法，只是不懂便不应孟浪从杂志里面译出来，把它发表。佩韦君这种行为，我只好说他是量力，大胆，不负责任。我不解佩韦君译出这“雅典主义”时，心里作何感想。有这样的主义没有？这主义是什么意思？象这样的问题不知当时佩韦君想起了没有。现在想起来时，又当怎样？

为一件这样的事情，不再糟踏我的纸笔了。我只愿我们的翻译界，一天天进步起来，给我们这些才开眼的同胞，一些好点的粮食。我只敬告我们的翻译家，再多尽一点诚心，再少造一点罪孽罢！

三月二十六日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2卷1期）

《一叶》的评论

在我们现在这种缺乏创作力——尤其是缺少长篇的创作的文学界，除了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王统照君的《一叶》要算是长篇大作了。没有长篇小说，固然不能便证明我们的创作力薄弱，而且时代的要求，也不在一口气看不完的长篇小说，而在看完了犹有低徊赏玩之余间的短篇；然而现在那些新闻杂志上的一两页或仅几行的短篇小说，大多数实在叫人看了之后，要不呕吐也不得了。

一个多月以前，我把《一叶》看了一遍，觉得它的缺陷虽然很多，全体却还不坏。我看了之后，随即写下了几句诗，我现在把它们抄在下面，使它们说明我当时的心境。

这里有人生，
 真的人生，
 他的慈爱，
 他的痛苦，
 他的寒噤！
似梦，
非梦！
是活的人生，
 真的人生！

虽只是枯了的一叶，

却已经刻上了，
人生的深迹，
与他的狂风，
 他的骤雨，
 他的和声，
 那慰安般似的。
虽只是枯了的一叶，
要在灵敏的心弦，
吹起要眇的嘘息。

我当时就想做一点批评，把它的美点与缺陷画写出来，不料又被别的事情耽搁了。我昨天与达夫偶然谈及《一叶》，便又把它翻出来跳看了。现在把我觉得顶不满足的几个地方写在下面，供王君与读者诸君的参考。

《一叶》不仅与《冲积期化石》同是我们现在仅有的长篇，结构上也差不多同是一样。《一叶》不必是模仿《冲积期化石》，然而《冲积期化石》那样的结构，我个人是不大喜欢的，在《创造》一卷三期上给沫若的信中，似乎我曾说过。《一叶》又用了这种结构，我是为《一叶》深惜的。并且《一叶》的内容，不是如《冲积期化石》那般不能任意宰割的。《冲积期化石》是一个整块，《一叶》却是由数个小块结成的，所以我想《一叶》的开场，为避开过长的倒叙可以不由在王志伯家说起。由慧姐死后，或在张柏如家时说起都妙，由芸涵的插话之后说起都可以。这样说起时，即可以把单调的倒叙减到一半，内容也似乎更要密切而丰富了。

《一叶》全体用的都是第三人称，这是很好的。我时常觉

得写感情浓厚的小说，如用第一人称，弄得不好，便难免不变为单调的伤感或狂热Sentimentalism or hysteria。如用第三人称，纵不能得到那种动的dynamic效果，然而他所能传到的静的static效果，往往有更缠绵的动人的能力。并且我觉得用第一人称，似乎比用第三人称，易于使我们感到“有人在说小说”，就是，易于在我们的世界与作品的世界之间，筑起一层超越不过的墙壁。真的艺术品，能使我们沉浸在作品的世界之内，把作者与读者所构成的世界完全忘了，把你我的界线也撤了，我们同时是这个，又同时是那个。这种似乎很难明白，其实比什么还显而易见的事情，最好用演剧开幕时的情调来作证。那时候，不论如何死咬着现实不放的人，免不了要如一个游魂一般，也被一种不可抗力摄了进去。所以艺术家的技术的目的，虽是在表现自己，然而技术的要诀，却是在如何把读者引入作品的世界，使他把一切的差别相毁了。一个艺术家，至少要能使我们把我们的世界完全忘了，至少要能打破妨碍我们“没入”的一切。至于作者自己无端跑出来，妨碍我们的“没入”，那便更不对了。《一叶》在这些地方的用心，全然不足。通这上下二篇，作者与读者混在一处，在前头带着读者跑（这些情形，读者是不知道的，只有作者一个人心里明了）。然而在第十四面第一行，忽然回头说一句“而且他每每同我们谈起”，这简直是作者自己露出马脚。在这本来写得不好的最初几页（如何不好，我想在下面再说），只这一句话，蓦地里把读者踢出了作品的世界之外，几乎叫人再也看不下去了。第二十一面第二行的“即我也曾间接的听过……”更使我不胜诧异，因为这句话使我想起了旧小说家惯用的“就是说书的当时也……”。至于那第三行的“所以我现在记起……”更无异作者精神混乱，

匆匆自己声明“我是在向你们说书呀！”更把费了二十面的文字才筑起来的效果，真是落花流水一般打得无影无踪了。我看了二十一面的这几行，便对于《一叶》隐隐抱了一种失望的忧惧，直到后来才稍稍心安了，然而觉得终是一大缺陷。第五十面的第四行，也是同样的一个污点。假使这些是没有办法的缺陷和污点，犹有可说，不幸这些地方，完全是不费气力就可以改好的，我不解王君何以竟把他们都看脱了。这些地方，似乎关系很小，然在技术上，却是最应当讲究的。

从上篇的二十一面起，到下篇的七十八面，这一百六十三面都是倒述！只有最初的二十一面，与最后的十一面，是现在的叙述。从二十一面起到七十六面止，是一个很美丽的插话。我觉得《一叶》的四个插话——慧姐、芸涵、张柏如及老渔夫各人的历史——之中，慧姐的身世，要算是最美的了。就只这一个插话，已经可以使《一叶》值得一读。不过天根与云哥两个名字之间，没有一点暗示，非把这插话看完，无从知道天根即是云哥。这地方是作者不顾读者的期望，不把读者的脑力的经济，放在心里的结果，我觉得是不好的地方。读者看了二十多页，已经有了许多的推想与期望，这时期忽又丢了他们所期望的不讲，偏拿一种似乎与他们无关系的闲文来给他们看，我觉得不仅不能使作品曲折，反因为太长了的缘故，易使人倦厌而对于作品生不快之感。读者对于出过场的人是很关心的，他的运命是读者所急于想知道的，他方面凭空出来的人，既要读者理解又要读者记忆，这是读者很不欢迎的事情。王君把这些地方，莫非看得太随便了？

天根的日记，不仅是打头阵的先锋，而且是随时都可以出没的游击队。然而打头阵的成绩，却不甚好。虽然作者一方

面说这日记很奇秘，一方面说达馨看了十五与十六两面的两处地方，便“再也不能往后看了，心中一酸，几乎要掉下泪来”，其实却并不奇秘，也并不能使人便要掉下泪来。这时当然的结果，因为这两处地方，实在有点过于是抽象的。作者这样说，倒是我们很觉得奇怪，不能首肯的。凡写一件可悲的事情，作者只当把他写得可悲，写到不要作者来说，读者自然明白就是了。若不把它写得可悲，只说它可悲，那便不问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也是不行的，不过把作者的无能越显得明白罢了。本来读者既不是被动的，没有判断力的小孩，这当然是不能勉强的。

达馨在全体本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在最初的二十面里头，却几与天根占一样重要的位置。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明白作者的意思，不过是要使她来介绍天根的那部日记，与由她们夫妇的对话，把天根也稍为介绍一番，介绍完了，她的职务便也完了。然而我们看了最初的二十面时，却不想她便是这般不重要的。她与王志伯——她的丈夫——的不合，她对于天根的同情，王志伯的疑惑与不安，及“天根的回忆的记录便第一次为她所发见”（第十五面第十一行）等等，都能于她的职务以外，诱起别的无益的推想。女性的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如果利用不得法，是最易使人误解的。《一叶》在这地方，也实在用得不好。

天根的日记，由全体看起来，颇能尽游击的责任，不过有几处地方，登场时总不高妙。譬如初次登场时，使达馨羞羞答答、勉勉强强介绍了出来，然后由达惠而汪青立而那个蛇足的“我”，未免太费气力。上篇的第四章，实在是可以不要的。由许多难关轻轻跑过来了的王君，在这个坦荡的平原倒显出这样幼稚的步法，我真有点不解。

上篇的第二章，又是作者失败的一处。我想这一章的使命，

一部分固然在表现天根，然大部分应当在利用他的回想或幻梦，来多给我们一点关于叙述之发展的暗示Suggestion，所以这里面的一语一句，都应当对于暗示有所贡献才好。然而作者在这一章，表现天根的地方多，供给暗示的地方很少；梦中的青年的志愿，梦中的好笑的她，梦中的修长的暗影，多是表现目前的情绪的。倒是“他想到在故乡的母亲，想到远嫁的姊姊，想到平生的遭遇，想到良友的远离”的几句话，给了我们暗示不少，可惜太简单，易于忽略了。我觉得在这地方作者失了一个好机会——一个给我们多少暗示，使我们对于往后的发展，发生更确的推想与更大的兴趣的机会。

最后，作者对于修辞似乎太不讲究。譬如上篇第一面第四行的“向来他读过何种关于哲学上的书籍，与讲过怎么样的大学者的讲说之后，他必不肯作盲从的判断”，象这类的文章，是很不好的。

出乎我的意外，我把《一叶》的短处说得很不少了。这些以外，也还有不好的地方，然而他的好处颇多，即使还有也不过是微瑕罢。《一叶》成功的地方，在能利用那四个插话，表出在运命掌中辗转的人类之无可奈何的悲哀，使谁看了，也要感到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哀的醺醉。他所以成功的原因，固由于那四个插话的哀婉，然而作者能到处维持那种美丽的情绪，那倒是处理treatment上自然的结果。作者能够（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我可不知）把这些人生的现象的一小部，关连于全体relative to the whole表现出来，那种美丽的情绪，倒象是一件附属品（关于这种处理，我想有暇时再说）。至于他发见了爱与悲哀并行，那也是自然的，因为没有爱何以有悲哀呢？

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2卷1期）

诗之防御战

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感情的传达，而不是关于它的理智的报告——这些浅近的原理，我想就是现在一般很幼稚的作家，也无待我来反复声明的必要。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至少对于诗歌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仅诗的全体要以它所传达的情绪之深浅决定它的优劣，而且一句一字亦必以情感的贫富为选择的标准。假使：

F为一个对象所给我们的印象的焦点focus或外包envelope,

f为这印象的焦点或外包所唤起的情绪。

那么，这对象的选择，可以把F所唤起的f之大小来决定。用浅显的算式来表出时，便是我们选择材料时，要满足

$$\frac{df}{dF} > 0$$

一个条件。如果这微分系数小于零时，那便是所谓蛇足。这算式所表出的意思，如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便是诗中如增加一句一字，必是这一句一字能增加全体的情绪多少。

这些都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由鲜美的内容与纯洁的情绪调和了的诗歌，是我们所最期待的。我们不主张感伤主义 *Sentimentalism* 的文学，而情感在诗歌上的重要与它的效果，

我们是不能不赞赏的，尤其当我们想起过量的理智怎样把诗歌的效果打坏了的时候。理智是我们不忠的奴仆，至少对于诗歌是这般。它是不可过于信任的，如果我们过于信任它，我们所筑成的效果，就难免不为它所打坏。而最可恶的叛徒，便是浅薄的理论reasoning。诗的职务只在使我们兴感to feel而不在使我们理解to understand。使我们理解，有更明了更自由的散文。诗的作用只在由不可捕捉的创出可捕捉的东西，于抽象的东西加以具体化，而它的方法只在运用我们的想象，表现我们的情感。一切因果的理论与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固然，真的智慧是直观的，是诗的，而且是我们所希求的，然而凡智的欢喜只是一时的，变迁的，只有真情的愉悦是永远的，不变的。象吃了智慧之果，人类便堕落了一般，中了理智的毒，诗歌便也要堕落了。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

现在试把我们目下的诗的王宫一瞥，看它的近情如何了。

一座腐败了的宫殿，是我们把它推翻了，几年来正在重新建造。然而现在呀，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了，可悲的王宫啊！可痛的王宫！

空言不足信，我现在把这些野草，随便指出几个来说说。

一、胡适的《尝试集》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

——《他》

这简直是文字的游戏，好象三家村里唱的猜谜歌，这也可以说是诗么？《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这种恶作剧正自举不胜举。又譬如：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

——《人力车夫》

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古说：秀才人情是纸半张。这样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半文钱了。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富问题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

雪色满空中，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很欢喜；

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胡君做诗原来是想写道理呀！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我的儿子》

这还不能说是浅薄，只能说是无聊。

这棵大树很可恶，
它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它砍倒了，
把树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乐观》

哈哈！好了！不要再抄胡适之的名句了。

二、康白情的《草儿》

我们想，所贵乎做同学的应该怎么样？不是说要互劝道德，互砥学问，互助事业么？……我呢——更该万死！我受同学的厚爱以当全国学友的重托，而我诚还未足以感人，学还未足以济用，致酿成今日底危局而前功几于尽弃。……

——《别北京大学同学》

这实是一篇演说词，康君把它分成“行”，便算是诗了！
无怪乎草儿那么多，那么厚。

德熙去了；
少荆来了。
少荆去了；
舜生来了。
舜生去了；
葆青绛霄终归在这里。

——《西湖杂诗》

这确如梁实秋君所说是一个点名簿。我把它抄下来，几乎

把肠都笑断了。还有那篇《三十日踏青会》，我从头看去，总以为是一篇序文，后来才又发见了那七十一人的点名录。

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
劳动是日间第一件大事；
少用心是晚上第一件大事；
打拳，看星子，是临睡前第一件大事。

——《律己九铭》

这些确是每天应做的太事，亏他想得周到，写得出来。

三、俞平伯的《冬夜》（及《雪朝》第三集）

飞——飞他底，
滚——滚他底；
推——推他们底。
有从来，有处去，
来去有个所以。
尽飞，尽滚，尽推；
自有飞不去、滚不到、推不动的时候。

——《仅有的伴侣》

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

留你也匆匆去，
送你也匆匆去；
然则——送你罢！

——《山居杂诗》

这真未免过于匆匆了；然则——不成其为诗罢！

“朋友！说你是愚人，可是吗？”

恭恭敬敬的回答：

“先生正是呢！”

——《愚的海》

朋友！说你的不是诗，可是吗？恭恭敬敬的回答：先生，正是呢！

四、周作人（《雪朝》第二集）

三座门的底下，
两个人并排着慢慢地走来。
一样的憔悴的颜色，
一样的戴着帽子，
一样的穿着袍子，
只是两边的袖子底下，
拖了一根青麻的索子。
我知道一个人是拴在腕上，
一个人是拿在手里；
但我看不出谁是谁来。

——《所见》

这不说是诗，只能说是所见，倒亏他知道了。

五、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

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一回加入呢？……那一回，苍前山一所茶楼的上边，街上正在迎神，……不是我一个人赢了！王三五十元，张桂二百元，我赢了一共七百五十元……你们怎能忘记呢……

这些赌棍们——就是王三张桂等——向从来没有和他表过同情；他们总是忙碌着，轻蔑嘲骂他：

“贼东西，不做梦吧！”

——《失败的赌棍底门》

这样的文字在小说里面都要说是拙劣极了。徐君何不把其余的人所输的钱也一齐写出呢？

我现在手写痛了，头也痛了！读者诸君看了这许多名诗，也许已经觉得眼花头痛，我要在这里变更计划，不再把野草一个个拿来洗剥了。我只把近来在“觉悟栏上”发见的一首小诗写在下面，聊与读者诸君解颐：

雄鸡整理它底美丽的冠羽，
在引吭高歌后，
飞到邻国里去强奸了！

我们的诗坛自从摆脱了词调，再进而洒脱了白话以来，象取了两种新的方向：

1. 所谓小诗或短诗，
2. 所谓哲理诗。

这两种因为它们的外样比前面的那些野草来得漂亮一点，它们的蔓延颇有一日千里之势。我现在要进而一窥它们的真相。

讲起小诗二字，我们便联想到周作人介绍的所谓日本小诗。最初我听了这个名字时，很有点不明白周君所指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日本的和歌与俳句。本来俳句是从和歌蝉蜕出来的，而和歌日本人通称为歌（uta），原是可歌的民谣，以音乐为它的生命的。后来虽渐变为可读的抒情的词，而严格地说起来，可称为抒情诗的究是极少数——至少俳句是这般。日语是多音节的，往往一个名字占四五个音，如杜鹃一个名

字，在日语占五个音，莺一个名字，占四个音之类。和歌一首为五七五七七的三十一音，俳句更只五七五的十七音。以这极少数的语音，要写出抒情的诗句，在和歌或犹易为，在俳句却实很困难的。我觉得俳句要成为抒情诗，至少有下面的几层困难：

1. 音数既经限定，字数自然甚少，结果难免不陷于极端的点画派Punktierkunst。

2. 同时又难免不限于极端的刹那主义Momentanismus。

3. 容积既小，往往情绪的负载过重。

4. 刹那主义与点画的结果，最易陷于轻浮。

和歌的首数几比俳句多到一半，它的困难自然也小，可是音数间的限制，即五七五七七总得严守，比俳句实在笨重，倒不如俳句轻快而新鲜。然而俳句的轻快与新鲜，同时又是它的致命的病毒。它每每不是些轻浮的感情，便是些浅薄的“洒落Share”，芭蕉这人是一个例外，他确留下了几首好点的俳句。然而别的人便少有好的了。土居光知在他们那本《文学序说》上说：

“俳谐由最初的滑稽洒脱之趣味和语言的游戏，渐进为芭蕉那样的从心底发出来的静调而近于抒情诗，然犹不外是自然情趣之客观的表现，不是以恋爱为主题而出之以滑稽，便是使与自然同等而加之以客观化。”

和歌虽则音数较多，而它的笨重与呆板，实令所得不偿所失。而且一个固定而呆板的铸型，久后必归无用，和歌与俳句，在日本早已成了过去的骨董，正犹如我们的律诗与绝句。周君把它们介绍了过来，好象是日本的新诗的样子，致使我们多少羽翼未丰的青年，把它们当做了诗的王道，终于把我们的

王官任它蹂躏了。这是我不解周君所以介绍什么日本的小诗的第一点。

其次，俳句既多是轻浮浅薄的诙谐，在文艺上便没有多大的价值，至少没有普遍的价值。譬如周君所译出的：

风冷，破纸障的神无月。

给它吮着养育起来罢，养花的雨。

在作者是利用纸与神、恰与雨的同音，显它的小巧，可是译出来的东西，却连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又如芭蕉的名句：

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

照周君这样译出来，简直把它的生命都丢掉了。古池之下原有一个感叹的“呀”字，是原文的命脉，周君却把它丢了。而且这“古池呀”在日文是Furuike-ya的五音，并且是二二一的关系，周君译作古池两个字，把原有的音乐的效果也全失了；不过这倒是两国文字不同的地方，怎么也没有办法的。青蛙的“青”字是周君添的蛇足。俳句以粗略Simple or rough见长，添上一个青字，亦不能于整体的情绪有所增加，倒把粗略的好处都埋没了。水里的声音的“里”字，也是周君添的蛇足，把原文暗味的美点也全失了。我以为俳句既以音节的关系来暗示一种文字以外的情调，则译它时当然也应保留原有的音节才好。所以我想芭蕉这首可以译作：

苍寂古池呀，小蛙儿蓦然跳入，池水的声音。

以保存二二一、三二二二一二的音节的关系。然而这里面不免也加了些无益的蛇足。

一个这样短的句子，周君那样译出来，既是呆板，我这样译出来，也是干燥无味。这样好一点的，尚且如此，其余差一点的，怕难免都要如前面所引的那两句，弄得不成话了。从这地

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判断，就是，俳句是日本文特长的表现法，至少不能应用于我们的言语。外国也有许多好事的文人，仿做了一种俳句。然而一是因为外国文本有做短诗的可能，如法国的P. Verlaine便有把一句短语分行为诗的；二是因为外国人在他们本国文字的运用上，已经用尽了他们的技巧，所以他们模仿俳谐，为的是要满足他们的异乡情调 *exoticisme*。在我们的文坛，却没有这样的可能与必要。中国人老是易于误解外国人的言行。梁任公听见外国人研究东方思想，便喜得眉飞色舞。这种浅薄的观察，我们只可把来当做笑柄。所以西洋人模仿俳谐，实在不能成为我们也可以模仿的理由。而且俳谐之不足模仿，还有两个理由：

1. 抒情诗的真谛在利用音律的反复引我们深入一个梦幻之境。俳句仅一单句，没有反复的音律，它实在没有抒情的可能。

2. 如土居光知所说：“歌人的理想是闲雅，俳人的理想是洒脱、幽玄、静寂。……闲雅是一生安于游乐的贵人的境地，静寂是离脱人生之苦恼的隐士的境地。”所以我们如果甘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则已，否则我们是不能不把它当做骨董看待。

俳谐之不可模仿，也有两个理由：

1. 我们的新文学正在建设时代，我们要秉我们的天禀，自由不羁地创造些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不可为一切固定的形式所拘束了。善于模仿的小孩，长大了也是无用的，我们不可任我们的小孩模仿。

2. 我们的新文学要有真挚的热情做根底，俳谐那种游戏的态度，我们决不可容许。

关于俳谐所说的话，大抵都可以应用于和歌。总之这两件

臭皮囊，即日本人——与俳谐一样浅薄无聊的日本人，已经早为它们奏了薙露之歌，不知周君为甚拾得它们的残骸，偏要为它们大吹大奏。这是我不解周君所以介绍什么日本的小诗的又一点。

现在流行的小诗，不必尽是受了周作人的影响，然而我关于俳句所说的话，是可以尽用于别的短诗的。我已经侵犯了他人的篇幅，我暂不多说了。

与小说凑成一对的所谓哲理诗，我们现在要把它拿来审定一下了。国内哲理诗的作者，大概以宗白华与冰心女士为代表。他们自称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

哲理诗！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名字。然而在我们现在的诗坛——哲学大家滔滔者天下皆是时代的诗坛，我们只一听这个名字，而这名字里而所含蓄的滑稽，就足以令我们破颜而大笑了。

我在这里论及哲理诗，要请读者诸君恕我不抄录宗白华与冰心女士的大作了，因为我只在报章上看过几回，随时随地把它们与电闻通信一齐丢了。他们对于别人，似乎具有不可当的引力，然而我只觉得宗君不过把概念与概念联络起来，而冰心亦不过善于把一些高尚的抽象的文字集拢来罢了。本来哲理如果硬要加入诗中，我们先要求它不是哲理。如果带上了诗形而又自称哲理，我们只好取消它的诗的资格。泰戈尔的《迷途之鸟》终于不过是些迷途之鸟罢。

我在前面已经预先把理智的叛逆说过了，把抽象的东西须加以具体化也说过了。所以理论的或概念的，与过于抽象的文字，纵列为诗形，而终不能说是诗，大约可以不消多说了。而且如果目的在阐明哲理，我们可以取更严肃的论理，可以用更

自由的散文；如果想利用诗的形式希图增加哲理的效果，那必自陷于冗长的叙事诗的失败。我们赏玩诗歌，是为诗歌自己，它自有它内存的目的。如果哲理可以诗传，则科学的论文也可以诗来代替，教科书也可以用诗的形式写出了。这样的梦是很愉快的，然而毕竟是一个梦啊！伽莱尔 T. Carlyle 教人说理不要用诗形，称那些铿锵的假诗是一些打木板的嘈响 *Wooden noise*。

固然，古人的诗中往往含有不少的哲理，然而那不外是偶成的现象，决没有人预先怀着说理的心去做诗的。我们现在的所谓哲理诗人，往往有专为发泄他的所谓哲理而做出许多诗来。（譬如冰心女士在她《繁星》的附白中，便说明了她是借迷途之鸟的形式来记载的零碎的感想）然而结果却不外一些畸形的概念与抽象的文字，使我们看了，如象在读格言，如象看了一些与我们不常会面的科学书籍，引不起兴致来。诗也要人去思考，根本上便错了。我们读诗，与我们看画听音乐，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只是要由诗的内容，与诗人共赏内容所具有的情调，内容间理论 *reasoning*，我们是不必去多事的。现在要我们劳心的理论一天天多起来了，诗也要我们去劳心，至少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的根据之一部。

泰戈尔做出了一部《迷途之鸟》，大家便一齐争着传颂，争着翻译，争着模仿，犹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得着了一部古典的稿本，这固然是饥不择食，却也可以证明我们现在的青年易于盲从了。周作人介绍了他的所谓日本的小诗，居然就有数不清的人去模仿，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不由得要想起《浮士德》中的：

So schwaetzt und lehrt man ungestoert,

Wer will sich mit den Narr'n befassen?
Gewoöhnlich glaubt der Mensch, Wenn er nur
Worte hoert,
Hs muesse sich dabei doch auch was
denken lassen,

(大意)人总是胡言乱讲神气泰然;
谁去和那些傻子们纠缠?
听了一句话便做天启一般,
这本是一般庸人们的习惯。

我把我对于现在的小诗与哲理诗的反对的意见约略说了，我把小诗的缺点指出，证明了它是犯不着去制造的一种风格甚低的诗形，我说了诗是不当拿去讲哲理的。可是我并不说小诗与哲理诗决不能成诗。有些天成的句子，天然的是一个字也不能增减的小诗；有些天才的诗人，于优美的诗中，写出了不少的哲理。而且诗是天才的创造，天才是能征服一切的困难，不为所限的，所以如果真是出自天才，则小诗变为优美的抒情诗，哲理与真情调和，亦并非不可能之事。不过这是进一步的说法，就一般言，我在上面所说的话，是可以成立的。没有内心的要求勉强去做诗，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小诗为标的去做，便更不对了。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不对了。日下的这两种倾向，很使我们感着不安，多少朋友们的活力已经消耗在这两种倾向之下了！我们如不急起而从事防御，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怕要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沉滞起来了？而且文学只有美丑之分，原无新旧之别，如果现在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可以称诗，则那些文妖的游戏谈谐，也可以有称诗的权利。现在的那些小诗实在令人做

呕，我真不知作者怎样能泰然发表出来，我真不知提倡者看了这厚光景，心中应当怎样。

至于前面的那些野草们，我们应当对于它们更为及时的防御战。它们大抵是一些浅薄无聊的文字，作者既没有丝毫的想象力，又不能利用音乐的效果，所以它们总不外是一些理论或观察的报告，怎么也免不了是一些鄙陋的嘈音。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除了想象与音乐，我不知诗歌还留有什么。这样的文字可以称诗，我不知我们的诗坛终将堕落到什么样子。我们要起而守护诗的王宫，我愿与我们的青年诗人共起而为这诗之防御战！

这篇一路写来，不知不觉写得太长了，有些地方写得过多，有些地方内容有未尽。我只暂把这篇做一总纲，有暇当更分别讨论。

五月四日 仿吾附识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周报》第1号）

新文学之使命

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然而我们于创作时，如果把我们的内心的活动，十分存在意识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使我们的内心的活动取一定之方向的。这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可喜的现象。

一讲到文学上的目的，我们每每立刻感着一种可惊的矛盾。原来世上的东西，没有比文学更加意见纷纷，莫衷一是的。有些人说它是不值一文钱的东西，有些人简直把它当做了自己的一切。即在一样肯定文学的人，都有人生的艺术 *l'art pour la vie* 与艺术的艺术 *l'art pour l'art* 之别。艺术的价值与根本既然那样摇摇不定，所以我们如把它应用在一个特别的目的，或是说它应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简直是在沙堆上营筑宫殿了。

然而这种争论也不是决不可以避开的。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而且这种争论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我们没头去斗争，则我们将永无创作之一日。文学没有创作，是与没有文学相等。所以我们最好是把文学的根蒂放在一个超越一切无用的争论之地点。这与科学家取绝对的静止点 *absolute rest* 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从此可以排去一切的障碍与矛盾，而直趋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

文学既是我们内心的活动之一种，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作它的原动力。一切嘈杂的争论，只当是各种的色盲过于信任了自己的肉眼，各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譬如对于红色是色盲的人，只能感到红色的补色，虽然原来是一样的白光。如果我们承认光是白色的，那么，那些色盲的是非，我们可以了悟是他们各人所认识的只限于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缘故。我们又可以由他们各人的争执，约略可以知道白光有些什么成分。我们由各成分的性质，又可以确定我们对于全部的见解。这样研究起来，我们不仅不怕什么矛盾，而且我们可以征服它们，利用它们。

我们既能由一个超越的地点俯视一切的矛盾，并能在这些矛盾之中，证出文学的实在，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内心的活动，便不难看出它应取的方向，也不难自由自在地使取我们意中的方向了。

我们说文学有目的，或是有使命，是从这些地方说的。

然而文学的目的或使命却也不是很简单的东西，而且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学之目的，实在说起来，已经离真的文学很远了，他们不是把时代看得太重，便是把文艺看得太轻，所以我们的新文学中，已经有不少的人走错了路径，把他们的精力空费了。我在这里想由那个根本的原理——以内心的要求为文学上活动之原动力的那个原理，进而考察我们的新文学所应有的使命。

我想我们的新文学，至少应当有以下三种使命：

1. 对于时代的使命。
2. 对于国语的使命。
3. 文学本身的使命。

而这三种以外，我想却也不必贪多了。

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然而我们不当止于无意识地时代排演，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我们的时代，它的生活，它的思想，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方法表现出来，使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所以我们第一对于时代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

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对于它的不公的组织与因袭的罪恶，我们要加以严厉的声讨。

这是文学家的重大的责任。然而有些人每每假笑佯啼，强投人好，却不仅软弱无力，催人作呕，而且没有真挚的热情，便已经没了文学的生命。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利、冷酷残忍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组织，既与这样的时代相宜，我们的教育又是虚有其表，所以文学家在这一方面的使命，不仅是重大，而且是独任的。我们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

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

我们的时代已经被虚伪、罪孽与丑恶充斥了！生命已经在浊气之中窒息了！打破这种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

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自从爆发以来，即是一个国语的运动。然而由这几年的结果与目下的趋势看起来，似乎我们的这个运动，有点换汤不换药便满足了的样子。从形式上论，有人说不过加了一些乱用的标点，与由之乎也者变为了的底吗啊。就内容论，有人说不过加了一些极端抽象的语言如生之花、爱之海之类，其实表现的能力早愈趋而愈弱了。

我们新文学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就满足了。我们这运动的目的，在使我们表现自我的能力充实起来，把一切心灵与心灵的障碍消灭了。表现能力薄弱的语言，莫如我们的国语。多人相会的时候，他们谈话的取材，不是些日用的起居饮食，便是些关于时事的照例的唏嘘，而这些关于时事的唏嘘，便是他们最高尚的话题，与最丰富的表现。如果他们谈到了更难的问题，便要感到自己的表现力太薄弱了。

我们在外国文学中所能看出那种丰富的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中，都是寻不出来的。是数千年来以文章自负的国民，也入了循环的衰颓的时代了？还是数千年来宏富的文章终于不过是一些文字的游戏？

我们从前的枯燥的生活，使我们的心灵都干涸了，我们从前的文章，使我们的精髓都焦灼了。这些确是使我们现在的生活与文学贫乏到这般光景的原因，而且是使我们益发感到新文学的使命之重大的。然而我们现在新兴的文学究竟如何了？

在这样短少的时间，我们原不能对于它抱过分的希望。而且只要我们循序渐进，不入迷途，我们的成功原可预计。然而我们的新文学，不幸于它的第一步就踏入了迷途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学，还不可以过于苛求，但是我们一翻现在的出版物，几乎文法清通不令人做呕的文字都不多有，内

容更可以无须多说。这真未免太令人失望了。我们的作家大多数是学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学堂的程度，这固然可以为我们辩解，然而他们粗制滥造，毫不努力求精，却恐无辩解之余地。我们现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虽然报纸杂志堂堂皇皇替他们登出来，可是在明眼人眼里，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数还是论不到好丑。最厉害的有把人名录来当作诗，把随便的两句话当作诗的，那更不足道了。大抵年轻的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徒以多多发表为荣，原是有的，然而我们新文学的真价，便多少不免为他们所湮没了。今后我们的作者如仍不对于自己的作品为更大的努力，我们新文学的真的建设家，恐怕要求之于异代了。

民族的自负心每每教我们称赞我们单音的文字，教我们辩护我们句法的呆板。然而他方而卑鄙的模仿性，却每每教我们把外国低级的文字拿来模仿。这是很自相矛盾而极可笑的事情，然而一部分人真把他当做很自然的事了。譬如日本的短歌我真不知何处有模仿的价值，而介绍者言之入神，模仿者趋之若鹜如此。一方面那样不肯努力，他方而这样轻于模仿，我真不知道真的文学作品，应当出现于何年何月了。

上述的两条歧路，还不过略举其大者。本来我们的先锋队中，多不懂文学为何的人物，所以他们最初便把我们带上了歧路了。聪者觉而知返，愚者迷而失道，归根起来，真不能不归咎于我们的前导者。然而现在的作者们自己也应当负全责之一半，而且今后如不早自觉悟，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国语，怕暂时不能不停顿于这可怜的现状了。

我们要在我们的语言创造些新的丰富的表现！我们不可忘记了新文学的使命之一部分即存在这里！为不辱这一部分的使

命，我们今后要有意识地多多在表现上努力，要不轻事模仿！

我今要进而一说文学本身的使命了。

不论什么东西，除了对于外界的使命之外，总有一种使命对于自己。

文学也是这样；而且有不少的人把这种对于自己的使命特别看得要紧。所谓艺术的艺术便是这般。他们以为文学自有它内在的意义，不能长把它打在功利主义的算盘里，它的对象不论是美的追求，或是极端的享乐，我们专诚去追从它，总不是叫我们后悔无益之事……。

艺术派的主张不必皆对，然而至少总有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餐去冥想。我们对于艺术派不能理解，也许与一般对于艺术没有兴趣的人不能理解艺术家同是一辙。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而且文学也不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积极的利益的。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赋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涮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粮食。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

我在上而把我所觉得新文学应有的使命约略说了。我现在

再来添上数言，作为全体的收束。

有人说中国人欢喜趋易避难，所以近数年来，最难的科学少有人学，稍易的哲学便有不少的人，而最易的文学便滔滔者天下皆是了。这种议论本来错得不成话，然而却也可见一般青年的心理。恐怕不仅说这种话的人与这种话里面的人相信科学哲学与文学有这样显著的难易之差，即我们现在大多数的青年之中有这种误解的，怕也要占大多数。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固然是自我表现的要求之结果，然而这种误解，至少总有了一点不小的帮助。

科学比哲学难，比文学更难——这种离奇的议论，使我又想起了新文学界的粗制滥造了。我们的青年作者之中，说不定有些人怀了这种误解，真个把文学认做了一件极容易的事。如果真是这般，我们的新文学运动真不知将来更要闹出一些什么笑话了。

我不能在这里详说科学哲学与文学的孰易孰难，我只想在这里顺便警告我们的青年作者几句：

“科学决不比哲学与文学难，文学决不比科学与哲学易。

我们要做一个文学家，我们要先有十分的科学与哲学上的素养。

文学决不是游戏，文学决不是容易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多少文学的作品，是古人用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与他们换得一种机关、换得一种原理一样。

我们要先有充分的修养，要不惜十分的努力。

要这样我们才能履行新文学的使命。”

五月九日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周报》第2号）

士气的提倡

我们人类内心的一切斗争之中，没有比义利之争还多来烦扰我们的。这样做于利可为，然而于义则不可，我们应当做还是不当做呢？我们时常为这样的问题所扰，而更难应付的是站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世风日靡，正义沦亡以来，人之争点莫不集中于利，向义者反被笑为非迂即愚。“一切好的都从东方来”，西人有这种谚语，然而现在的我们，我真不知有什么好的给西方人了。鲁连义不帝秦，夷齐不食周粟，我们且不须提起，我们的祖先实在给了我们不少的榜样，给了我们不少的余勇；他们能不为利诱，他们能赴死如归，他们超然于成败利钝之上，而成功终于是他们的了。返观他们现在的子孙，不须利诱，也不须威胁，不须你左手握黄金，右手握白刃，而他们惟利是趋，乃愈于鸡群之就食。强者横施抨击，捷足先登，弱者呻吟脚底，凝眸疾视，礼义之邦，神明之胄，曾野蛮种族之不如！这是何等伤心的光景！

义之所命，尚且如此。其余更自由的廉耻忠信，更不过是伦理学者脑中的概念与纸上的字眼，在现在中国人的脑髓中，是寻不出痕迹来的。而且现在的中国人，别的技能虽然一点也不发达，只有虚伪与作恶的工夫，直可以夸耀环宇。他们为的要满足他们的野心，便不择他们的手段。不论所追求的是什么，是利或是名，成功是他们所要的一切。有些人在“为作恶而作恶”，有些人在自称好人，为他们作走狗。哀恳不足以动其情，

笑骂不足以弱其意，他们只是如一群野兽任南北东西奔驰。他们只是以利合而为利争，必到利尽恶扬，然后乃踌躇满志。在他们的眼中，真理与正义太纤细了，而且是他们的仇敌。他们要殄灭正义与真理，或则假装正义与真理的天使。我们的军人如此，政客如此，学者如此，文人如此，中华民国全体如此。大地开遍了恶之花，天空充满了撒旦之歌颂。

最奇怪的是目击这种情形，从来不闻有人出而揭竿，出而攻击。满清末年革命时，不是喧传炸弹手枪，便是忙的定期举事，那是何等生气勃勃而可壮人心胆。我们现在的国民的与社会的生活，不是比满清末年更要堕落到不堪了吗？为什么这几年来，不闻有人对于我们前面的恶魔，放过于枪之一响，投过炸弹之一片？我们的士气消沉到这般田地了！

我们的祖先能够为义而死，我们的前辈已经能够为义而战，我们的传统的士气，已经由消极的而变为积极的了。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不仅不能更进而轰轰烈烈地燃烧，反轻轻地焰消烟散了？为什么？可羞啊！假使我们还知羞耻！

我们的祖先所表现的士气，还不免是一种消极的反抗精神，现在时代要求我们即为积极的表现了。我们所要表现的新士气，是进而征服的精神。我们要征服一切的障碍，把人类的良心由昏睡之中救起，为他吹起新鲜的生命。我们要使人类的良心，重为正义与真理而战！

我们在俄国的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感到一个先驱而同调者。我们与他们的方法可以不同，我们与他们的结果可以不同，我们与他们的精神是相同的。他们是有知识的先觉者的团体，他们是超越一切社会的不自然的阶级差别的一个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不断地反抗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不断地追求它的

革新。他们为的要传布社会革命，不辞投入农民与劳动者之群；他们为的要实行他们的主张，不惜把身体去亲试。他们的献身的努力，终于使胜利归于他们了。俄国当时的政治的与社会的生活，不比我们现在安好。他们那种纯真的理想，那种对于社会公共福利的热诚，与那种不顾一身的利害，只知努力向上的牺牲的精神，啊，那是人类史上永不可消磨的最美的一页！

一个人最可哀的事情，莫过于良心的死尽；一民族最可哀的事情，莫过于士气的凋亡；良心不死，终当可救，士气不衰，总有可为。我们要常存此心，为正义与真理而战！“成功不是那般紧要的，紧要的是伟大”。我们只要求为伟大，由困苦与奋斗而成为伟大。为一种高尚的目的而困苦，而奋斗，只他本身便是神圣的；为高尚的目的苦战的人，是永远在征服着；失败与成功，那是闲人盲目的评价。

伟大的精灵的一生，是不断的传道与殉教；这些便是他征服一切的过程。我们要时常接触着伟大的精灵，自己也成为一个。肉体只不过是我们的工具；使用这工具，为高尚的目的，把一切的障碍征服着前往，只此便是人生的不误的真谛。人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是不可灭的。古来多少人生的战士，他们的生命是永远如生。

要向永远求生的人们哟，请莫忘了这一句标语：“奉着良心的指挥，为正义与真理而战！”

五月廿八日

（原载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

不论什么东西，总有真的与假的。由明眼人看起来，真假本不难分辨，然而在一般人的眼里，却是每每不大分明。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也有真假：这种真假之别，一般的人固然看不出来，即我们现在的文学家，也有不少人不大明白。要想分别这种真假，我们还要多做一点写实主义的研究，然而我们的作家们太忙于发表了。假的写实主义，我依基欧M. Guyau叫做庸俗主义Trivialisme。我想在这里稍述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的异同及怎样免去庸俗的方法。

从前的浪漫的Romantic文学，在取材与表现上，都以由我们的生活与经验远离为他的妙诀，所以它的取材多是非现实的，而它的表现则极端利于我们的幻想。这种非现实的取材与幻想的表现，对于表现一种不可捕捉的东西是有特别的效力的；然而不论它们的效果如何，除了为它们的效果与技能称赏而外，它们是不能使我们兴起热烈的同情来的。而且一失正鹄，现出刀斧之痕，则弄巧反拙，卖力愈多，露丑愈甚。自入近代以来，为的反抗这种浪漫的文学，为的与人生合为一体，才有了一种脱离梦想之王宫的写实的文章。这是（人的）文学；这是赤裸裸的人生。这种文学虽无浪漫主义的光彩陆离，然而它的取材是我们的生活，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经验，所以它最能唤起我们的热烈的同情。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比对于别的一切更要关心，关于我们的文字也最能打动我们的心境。所以在文

学上最有效力的是关于人事，其次是关于感觉世界的，最后乃是理智的与超自然的。浪漫的文学取的多是最后的理智与超自然的内容，写实的文学才是赤裸裸的人事与感觉世界的表现。

文学由浪漫的变为写实的，是我们由梦的王国醒来，复归到了自己。我们已与现实面对面。我们要注视着它而窥破它的真象。我们要把它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然而我们于观察时，要用我们的全部机能来观察，要捉住内部的生命，而不为外部的色彩所迷；我们于表现时，要显出全部的生命，要使一部分的描写暗示全体，或关连于全体面存在。文艺成于作者之不断的反省，作者的目的亦在由于读者之不断的反省，使读者也捕捉到作者意识中的全部的生命。庸俗之流，不见到此，观察不出乎外面的色彩，表现不出乎部分的形骸。他们作的只是一些原色写真与一些留声机片。所谓庸俗主义虽亦以写实自夸，然而他的“实”仅是皮毛上之“实”，一眼看完，便毫无可观的了。文艺贵有后效*Nachwirkung*；一眼看穿，便无余味，只此便可以证明作品之庸俗。

基欧在他的名著《社会学的艺术观*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的第一部第五章上说：“写实主义的艺术比单以空想唤起兴味的艺术，自然不得不更难。单以空想为生命的艺术，在创造方面无多能，因为空想的意象可以任意结合，而多少总有魔力。然对于足不离现实的人，诗与美都非偶然的结合，而是在悬想的目的之下所成就的发现，是纠纷的经验之有机化，是对于寻常境界所生出的阿堵物。”他把写实比浪漫的文学看得更难，实在可以点醒许多把写实主义看得太轻易了的作家；然而他说写实主义的真义在由现实把一切庸俗的东西丢了，在于枯萎了的官能添一种清新之意趣，从陈腐之中发现新境，从习惯之

中抽出奇异，却把真的写实主义误解了。真的写实主义我以后略称为真实主义。真实主义的文艺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创造。一切的经验，不分美丑，皆可以为材料，只是由伟大的作家表现出来，便奇丑的亦每不见其丑。真实主义与庸俗主义的不同，只是一是表现Expression，而一是再现Representation。再现没有创造的地步，惟表现乃如海阔天空，一任天才驰骋。

我在上面把真实主义与庸俗主义的异同约略说了。不过我说的，是就一般而论。若就我们现在的文学界来立言，却还有一种智力上的区别。我们现在的文学家，大抵学识肤浅，根本上便不能免于庸俗。所以新的作品尽管天天出来，而求文法清通者尚不可多得。所谓诗人与小说家尽管连篇累牍地粗制滥造，而求一首有诗的诗，求一篇不庸且俗的小说，真比什么还难。至于戏剧文学则长在一些无知的新剧家与一些所谓爱美剧团之手中，更不堪说了。

求免于庸俗而不离真，原没有一定的方法。基欧提出二纲：

1. 时间的远隔，2. 空间的远隔。

但是他所主张的空间的远隔不外是一种外国情调Exoticisme，而他所说的圣书与东洋的影响，尤与我们没有关系，我现在只把他所主张的时间的远隔介绍一番，便进而说我自己的意见。

关于时间的远隔所生的效果，有必预先思考的一事，那便是关于“追忆的美”的问题。追忆毕竟是一种同情——对于自我的同情，即现在的自我对于过去的自我的同情。艺术的目的在于取最经济的方法运用想象与感性的力。追忆是感性的延长，而想象是追忆的端绪与基础。所以艺术的诗美，一部分应归于“追怀的诗趣Poesie du souvenir”。并且追忆在许多的表现作用之中为最容易而最经济，诗人与小说家的最重要的技巧便

是在我们心中唤起生动的追忆。追忆能使对象变形，而这变形作用多是审美的，也是追忆的一个特点。

基欧所言，大略如此。不过他仅说明追忆为“艺术家最坚固的地盘”，与历史派L'ecole historique所利用的美的效果，丝毫没有提及实在运用的方法。我现在把我自己关于怎样方可免于庸俗的意见，在下面写出。

一、艺术的世界 我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的评论栏第三十三面上有下面的一段：“真的艺术品能使我们沉没在作品的世界之内，把作者与读者构成的世界完全忘了，把你我的界线也撤了，我们同时是这个，又同时是那个。……所以艺术家的技术的目的，虽是在表现自己，然而技术的要诀，却是在如何把读者引入作品的世界，使他把一切的差别相毁了。一个艺术家至少要使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完全忘了，至少要能打破妨碍我们没入的一切，至于作者自己无端跑出来，妨碍我们的没入，那便更不对了。”为诱导我们没入这个艺术的世界，作者要把这诱导的义务，时常存在意识里。他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如一个带路人指点给我们看。

二、容量Capacity 在一定长的篇幅，事实与它所引起的情绪，都有一定限。叙述的事实过多，最易流于庸俗；事实所引起的情绪过浓，亦每陷于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e。以事实的个数除篇幅（字数）所得之商，即这篇文的容量。庸俗的文字大抵是因为容量过小，所以容量不可不稍大。然容量过大时，内容又难免不过于稀薄了。

三、追怀 诗中多追怀的作品，固不待说；小说中之以追怀为生命的，亦所在多有，而最普通的便是倒叙。追怀的诗美已由基欧道破。我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号的评论栏第十

七面上也说过：“我不想在这里说及我们一个人怎样忘不了自己的过去，怎样眷念，怎样渴想；然而我们一生的历史，很无情地一页页翻过来了，永无回复的可能性。事愈不能，我们越想，只在我们这种想念之中，我们回复了多少过去了的我们，寻找了多少过去的悲哀与欢容——那一样地要求我们感激的！当我们表出这种陶醉的感激的时候，谁能不被波起狂热的共鸣？”

四、暗示的推移 文字的作用毕竟不出一种暗示。文学家所以能由一些死文字，演出活跃的影像在读者心中的，是因为作者的一字一句能在读者的想象中，诱起不断的预想。而作者于作品的演进中，除自己一个人之外，鬼不知、神不觉地，使读者的预想取自己所预定的方向。读者得了作者的暗示所生出来的预想，如恰与作品的内容相符，则读者可以感到一种满足；即不幸而不中，亦可以得到一种抑郁的享乐。总之，不论预想的结果符与不符，这种暗示的推移能使我们对于作品的兴趣增加，却是毫无可疑的。

五、效果Effect 由技艺上说，可以分为全体的与部分的效果。要增加全体的效果，作者须关于全体的目标有十分的意识。对于部分的效果，作者须取助势与调和等种种特别的方法。

六、音乐 W. pater说：“一切的艺术，都向往音乐。”音乐不仅可以延长文艺的后效，而且它自己所酿成的情调，便可以增加美的效果。

七、美文 文字的简洁优美，亦全体的生命所系。美文 *Belles—lettres* 只是它自己便有存在的价值。它是一国文字所固有的美之最高的表现。一篇作品至少要有八分的美文，而在最初读者兴趣未浓时，尤当发挥美文的效果，引人入胜。

（原载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5号）

新的修养

时代的潮流滚滚不息，现在囊括了过去，而成为一个新的时代。一切的质量，一切的势能Energy，都各取一种新的形式与运动。象我们对于凡百新的事业要受新的教育一般，时代要求我们对于新的生活也即为新的修养。

旧的修养，犹如旧的教育，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了。它植根在旧社会的虚伪的道德之上；它的目的在装成一个伪君子，它的方法在抹杀真理与正义。能指鹿为马以阿顺他人，方可称为修养之极致。或故抑本能，或强为悲笑，或佯若谦恭，或假装热诚，皆修养的要领。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国家，在是非颠倒、曲直不分的时代，成功即是真理，即是正义，即是一切，这些原有可原的地方，然而我们既要对于一切估定一个新的价值，既不承认成功的重要，旧的虚伪尚于我们何有？

正义与真理的时代终当到来，在这过渡的时期，我们当为正义与真理而战。我们感到我们的一生当倾注于此。

时代受着旧道德的催眠，一切都麻痺了。假的知识掘成了罪恶的深沟，扩大了罪恶的直径。人类用了十二分的意识，在筑一座罪恶的高台。高台之上供奉了“恶”的偶像。“恶”的赞美歌响彻了，黑的横流在激起狂鸣而相和。

我们是在黑暗之中。且诱且胁，黑暗之中常有一种阴谋在酝酿，我们同时听到一种耳语，感到一种威逼。耳语常使我们心开，威逼常使我们心惧。然而在威逼之前降心，在耳语之中

软化，我们可否？

我们是背负着时代的使命而存在。我们非始终与罪恶对敌不可。“恶”愈强，我们的兵备也要愈加坚锐。必胜的战术，是不肯后退的决心。为了战胜，我们要有不肯后退的决心；为了保存这种不肯后退的决心，我们要有新的修养。

新的修养之要点有四：

1. 养成嫉恶如仇的毅力。——我们的任务在芟除一切的恶，所以我们不仅对于“恶”的暴虐要以一只眼报一只眼，我们真要捉住它的颈项，掷在地下，把它屠了。我们对于一切恶的东西，要常存十二分的嫌恶。我们不赞成消极的“无抵抗”。对于一切的恶，我们没有容忍，有的只是嫌恶与征服。

2. 养成忠于正义的毅力。——各人要有他所应有的“正义”。我们要使正义为一切行为的标准。我们要使一切不离正义，我们要能不离正义。我们要能为正义尽我们的精勤，不要为利欲所诱惑了。

3. 养成爱护真理的毅力。——真理是我们生存的要素，真理没而不彰的人间，那才值得咒诅。一切要依真理而存在。我们要永与真理为友。我们要能爱护真理，犹如爱护我们的友人。我们要不辞为真理而战。

4. 养成不畏痛苦的毅力。——与恶的势力战斗，免不了要有痛苦。这与我们做苦工要劳身体是一样的。所以不畏痛苦是一切事业的先决问题。我们要能泰然忍受一切的痛苦。我们要能以痛苦为每天的粮食。

概括起来，我们应有的新的修养，可以归于真勇之一字，我们的新的修养，便是这种真勇之养成。一个民族的盛衰，常与民族的道德的生活有重大的关系；道德的生活衰颓，民族的精

神便也死灭。我们这庞大的民族，逶迤至今，仅存一具苍白的死尸了！让我们全来由这种真勇之养成，恢复我们的道德的生活！

（原载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6号）

评《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

《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出来了许久，还没有见过一篇批评；我同朋友们通信的时候，我每每叫他们不要客气，只管据理批评；然而总不见有人发表一言一句。今天《学灯》上忽登出了章克标君的一篇批评，我真怀着十二分的好奇心看了。我每读批评我们的作品的文字，最担心的是怕评者不据理而谈，一味冷嘲热骂，或是不分好坏，一味倾倒称扬。这回章君的评论，自始至终我觉得他的态度直没有脱尽孟浪与诬妄，而且还有许多的地方错到不成话了。我为文艺批评的进步起见，要在这里与章君及读者诸君再作一番思考。

郁达夫的《莛萝行》

我们的作品之中，只这一篇章君“不吝惜称赞”。这篇本来自有它的好处，但是达夫自己并不以为是可心许的杰作，我也以为这在一个下午写出来的东西，在达夫的许多作品之中，还不能说是上上。这一点能够自我超克的眼光，或者是我们还有“伟大的将来”之希望。所以我愿章君暂且把你贵重的“称赞”再“吝惜”一下罢！

邓均吾的《白鸥》

读了这一段批评，评者的横暴真是到了绝顶了！什么叫“木头”，什么叫“木匠子”？你看了读了不生什么感觉，安知

不是你自己的头脑是“木头”、是“木匣子”吗？我们要知道这位评者的头脑是个“木头匣子”的地方，请听他批评《簷溜》一诗时所鼓打出来的“木头的噪响”（Wooden noise）！

扰人睡眠的，
单调的声音！——
长夜漫漫，
我只渴望着鸡鸣。

这是多么一首好诗！他这诗的好处是全凭着听觉在做骨子的。我们幻想着一位诗人辗转反侧地不能成寐，而簷前雨滴，又点点滴滴地滴入那时凄凉的心坎，那时对于无眠的抑郁自然会集矢在这单调的雨声上了，所以我们的诗人要渴望着雄浑的鸡鸣来，把这单调的雨声打破！这首诗不管它还有什么象征的意味没有，就单从这样如实的解释，已就是一首好诗，它的好处全靠有末尾的“鸡鸣”两字，要这样才能统一，统一在听官之下，统一在一个整个的音乐里。这“鸡鸣”二字怎么能改得成“天明”！真是“木头”！真是“木匣子”！真是“黑炭涂在明珠上”！

成仿吾的《欢迎会》

在这篇作品里面我所想表出的是旧社会的虚伪和新青年的反抗精神。我时常觉得我们的兄长（民国初年的人）已经甘心堕落，我们这些民国十年代的人，才有热烈的反抗的精神，而将来的青年将更为激烈的反抗。我在这篇作品里面，实使刘姊为民国初年时代的代表，刘兄与刘为民国十年代的代表，而刘弟代表将来的一时代。我同时着手作一长篇小说《兄与弟》，可惜还是那时候写了十几张，至今没有机会续下。我在《欢迎会》中

本想把这层意思说出一点的，因为说白太多了，所以毕竟没有写出。但是由明眼人看来，我想也不是那样难于看出的。章君没有把这种精神看出来，他只看见了这剧的形式。

刘兄的性格没有十分的暗示，我本知道是一个缺点。但是要使他先登场一次，而又介绍他的性格，还要添一点内容；我却不愿再加内容，更加混杂。我当时曾想于壁上挂一刘兄的肖像，由张与刘弟口里介绍刘兄的性格，继想这也不过稍臻形态上的完备，而这种结构所必有的缺点，还是不能征服，所以我率性把这方面努力丢了。所以虽然许多的朋友同章君一样说我未能善为布置于前，我当时却没有想起更有效的方法，而我现在想来，也觉得除非再加一幕。至于刘兄的爆发，虽然因为前面关于他的性格少有暗示，所以在一般人眼中不免来得突兀一点，但是我在前面使刘说了“今晚好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样子”，只要演者能够完全表出，我想还不打紧。而且评者如能看出全剧的根本精神，刘兄的反抗直是意中事。所以这篇剧本的真的缺点，倒在我表现三个时代的人的思想时，没有用同一件事来证明，却于刘姊与刘弟的悬绝，用了刘姊的私通，而于表出刘兄时，另用了别的一件事。不过这两件事虽则不同，其为虚伪则一，而且比用同一事，内容要丰富些。我在这地方实为批评家留有活动的地步，可是对于现在的批评家，也许过于隐晦了。

刘兄出去时，口里叫“谁来同我去”，这本来有点不自然。但章君说是作者因为没有力量处理刘兄退场后之局面，所以硬把这三人交给他带下去了，在我的意思，他们的反抗精神可以使他们一同与虚伪诀绝。我当时本想使刘兄再攻击旧社会，其余三人和他，然后四人同去。可是这样一来，不仅说理

太多，而且与前面重复，而且会减少一鼓作气的效果。末了刘父手扬客单，口呼奇事，并没有把效果打坏，章君想错了。

全剧章君说大约二十分钟可以演完，我以为须二十多分钟或过三十。人物的出入我觉得并不多，舞台上的一分钟是很长的，而且是熟人，也不会扰乱观者的注意力。我在剧中骂拜金主义，表现的也是一种反抗精神，我并没有指骂人物。

总而言之，我用这样的一种结构时，我早知道技术上有不少的困难，我当时想一方面由潜在的思想补救，一方面稍加一点技巧，然而暗昧而生硬，使我终于只能做到那个样子，却是实在的。我只愿我这点成绩能对于我们的剧文学家有消极的效果。章君对于这篇剧本的非难，一部分是因为没有看出全剧的精神，一部分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种必然的缺点，一部分倒是误会。至于有一位王从周君说我这篇是“想模仿菊池宽的作风而又不能的未成作品”，菊池宽的作品我还不曾读过，不知这位日本的时髦文学家，也曾用过这样的结构而能征服这些困难否？如果他曾用过，我倒不信他的结果会比我好。

黄慎之的《他》

章君说文艺不是象反刍类动物吃了食物进去，再送回口中来细嚼辨味的工作，章君的意思大约是说文艺不当是回想。这层又是章君大错。回想在文艺上的价值，我在《周报》第五号的《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上说过，我不多说了。章君把自己的偏见认为原则，太孟浪；至于不知道自己错了，反说作者太幼稚与缺乏文艺的训练，倒象是夫子自道。

张资平的《双曲线与渐近线》

这一篇的题目太离奇，我本来想做一点说明的，后来毕竟搁下了。双曲线是一种圆锥曲线，它与它的渐近线，除非到无穷远点，是不一致的。资平的意思大约是说恋爱与结婚的一致，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理想。一般的人，看了这题名，便已经有点头痛，所以也许是当然看不懂。资平有点怪脾气，你如向他说有批评家说看了不懂，他会说这样幼稚的人还没有做批评的资格。而且评者说“恐怕全篇的焦点散乱了的缘故罢。但是我还不曾寻到作者混乱的证据”，我真不知评者在干什么勾当。

郭沫若的《卓文君》

章君说第一幕不经济，倒不晓得什么叫不经济，讲经济讲到这般程度，却只好把文艺抹杀了。第二幕又说是滑稽的气息把第三幕的严肃紧张味破坏了，这也不对。此剧全靠有第二幕的滑稽，才调和了。焦桐二字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但是一个作者于创作时，没有把这种Anachronism放在意识里而之必要。A. Beardsley画Salome时，加上几本法文书籍，并不见得不好。

红箫刺秦二时，秦二没有一点抵抗，我想秦二此时决不能抵抗。沉默的悲哀是最深刻悲哀，作者是在为演者留用武之地，而评者简直把作者的苦心辜负了。至于剑之来源，各人的衣饰，概都从略，没有详写，所以带剑是可以预想得到的。

章君说三幕“各自有一个焦点而不能相调和的，所以凑在一起，就互相打坏了，一点也不能使人感到什么东西”。在章君的意思大约是静剧不能与动剧调和，滑稽不能与严肃一

致。殊不知于它外表的不调和与不一致正是它全剧变化之处它底里的一种主潮，人性的爆发，是终如贯流着在。此剧情节的开展和人物的个性都很活跃而鲜明，卓父表现的是矫伪的严肃者，却被章君误为丑角去了。据沫若自己说：他做这剧，从Edmond Rostand的Cyrano de Bergerac一剧中所得的暗示颇不少。这剧我也读过，极端的动和极端的静，极端的滑稽和极端的严肃，参错陆离，可以说是表尽了舞台艺术的极致。这剧如经章君批评时，亦必以为“五幕各有一个焦点而不能相调和……一点也不能使人感到什么东西”了。感不感与使不使倒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耳聋的人去听Beethoven的Symphonie，始终是莫名其妙。

× × × × ×

别的几种，章君也大抵弄错了，我无暇一一详说。总之章君这回的态度近于诬妄，我深以为遗憾，而章君于文艺的原理（即于极浅显的文艺原理）似乎还没有做过确切的思索，所以有许多地方简直太不成话了。批评虽然也是天才的领地，但是也决不是不可以力为。批评家要有十分的学识，要有十二分的同情，要能超越一切的偏见。我愿章君从此努力。

六月十七日

昨天新从东京回来了一位朋友，我才知道了章君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原来去年有朋友介绍了他的两篇作品给沫若，沫若因为作品不甚好，所以加了几句评语，改了几个字，给朋友寄了回去。有一天是记的一晚没有睡觉的感情，作者把天明倒叙在鸡鸣之前，沫若说是错误；不料他竟因此对沫若怀了一种极端的反感，这回更迁怒到邓均吾的一首诗上，无端气愤愤地

想把人骂倒。象这种假文艺批评之名，行极雪私愤之实，真是
我们文艺界一件大不幸的事!!!

六月廿四日

（原载1923年7月《创造周报》第9号）

批评与同情

没有比文艺批评还容易被人误解了的。它的职务在哪里？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难解答的疑问。不仅我们现在的文艺界因为这些疑问不曾得到正确的答解陷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便是外国的批评家也很少能为正当的解答的。

专就批评而论，我们至少已有价值批评与审美批评的两种。而以文艺为对象的文艺批评，专就方法分类，至少便有判断的批评与归纳的批评二种；专就态度分类，亦有主观的批评与客观的批评之别；其余如道德的批评、形式的批评等等，正自指不胜屈。

此外还有求疵与捧场的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一是不为作者设想，一是专为作者欺世，要皆是文艺批评的异端，对于读者与作者一样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的评坛，在别的合理的方向总无进步，只在这些异端上用功夫，实是很可叹息的一并事。乔那利斯特Journalist实行他们的乔那利斯姆Journalism，我们只好任其所为；只是忠心文艺的人，我以为应当大家起来把这妖氛一扫。为扫尽这种妖氛我们所能为而应即为之的，便是阐明文艺批评的根本原理。

于讨论怎样为文艺批评之先，我们当想想我们现在渴望着的文艺批评所应具有的几个条件：

我们应当超越一切偏执的见解——文艺批评的纷异，大抵是因为评者固执一见，各不相容。其实假使甲能弃却己见，则

乙的见解未必不能相容，乙之于甲亦复如此。而这种种的偏见其实它们自己便不外是一些不完全的东西，所以拿它们来权衡一件作品，根本上便无从完全权衡得出。偏见犹如一副着色的眼镜，一经带上了，便怎么也看不出实在的色彩来；有偏见的人犹如带上了一副着色的眼镜，他所见的色彩，是只对他一个人真的。所以我们为文艺批评的时候，如果想捉住作品的实在，还它一个相当的评价，那么我们非超越一切的偏见不可。

我们应当囊括一切部分的知识。——文学以外的知识，暂且不说，文学上的知识，我们总应当都给一块收容的地方。我们不当取此而忘彼，因为各个的知识总是部分的，把它们综合起来，使各得其所，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知识。譬如知对称之美的，往往不知复杂之美；知曲线之美的，往往不知直线之美；知纤细之美的，往往不知粗大之美。这便是知有其一而不知有其二的缘故。所以为文艺批评时，如果想捉住作品的全部，我们非囊括一切部分的知识不可。

总而言之，我们如果想捉住作品的实在与全体，我们的心境当如一碧的澄空，没有丝毫云雾，而又能把一切的个体包涵。要这样我们才能给各作品以相当的评价。

有了这样的了解与准备，我们才能讲到批评的方法上来。

一件文艺作品，是作者将一个情况用最适当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努力在由无创造出有，由混沌创出形象，由部分的描写达到全部的表现。所以赏玩者的努力便是由部分的感触得到全部的暗示。这是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赏玩者可以由这具体的整个得到他所具有的美感，与它所带来的意义。

批评家原来也是一个赏玩者，不过当它随作者的指导，由

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时，他是要批评这些部分的感触有没有效，具体的整个完美不完美的。尚不在此，批评家还要由全体的意义，反而批评作者之表现的方法的。譬如作者描写一些梁柱瓦石来表现一座建筑，批评家便由这些描写也构成一座建筑。他所构成的是不是作者想表现的建筑，这是关于作者创作时的意识的问题；不过明敏的批评家所构成的，总是作者所表现的建筑，却无疑义。批评家由自己所构成的建筑，再来批评作者的表现方法与描写时，批评家是与作者并肩而立，一同对着这座建筑。这时候，他不仅可以批评作者的表现方法与描写，他还能进而批评作者所自处的地位。

这样的批评，我们可以称它为超越的批评，因为它的主要的工作，是在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丝毫不把它去与固定的型式相比，也决不议论它的方法，只批评作者所取的方法的成结，与由结果反而批评它的效力。这样的批评，我们决不把外界的事物去比拟作品，我们承认作品的世界之独立性。

然而这种批评的主要的工作既是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那么，这种工作之前，却也有两个困难之处：

我们要有十分的感触力，来捉住作品所描写的现象。

我们要有十分的想象力，来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

这后者是全靠批评家的天资；只前者可以由批评家对于作者或作品的同情而变易。理想的批评家是能由作品得到最多的观念情绪之暗示而能表现出来的。然而，他对于作品或作者非抱有热烈的同情不可，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若是批评家对于作品或作者先有反感或没有同情，那便不论作品如何优秀，

在这样的批评家的眼底，好的也不免要变为丑的，作者的观念情绪更无从感触得到了。

“文人相轻”，这差不多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定律。所以差不多在一般人的眼里分明是好的东西，一到了文人们的眼底，便丝毫没有是非可言，只各是其是而非人之是。固然文人对于作品的监察力要比一般人强，然而他们的同情心反而比一般人弱，实是使他们相轻的最大的原因。

作品纵令如何不完全，只要作者是诚虔地在努力，那便是他向永远求生命的意志之表现。这种诚虔，这种意志，我们非尊敬不可。批评家尤应对于作品常存十分的同情，以完成他的使命。

艺术是人类反抗“死”的最高的努力。不问它怎样拙劣，诚虔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微弱的人子之血泪的凝集。

我一方面愿我们的艺术家三省自己的虔诚，他方面愿我们的批评家把热烈的同情心点起。

八月一日

（原载1923年8月《创造周报》第13号）

作者与批评家

创作与批评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然而创作时不可没有批评的精神，与批评时不可没有创作的精神，却是不可轻轻看过的。有人说：“作者于创作时，是在一种催眠的状态，没有批评的精神。”这是似而非的谬见。假使创作只成于催眠的状态中，那便不外是一些支离灭裂的冲动的表现。如果作者想把全部捕住而表现出来，那便非一旦由催眠的状态出来，做一番观照与批评的工夫不可。短诗许是一个例外，别种要求更多的理智的艺术，如小说与戏剧，便绝少能仅由神兴（in spiration）做成的了。这也决不能没有必然的原因。我至少可以想起以下的两个：

1. 催眠状态是决不能久持的，而完全催眠，为时尤仅一瞬，大部分是不能禁止别的精神作用的不完全催眠状态。

2. 我们所使用的Medium 既多是不如人意的，为征服它们，也势不得不为批评等种种活动。

批评家对于一件作品，是不是要站在作者的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主张判断批评的人，每以为批评者应当高自位置，至少要脱离创作的atmosphere，这种错误的见解，在一般人眼中，是牢不可拔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肯定（bejahren）作者的一切，只评判他的成绩如何，或想由作品中发见它的意义，那便非没入创作的零围气中不行，也要这样才能不负作者。批评与赏玩的不同点，决不是在一个不没入、一个没入，而在批

评家于赏玩时能为不断的反省，赏玩家却只是一味赏玩。明敏的批评家能由创作的零围气，看出作者创作时的态度与腹案来，而这种腹案于了解作品的意义，亦颇重要。所以作者对于评者提示自己的腹案，是极有益处的事。作者画一物，自己以为是虎，评者的职务便在批评它是不是虎，别人怎么说，那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批评家的工作之第一种。如果它确是虎，而他人以为是犬，这时候批评家便应当起而开导，——这是批评家的工作又一种。

作者反抗批评家的批评，在日本几成为了风尚。有人说这种现象很不好，其实日本的作者所以反抗批评家，是因为日本没有伟大的批评家的原故。而且作者反抗批评家，我认为是不避免的事，因为批评家的学识应比作者更广博，而实际上不尽如此。批评家也难免没有偏见，作者自不能不求自中。

对于一般人，批评家是很重要的；然而假使他的批评错了，作者却也有出来反抗的正当的权利。批评家不能是独裁的君主；严密的司法的律条，都要有复审三审的组织。人纵不能扫尽批评家的地盘，而作者自有主张自己的权利。批评家之自作威仪，是与有产阶级之自称骄子，同样无一点根据的。

不仅如此，我还赞成作者之反抗。因为批评所以促作者的进步，而作者的反观亦足以促批评的进步。我愿我们的批评家与作者，能为炮火与铁甲armour一般的竞争。

前几天《学灯》上登了章克标君的一篇《所谓批评者》，这是章君答我的《评创造二卷一号评》的。这篇文字的大部分，是他写来嘲我或骂我的，我真是犯不着多管；至于他骂我身体上某部分有障碍，虽然是极端轻侮，我只付之一笑。我前回的那篇批评，因为我痛恶他的借端复仇，不免加了几句反骂的话

(也只借用了他自己的话)，却不料他又冒了火，竟大显而特显嘲骂的本事，我由他的文章，没入他创作的零围气，更觉不能不赞美他的本事了。然笑骂虽于我如浮云，而真理不可不一辨，我所以把章君误解了的几处地方，拉杂写在这里，供章君及读者诸君的一番参考。对于事物的思考，只忧不足，章君切不可以为我为悔，因为谁又没有思虑不周的时候呢？

章君极端攻击我——作者——不应当反驳他——评者，以为我是攻击他，这也是很错得厉害的误解，反驳不是攻击，章君应当分清楚这一点。我在文中攻击他的，只关于邓均吾的《簷溜》一诗。这时候我已经也是一个评者。关于这首诗，章君不是滥用，便是误用了评者的权限，把一个极真挚的诗人污蔑了。我如不出来订正，恐怕章君的批评，将在我们新兴的诗坛上留下一个永难磨灭的污点。我想我这回的工作，是凡关心文艺上之正义的人，谁也应当争先担任的。

至关于《创造》二卷一号，章君既始终说“我还是不错”，或“纵这是错了，另外的还是木匠干”。我偶举一例，便说我是请洋菩萨，章君的态度我觉得是很彻底而很可爱的，我只请读者诸君自己去批评，不再多说了。至章君说他不是借端雪恨，如果事实如此，我也极愿意谢我操切之罪的。

八月八日

(原载《创造周报》第14号，1923年8月12日)

论译诗

每当我们讨论译诗的时候，我们每不由得要碰着一个重大的先决问题，就是：诗到底能不能翻译？有人说这是译诗问题的alpha与Omega，有些人简直说诗的翻译是不可能。我不是想在这里专论这个能不能的问题，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只简单的说几句。

一讲到译诗能不能的问题，实在说起来，我们又非由“什么是诗？”着手研究不可。然而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而与其对于诗加一些浅薄的界说，无宁说“诗只是诗”。这句话似很无聊而可笑，然而诗是不能由分析与解剖求到它的本质的，所以为得到一个整个的概念起见，倒是说“诗只是诗”的好。这似乎有点象神秘说，然而这不过是为的求一个更完全无缺的见解，不必便是神秘说。

译诗虽也是把一种文字译成第二的一种文字的工作，然而因为所译的是诗——一个整个的诗，所以这工作的紧要处，便是译出来的结果也应当是诗。这是必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十足的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有些人把原诗一字一字译了出来，也照样按行写出，便说是翻译的诗，这样的翻译，即很精确地译出来，也只是译字译文而绝不是译诗。

译诗应当也是诗，这是我们所最不可忘记的。其次，译诗应当忠于原作。诗歌大略可以分为内容、情绪与诗形三部来讨论。诗形最易于移植过来，内容也是一般翻译者所最注意，只

有原诗的情绪却很不易传过来，我们现在的翻译家尤其把它全然丢掉了。

所以理想的译诗，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传原诗的情绪；第三，它应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取原诗的形式。

这样的译诗可不可能？我们以为第一条件的“是诗”，要看译者的天分；第二的情绪，要看他的感受力与表现力；第三的内容，要看他的悟性与表现力；第四的诗形，要看他的手魔。

人类的感情生活，大抵相同，表情的文字语言，也没有多大的贫富之差可论。所以这种理想的翻译之可能不可能，完全关系于译者的能力（只有一种文字所特有的表现法，我认为不能照它的形式用第二种文字表现出来）。

译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以我的些少的经验而论，最初看了似不易翻译的诗，经过几番的推敲，也能完全译出。所以译诗只看能力与努力如何，能用一国文字作出来的东西，总可以取一种方法译成别一国的文字。译得不好的东西，不是译者的能力缺少，便是他的努力不足。这种粗制滥造的译家，在外国亦所在多有，惟不如我们今日这般丰富。现在的许多译诗，我们每每一见便知道译者无能而努力不足。这样的译诗，除酿成一般的人对于诗的误解与表示译者的肤浅之外，是没有丝毫益处的。

不过我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条件之中，当然也有轻重之别。有时为使译品“是诗”的原故，或为传原诗的情绪的原故，内容的小小的变更或诗形的改变，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诗是内容以上的一个东西，我们实不应当舍本而趋末。

译诗的方法有二，我现在为便利起见，假定两个特别的名称：

1. 表现的翻译法 Expressive method
2. 构成的翻译法 Compositive method

我所谓表现的翻译法，是译者用灵感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的意思。这种方法几与诗人得着灵感，乘兴吐出新颖的诗，没有多大的差异。这种方法对于能力的要求更多，译者若不是与原诗的作者同样伟大的诗人，便不能得着良好的结果。所以译诗的时候，译者须深入诗人的对象中，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然后把在自己胸中沸腾着的感情，用全部的热力与纯真吐出。沫若译雪莱的诗，曾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言简而义深。近来有人不懂，无故反加讥笑，这不啻强人凝视讥笑者自己的丑恶的裸体。

这种翻译的方法，实具创作的精神，所以译者每每只努力于表现，而不拘于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我现在举 Richard Dehmel 所译 Paul Verlaine 的《月明》一诗为例：

(P. Verlaine 原诗)

La lune blanche
Luit dans les bois,
De chaque branche
Part une voix
aous la ramée.....

Oh bien—aimé et

(P. Dehmel 的译诗)

Weich kueszt die Zweige
der weisze Mond.
Ein Fluestern wohnt
im Laub, als neige,
als schweige sich der Hain—
zur Ruh;

Geliebte du—

L'étang reflète
Profond miroir
La silhouette
Du saule noir
Où le vent pleure……

Rêvons c'est l'heure,

Un vaste et tendre
Apaisement
Sembler descendre
Du firmament
Que l'astre irise……

C'est l'heure exquise

月光皎清，
照入深林：
一枝枝，
吐弄清音，
出自阴森……
哦，我的爱人！
池塘反映，
深镜。
杨柳暗，

Der weiler ruht' und
die weide schimmert
Ihr Schatten flimmert
in seiner Flut, und
der wind weint in den
Baeumen
Wir traumen—traeumen

Die weiten leuchten
Beruhigung,
Die Niederung
hebt bleich den feuchten
Schleier hin zum Himm-
elssaum,
O hin—O Traum——

银白的月光，
流照疏林上：
枝枝映着光，
不住的哀响，
声声清澈……
哦我的亲爱的！
一池清净水，
沉沉耀银镜。
柳树映池水，

影氤氲。
风在哀吟……
睡罢，已是时辰。

影暗寒光迸。
飒飒悲风鸣……
我与你，梦相亲。

泛洲而可人，
一个和平，
仿佛是，
自天下临。
天上有繁星……
这正是一刻千金！

无边的静景，
弥漫此旷野，
一层的浮影，
如自长空下。
点点耀银光……
哦无边的梦乡！

（沫若旧译）

（仿吾四年前旧译）

Dehmel的译诗，虽有许多与原诗不同之处，然而它自己便是一首好诗，而又能把诗的情调表出，所以说它是魏尔岑诗的名译，谁也不能非难。

其次，我所谓的构成翻译法，是保存原诗的内容的构造与音韵的关系，而力求再现原诗的情绪的意思。这是一般人所常用的方法，但他们每每只把原诗一字一字的翻出，依样排列出来，便以为工事已经完毕了，他们绝少致力于音韵的关系与情绪的构成的。这种方法的要点，是在仿照原诗的内容的关系与音韵的关系，求构成原诗的情绪。译者须把原诗一字一字在内容上的关系与在音韵上的关系拿稳，然后在第二的一国语言中也求出有那样的内容的字，使它们也保存那种音韵上的关系。

这种方法的好例，在我们的文学界中，我还不曾多见，现在只把我所知道的引用几首。

Das Meer erstrahlt im Sonnenschein,
Als ob es golden wear

Ihr Brüeder, wenn ich Sterbe,
Versenkt mich in das Meer.

日光之中大海明，
颜色如黄金，
友们哟，假如我死时，
请沉我尸入海心。

——海涅Seraphine第十六首，沫若译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No nightingale did ever chant
More welcome notes to weary bands,
Of travellers in some shady haunt,
Among Arabian sands,
A voice so thrilling ne'er was heard
In spring—time from the Cuckoo—bird
Breaking the silence of the seas,
Among the farthest Hebrides.

看她，独在回陇里，
那孤独的高原的女孩儿！
看她，刈着还歌着，一人独自；
为她止步，或轻一点儿！
她一人刈着，还把来捆了，
又歌起她的哀调；
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歌唱的清音。
绝无好莺曾歌唱，
更悦耳的清音；
于倦了的旅人之队，
在阿拉伯沙漠的幽阴；
如此动人的声涛，
不曾闻自好春的鹁号；
那啼破海湾之沉寂，
于远方之希布利诸岛的。

——Wordsworth 的《孤寂的刈稻者》（仿吾译）

这些许不是什么好例，然它们所构成的情绪，与原诗相去尚不远，可以称为译诗。

再把这两种方法考察一番，那末，表现的翻译法是要从一个混一的情绪放射出来，所以它的作用是分析的远心的。构成的翻译法恰恰相反，是要从散乱的材料结合起来成一个混译的情绪，所以它的作用是综合的求心的。

表现的翻译法既是由译者放射出来，结果难免没有与原作的内容不同之处，比如，原作字句的先后详约，每被颠倒或更改。这是它不如别的译法之处。然而构成的翻译法，虽在内

容上可以无限的逼近原诗，而情绪每有不能用这自绳自缚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感情生活大抵相同，一国语言可以表现出来的情绪，别的语言也可以表现出来，只能说可以用同一的形式。所以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不能妄定高下，最后的判决总要看译者的才能如何。

总而言之，译诗第一要“诗”。假如它是诗便不问它与原诗有无出入，它是值得欣赏。近来指摘译诗的人颇多，惜他们几把译诗与学习外国文字的课题同视了，有些竟弄错了也去向他人饶舌。我们讨论一件事情，总要先作一番思考。

一种语言的最丰富的表现，可以在诗歌中看出来。我们的语言极富，只是因为构造生硬的原因，表现却不甚丰富。我们的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目的，是在使我们的表现丰富起来。我们能把外国的许多好诗翻译出来，是可以使我们的表现丰富，同时使我们知道怎样扩充我们的表现方法的。我愿我们的翻译家不要以翻字典自限，要知道译诗也正是我们的艰巨工程之一部。

十二年九月三日

（原载1923年9月《创造周报》第18号）

秋 的 诗 歌

自然是最伟大的艺术，四时是最庄严的律吕。没有比春夏秋冬的变化还能对于我们有更大而更多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物质的，毋宁说是精神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四时的变化不单是外部的现象的时候，我们才能发见自己是很脆弱而易于为这种变化所感；不是的，我们直要深深感觉自己的全身心在不由自主地与这庄严的律吕共鸣而共成这伟大的交响乐。

四时之中又以秋天对于我们的灵感为最伟大。春天是一年的早晨，这时期中我们的全神完全为希望所占据了。夏天是一年的日中，这时候我们全在快活地追求着希望的实现，别的作用还是一概没有。冬天是一年的夜间，这时候不论我们的希望实现与不实现，我们深深感觉劳顿了，我们只希望甜美的休息到临。只有在秋天这一年的薄暮，我们的心灵才能发见任它纵翼飞腾的领土，这时候我们渐次知道我们的希望或者还在远方的暮霭中，而暮色的一重重的垂帘已经自空而下，或者已经达到，而终将不能长为我们所有。然而我们去残年的绝望的状态 Resignation 却还太早了，我们的心中还有一闪闪的余灰未曾全灭；所以秋天的情曲是介在绝望与追求之间，而以追忆的情怀为它的大动脉。

这种秋天的情曲，古来多少诗人为我们创出了不少的表现。我们只要一读他们的诗歌，我们自己的全组织便也要觉到

有一种动力的 **Dynamic** 律吕在诱它们去共鸣而舞蹈。只我们中国的古诗中，便有不少的绝妙的诗句。如汉武的《秋风辞》之类，直是全人类的文库的精华，不独是我们私有的荣耀。这种质朴而沉静的诗歌，是大自然自己的琴调，人类的脆弱的心弦是做就了易于为它所感动的。

中国的关于秋的诗，我请读者自己去寻玩。我现在想介绍几个外国的诗人，附以译诗，公诸同好。

1. Paul Verlaine

一讲到秋的诗，我想没有人不想起《可怜的侣离雁 *Pauvre Lelian*》的《秋之歌 *Chanson d'automne*》的。比什么都注重音乐的这位奇僻的诗人，他是象征派的翘楚，是自然的一个无意识的歌童。他的诗是生命的刹那之最丰富的表现。他这首《秋之歌》*Chanson D'automne* 的译诗，每一国都有若干种，而我所见过的，只有德国的 *Franz Evers* 所译较佳，这首诗的神韵似超过了可译的范围。我于四年前曾把他译出了，当然也是不能满意，联录供不懂法文的诸君玩赏。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lons
De l'automne
Blessent mon coeur
D'une lueur
Monotone.

长的哀吟，
来从鸣琴，
秋声的，
伤我的心，

把一种烦闷，

单调的。

Tout suffocant

Et blême, quand

Sonne l'heure,

Je me souviens

Des jouts anciens,

Et je pleure.

全是窒死人的，

苍黄的。

当那时辰响彻，

我想起

往日，

我呜咽。

Et je m'en vais

An vent mauvais

Qui m'importe

Deçà, delà,

pareil à la

Feuille morte.

我飘荡，

尽风狂，

将我倾跌。

这边，那边，

犹如一片

凋残的叶。

2. Nicolaus Lenau

这位忧郁的诗人，本姓 Strehlenau，是匈牙利人。虽然他遗下了不少的优美的诗篇，然因为他是异族的原故，生前既不为度量狭小的德国人所爱，死后亦以他为无病呻吟，被屏入二三流之亚，在德国文学史中勉强占二三页的面积而已。虽然他的创作的力量与思想的充溢，至少可以与许尔雷 Schiller 匹敌，然而他的纪念铜像，却在维也纳的一个不堪的公园中，没在许尔雷的高像的荫里。对奥匈国的代表，世人都只知有那个纤弱而无思想的古典主义的末流 Grillparzer。这些都是德国人埋没薄命的诗人的象征。他是世界苦 Weltschmerz 的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他的诗的特征，是他那种固有的沉痛的忧郁。他的诗与普通的技巧诗人不同，是由愁怀深处绞出来的。关于秋的诗，他有数首，兹录秋的哀词 Herbstklage 于下：

Holder Lenz, du bist dahin!

Nirgends, nirgends darfst du bleiben!

Wo ich sah dein frohes Bluehn,
braust des Herbstes banges Treiben.

好春，你去了！

无处，无处你可留住！

往日的好花夭夭，
今是秋声悲起之处。

Wie der Wind so traurig fuhr
durch den Strauch, als ob er weine,
Sterbeseufzer der Natur
schauern durch die weiken Haine.

凄风吹渡萋萋，
悲惨如泣，
自然的死的悲号，
在哀林冷颤着去。

Wieder ist, wie bald! wie bald!
Mir ein Jahr dahingeschwunden,
Fragend rauscht es aus dem Wald,
Hat dein Herz sein Glueck gefunden?

又是，这等匆匆！
于我消去一年了。
林儿有声低问：
你的心儿寻着了幸福否？

Waldesrauschen, wunderbar
hast du mir das Herz getroffen!
Treulich bringt ein jedes Jahr
welkes Laub und welkes Hoffen.

林声，很奇怪地，
你中了我的心肠！
忠实地每岁都来，每岁，
枯了的叶儿与枯了的希望。

3. Kalidasa

这是印度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年代已经难于确定，大约是基督纪元第五世纪。关于他的身世有许多的传说与歌谣，有谓他的学识与诗才为女神Kali所授，他这名字的原意，便是这位女神的侍者。他深通哲学，又能天文与法律。他的作品还

留存的有戏剧三、史诗二，挽歌与诗篇各一，共七篇，最著名的是剧曲shakuntala。歌德极崇拜他。我所要介绍的诗篇中的一首《秋》，是把秋天的情绪拟人Personification，最美——我疑是最初的一首，模仿它的，至今不绝。沫若曾把它由英文重译了出来，我乐得借用了。

The autumn comes, a maiden fair
In slenderness and grace,
With nodding rice—stems in her hair
And lilies in her face,
In flowers of grasses she is clad,
And as she moves along,
Birds greet her with cooing glad
Like bracelets' tinkling song.
秋天来了，一个佳丽的姑娘
袅娜而端庄，
翘摇的稻梗——发间，
睡莲之花——脸上。
野花烂缦为衣，
群鸟随之徜徉，
群鸟之乐洋洋，
犹如环珮之鸣锵锵。
A diadem adorns the night
of multitudinous stars,
Her silken robe is white moonlight,
Set free from cloudy bars,
And on her face (the radiant moon)

Bewitching smiles are shown,
She seems a slender maid, who soon
Will be a woman grown.

华冠璀璨，

耀繁星之夜景，

绢衣皎洁，

乃月光之泛出银屏，

朗月的面儿，

有迷人的笑影，

她象个袅娉的姑娘，

刚要到成熟的年龄。

Over the rice—fields, laden plants
Are shivering to the breeze,
While in his brisk caresses dance
The blossom—burdened trees,
He ruffles every lily—pond
Where blossoms Kiss and part,
And stirs with lovers fancies fond
The young man's eager heart
——trans, by A. W. Ryber

稻田上黄熟的稻草，

随“微风”而飘摇；

在它那活泼的抚抱之中，

戴花的树木舞蹈；

它吹皱一一的莲池，

莲花儿吻接而又分了；

管教少年人的痴心，
为爱人儿甜蜜的梦想潦倒。
——中秋节

（原载1923年9月《创造周报》第21号）

《创造日汇刊》终刊感言

仅仅出到了一百期，似乎历程很短，然而我总觉得它是很长很长的。这几天我们时常说：居然出到一百期了。

开辟这块新土地，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冒险。真的，我们自己手中待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们所恃的，仅我们的几个好朋友的一德一心，我们是手无寸铁的。

关于我们这工程的成绩，我想没有比我们自己更不满意的。无论如何，我们当初的计划，决不是只为此而已的。只我们的人数太少，事情太多，与外来的投稿太少，“小诗”太多了，使我们终于不曾把当初的计划实现。

我们当初的几种计划之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使我们突然高兴着手开辟这块新土地的原因的——是对于新旧出版物的一种监察与批评的工作。我们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也造就了不少的名人博士，究竟当此凶年，不仅良莠不齐，而且败类实占多数。一知半解之徒，装出一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的面孔，市井无聊之辈，也弄出一些有名无实的翻译与著述出来。这种种的颓风，我们实在不能沉默。终我们这一百天的工程，我们不曾忘却我们的这层天职。然而毕竟我们的力量太弱了，毕竟我们的嫉恶之心还没有修养到十足，而不辨黑白的群众对于我们的诬枉倒使我们每期作呕三日了。

这种工作我们现不能力行，我们这开辟的新工程，本来对于我们早已失了它原来的意义，我们的努力全是第二义的东西

了。然而在我们这种第二义的努力之中，多少可以使我随时想起了都可以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我们所择登的仅仅几十首的新诗。我说我随时想起都可以感到一点安慰，也许是因为我这一百天的努力，大半都消磨在这新诗的选择里。真的，我每天一到下午，便至少也得把我们这两年来接到的几堆诗稿翻来复去地搜寻几遍；每当寻不着好一点的诗，便又忙着向别的方面去寻找。这几十首诗，那一首首是怎样怎样得来的，我此刻还能一一想起。我对于这几十首诗所以特别感觉一种亲爱，也许是因为有了这种因缘，然而我自信我这点溺爱决不是不当的。

关于我们所选登的几篇小说，我也可以保证它们是水平线以上的作品。几个作者之中，尤以周全平与倪贻德二君为最有希望。二君是这半年以来的最杰出的新进作家；我们便只介绍了这两位无名的新进作家，也可以说没有空费了这一百天的努力。

均吾的神话与《歌德传》都是空前的壮举。《歌德传》不曾登完，真是可惜。

回顾我们这一百天的工程，我们自信已经尽了我们的心力，我们暂时只得以此自慰了。至于我们在这边没有做完的工程，我们在季刊与周报上当更努力去做。

报馆街也跑够了，望平街，我们再会！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原载《创造日汇刊》）

真的艺术家

没有比现在的时代更混乱的！差不多每一件事情都有真与伪的两方面，每一个名称都有真与伪的两实体，甚至于一样号称艺术家，也有真的与伪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抽出一点时间来一想什么是真的艺术家，实在是很重要的急务。

欲明什么是真的艺术家，我们不可不一察什么是艺术。不过关于这一点，古今的艺术家的议论甚多，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事，我只在这里引用约翰·拉思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的几句话来求一点暗示。

拉思金说：

“学者当熟记我们所常用的‘制造’、‘技术’与‘美术’，诸字的真的不同之处。制造 Manufacture 依语原与正确的用法上说，是用手工作——直接或间接，用或不用机器。用手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制造；但须是只如机械一般用手做出来，而在工作中不直接受智力的影响的。

其次，技术 Art 是手与智力的协作：比如做机械的技术，造船的技术，造车的技术等。这些，当称为技术而不当称为美术的这些，都是手与头同时协作的事业。

第三，美术 Fine Art 是手与头与心协作的事业。” (The Two Paths)

我们平常所用的艺术二字，是包含美术及美术以外以美的追求为生命的各种努力之统称。拉思金关于美术的说法，是可以

应用于艺术一般的。

艺术是手与头与心协作的事业，没有比这句话还易明了，也没有比它还更正确的。心！这是艺术所特别需要的。我们如果要创作伟大的艺术品，我们要有伟大的心情的努力；我们如果要作一个真的艺术家，我们要有真的心情的伟力。

所以一个真的艺术家当是一种真的心情的伟力之所有者，而且他如要成为伟大，他也必定要养成伟大的心情。这便是真的艺术家与他的修养的要点。

然而真的艺术家，他的伟大的心情，与其说是表现在他的作品，毋宁说是表现在他的生活；而且他的作品每不过是他的生活之糟粕。真的艺术家所以要养成伟大的心情，是为他的生活，而不是为他的作品；实在也要有伟大的心情使他的生活伟大，才能有伟大的心情流贯他的作品。

我在这里所用的“伟大”二字，当然不是可以名与利来测量的，一般的人所常用的意思。反之，名与利于艺术家的伟大没有丝毫的关系，只虚伪的艺术家思借以自重，才不惜酷名逐势，苟合取容，甚或依附权贵，谄媚财奴，以卖身取辱。世界诚不少这样的假的艺术家，甚至有作些好听的文字，迎合时人，而自吹自唱，与画些好看的图画，愚弄群盲，而故标高价的，然而这些可怜的人实在不能说是艺术家，最好是各人挟着自己的技术，或去为人画招牌，或去为人作广告，他们不患没有他们存在的地方，然而决不能说是艺术的女神之使者。

真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他们的信条是美即真即善。他所希求的是永远，他所努力的是伟大。名利不能动他的心，更不足引他去追逐。歌德低首于王公之前，贝多芬Beethoven尚且愤恨，为一国重臣的歌德或不可厚非，然与直冲皇帝行列的

悲多汶相比，则谁为更伟大的艺术家，似不难立见。

伟大的艺术家莫不嫉视世间的虚伪，然而他们决不是遁世者流。他们反极高兴备尝人生的苦乐。他们的伟大的心情，乐时要比一般的人更欢喜，苦时也要比一般的人更悲痛。他们乐时是为全人类乐，苦时是为全人类苦。他们自知是全人类的有意识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苦，也以此为乐；他们决不忍独善其身，弃此彷徨的羊群而他去。

多少伟大的艺术家传布了他们的“爱”的宗教！他们之中，有的是出于悲悯，有的是别无所为。前者近于宗教家，后者才是纯粹的艺术家的。他们的动机虽或不同，然而同是出自他们的伟大的心情，并且不断地有心情的伟力支持着。他们是宗教的艺术家，同时他们又是艺术的宗教的传道者。

然而他们决不是没入于人生的黑海而随波逐浪，反之，人类的生活对于他们亦不过供他们创作的物品。人生自己便是一种艺术。他们是自己在建设自己，在创造自己，在表现自己。他们的艺术是生命的艺术。对于他们，如英国Edward Carpenter所说，人生是表现Life is Expression。肉体与物质都是供他们表现的东西，他们用生命、物质与身体，正犹如画家同他的彩色。

耶稣、释迦、老聃、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贝多芬、密勒、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也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自从有了他们，人类增加了荣光不少。他们的一生都是完美的艺术。他们的伟大的心情，好象可以把全人类的心灵囊括。

所以真的艺术家，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是有伟大的心情而能以人生为艺术的人，他是超人，他是人而神。

我们的艺术界觉醒不久，才如冬尽春初，正在萌芽时代，

我们固不能即望有伟大的艺术家显出，然而当此黑白不分的时期，凡从事艺术的人，应常保持清静，养成伟大的心情，以求成为伟大。而对于假的艺术家，我们要不惜一致屏弃，如我们弃绝一切有害的细菌。这决不是残忍自私，这才是热爱真理的真的艺术家的态度。

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上海

（原载1923年11月《创造周报》第27号）

国学运动的我见

我们的学术界自从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真不知道经过多少变迁了。变迁本是进步的一个条件，可惜我们所经过的变迁，不幸是向退步一方向去的。最初，我们有所谓国语运动，这与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革命一样，总算成功了。其次，我们有所谓学术运动，许多关于社会经济与哲学的书籍，真如雨后的春笋露了出来，不幸投机的商人虽多，好货完全没有，广告虽然打得很大，内容却实空虚，有许多不值一文钱的人也自称哲学家，也自称社会学者，尤足使人喷饭，所以这种运动的结果，只不过这些商人各人赤条条地暴露了他们的骸骨。最后我们现在有所谓国学运动，这种运动怎样奇怪，与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怎样无聊，我觉得没有适当的语言可以表出。

国学运动！这是怎样好听的一个名词！不但国粹派听了要油然而喜，即一般的人听了，少不了也要点头称是。然而他们这种运动的神髓可惜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所以假使国粹派称新文化运动为清谈，我们当称这国学运动为清谈中之清谈，遗害更加百倍的清谈。

从事这种运动的人，约略可以分为下列的三种：

1. 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
2. 老儒宿学及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倡和者。
3. 盲从派，这是一切运动所必需之物。

这三种人性质虽稍不同，然而他们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想用以显耀一时，却是一样的。要想取科学的方法为真切的研究，他们都缺少科学的素养。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这样的研究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即于国学的研究，亦无何等的益处。

国学，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然而现在便高谈研究，对于上列的三种人，未免为时过早，何况群起而为一种运动？凡研究一件东西，我们能常持批评的态度，才能得到真确的结果，若不能保持批评的态度，则必转为所惑。古来多少国学家所以把他们绝大的努力空费了，便是因为他们缺少批评的精神，终于为对象所迷乱而不知所择的缘故。然而欲保持批评的态度或精神，须有十分的素养，所以我们即要研究国学，亦非先有十分的素养不可。现在是修养的时期，还谈不到研究上去。

这三种人中颇有因为外国人近来喜欢研究我们的国学而沾沾自喜的。这种外国Exotics不满足于科学（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妙想天开，以为极东的苍天之下有一块常青的乐土；他们不再想起做过他们幻想之背景的，和在科学上做过他们的先生的阿拉伯或印度，却更很远很远地画出一个这样的Paradise来。虽不免出人意外，然而他们这样满足他们的幻想，是谁也不能干涉的，不过我们在这极东的苍天之下的人若偏信以为真，那却是非狂即盲了。不懂什么是科学的人，我们尽可任他们胡说，然而我们当知数千年来的疲弊之后，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素养最紧要的命脉，而且是恢复我们的生命力之唯一的源泉，我们当对于科学维持我们的信仰。

广义上说起来，不论什么事物都可以为研究的对象，然而研究的人一要有十分的素养，二要取适当的方法。返观现在许多热心国学运动的人，却不仅没有十分的素养，也还未取适当的方法。

综观年来的成绩，我只见有考证几篇，目录几个，近更看见了这篇考证的文章，然皆不过标榜他们考据的渊博，而扬甲抑乙，扬乙抑丙，只顾搜罗死字，据以相争，曾不一问它们的价值与Probability；这样的研究，便做几十百年，终是无所裨益。若这样的考证便是国学运动的全部，我们倒也不须多说了。

以这样的人们，取这样的方法，我看我们这种所谓国学运动，充其量不过能造出一些考据死文字的文字，充其量不过能增加一些更烦碎的考据学者。近代的精神是就事物去考究，不闻是就死字去考究。我愿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够反省，我尤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基打稳。至于遗老逸少借此消闲，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不是我所愿意说及。

十一月十三日，上海

（原载1923年11月《创造周报》第28号）

《呐喊》的评论

我们每当静默中，每易悬想有一冲破这静默的动乱到来，或竟希望它临到。我一个人尤觉得静默不外是动乱的一个潜伏的时期，不会继续长久的。

近半年来的文坛，可谓消沉到极处了。我忍着声音等待震破这沉默的音响到来，终于听到了一声宏亮的呐喊。在我未曾直接耳闻这一声宏亮的呐喊之先，我先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呐喊的呼声，这种呼声对于提醒人们迟钝的注意力是必要的，然对于我这种吞声等着的人，却觉得有点嘈杂而可厌。

然而我终于听到了一声宏亮的呐喊了，这便是鲁迅的《呐喊》一部小说集。

在嗜好文艺的人，这一声宏亮的呐喊当然是做批评的绝好的材料，然而许多的朋友虽然很望我也做篇批评，我总觉得有点不好如何做。因为：

我若写一篇赞词呢，作者名闻天下，门人弟子随处皆是，而且那些嘈杂的呼声莫不是异趣同归的赞美，我又何必把我这本来不大好听的声带撕开，放出一些讨人嫌厌的声浪？

反之，我若不赞而贬呢，有许多的人已经说我是专爱吹毛求疵的，那怕不是恰恰把自己的罪名证实了？吹毛求疵！我本来不比一个化学分析的技师更干犯了这条法律，然而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君子贵能远嫌，我又何乐而故干众怒？

而最使我觉得困难的，是我自己不能把要说的话说得有

趣。我是个不能说趣话的人，我的笔便是我的叛逆者。世人的批评没有比对于我更不公平的，然而我颇自知这是我自己性格上的缺点，也是我自己的将以悲剧完结的命运。

然而要在我们最近的文艺中寻出一件可以为批评的对象的作品，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呐喊》的作者也许是不承认批评的一个，我也极端赞成作者主张自己的权利，然而批评是为的纠正作者呢，还是为的使读者了解作品的一种向导？我以为文艺批评的真的作用在使读者了解作品，使之给它一个相当的价值。至于纠正作者，那是间接的作用，是教导而不是真的用法上的文艺批评。所以文艺批评的配角是读者而不是作者，作者即不承认批评，而批评仍然要发生效力。

《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了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杂志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

共计十五篇的作品之中，我以为前面的九篇与后面的六篇，不论内容与作风，都不是一样。编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恰依我的分法把目录分为两面了。如果我们用简单的文字把这不同的两部标明，前九篇是“再现的”，后六篇是“表现的”。

严格地说起来，前九篇中之《故乡》一篇应归入后期作品之内，然而下面的《阿Q正传》又是前期的作品，而且是前期中很重要的一篇，所以便宜上不妨与前期诸作并置。

前期的作品有一种共通的颜色，那便是再现的记述。不仅

《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是如此，即别的几篇也不外是一些记述description。这些记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筑成build up各样典型的性格typical 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记述的世界，而在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称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典型筑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败，也便是在此处。作者太急了，太急于再现他的典型了；我以为作者若能不这样急于追求“典型的”，他总还可以寻到一点“普遍的”（allgemein）出来。

我们看这些典型在他们的世界不住地盲动，犹如我们跑到了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家，看见了各样奇形怪状的人在无意识地行动，没有与我们相同的地方可以使我们猜出他们的心理的状态。而作者偏偏好象非如是不足以再现他的典型的样子。关于这一点，作者所急于筑成的这些典型本身固然应负责任，然而作者所取的再现的方法也是不能不负责任的。

假使我们暂时借用那被他们滥用了的一个名称，暂不顾忌一般人的滥用，那么，这前期的几篇可以用自然主义这个名称来表出。《狂人日记》为自然派所极主张的纪录（document），固不待说；《孔乙己》、《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亦不待说；即前期中最好的《风波》，亦不外是事实的纪录，所以这前期的几篇，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的作品。

这几篇自然主义的作品，除了那篇不能说是小说的，并且即称为随笔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之外，在它们自己的王国里大都是成绩很不坏，而且作者的手腕是很值得欣赏的，便只这几种不曾见过的unique的取材，与作者的冷静而肥胖的Hue

mour, 已可博得一般人的惊疑而绰有余裕。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赞成自然派的主张,然而我们如欲求为一个公平的审判官,我们当然要给自然主义一个相当的地位。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前期这几篇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抹杀它们,我们反应当取它们在自然主义的权衡上的重量。作者先我在日本留学,那时候日本的文艺界正是自然主义盛行,我们的作者便从那时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这大约是无可疑义的。所以他现在作出许多自然派的作品来,不仅我们的文艺进化程序上的一个空陷由他填补了,而在作者自己亦是很自然的。

前期的作品之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这几篇中还有一种特色,那便是它们所显现的村人的性格。作者所取的几个典型,多是乡村或小镇上的人物,在这一点,作者可谓独开生面了(描写乡村生活的文字很不少,然多庸俗之流)。我们现在在都市过活的人看乡村的人好象永远隔着在彼岸,文学家能够在这中间造出一条桥梁,使我们知道他们,也使他们自觉,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此中也正有无穷的材料;然而我们如果要表现他们的时候,我们最要注意环境与国民性,我们的作者可惜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颠倒尽把他的典型写成abnormal的morbid的人物去了。这许是他所学过的医学害了他的地方,是自然主义害了他的地方,也是我所最为作者遗恨的。

读《呐喊》的人都赞作者描写的手腕,我亦以为作者描写的手腕高妙,然而文艺的标语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而且我以为作者只顾发挥描写的

手腕，正是他失败的地方。文艺的作用总离不了是一种暗示，能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方可谓发挥了文艺的效果。若以全部来示全部，这便是劳而无功了。只顾描写的人，他所表现的不出他所描写的以外，便是劳而无功的人。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药》、《明天》等作，都是劳而无功的作品，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这样的作品便再凑千百篇拢来，也暗示全部不出。艺术家的努力要在捕住全部——一个时代或一种生活的——而表现出来，象庸俗之徒那样死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从《阿Q正传》翻过来看《端午节》时，我想不论谁也会觉得有点奇异的。不论表现与内容，这两篇比邻的小说是大不相同的；严格地说起来，前者不过是一篇故事（Tale），后者才真是我们近代所谓小说。我一直读完《阿Q正传》的时候，除了那篇《故乡》之外，我好象觉得我所读的是半世纪前或一世纪以前的一个作者的作品。我读了这篇《端午节》，才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

而最使我觉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节》的表现的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我们的高明的作者当然不必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然而有一件事是无可多疑的，那便是我们的作者原来与我的几个朋友是在一样的境遇之下，受着大约相同的影响，根本上本有相同之可能的。

无论如何，我们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在这一点，《端午节》这篇小说对于我们的作者实有重大的意义，欣赏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记了这一点。

《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之死》，可惜表现在不足，薄弱得很。《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

《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不甘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艺术的宫庭。这种有意识的转变，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

总而言之，假使《呐喊》有一读之价值，它的价值是在后期的几篇；假使作者关于自己有所表白于我们，那便是他的复活。

我在上面草率地把我关于《呐喊》的意见说过了，然而在我搁笔之先，觉得还有几句话没有说尽。

作者是中途使用白话文的一人，他用了许多无益的文言，原不足怪，然而读下去是很使人不快的。又作者的用字不甚修洁，造句不甚优美，还有些地方艰涩，这都是使作品损色的。我们的新文学现在还是在一个建设国语的时期，许多的表白都待我们来新创，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不要忽视了。

集中有几篇是不能称为小说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便是新诗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做新诗，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做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拜的人，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象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全集我只看了一回，我现在只凭了我的记忆在这里说话，我如多看一两回，也许发生不同的见解。然而我回头一看，却

还不觉得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所以我将在这里搁笔，就把这几句话拿去报答希望我做批评的几个朋友。至于狂妄的地方，那也不外是我自己暴露了自己虚空的裸体，大方君子可不要笑绝。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原载1924年2月《创造季刊》2卷2期）

批评的建设

忧怀国事的人莫不知道国是之所以日非是因为没有法纪，为善不赏，为恶不罚，致金钱为万事之动力，势力为万物之权衡，狡黠之徒遂惟利是务，不知有他。

我们的文艺界恰是政治界的一幅缩写，黑白混淆，良莠并立，尤为酷肖。推考它的原因，亦不外没有辨别是非的真的文艺批评存在，所以象对于国事我们要主张维持法纪，对于我们这方面的文艺我们要高呼“批评的建设”。

文艺批评的全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暂时不必提及，它的语原是从希腊文的Krinein(判断)，我们便就“判断”一方面谈谈罢。

判断是我们的一种良能，我们若没有它，我们是不能一天存在。不仅我们的感官，生而能辨形色，而且我们的天赋的智力，稍长便随处发挥它的效果，使我们能够判别安危，断定善恶。有关于我们的安危利害的事情与对象，我们固然加以判断而定去取，即于我们的安危利害无甚关系的对象与事情，我们亦莫不随时有我们对于它们的判断。每见一色，我们自然会判断它，同样，每遇一事，我们也自然会有一种判断。

然而这只就浅显的对象与事情才能如是说，若对象与事情繁杂，我们的感官固不能直接发挥它们的效用，即我们的天赋的智力亦必苦于无从措施。这时候我们便不能不求教于后天的知识了。譬如这里有一瓶化学的药品，一般的人只能判断它的

形色与味，怎么也无从多知，这时候假使我们是学过化学的人，我们便能由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断定它的成分与性质。关于物质的现象如此，关于社会的现象亦如此。自人类进化以来，我们的对象一天天由简易而更趋于繁难了。我们非有丰富的修养不行，而对于特别的对象，我们又须有专门的知识才能加以判断。世愈进化，我们的对象亦愈繁难，于是Kritikos(能批评的人)始为社会所需要。自近代批评的精神发达以来，于是批评更进而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差不多各专门的知识都各有它的批评家了。

我们现在所常用的文明批评家、军事批评家等，都是应这种要求而发生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专门有特别丰富的知识，他们的批评可以供我们这些没有特别知识的人们的参考。

一切的进步决不是从无意中可以得来的，有有意识的努力，才可以得到真的进步。然而欲为有意识的努力，须先有真确的批评，否则不知何从努力。所以进步无批评不可，欲求进步，我们应当先建设真确的批评。

文艺亦是人类精神活动之一种，我们如果要它进步，我们亦当先建设它的批评。

时人对于文艺批评颇多反对的意见，然而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外以下数种：

1. 不愿多管是非。
2. 不承认有客观的真理。
3. 以现在无好批评。

这几项理由之不能成立，我将逐项解剖。至于谓文艺只要是秉着内心的要求，便无所谓好丑，这多是不成器的人借以自欺欺人的话，我以为在此不须多讲。

不愿多管是非，在安分守己的好人与明哲保身的君子看来，当然是修身的要诀；然而他们这种消极的伦理不仅是养疽恣虐，而且实是矫枉的伪善的行为。“是非人心，人皆有之”，我在上面亦曾说过批评是一种良能；我们纵不主张文艺有一绝对的标准可以权衡一切，然而相对的差，相对的美丑，是谁也不能不承认的。象这种沙漠中的高蹈派，我真不知他们将何以自别于无赖的下贱的文人，我真不知他们自己的作品将何以自别于无聊的文字。

“没有客观的真理”这句话实是一般偏重主观的人的口头禅，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说这句话时实在已经承认了一个客观的真理，那便是：“没有客观的真理”。他们实是承认有这一个客观的真理，不过他们只承认有这一个，不过他们想把别的真理打倒而建设这唯一的一个。然而他们这唯一的客观的真理，它的Probability至多不过二分之一。他们如果可以把这唯一的一个来打倒别的，别的也可以打倒这唯一的一个的。所以实在讲起来，这种无谓的武断是很可笑的，倒是坦白的怀疑有更多的真理。但是我们在这一件必须注意的事，那便是，他们所以不承认有客观的真理，多是因为一切的现象是流动的，易变的。他们以为流动易变便是等于没有，殊不知流动本是世界的真相，只要我们知道这流动的法则，这世界还是在我们的掌握中，还是我们所有。我们不能因为水变成了蒸气便以为不曾有水，我们不能因为电气眼不能见便说电气是没有的；反之，我们既能知道它们的性质与大小，知道它们的来源与去路，那么，它们对于我们，与那些肉眼可见的似乎不变的物质，还有什么地方不同？盲目之徒只凭自己的浅见判断一切，尚欲美其名曰主观，这毕竟是瞎闹。我们关于自己，所知不多，然而关于主

观的作用比关于客观的作用，我们所知便又更少了。我们将宁舍磐石而建于沙丘之上吗？固然，世上没有永远坚固的磐石，然而在它是坚固的范围中，在相对的关系上，我们是可以信赖它，而不须多虑的。

最后，他们因为现在还没有好批评的缘故，疑批评势将终于无所成就而反对批评。本来便是外国的文艺批评，亦无甚伟大的成绩可说，何当论及今日的我们。然而我们既承认批评为谋文艺进步的必须的工作，纵令我们的面前只是一片渺渺茫茫的荒土，我们仍当满怀希望，不断地开垦着前往。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好批评而不从事于建设批评，这正与我们不能因为人生毕竟是空幻而不努力去生活是一样的。“暂时是暗淡的，希望在前途，在远处的前途，也许你们永远不能得到，然而耐心等待着罢！”这是我们所据以生活的一大信条，也是我们所当据以建设我们的文艺批评的。现在还没有好批评，我们只当由此更加奋发，我们不当因此而气馁。

以上几种理由之外，还有持他人陈说一二以反对批评的，然而他们所持的陈说便多不合理的，所以他们的反对的主张，几乎没有辩驳的价值。譬如Anatole France主张批评为心灵的冒险，有人便拿来反对批评以护己之高唱。然而我们只要想起批评的根本是不断的反省的作用，冒险只能赏玩而不能批评，佛兰史此说之无稽可以立辨，而持此高唱的人亦可以敛迹了。而且佛兰史所谓“心灵在杰作中的冒险”，本来便已假定对象是杰作，尚在何处用得着批评？这种似是而非的见解，我们应当用批评的眼光去观察，不当让我们的心灵去冒险。

此外还有主张欣赏而不主张批评的。教人欣赏原是批评家的一种职务，然而这是对于优秀的作品说的，若是作品拙劣，那

便只有批评了。优秀的作品苦不易得，可以值得我们的心灵去冒险的更少，所以批评的工作常少杰作的欣赏而多 劣 的 品 评，在我们今日的文坛，后者尤为必要，对于将来的进步，关系尤非浅少；这种种无稽的反对的议论，我们不可为所迷惘。

我们为文艺批评时，最困难的是批评的标准。我们不可为一时的交感与浅薄的印象所惑，我们必有一种尺度做标准，然而什么是批评的标准？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我们当然无从得到，我们所能求到的只有相对的客观的标准；对于本来是相对的文艺，我们却也无须更求它的绝对性。

万象都是相对的，我们只要知道万象中的相对的法则，那便是我们知道万象的真相了。文艺也当是一样。我们只要知道它的相对的标准，我们实不必，也实不能达到它的本质。

这种相对的标准的内容如何，不是我在这里所欲说，然而也许可以简单地用独创Originality，生命或宇宙的实感，活跃而丰富的表现等要素来代表。我在这里只想一说这标准所应具有的性质。

我以为我们的批评的标准应有以下的两种性质：

1. 超越的。
2. 建设的。

我们为文艺批评的时候，对于一切既成的思想与见解要能超然脱出，至少我们当用批评的眼光在它们适用的范围内利用它们，而不为它们所迷惘；这便是我所谓超越的。

我们对于我们所确定的标准要加意拥护，我们的批评的工程，须是这种标准的永远的建设。我们为一次批评，须使我们的标准的建设工程进一步，结果，我们的批评愈盛，我们的标

准亦愈坚稳，我们的文艺乃有所归趣；这便是我所谓建设的。

超越一切既成的标准，在新的地面上，由不断的建设的努力，建设一个永远的标准，这是我们的文艺批评所应履行的使命！

有人或疑我们不能超越一切，而谓我们最后亦不过拣得这一切中的一片或竟是同样拘囚在自我的小我。诚然，我们决不能脱出这一切，也决不能离去自我的小我；但是为这种议论的人，病在昧于个性中的普遍性，小我中的大我，与小异中的大同。我们如果能从个性中认出普遍性，从小我中认出大我，从小异中认出大同，我们便可以从它们超脱了。

超越的而兼建设的，这是我们应当建设的新的文艺批评。这是进化的，这是永远的创造的工程。

返观我们现在的文艺批评，随处皆是一些任意瞎说的浅薄无聊的文字，稍通一家陈言据以高唱的，便是一个睥睨不可一世的学者；今日甲如此瞎评，明日乙又如彼瞎说；更有狐群狗党互相称誉，非我族类便任情暗刺明讥，毫不为公理顾惜；甚或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为迎合群盲的心理，而倡欺人欺己的狂说。这便是我们的评坛的大观！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断难有卓绝的创作出生。我们须急起而为批评的建设。象现在这种瞎闹的破坏的批评文字，我们当即时停止。这种文字是与真的文艺有害无益的。我们当急起而为建设的批评！

有人谓批评为低级的文字，我以为不能轻易断言，要当以批评的作者与文字为定。纵论如此，然批评即为文艺进步必需之工作，我们亦不能因此而不努力。又有人因现在无值得批评

的作品，以为可以不要批评，此亦非是。我们现在无好作品，而粗制滥造的匠人太多，尤有批评指摘之必要。

我们的新兴文学已在一个沉滞的时期，我愿从事批评的人自知工作之艰巨，勿再耗费精力为瞎闹的破坏的行为，急起而为建设的批评的建设！

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原载1924年2月《创造季刊》2卷2期）

建设的批评论

破坏了一切偶像的近代人，炸穿了一切迷信的近代人，他们的唯一的急务是这破坏后的新的创造。他们不能再向废墟中寻他们的“美的昔日”的迷梦，他们也不能长在废墟中踟躇徘徊，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来维持他们对于人生的信仰。

在这创造的工程中，有与创造的工作一样重要而有重大关系的另一种工作。我们称这另一种工作为批评。批评是创造的指南针，它是判别善与恶、美与丑和真与伪的努力。

批评是判别善与恶、美与丑和真与伪的努力——我这样把它的界说定下了，我想只要不是带上了着色眼镜的人，大抵不至于觉得不满足。然而我们如果为公允起见，暂时倾听那些不满足的文学家的发言，那么，我们可以听到几种反对的说话：

第一，有人说：“批评只是欣赏。”这种人的意思大约以为批评只应当在正的方向 Positive Direction 工作，不当向负的方向 Negative Direction 工作。我们且不必论这种主张的是否，然而这种主张当先有一个假设 Assumption，那便是须先得着可以欣赏的好的作品。这样看起来，他们所谓批评，不过是判别之后的工作，究竟判别他们总少不了。

第二，有人说：“世上没有客观的真理使我们能判别。”这种主张亦是似而非的。假使我们弄弄诡辩，我们可以因为它主张世上没有客观的真理，说它自己承认了一个真理。然而我们不必强弄诡辩，我们日常所下的判别并不要有客观的绝对的

真理——这种事实我们也不必拿来相诘，我们不难从正面打破它。我们也可以否认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但是合于科学精神的真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研究美学，不是知道了关于美的真理而去到事实中求应用的方法的，倒是想从事实中求出关于美的真理。这样的真理缺少普遍性，然而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绝对性的。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绝对性有限制，便不承认它是真理；反之，在它实用的范围内，它是与吾人理想中之绝对的真理一致的。所以这样的真理实是吾人理想中之绝对的真理之一部。譬如这样的真理是曲线甲，吾人理想中之绝对的真理是曲线乙，现在甲与乙有一部分互相重合Coincide，则甲的这一部分，同时是乙的一部分。所以绝对的真理的全部我们纵不能求，而它的一部分是可以求得的。而实际上我们对于真理的需求，亦决不出实用的范围以外。

最后，有人说：“判别终不外是一种主观的活动。”这句话亦似是而非。两物之差极小时，它们的判别自不容易，然而它们相差既极小，则对于差大之物，它们可以视为同等。若二物相差颇大，便可以用客观的方法判别出来，无凭主观妄测之必要。在实用的范围之内，批评的对象相差常大，我们不患没有方法判别出来，丝毫用不着主观的判断。

对于批评的反对的意见，此外还有，只是不如这几条重要。这几条之中实有几点足致批评的死命，然而这多是批评的内部的问题，于它的存在是无影响的，精明的批评家自能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不受何等重大的影响。要之，我们研究批评，不是要拥立一个既成的原理而分植它的势力，我们是要由所有的事实之中筑起一个合理的标准，换一句话，便是要求出一个原理来。

世人大抵把批评误解了。便是欧美近代的批评家之中，也多把批评误解了的；他们不是拘守着形式的批评Formal Criticism，便是过于信用了自己的印象。申徒白吾 Sainte-Beuve 是最能理解批评的一个，然而这位“没拿有法典的评判者”的批评，诚如Prof. Dowden所说，是一种消极的批评Negative Criticism，他的自然主义的批评缺少积极的建设的努力。瓦特裴德Walter Pater也是最能理解批评的一个，然而他所谓“在审美批评中达到如实地观察物象的第一步，是如实地审悉自己所得的印象，辨别它，明白地实现它”只是一种逆的工作，因为我们由对象所得的个个的印象，须先把它们合成to compose起来，才能说到审悉上去；至于他谓批评家是“强烈地经验得这些印象，而直去追求其辨别和分析的人He who experiences these impressions strongly, and drives directly at the discri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m”直是跳出了轨道。别的人更多把批评误解了。

批评的工作决不止于辨别自己所得的印象，也决不止于由事实中求出个个的法则，我们要进而求出事实中的统率的普遍的原理。最后的一种工作，我称为批评之建设的努力。有这种努力的批评，我称为建设的批评。

我在前面说过了批评是判别善与恶、美与丑和真与伪的努力；所以建设的批评的课题是在求出判别善恶美丑和真伪的普遍的原理。这种课题也许是艺术学者与美学家，或形而上学者与哲学家的分内事，但若一个批评家，当他工作的时候，能常为这种求心的运动，这不仅是可以使他免入迷路的指南针，而且是阐明真理的有效的工作。批评的究竟的意义是在阐明真理，所以这种建设的批评才是第一义的批评的努力。

然而我们要怎样才能为建设的批评？我以为方法既难于概论，而我们目前所急需的又只在十分理解什么是建设的批评，所以愈其孜孜于繁杂的方法论，不如暂就所要的条件作一番思考。

我以为我们如果要为建设的批评，至少要能满足下面的两个条件：

A. 我们要常有建设的意识。——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若没有充分的意识，便得不到良好的效果。我们为批评时亦当时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务使自己的工作不离求心的建设的宗旨。

B. 我们要常为自我的批评。——譬如我们建筑一屋，凡一梁一栋，我们皆须加以详细的检查。又譬如试验材料的试验机，当我们使用时，皆须时常矫正to adjust。同样，我们为批评时，应当时常把自己作对象，为客观的批评。我们的态度对否？我们的方法对否？我们不曾为不确的概念所误否？这些都是我们所应当时时反省的。

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工作既不走入迷途，而又能对于真理的树立与阐明一回有一回的贡献，我们至少非满足这两个条件不可。这两个条件便是建设的批评之必要的条件。

批评的工作是在对象中的不断的反省，自我批评是在反省中的反省，我们可以称它为再反省。没有这种再反省的批评决不能是正确的，对于真理的阐明相去尤远。我们对于一种物象为一次批评，一是为的判别物象之善恶美丑和真伪，一是为的阐明真理；我们的工作不止于物象之判别，我们要进而求出或阐明真理。我们为一次批评，当使真理因此而益显现，益坚稳。我们的批评当一次有一次的贡献。

我们现在的批评界真可谓幼稚极了。幼稚本是成人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原用不着悲观；但是现在一方面有人否认批评，他方面又有人滥用批评，却是使我们不能不为我们新兴的文艺运动悲观的。否认批评为一种误解，犹不难徐徐解释，惟有一知半解，胡说八道的文字，也假冒批评的美名，颠倒是非，惑人耳目，却是使批评界的前途更加暗淡。在我们现在这种万端急待创造的时期，批评是与创造同样重要的工作，我愿从事批评的人们再三考究批评的意义，共起而为建设的批评，以求不辱他们的重大使命。

附白：

作者在《创造季刊》二卷二号上发表了《批评的建设》一文，文中曾说及“建设的批评”，惟甚简约，故特再申论于此。

二月二十五日，上海。

（原载1924年3月《创造周报》第43号）

艺术之社会的意义

热心社会运动的人多斥艺术为无益于实际的生活；在他们的意思以为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应集中于解决社会的问题，而一件艺术的作品既然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当然是空费精神而毫无益处的。

在某种范围以内，这种非难是不能不承认的；古来的艺术家为了这个问题已怀疑而烦恼的，正自不少。而且只要不是利己的恶汉，凡是真的艺术家，没有不关心于社会的问题，没有不痛恨丑恶的社会组织而深表同情于善良的人类之不平的境遇的。

不过当我们讨论一个涉及两种思想或现象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对于这两种思想或现象都先有一番精确的探讨。譬如我们想讨论东西文化，便当先了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们想讨论艺术与道德，便当对于艺术家与伦理先有十分的研究。如果我们根据东方文化来讨论东西文化，或根据伦理来讨论艺术与道德，那么，这种讨论之结果一定不能是公允的。同样，我们如果根据了社会学的推理来讨论艺术的问题，那么，我们只是社会一方面的律师，决不能是公正的裁判者。

过誉自己的物品，是商人的一种恶习；研究学术的人要以虚心坦怀为主。全然肯定与全然否定是同等的独断的主张。譬如一方面偏重社会的人以社会生活为人生的正路，他方面偏重个性的人以个人生活为人生的实性，然而他们同是建设在肯定

——也许是否定——人生的理论上，如果他们能够虚怀一点，他们的意见决不会是那样不能接近的。

现在一般讨论社会问题的人大抵看脱了艺术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便是眼光稍大一点的人也绝少了解艺术是一种社会的机能的。这是很可遗恨的一件事，因为这不仅于艺术的进步有碍，即于社会的改造也不无亏损。

欧洲的学者早已有人把艺术当做一个社会的现象来说明的。十八世纪的诸波Abbé Dubos便是最初的一个。其后Herder, Taine诸人都曾做过热心的研究。直到近代，由基欧Guyau的新颖的思想，这种研究便又进了一步。他在他的名著《社会学上的艺术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上说：“艺术是社会有机体的一机能，对于社会有机体之生存与发展有最高度的重要。”

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好是由原始的现象着手，现在引用格罗设Grosse博士的《艺术之始源Die Anfänge der Kunst》的结论，助我们一番思考。他说：“原始民族的艺术的作品之大多数不生于纯粹的美的动机，同时必有一种实用的目的；这里用的目的实为第一的要素，美的要求反是第二的。譬如原始的装饰全然是做来当实际的意义之标号及象征的，决不是为的装饰。”博士又云：“不论什么民族，绝无没有艺术的。我们知道，那些最粗鄙最不幸的种族，尚且把时间与精力之大部分，贡于那些文明国民，由他们之实际的与科学的高位视为无益的游戏之艺术。然而若说这样多量的精力所曾经应用的事功对于社会的体制之维持与发达不重要，这是由近代科学的见解上所全然不能想象的；因为，若人类对于美的创作及美的享乐所费的精力为无益于生活之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若艺术实不过无益的游戏，那

么，自然淘汰应当爱护有实际的高才之别种民族，而使对于这种无益的事情浪费劳力的民族灭绝无余，而艺术亦不会有这样高大而丰富的发达。所以我们不能不信原始的艺术最初就在直接的美的意义之外，对于狩猎民族又有实际的重要之处，而我们的研究之结果，恰足以使我们确信。……原始的艺术之最高的社会的作用在统一，然而有丰富的而且更个性的制作物之文明国的艺术却不仅于统一有效，此外又能提高人的精神。象科学使我们的智的生活丰富，艺术使我们的情的生活丰富。艺术与科学是对于人类之教育最有力的手段。”

艺术之所以能够维持到今而且渐次进步的原因，实是因为它有这种社会的价值。艺术是否如我们的古人所梦想，能够治国平天下，与人生是否模仿艺术，我且不讲；然而至少它的社会的价值，在明达的思想家的眼中，是决不会潜消的。

艺术之社会的价值随时可以发见出来，只方面与大小不必一样。如果只就大一点的说，我以为至少有下面的两种：

一、同情的唤醒。艺术由它所必有的社会的成分，利用人类对于美的憧憬，唤起在人类中间熟睡了的同情。

二、生活的向上。艺术由它所反映的生活，提醒我们的自意识，促成生活的向上。

人类社会的不幸之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同情的缺乏。艺术若对于昏睡中的人类能充分发挥它的效果，人类中间的同情，是可以徐徐点起来的。生活的自意识是我们的感激的源泉，也是向上的必要条件；艺术若能提醒人类的自意识，是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向上已有莫大的贡献了。

艺术是因为有了这种种社会的价值，才有了它的社会的意义，才能维持发展以至于今。纵令近代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

使人类的物质的生活日渐窘迫，不暇仰受艺术的教养；纵令实用主义的思想已在人类的髓中根深蒂固，然而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是丝毫不曾减杀。不仅觉醒了的心灵在要求精神上的粮食，即困苦中的灵肉也在渴望精神上的慰安。人类将渐不信物质问题的解决为一切问题的解决，他们由自己所招致的物质的困苦解脱时，他们将更要求艺术的薰洗。

现在一般讨论社会问题的人多看脱了艺术的这种社会的意义，往往以为艺术是对于我们面前的工作无益的东西，他们是过于重视了物质的生活，误以为人生的诸问题只要物质的问题解决了，便都可以解决下来的。人生的问题决不是那样简单；它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它是不能由一部分的解决了事。一部分的解决只是畸形的发展，是与我们的理想两样的。

深深伏在研究室或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他们对于现实生活实没有丝毫的贡献；他们的纯理论的发表大抵没有什么好处给我们一般的人，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研究没有好处便责备他们，因为我们相信一种学问应得有人去研究，而在远的将来他们也许有所贡献于人类的。这样的科学家现在世界上共有多少，差不多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想到，要多少在科学的大海里面游泳过一番的人才能吃惊于这样的科学家的头数之巨。我们对于研究艺术的人，也不当吝惜我们的宽大。

艺术家里面有许多的人的艺术被别人称“为艺术的艺术”，他们尤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所集矢。这也不能说是公允的事。既是真的艺术，必有它的社会的价值；它至少有给我们的美感。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社会价值的低微便责备它，因为它也是艺术发展上的一个诱导——也可以说是一种阶级。艺术的活动比别的活动更贵自由，差不多自由便是艺术的生命。自然界的

花草在能自由生长时才能成为美好，艺术也是一样。我以为象“各取所需”为社会经济的原理一般，“各尽所能”是我们应当对于艺术家容忍的一个原理。眼光远大一点的社会学者，如基欢、如罗素之类，多注意艺术上的自由，这是我们所当服膺的一点。

假使自然界没有好花好景，人类的生活当如何？这种问题谁也不常留意。我们只要想起这样的问题，那么，艺术——自然的模仿，自然的再现，自然的创造——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怎样重要，多少总可以了然，它的社会的意义便也不难看出了。我愿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更加明察一点，也更加宽大一点。

然而在这是非非的争论之中，我以为研究艺术的人尤应当有一番切实的觉醒。现在一般的人对于艺术当然还不能有充分的理解，然而旁人的议论，不论对与不对，总足以供我们的参考。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的善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社会忘记了可不必说，我们以后只当更用了十二分的意识把我们的热爱表白一番。内生活的纷争，我们即时剿平了罢！我们来大开眼帘观看，观看我们四围的血肉横飞的攘扰！我们不是怕见血的懦夫，我们不是惯流泪的弱女，我们来，来恢复我们的社会意识！至关于艺术之根本的意义，我以为谦逊的怀疑实愈于狂妄的武断，我们就暂且怀疑，待我们从怀疑之中证出新的信仰，如我们从黑暗之中求出光明来罢！

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原载1924年3月《创造周报》第四十一号）

民众艺术

大凡一个名字愈简单便愈暧昧，极端简单的便只能给我们一点概念。“民众艺术”这个名称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名字，所以它的意义很暧昧，在我们现在这混乱的文学界，它尤其是被一般的人误解得很厉害了。

本来包含“民众”与“艺术”二字的成语，我们至少可以寻出三个：

1. 民众的艺术，
2. 关于民众的艺术，
3. 为民众的艺术。

这三个成语之中，由“民众”与“艺术”二字的真义看起来，那一个是可以简单地称为民众艺术而无大误，实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妨逐条先作一番思考。

所谓“民众的艺术”是指民众现在所有的艺术，也可以说民众自己所创造的艺术。这种东西诚然是“民众的”了，然而它们真可以说是“艺术”的吗？在娱乐与教化两方面，它们诚然效力不小，然而艺术的功用便止于这些吗？这是我们所不能无疑的。而一般所谓民众的艺术多是原始的，或近于原始时代的東西，虽略具艺术的雏形，而实在不曾进化到我们所谓艺术。它们的目的是在浅薄的娱乐与低级的教化，它们还不知有人生的批评与美的创造。这样的东西，我们似不应假以民众艺术的称号。

所谓“关于民众的艺术”是指以民众为材料的艺术。广义上说起来，这类的东西与上面所举的民众的艺术不同，是有艺术上的价值的。它们大抵成于艺术家之手，而大多数尚是从贵族的艺术家手里弄出来的。这些艺术家——大多数是尊贵的Bourgeon——利用他们的过多的余暇，发挥他们的熟习的技巧，把可怜的或者竟是愚蠢的民众的生活做他们的尊贵的材料，诚然可以创作许多有价值的艺术品出来。然而，这种过于高明的作品不幸只如美术家所画的静物一般，只能供给他们的尊贵的朋友赏玩，与静物般的民众未免太不相干了。而俯伏资本家的膝下为民众大书特书血与泪的人，尤与坐在他人肩上谈劳工运动，或抱拥三妻四妾论妇女问题的一样，适足令人齿冷。出自寒微的Proletariat的作家们呢，当他们未享盛名以前，他们当然是民众的朋友，然而当他们在艺术上的地位渐高、思想与技术渐进时，他们已是穷措大，便不能再是民众的朋友了。所以这种所谓“关于民众的艺术”究是老爷太太们案上的装饰品，实是不能称谓民众艺术的。

最后所谓“为民众的艺术”是指为民众供给精神上的食粮的艺术。它的特点是能给大多数人以精神上的益处与美感而不失艺术上的价值。我以为要这样的才配称为民众艺术。

我主张要“为民众的艺术”才能称为民众艺术。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多数民众的感受甚小，我们的作品不应低就他们呢？这是一个应当预先解决的问题，我所以在上面说过要不失艺术上的价值。我以为不仅艺术运动，凡一切民众运动当以使民众升到水平线以上来为目的，我以为要这样才合于进化的原理。若一切民众运动只在把一切阶级的建筑推翻，一同降到最低的阶级，这是很可悲观的事情，而艺术的降

低尤不啻是艺术的自灭。

艺术的低就民众所以不可的原因，第一是如上所说不合进化的原理，第二是我们现在的民众的鉴赏力太幼稚，如果低就他们，直是抑制艺术不使发挥它的效果。我们现在的民众的艺术还没有脱离原始的状态，而且因为不曾博得一般民众的信仰，从来不曾发挥过显著的效力。我们不可在这种原始的民众的艺术上求基础，也不可与它们作比邻，我们要由它们超出。

我说我们的民众的艺术还没有脱离原始的状态，我以为只要一看旧剧的表白式与符号主义Symbolism便可以知道了。旧剧在音乐上或有它的特色，然而它的表现法之拙劣与剧本之粗鄙都是不许我们认它为艺术的。

近年来有所谓文明剧新剧，多半是由俳優（现在称为演员）编制出来；他们的目的好象是在发挥俳優技术。戏剧的成立先要有剧文学，次要有舞台艺术，再次才是俳優艺术。这些演员由俳優技术的经验，编制一些奇奇怪怪的戏剧出来，新剧的前途实在可以不须多问了。剧文学尚没有好成绩的今日，本来不能多怪他们，不过他们的新剧与旧剧一样丑恶，却是谁也不能遮掩。

此外尚有所谓大鼓，也是原始的民众的艺术之一。我们只要听一分钟便已略尽它的风味，它之单调如此。至于内容之粗鄙，我想定不在旧剧之下。（近来田寿昌在他所谓大经营的《南国》二号上曾称大鼓的鼓娘为民众艺术家，这是他把民众艺术误解了的地方。我恐一般的青年又要多着一次谜，所以在此附说几句。）

我们的民众的艺术还在原始状态的今日，我们如果要艺术低就民众，是与强使艺术复归原始的状态相等。固然，征诸已

往的历史，艺术愈进化，便愈和民众无关；然而这是民众教育上的缺陷，不能把责任推到艺术上的进化上来。

艺术非继续它的创造的进化不可。至于它与民众的联络，我以为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发达之后，民众的鉴赏力自然增加；那时候，艺术家只要稍存民众意识，他的作品不怕民众不能感受，也不怕民众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教养。

所以在这种境遇下的我们，如果要达到民众艺术的实现，我以为一方面须力求真的艺术之建设，他方面须即将阻碍教育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魔窟塌倒！

三月十八日

（原载1924年4月《创造周报》第47号）

文学界的现形

自从梳人魂魄的春风把冬来的残梦吹醒以来，我的耳边时常觉得有一种疑问的低声在响，那便是：我们这种说起来很好听的所谓新文化运动，闹了这几年，究竟有一点成绩没有？有的时候，究竟在何处？

这种疑问的低声，时在我的耳边响个不住。我知道今日的我们还不在于可以回顾而下批评的适当的地位。然而这种疑问的声响，好象那踯躅花间的蜜蜂一般，只是在我的耳边旋绕，直到我想起了这种所谓新文化运动，不过几个学政客不成的没事做的闲人硬吹出来出出风头的一种把戏；想起了这几个人于风头出足了之后，已经一足搭上了彼岸，把以前的一切久已撇在脑后；想起了运动开始的当初便只有一部分品学俱坏的不安分读书的学生跟着瞎闹，想博得一点声名，好弄到一个往外国去游逛一回的机会；想起了数年后的今天虽然也有不少的人在做这宗生意，然而大部分只是一些才从胎里出来还未开眼的乳犬般的学生在四处匍匐——想起了这些，我耳边的这种低声就好象催人入睡的夏日的鸣蝉一般，使我颓然倾倒在这不雨常阴的上海的囚牢中了。

这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究竟，我不想在此多谈，且让那些研究文化史的人当做天大的事情去考据，而且北京的讲学社恰从极乐的西方抬了大诗哲泰戈尔先生过来。我想这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究竟，多少总可以从这回的盛举得到一点暗示，正用

不着我来多讲。

与其唠叨这种漫无着落的问题，还是自谦一点看看你们自己所曾直接参与的新文学的现状罢！我好象听见了有一种这样的声音，刚巧我自己正有几句话塞在喉头待吐。

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不觉已经闹了许多年。在创作方面，除了极少数的作品之外，固无成绩可言；即在翻译方面，也差不多没有几部书可以使我们首肯。而最使人悲观的，便是正义观念的沦亡与个人道德的堕落。

我们现在的新文学界直可以称为政界的缩写。一方面有人利用丰厚的资本，拉人组织研究会，以人生主义相标榜，而以颓废派的名称加在别人头上；他方面有人专门迎合无知无识的青年，称奖他们的幼稚的出版物，以图博得一般青年的好感。这两种大才小用的人，每逢有人攻击的时候，总是指为政党的发言，使别人的公正的批评也不易发生效果。

这便是我们的新文学界的大概。现在的那些要象不象的创作，那些“雅典主义”的译品与那些糟踏好纸的杂志，便是我们这种努力的结果。我每见了这样的东西，便很想带他们往印刷局的排字房看看，问问他们那样无聊的文宇值不值得使排字的工人一天受十二点钟的熬苦。

在这种状况之下，偶然有一二个人揭破他们的阴险，指出他们的浅薄，就好象破坏教义的叛徒，干犯国法的恶汉一般，不被他们烤杀，也要被他们骂死。

文学家的使命，是要从暗怛的死灰中把时代的良心吹醒。啊，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学家，他们自己的良心还在死灰之中辗转！他们是一些政客，他们专事植党营私，以利相诱，他们的目的不在新文学的建设而在象把持政权一般把持文学界的势利。

我们每每看到颠倒是非的批评，每每看到阴讽暗骂的文字。利用他们优势的机关与逐利的狐群狗党，他们想把异己的人一齐打尽。正义的观念早已从他们的脑中消亡，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早已不算一回事了。

这是那些人多势众的政党与那些博有一点过分的名誉的名人的现相。至于那些还未开眼而爱出出杂志报纸的乳犬般的青年们，他们纯是以耳代目，别人怎样说便也跟嗡嗡低响。他们对于新文艺的贡献，只是他们吃纸烟剩下来的给书贾们装满钱袋的些少的金钱；而他们从虚荣心弄出来的不成话的作品，倒在一般民众的眼中把新文学的羸瘠的丑态赤条条地露出来了。他们每每高捧一二个名人——甚至全无知识的名人也有人捧——而这些名人也就把他们介绍于大众。这是另一种很奇怪的现形。

在非有一点政客的手腕不能成事的我们的国家，这种现象怕也是自然的结果。然而文学家的天职不是在批评与改造人类的生活吗？为什么便任自然的趋势把自己推倒了？为什么不从死灰之中把自己的良心救出？

“哀莫大于心死”。把文学界化为了政局的人们哟，你们如果要不负文学的使命，要对于时代有所贡献，你们须先把你们自己的良心救起！你们的种种心计只能眩惑一时，你们不要为自己荣耀一时的缘故，致使文学不能对于时代的迫切的要求为及时的贡献；这是时代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你们不要使新文学的建设再延下去，时代是一个最严肃而明敏的裁判者，它决不宽恕你们，也决不会看过。你们不要学朝露在曙光之前的无益的抵抗，时代的阳光将带了执行你们的死刑的使命而来到！

四月二十三日

（原载1924年4月《创造周报》第50号）

批评与批评家

“艺术作品”的意义是什么？一般的人，很多把它误解了的，他们往往把它的媒质（文字与颜料等）当做了它的本体；这与把铁路当做铁路的本体一样，是全然错误的。“艺术作品”只是一种创作的精神之“文艺的活动”的可见的部分。它与“文艺的活动”外似分离，然而内里实在是不能分离的。离开了文艺的活动，艺术作品决不能成立。

象艺术作品被一般的人误解了一样，“文艺批评”也被一般的人误解了。他们误把批评的媒质当做了批评的本体。其实，“文艺批评”只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之“文艺的活动”的可见的部分。文艺批评的本体，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之文艺的活动。

我们对于文艺批评常存这种基本的见解时，不仅文艺批评上的许多纷纷的议论可以解决，而且关于批评与批评家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一种贵重的暗示。

一个文艺批评家作文艺批评的时候，是一个批评的精神在做文艺的活动；决不是在鉴赏什么文艺，也决不如一部分人的主张，在冒什么险。他只是用了全部的生命在从事自己的文艺的活动。因为他是用了全部的生命在做“文艺的活动”，所以文艺以外的问题，他决不会想起。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个真的批评家可以完全信用的缘故。

真的文艺批评家，他是在做文艺的活动。他把自己表现出来，就成为可以完全信用的文艺批评——这便是他的文艺作

品。象真的文艺作品必有作者的人格在背后支持一般，真的文艺批评也必有批评家的人格在背后。他对于他的对象，也象创作者对于一切的现象一般是很公允而沉着的。他是使自己的文艺的活动在建设自己，在完成自己；除此而外，他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文艺批评家，这是不容隐讳的事实。有一部分人把文艺批评误解了，另一部分人却把文艺批评家用得很厉害。在大家对于文艺批评还没有正确的理解的时期，这本是难免的现象，然而若长是这样在歧路之上彷徨，却实是新文艺前途的可悲的障碍。

假装批评的形式捧自己的朋党，已成公然的秘密。有种杂志很老老实实在地自认：“我们的批评成了宣传的工具，——朋友赞美朋友。”有人说现在的批评界并且把批评当做了攻击敌人的工具。这些都是不忠于文艺，混淆黑白的行为，是关心文艺上的正义的人所应当痛恶而加以评击的。敌人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为拥护真理而加以批评，这种行为的动机还可以说是一种“真理爱”，在真理泯没不彰的今日，这种行为，我认为我们应当谅解。至于单因是自己的朋友，便不惜颠倒是非，破坏批评的信实，自欺欺人，这是我们所决不能容许。

批评的工作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回顾批评的研究方面的情形，也使我们不胜伤感。浅薄的印象主义的批评，也不知是谁贩了进来，这几年来好象正合了在吃奶的作家们的脾胃。他有许多人做了些零零碎碎的介绍；然而介绍者既是生吞活吐，乞食者正是饥不择食。所以现在一些研究文艺批评的人，可以说是还不曾开眼。

我们的文艺批评应当取怎样的方向，我在《批评的建设》

（季刊二卷二号）与《建设的批评论》（周报第四十三号）二文中约略说过，我以为我们的批评家应当屏绝不合理的独断与浅薄的印象，而追求更真实的基础以至于无穷。我们要更忠于文艺；不要颠倒是非，尤不可冤屈作者。近来常有因为自己的知识浅陋，在报纸杂志上作完全错误的批评的人；这种行动不一定对于被冤屈的人有何影响，倒是这种人自己在把自己的资格取消，在无端自杀。明眼人见了这种批评，好象可以看见这种人的丑恶的裸体。做这种错误的批评，实是自己暴露自己的丑态。

总而言之，我们如果要维持批评的尊严（这当然是大家所希望的），我们的批评当有我们的人格做后盾，我们要知道批评离了批评家是要与铁轨离了铁路一样把意义失了的。

五月四日

（原载1924年5月《创造周报》第52号）

一年的回顾

时辰好象东流的江水，它很缓缓地我们的面前流去，然而它是永远由我们离去；一波逐一波，转瞬已成过去，而且永远不可复回的了。

在这样的时辰的黑潮中，我们的周报匆匆已经满了一岁。眼看自己的儿子一天一天的成长，这是很可以使我们自慰的。然而我们这个可爱的婴儿，正当它可望成长的时候，我们忽然不能不忍心任它在春风之中枯萎。啊，亲爱的读者诸君，我们的伤心只好请你们设身处地替我们想想！

常常在电影中见到贫寒的父母流着泪把自己的爱儿遗弃在路旁或街上，便不觉也泪倾如雨。现在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更得到了这种景况所特有的切肤的悲感。

临到一年的尽头，回顾年来的陈迹，决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一述年来抚养的苦心与我们的不幸的爱儿在这短短的征途上所备尝的艰楚，也是对于我们的爱儿的一种纪念方法。

去年的劳工纪念日，那是晴和的初夏的一天，我不知为什么缘故，起来比平常迟了一点。我起来恰好洗漱过了的时候，后门的铃声一响，沫若穿了他那件象西式大衣的，技师们在工场中常穿的黑衣从外面回来。他的头发是蓬松散乱的，一见便知道他今早也不曾梳头，并且在晨风中跑了不少的时候。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时候，我从他的轻快的动作与快活的表情，早知道他一定带回了一点可喜的消息。他不使我有猜想的烦

劳，还隔着几步就向我说：

“喂，我们的周报干起来罢！我在电车上得了一首诗，倒可以当发刊词。”

本来我们想出一种周报，这件事已经说了许久，达夫没有回家去的时候就商量过几次的，总是因为人数太少，不敢贸然弄出。对于出一种周刊，沫若、达夫与我的意见完全一致，只是没有一个人能毅然决定一个发刊的时日。老实说，我是一个好事的，然而也觉得未免过于冒险。日子一天一天的挨过，不久达夫回家去了，我们的纪念日——五月一号——也一天一天的接近了。四月底的这几天，我同沫若差不多每天只是商量怎样纪念我们这个纪念日，办周报的事情倒有许久不曾提及了。所以沫若这一早从外面回来，我实不想他会忽然提及周报的。

——不错，对于我们季刊的出版纪念日，我们再创造出一种出版物来纪念它，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的方法。

沫若在写他的发刊词时，我心里这样想。

名称是早已定好了的。我们由发刊词的意思，定为每礼拜日出版。形式也是商量过的，我们决定依季刊的样式，只不截开。再加几行，每行加几个字。内容注重翻译与批评。沫若决定翻译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我誓要扫荡新诗坛上的妖魔，写几篇批评近日的新诗的文字。我们差不多同时这样讲：“我们快点弄出来吓达夫一跳。”

这样，以旭日东升的气概，我们匆匆于五月十三日把第一号弄了出来。这一回的广告，我现在还留下了一张，我顺便抄在下面：

画家Millet是没有礼拜日的，
我们也是没有礼拜日的。

我们没有可以礼拜的偶像，
我们在这犹太人的安息日上只有努力创造。
朋友哟，我们只有努力创造，
请看我们造出的这个新的创世纪！

这便是我们周报降生时的实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生诞以后暂时之间，不曾尝过困苦的我们的爱儿，在金钱万恶的我们的时代，便也不能不在生后第十二个礼拜上第一次感受了经济上的痛苦。我们忍着泪依了泰东书局的计划，承认了为《中华新报》创造我们第三的一个爱儿。然而我的不时的奔走，我的彻夜校对的劳力，毕竟不能在冷酷的恶浊的环境内使我们的爱儿好好生长。《中华新报》的无诚意和报馆干部的虐待工人，致使愚昧的工人为发泄他们的反抗，无端涂毁了我们的周报。这是一种过重的打击，是我们所决不能容忍。于是从第十四号上仍改由泰东书局印出。

外来的投稿虽然天天增加，然而可以用的很少，从二十号以后便渐渐感到稿乏的痛苦了。这种稿荒一直闹到了四十号。最后的十几期，因为大家特别努力，倒每期绰有余裕，现在还剩下不少的稿子。

这是我们的爱儿这一年来所经过的路程的概况。我这样约略陈述出来，不过是要留为他日的纪念。至于我们的成绩与瑕疵早在亲爱的读者诸君的明察之中，我不想在这里多说，说起来恐益足招起无穷的悲戚。

我们的生活是很不好的，这差不多已是周知的事实。我们不曾拜倒在资本家与权贵的门首，不曾妄用了诗神的灵香去敬那些财阀与豪贵的妖神。这是应当受罚的。现在我们东西零落，一定已有许多人站在资本家的墙脚下向我们遥露他们的得意的

冷齿。

这一年来的新文学，在作品的质的一方面，不能不说进步了一点，然而同时却把作者的质一方面的丑态也显露给我们看了。我们中国人素来富有所谓东方文化的思辨的精神，所以不论自己如何行动，总能说出一个很冠冕堂皇的道理，纵然骨子里实在只是为自己的名利。我们现在的许多的文学家当然也是富于这种精神的，这一层我们也许应为他们谅解。然而从事精神活动的文学家，以唤醒世人的病了的良心为职务的文学家，也只争逐自己的名利，不惜颠倒是非，这是决不宽许的。这一年间，我们目击不义的以利相结合的文学团体一天天肥大起来，并且利用他们的财力与机关，专门假造一些时人所深忌的名称加在别人的头上。这种种现象所暗示于我们的是什么？

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几乎使我们不能不信希腊诡辩学者的“人为万事的尺度”。真没有是非可论吗？否！全国的人民在渴望平和的生活，凡帮助人民得到平和的生活即是，妨碍的即非。同样，新文学的使命在给新醒的民族以精神粮食，使成为伟大。以伟大的心，从事的即是，以卑鄙的利欲从事的即非。没有比这个更显然易见的。

我们秉着这种精神，一年以来，对于卑鄙的人们曾张过几次杀伐，然而我们毕竟势孤力弱，托荫在资本家的高墙下的他们，依然在肆行无忌，在暗咒而静待我们的疲惫而死。我们死不足惜，只是想到新文学的前途，未免心中要顿时愁惨。

假使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把周报停办，我们必先请他详察我们心里的悲哀，然后我们将对他说：“我们固然很愿意竭力于新文学的建筑，然而我们自己也要生活。”我们都很年轻，我

们热爱青春的生活，我们不能把我们有限的生命一齐都丢在一个无底洞里。作着一群妖鬼赴无限远的前程时，诚如达夫所说：“我们即使在半路上气绝身死，也同野狗毙于道旁一样，却是我们自家寻得的苦恼，谁也不能来和我们表同情，谁也不能来收拾我们的遗骨的。”我们爱生活，我们还年轻，我们不愿忘记了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这一年——很长很长的一年的工作之中，我们深幸得到了几个同心的朋友，他们给我们出了不少的气力，他们是一个维系我们的希望的星斗。他们之中，我们尤其感激倪貽德、周全平、淦女士和敬隐渔四位。这四位好朋友的作品虽然还不能就使我们满足，然而他们是以一日千里之势在向完善之域猛进，他们的成就一定不小。敬隐渔君富有天才，一向没有时间，不曾创作小说，这回因周报就要停办，尽数日之力写了两篇；他的国文虽然远不及他的拉丁文和法文，然而毕竟才高，出马便已高人一等。

有将近三十位朋友一德一心，原是愉快不过的，然而我们负责编辑的人的疲惫，却也不是局外人所能悬想的。生活的困难，环境的恶劣，先在我们的双肩加上了一对死重deadweight对于我一个人，没有爱的生活便是一个榨碎全心身的水压机。每从梦寐中醒来，但愿我的心儿能顿时粉碎，我的四肢能顿时瓦解。数年来疯狂一般的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文艺的女神，然而环顾我的周围，又不禁悲愤而羞悔。我的世界到底还只是一个无限大的空虚与一片漫无着落的悲感。

然而我们既然带了这样顽恶的命运而来，我们决不是卑怯的逃避者，我们也决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须从新再来一次。我们休息一时，当

是一种准备的作用。不等到来年，秋风起时也许就是我们卷土重来的军歌高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哟，请等待着，等待我们卷土重来时雄壮的鼙鼓！

国耻纪念日

（原载《创造周报》52号，1924年5月）

今后的觉悟

五卅惨事传遍全国之后，各地的新闻杂志全体议决停载文艺游戏之类的文字。在这哀恸之中，也禁不住一种痛快的感觉。老实说，游戏文字固不待言，便是那些所谓“文艺作品”，我们也正渴望着立时有一阵旋风，把它们卷入太平洋的深海，沉入那黑沉沉的大海深处。我们为了它们含羞忍垢实在不知经过多少年月了！

没有比文艺还不值钱的。那些浅薄的心灵所露出的丑恶的裸体尤足使人掩鼻。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文学家先要懂得这一点。假使有人说这是暴慢的武断的话，那么，你尊贵的文学家哟，我且问你们，你们的宝贵的作品，就假定它在艺术上已到完全的境地，对于人生它究竟能有什么贡献？谁说不至于是供给一些寄生着的特权阶级和一些同样寄生着的游荡儿的游艺？我们反对功利主义的主张，我们承认文艺不一定要与社会有关系，然而对于人生自己，它究有什么贡献？不止于是一些苟且姑息的，暂时蒙醉自己的假药，外样好象充实，骨子里其实空空洞洞的吗？

一阵狂风起来，从一些跳动着的刺眼的黑字堆中，把那些刺眼的所谓文艺作品一起卷去了，实是一件痛快不过的事。而我个人替那些在报纸上争名夺利的一群鹅——（霸用资平的字，稍加以别的意义）私心窃喜的就是，这一大群总也应该有一番觉悟了。一个人要有外界的刺激，才能觉悟起来，已经是不堪造

就，然而我希望这一大群中的优秀分子能从此真正觉悟起来，于不堪造就的资质中，勉强图自己的造就。

自有新文艺运动以来，一天天增大的这一大群，他们把文艺看得太尊贵了，也许是看得太下贱了。他们不曾有过真正的了解，所以不曾有过真正的肯定。真正的肯定要从否定之中出来。没有否定的精神决不能达到真正的肯定。这里的定则是：由否定达到肯定 *Durch verneinen Bejahung*。

这一阵的狂风总算吹的很厉害，我希望大家从此觉悟起来，想想已往的过失，决定今后的态度。现在我提出最重要的两端，促大家的猛省。

我们的新文艺，自从运动发生以来，便已被一部分无聊的分子腐蚀，弄成了时髦、出风头的捷径。一些乳犬般的未开眼的学生，也跳出来争着谈长论短，发表些浅薄无聊的著作；一些外国字母还认不清的低能儿，也跑出来抢着翻译，弄出一些“手势戏”与“雅典主义”的笑话。他们的动机是出风头，学时髦。他们批评文艺的标准是“好玩”，或“也好玩”。

这“好玩主义”或“也好玩主义”不始于我们这个时代。然而近来因为借此易出风头，又有人盛昌佛兰士的欣赏主义，于是“好玩主义”就风行一时了。

这种新奇的主义在文艺上培成了一些浅薄无聊的作品，在青年间传遍了一种骄淫轻佻的风气。这种种的结果合作起来，诱起了一般的人对于新思潮的反感，致有近来对于新文艺的总攻击。世人对于新文艺的非难，明眼的人是早已预期，而且表示相当的同情的；就是那些开倒车的种种现象，也是因为有机可乘；这都是时代对于新文艺极端厌弃的一种表现。

我们从此应该痛改以前的“好玩主义”或“也好玩主义”。

佛兰士的批评上的主张，我已屡次痛击他的错误，我们应当猛省过来。真的文艺作品不是可以胡乱苟且创作出来的。艺术上要做工夫，同时人格上要有修养。当此是非鼎沸的时期，我们如果还要建设真有价值的文艺，我们应当一洗目前的风气，与忠实的信徒一般，保持坚忍的殉教的精神与态度，换一句话说，便是：严肃一点罢！这是希望大家觉悟的第一点。

自从社会运动的声浪传播以来，便已有许多言明手快的作者，自称要为被压迫的第四阶级一吐不平之气。然而他们多不曾有过实感，仅凭自己很贫弱的想象力，以拙劣的艺术，写他们不费本钱的同情来诱起他人的反感。最使人发噁的是他们写了满纸的“血”、“泪”，便以“血与泪的文艺”自豪，而封他人的作品为艺术的艺术。

同样专横而更可使人喷饭的，是他们所提倡的自然主义。什么是自然主义，他们自然不曾了解；自然主义有无提倡的必要与价值，他们当然更不介意。中国人总是在迷途上盘旋，中国的事情总是一些钢铁铸成的大错；一个人妄入迷途，便要一起跟着进去，再也唤不回来，唤他们的人还要受他们的毒骂与排挤。文艺界当然也逃不了这个公例，不过愿入迷途的人，我们不必枉费气力去把他们唤回，只是强人践入迷途，想把一种奇形怪状的主义来箝束新生的文艺，使不能自由发展，那是非加以痛击不可的。

近来又有许多人因为自己不能创作，便武断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创作，而尽力劝人从事翻译。他们的用心无非是一方面想冷却他人对于创作的信仰与努力，他方面想借此勉强遮饰自己不能创作的隐痛，暗地里也想借此多少扩张他们那不三不四的翻译品的行销。高倡这种武断的人，他们的翻译品，据我的经

验，是从来没有一本不大错特错的。他们这种阴险的行为，我们不仅为培养创作的精神起见，就单为翻译界的澄清，也应当声罪致讨。

这种种行为都是关心新文艺建设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推考这种种行为的原因，多是一些不成器狡猾东西，借此动人耳目，妄想延长在文艺上的生命。这种种行为的动机是利己的，他们是为虚荣所驱使，他们是不忠于文艺。对于这种人，我希望他们能够脱离虚伪，悔改过来，诚诚实实的忠于文艺，换一句话说，就是：诚实一点罢！这是我希望大家觉悟的第二点。

现文艺界的弊端不一而足，然而大抵可以归纳于此二点。严肃！诚实！实是我们所急须觉悟、急须励行的标语。五卅事变的不幸的狂风，让我们善用它，把它做一个起点，划一个新纪元，以新生的毅力与热诚，致力于我们的永远的使命，图自我的完成，也为它留一个永远的纪念罢！

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原载1925年10月《洪水》1卷3期）

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

久在报上广告内见甲寅周刊第十四号登有章氏《评新文学运动》一文，颇想一读，因久未上街，不果。今天以俗事入城，才在一家书店买了一部。我回到湖南以来，从不曾买过、也不曾看过这些新出版物。一个薄薄的本子，价目倒值一角大洋，足足花去了我十七个双铜板，使我的袋子空了一半，这事情只不曾把我吓倒。

叫好一部车子，跳上去就翻读起来。把封面后面登着的第二次特别征文题先思索了一番。坐在车上欢喜看书，实是我的一大毛病。其实坐在长沙的人力车上，左边一歪，右边一跳，纵然你的眼力精明，总是看不上两分钟的。转过一弯，双眼就模糊起来，只见椽大的“执政”二字满纸乱跳。

回到家中休息了片时，又双手捧着诵朗起来。最小的个侄儿，笑着学我连连点首。刚把全文读完，邮差递来了一份《现代评论》。打开一看，达夫恰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里面，他的题目是《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同样看了一番。陡然想起明天教课的讲义还只有雪白的几页纸铺在那边桌上，不由得性急起来，但是咽喉里边却又好象有件东西在龟头作梗。

胡适之氏在武昌公开演讲之词，我不幸不曾过目，所以我现在所要说的话，只及章氏本文与胡氏演词经章氏引用之一部，所以我对于胡氏所言，不能负何等责任。还有一点须预先申明的，就是章氏标题为《评新文学运动》，然内容却如章氏

自身所说：“右举各条，皆就胡君词中，稍稍论之，义取消极，辞止答辨。”据道理讲起来，胡氏演词，仅胡氏一人之说，它的是否，还待研究，实不应据以为评新文学运动之对象，犹如我们不应根据一省教育局的报告来评论全国的教育行政一般。章氏这种理法，不知究是小题大做，还是大题小做。我们再来批评章氏这篇文章的人，本不应牵及胡氏一人之说以外的全国新文学运动，然而我有许多的话须说，这回恐怕要借题发挥了。

章氏这篇文章，在数目上虽仅寥寥数千字，而不通的地方却实不少。我现在按章氏本文的次第，就事实于理论两方面指摘他的误谬。

甲、事实方面之错误

(一) 章氏谓：“人性即兽性，其苦拘囚而乐放纵，避艰贞而就平易，乃出于天赋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劝而能者也。……胡君倡为新文学，被荷如彼其远，而乃不言而人喻，能收大辩若嘿之效者以此。”

这是极端误解事实的话。查波动的现象，如各部分的振动数不由相近而一致，必不能成为轩然大波。新文学运动所以动播甚速的原因，是因为一般青年的心里，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意的念头。一部分早已使用白话，而他方面因为对于国事极端愤激的结果，认旧文学为衰弱的象征，不足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觉全国的青年都响应了。

(二) 章氏谓：“以英人而治Chaucer即号难读，自非大学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吾则二千年外之经典，可得朗然诵于数岁儿童之口。韩昌黎差比Macaulay而元白之歌行且易于

Byron, Shelley之短句，莎米更非其伦。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

这种说法直是诡辩。Chaucer诚不易解，然二千年外之经史，数岁儿童究能朗诵吗？纵能朗诵，究能理解吗？元白之歌行易于B. S之短句亦不尽然。

（三）章氏谓：“一乡中其得层累而进之徒，较之前清赴省就学考试，洋洋诵其场作，白鸣得意者，数尤减焉。”

此亦与事实相反。纵有这种事实，也是教育没有普及的原故，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与文言白话之争没有关系。

（四）章氏谓：“文言死于二千言前，是自距今千九百年以至演义出版之日，中国无文化也。”

此千九百年不知是如何算出来的。这些地方虽然不关紧要，然而也可看出章氏是信口雌黄，论理错乱。

乙、理论上之误谬

（一）章氏以新文学之勃兴为避难就易之结果。旧文学对于现代的青年，确是困难的功课，然而我们在这地方还当考察下列的二点：

A. 古文创作文字之初，也是这样强人以所难能的吗？我们知道先有声音，后有文字。安知古人读书识字不是和我们今日读白语文一样容易的吗？

B.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留这困难的功课？

对于最后一点，章氏必曰：“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然而文言亦不过一种容器，假使我们把这些所谓国性群德，移植别种容器之中，那么，文言便不是绝对必要之物了。

不仅不是绝对必要之物，而且假使我们理想的国语告成，文言直是不必要的赘累。我们在这过渡时期的人，处处受尽了这二重人格的苦。使将来的青年可不再空费精力与光阴去苦记一些无用的文字与无用的句法，实是我们应当努力做到的一大事业。所以章氏所谓避难就易，应当改为去繁务实。而且这种行为的动机，亦决不如章氏所言全是从兽性出来的，这里面理性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这种因时制宜的行为，实是我们民族自觉的一个证据，与章氏所盛称的古之圣人创为礼义的行为，同出一途，理无二致的。

(二) 胡氏以旧文学为死文学，章氏为下定义谓：“凡死文学必其迹象与今群渺不相习，仅少数人贤为考古而探索之，废兴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若依章氏定义，则今日之文言实可以称为死文学。它的迹象有许多与今群实在渺不相习，仅少数人迷恋不舍，废兴存亡与世无涉。章氏又谓：“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章氏之意大约以为须有Chaucer与现行英文间之差，才可谓死。然而这未免把Chaucer时代的文字看得太难，把我们的文体之艰涩看的太易了。现在的青年读近代文，已经有点象读外国文要加注释，再过数年，章氏所谓“如是之一境”将更一天一天的显现起来了。那么，纵令旧文学现在还未尽死，然而它的死期真是指顾间事。其实，在文学内分死的活的，是极不容易而不妥当的事情，我们立刻可以碰到两个难问：

A. 希腊拉丁之文学，由文学的价值而论，究竟能不能说是死文学？

B. Chaucer时代的文学，文体与现在的差异无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视为仅仅字体上的蜕变？

关于第一问，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承认它们不是死文学。关于第二问，我们知道Chaucer的诗文是用Midland dialect写的，他的文字助长这种白话成为了英国的国语，他的文字好象很难，然而实是因为字体的变易很多之故。英国人称他为第一个近代的英诗人，所以他的文学亦决不能定为死文学的代表。

其实，文学之死活，比较这种外形的问题，还有更重大的两点：

第一，在实用上能使大多数人理解而应用的才是活文学，否即是死文学。

第二，在表现上常能供给新鲜的表现expression的才是活文学，否即是死文学。

看明了这两点，旧文学的死活问题自然瓦解。章氏所谓：“二千年外之经典，可得琅然诵于数岁儿童之口。……且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此皆不重事实的话，末了忽提出俚言，尤为诡辩。

此外章氏所言，如“文字限人之说，未或前闻。”及“世界语之无生气”等等皆无稽之谈，不复多辩。不过后面对于胡氏的几句话，倒还说的爽直：“而又自为矛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所列书目，又率为愚夫愚妇顽童稚子之所不谙，己之结习未忘，人之智欲焉傅。”辟于这件事情，我们曾经屡次痛论。然而这是胡氏个人的行为，与新文学运动无涉。

关于章氏评论胡氏演词的话，约略说完了。我现在想利用这个机会，关于批评新文学运动的方法与标准稍说几句，希望以后如果再有人从事这种评论的时候，不至徒费无益的口舌。

一切的道理是由推论或归纳出来，而这些推论或归纳的根底又都在假设 Assumption 之上，所以一切的道理都在一些的假设之上。譬如一个道理A在一个假设B之上，而假设B又在另一假设C之上。这时候，如果有人根据假设B来讨论A，而我们想对于这种讨论做一种批评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应只就B或与它同等的假设讨论，我们应当回到更 einwand freier 的C来。只就B或与它同等的假设讨论的时候，是容易陷入 Circulus vitiation 的错误的。

所以我们批评别人关于新文学的议论的时候，我们应当由更原始的，比别人的假设更 Einwand freier 的假设出发。而我们批评的标准也应从文艺的原则出发。文字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约有下列数种：

一、实用量。有多数人理解与应用，才能成为有力的文字。

二、表现力。常能供给新鲜的表现，才能是有生气的文字。

三、柔软，Flexibility。

四、明确。

五、优美。

这五种要素轻重不同，须各乘以相当之重量 Weight。我觉得实用量乘五，表现力乘五，柔软乘二，明确乘二，优美乘一，最为适当。我们批评一种文字之良否，我以为可就这几种要素研究。

我们前面用过“我们理想的国语”数字，我们认为现在的国语很不完善，我们须把它改良使成为理想的国语。开倒车的人们尽可以非难现在的新文学（其实明眼人自知得失，正不必问

有无非难)，我们只是对着我们的目标走。关于这种种，留待下次的机会细说，现在引用Lounsbury关于Chaucer的几句话做一个尾声，并且勉励我心坚气壮的同志者。

“一种能使一切读书人赞美而研究，一切著作人取以为模范的文学如未创出，真的国语是决不能成立的。能由一群方言之中拔出一种使超出一切，或者能以生命之统一与元气给予存在其中一种之涣散的势力的，只有天才，只有天才。”

十一月九日于长沙賸园

（原载1925年12月《洪水》第1卷第6号）

文艺批评杂论

一、主观的与客观的

主观与客观是相对的，有此必有彼。主观不外构成对象界之内面的作用。素朴的实在论Naiver Realismus以客观的实在为与主观独立存在，然而这种对立的关系是依然存在的。由认识论Evkenntnislehre说来，在意识中，凡直观等单系由经验所统一的皆为主观的统一，若再经过悟性Verstand的统一便可以称为客观的。换句话说，在直观发展的途中，统一、区别而固定自己的普遍即是对象（客观），这是与直观之内面的统一——自我Ego（主观）——对立的。

在目前常识缺乏的一般人的眼中，大多数往往把主观与客观的作用认为绝对的，这是对于了解文艺批评的一种障碍。然而这里还有第二种，或者可以说是更大的一种障碍，那便是——一般人对于主观的Subjectiv与个人的individual两字的误会。我们可以绝大的公算Probability断定现在一般研究文艺的青年和一部分努力或介绍文艺批评的人大多数把这两个不同的字混用了。这种错误，一半是基因于“主观的”一字之误解，一半是因为他们误认感情为个人的瞬间的状态。感情在纯粹的状态为体验Erlebnis的指示，自有普遍妥当性Allgemeinguelligkeit，自是超个人的。

关于“客观的”objectiv一字，一般的用法亦不免有错误混淆之点。这个字决不能如一般人所臆想，可认为与自我独立

的。它的意义是如康德kant所谓，指经过先验的统一Tianszend-entale Einheit的。

总而言之，“主观的”含有超个人的性质，而客观的真理的要素在有普遍妥当性与必然性 Nothwendigkeit；意识Bewusstsein之求心的Zentripetal方向为主观的，远心的Zentrifugal方向为客观的，这中心便是自我。这些概念的理解，对于文艺批评的研究是绝对必要的，而要点在给它们以正确的解释。假如我们不能给它们一种正确的解释，那么，我们研究的结果终不免是一些空中的楼阁。

研究文艺批评的人常分文艺批评为主观的与客观的。假使我们对于所谓“主观的”与“客观的”采月常识上的见解，那么，这两种批评上的主张是相反的，结果，是二者皆无意义，因为主观与客观是绝对不能单独存在的。文艺批评家往往忽视批评所根据的A Priori，所以各自高筑空中的楼阁，往往达到相反的结果。假使我们明白文艺批评所根据的A Priori，假使我们了解这主观与客观的意义，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批评的主张究不过一内容的两方面。

主观论者的大多数完全把“主观的”与“个人的”硬挂在粗笨的天秤的两侧了。他们所高呼的口号，大致可以“趣味”二字表出。他们的意思大约以为世界上有这许多人，就必有这许多不同的趣味，所以文艺不能有一定的客观的标准。

我们的趣味taste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它是感情、想象与理智的混合体。这三种元素之中，理智可以说是超个人的，想象半是个人的，感情多半是个人的。然而想象与感情是可由理智的增加而变化的；过某程度，想象可以是超个人的；再过极端的某程度，则感情亦脱离个人气质的影响。所以理智的分量

过某程度之后，我们的趣味可以是超个人的。

文艺在鉴赏上亦可分为悦意Agreeable、优美Beautiful与完全Perfect三个阶级。最低阶级的悦意对于理智的要求较少，中间阶级的优美对于理智的要求便大增加，最高阶级的完全便非有充分的理智不能赏鉴了。不曾见过雕刻的人，在路旁见一泥人，亦可加以称赞，但是他见了一片著名的雕刻，倒会摇头起来。浅薄无聊的文字，在常人口中，津津有味，但是对于一篇名文，亦不过如是如是。这都是理智不足的结果，一个Sphinx或一个Laocoon在常人眼中只是一些鬼怪的制作。

主观论者的错误在以为个人趣味（不是理论的研究）的提高可以增加我们的鉴赏的能力。然而趣味的三元素之中，感情的增加是与感受力无多大的关系的，而想象的增加是依靠经验的世界之扩大的。所以趣味的提高，归根起来，究不外理智的发达；而理智的分量过某程度之后，趣味会永远成为超个人的。所以高级的趣味必然地是超个人的，只有低级的趣味是个人的感情的领土。这便是为什么一阵单调的锣鼓声可以使儿童倾听，而一片粗拙的图画可以使常人欢喜的原因。

趣味的高低自然是相对的，同时，文艺的阶级也是相对的。然而批评（希腊文Krinō）的原义不外“分别”，我们的心的作用能把这种“分别”为对象，加以“分别”的作用——这里我们有批评一般的公准Postulat。阶级既然成立，那么，各阶级的通性便成为客观的标准。

客观的标准是主观论者所誓不承认的。然而当那个Philosophical Monk佛兰士Anatole France说“自己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时候，他已经偷偷摸摸地建设了杰作一个阶级了。这位helemite在把他的Wits铸成金钱的时候，大约把一生二、

二生四的公理撇在脑后了。

我们如果要研究批评的性质，我们不可不先关于批评所以成立的A Priori有切实的了解。否则我们的研究不仅得不到真的知识，我们并且没有可以凭据的基础。主观论者自称他们的工作为批评，然而他们却想把他们的公准抹杀了，虽然他们暗暗里仍依靠着这公准。我们可以怀疑批评的可能，我们可以怀疑一切，然而这些是形而上的问题，我们一经从事批评便是永远把这些问题肯定了。

又从批评的作用上说起来，它的目的决不止于表现自己，它并含有要求一般人承认的性质。我们对于仅仅表现自己的文字，只能称为感想。所以普遍妥当性实是批评的生命，所谓客观的不外是普遍妥当的别称。

所以我们如果解释“主观的”为“超个人的”而“客观的”为“普遍妥当的”，那么，不仅主观客观的纷争，可以避免，而且他种争论亦可消灭于无形，对于文艺的本质的考察亦可除去不少的障碍。

这种的真理是，除了先验的自我之外，我们是外的世界所形成，我们是无所谓异质的自己。我们与世界是立在内包与外延的关系。这真是一种绝大的不幸。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苍蝇与猩猩意识中的自然与我们的不会有实质上的差别，我们毫无羡慕它们的必要。我们真是被限定了的，如同在一个永恒的狱里。我们所能作为的，乃是回到纯粹意识的境地，由绝对自我乐享创造的愉悦，或感受真善美的无限的欢喜。

然而我们如要做到这个境地，我们不可没有一番基本的工夫，这便是批评所以重要的道理。我们可以由文艺批评介绍一些美的东西于我们的同类，也可以告诉他所以美的道理。然而

若仅就Shakespeare，或就Racine或就Pascal，或就Goether关于自己说话，那么，除非由绝对自我立说，这种话不免是个人的感想，只对于个人是真，不能适用于别人的。这种话不能说是批评，或者可以称为创作。

批评如果要有权威，它须是普遍妥当而必然的，约言时，必须是客观的。这种工作之可能，全在纯粹意识的作用。

十五年二月六日，于长沙

二、内容与形式

自从柏拉图（Plato）主张他的理想（deal）、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制定他的法则以来，文艺批评便有了偏重内容与偏重形式的两派。

这里我所谓内容德文是所谓Inhalt，或进一步说是英文的Matter，我所谓形式（Form）是单就结构而言的普通的意义，哲学上所常用的“思维的形式”之类的用法当然不是这里所要用的。

在这种含义之内，我们可以把古往今来的为数不少的批评家分为这两派中的这一派或那一派。

为明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起见，我们不妨就最初分歧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进一步的探讨。

柏拉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批评是文艺在“原理”的灯下的检验，而这种原理是从人生的研究引导出来的。他的原理有三：思想在形式之先；艺术的伟大关于艺术家的道德；艺术与道德是有连带关系的。他在他的《理想国》里头，替他的理想国定下了一个检验诗与美术的标准。对于他，善即是美；由表现善的程度可以判定美的程度。“形式、节奏及谐和上的

缺点是与思想及性格的缺陷相关的，而它们的美点是与克己温良等道德的优越相关的。”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批评是就眼前确在的文艺材料考察出来的。他的批评没有伦理的动机，自成一种特别的研究。他说“艺术是创制能力与理智合作的出产”。他由悲剧的结构与方法的研究，定下了一些基本的法则。它们之中最紧要的是布局Plot，他曾称为“悲剧之最后的目标”，“灵魂”与“中心的原则”。

柏拉图认文艺的制作为装载哲理的器具，所以批评的目的不外察出诗及美术的内容与哲学的内容一致的程度。亚里士多德承认了文艺的独立性，并且多少承认了艺术家创造的能力，纵然他所谓创制能力（Creative faculty）的根源仍不外模仿之原始的冲动。这是一种解放，一种极大的进步。有了这一步的前进，文艺才由庸奴的境遇得了解放，而文艺批评也才确立了实质的基础。

然而这种进步，与其说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分歧，宁可说是为柏拉图补足。我们不能离开形式而讲内容，内容必有形式才能存在。艺术的形式可以分为“论理的”与“审美的”两类。一种思想，或一种感情，必取一种论理的或审美的形式才能成立；如果没有形式，决不能成为具体的存在。更进一步说，一个内容必有它的内在的形式；艺术家的工作不外捕住这内在的形式，用他的媒质（Medium）表现出来，使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柏拉图在他的Phaedrus上说：“凡文辞应当做得如象一个生物，有它自己的身体，也不缺头，也不缺足；辞的躯干与尖端应当互相调和而且与全体调和。”这是与亚里士多德所主张如出一辙。然而这身体、头、足是一个内容所本有的，不

是我们能由一个内容扭出一头或一足来。

一个艺术的内容须有论理的与审美的形式。论理的形式是满足我们的智力的要求 (Intellectual demanded) 的要件, 因为我们的智力的河流 (Intellectual flow) 要求内容依着我们的智力之自然的顺序 (Naturan order) 排列而流去。这是心理学上显明的事实; 注意或智力的经济常能使我们发生快感。我们鉴赏艺术的时候, 它的内容在我们的识域中波动着, 我们由注意与记忆的作用, 将零碎的结为一体。内容如果是反论理的, 我们识域中的波形必不能成为平滑的 (Smooth) 曲线, 必被中断; 我们的智力必然感觉不快, 终于发生反感。

审美的形式是满足我们的审美的要求 (Aesthetic demanded) 的要素, 任功利主义者怎样巧辩, 无论如何, 美是艺术的生命, 至少是艺术的生命之火的保燃体。全然缺少审美的形式的艺术, 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音乐可以说是全由审美的形式成立的。在文学里头, 绘画的心象、音节及韵律等皆可以称为审美的形式; 由内容的结合所生的美感与人格美、崇高美之类的感情, 当做内容看待。

康德说: “审美的形式是对象对于我们的智力的适合 Aesthetic form is the adaptation of the object to our faculty of knowing.” 这里所讲的审美的形式一种是广义的见解, 与艺术的形式同义; 如果应用于我的说法, 应改为“论理的形式是对象对于我们的智力的适合”。同样, 我们可以说“审美的形式是对象对于我们的感受力的适合”。

就绘画、雕刻及其余的成形艺术而言, 形式如果变更, 内容也立即改变, 内容与形式几不能分, 几成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在文学上, 内容与形式的界线稍明, 然而决不是各自独立存在

的。外观上似乎独立存在的只是艺术家所用的媒质。

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既是如此，我们当能进一步，对于文艺批评所取的路径做一番比较批评的思考。

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创造者，他在创造他的世界的时候，应该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不应当由我们的世界拿着一个理想或一个原则去规范他。对于他的艺术的内容，我们是不当拿外界的理想或原则去测量的。我们在批评他的艺术的时候，最要紧的是检查他的形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智力的及审美的要求，他的形式是不是论理的与审美的。

由这样的立脚点试一回顾柏拉图以来的文艺批评的时候，我们替古往今来没在艺术的深渊里不能自拔的一群艺术家感觉层层束缚与压迫。他们在创造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也是不能自由的，他们须把这自己的世界扭成一定的形式，或则建设在一定的磁场里。

自由是艺术的生命。艺术与道德、社会及人生许有偶然的或必然的关系，然而它们都是第二义的要素，并且不是可以要求混入艺术的内容而能达到宣传他们的目的同时保全其艺术的价值。这些宁可说是一个艺术家的修养上的要素，我们可以对于艺术家为这种修养上的要求。一个艺术家如果真是道德的，真是对于社会有热情，对于人生有信仰的时候，他的艺术自然是道德的、社会的而且热爱人生的。

然而在他一方面，古来的形式批评却又不免是狭义的。极端的更只注意可见的外形，不曾注意到内在的形式。

三月十九日于广东大学

（原载1926年《创造月刊》1卷1期、3期）

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

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human nature）。两足的这个怪兽，他的头脑虽然已经发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已经可以做种种复杂的思维，但是他的思维，他的一切，总不免要带上这“人间的”一个规定。“人间的”东西最易于使他明白，最易于使他首肯，而且也最能使他感到兴趣。所以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

人性是进化的。现在这两足怪物的天性可以分为积极与消极的两类：

积极的——真实，正义，仁爱等，

消极的——虚伪，不义，嫌恶等。

在原始时代文化幼稚的时期，人类的天性是偏于消极的一方面，或则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相等。文化进步的时候，人类知道积极比较消极的更合于生活改良的目的，所以这积极的一类便因为这合目的性的缘故，渐渐被主张起来，渐渐占了优胜的地位。到了现在，这积极的一类已经在人类精神之中固定，已成至当不易的真理。

文学以人性为它的内容，但它同时也帮助了人性的分化。人性之中的积极的一类所以能有现在的优越的地位，文学的感化的功劳实在不小。但在一般的文学里面，人性只是被包含着，是无意识的。对于人性的积极的一类，有意识地加以积极的主张，而对于消极的一类，有意识地加以彻底的屏绝。在这里有

一种特别的文学发生的可能，这便是所谓革命文学。

文学是这样可以分为一般的与革命的两类。但革命文学不因为有革命二字便必要革命这种现象为题材，要紧的是所传的感情是不是革命的。一个作品纵然由革命这种事实取材，但它仍可以不是革命的，更可以不成文学。反之，纵然它的材料不曾由革命取来，不怕他就是一件琐碎的小事，只要他所传的感情是革命的，能在人类的死寂的心里，吹起对于革命的信仰与热情，这种作品便不能不说是革命的。

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跃进。不问是团体的与个人的，凡是有意识的跃进，皆是革命。人类在自然的状态是在暗中推移着；是在被时空两种形式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移动着。由暗中推移着的，或被移动着的，进而为有意识的能动的跃进，这里必先有可惊的伟大的智识。然而，那是热烈的情意，那使我们出而行动的。

革命的文学家，当他先觉或同感于革命的必要的时候，他便以审美的文学的形式传出他的热情。他的作品常是人们的心脏，常与人们以不息的鼓动。

广义地说时，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多少总可以说是革命的。但是我们现在不妨以常识的见解仍将文学分为一般的与革命的。这是合理的见解，因为特殊的必有一般的才能觅到他的理解与归宿。

关于文学的永远性，可疑与可议之处很多。然而，假使我们以人性为文学的内容，则人性有永远性的时候，文学也必有永远性（当然假定它有审美的形式）。人性是进化的，上文已经说过。进化的现象常暗示一个进化的主体，这主体是有永远性的。我们称人性的这种主体为真挚的人性，或永远的人性。

所以，假使我们以这种真挚的人性为文学的内容，则文学具有审美的形式的时候，它必有永远性。所以关于文学一般的永远性，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明的公式：

（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永远的文学）

关于一般的文学既然如此，则关于革命文学的永远性，因为革命文学究不过在一般文学之外多有一种特别有感动力的热情，所以也可以得一个简明的公式：

（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

遍观自古流传下来的一般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决定他们所以能留存至今，所以有永远性的原因，在于有真挚的人性与审美的形式。而历来的革命文学，我们也可以决定他们所以至今是革命的，所以能是永远的革命文学的原因，在于多有这热情可以依然激荡我们的心境。

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明白时代效力（time effect）的真意。有人会说拜伦Byron的《哀希腊》，在希腊已经独立自由的现今，已经不能使我们感到他原来的热力。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作品自成一个世界，它是不受时代效力的影响的，只要他能给我们一种实在感。受时代效力的影响的，是那进化的人性。现在的我们是夹带着现在的人性的。我们遇着异样的人性发现时，我们必发生异样的感觉，或则滑稽感。所以永远的文学的内容必须是永远的真挚的人性。

从古至今，多少天才的心血的结晶被时辰的潮汐淘汰得无踪无影！我们由上述的理论，可以知道这里面的原因不外是作者的观察不曾透入或追踪到永远的真挚的人性，或则他的形式不能引起他人的美感，或则没有使人震撼的热力。

归究起来，如果文学作品要是革命的，它的作者必须是具有革命的热情的人；如果要是永远的革命文学，它的作者还须彻底透入而追踪到永远的真挚的人性。但是永远的人性，如真理爱、正义爱、邻人爱等，又可以统一于人生之热爱。我们须热爱人生。而我们维持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还须维持团体意识；我们维持个人感情的时候，我们还须维持团体感情。要这样才能产生革命文学而有永远性。

（原载1926年6月《创造月刊》1卷1期）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

两年前下了决心，不问出版界情状的我，这两年来受了许多无名的闷气，真是心身都很安泰，自己觉得这样再好没有了。这次重游岭南，因为创造社出版部的关系，却不得不常常与现在出版界接触。这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灾难。但是小心翼翼的我却也早已节节布防，非曾经别人看过证明了不妨看看的书，我是决不使灵魂去冒险，就是不妨看看的书，我也只看看一两行，便专去考察它们的外形的进步，因为根据已往的经验，我已经知道了它们的外形委实要比它们的内容充实。这一点是我们出版界的一大进步。而特放异彩的是志摩的古装复辟，他的忠肝义胆应可光耀日月。不过志摩这人有的是钱，有的是闲暇，论起他的高怀逸志来，就是恢复竹书与结绳也不是多怪。所以倒是刘半农博士的古装书功劳犹不可没。他的意思大约是不让志摩专美，这种竞进的精神犹为难能可贵。

据我的推测，外形既然进步，内容也应该长进，我以为内容充实的程度至少也应该有外形的十分之一。可是最近因为友人的恶作剧与自己的好奇心，看了几本书的结果，却真叫我后悔不及。内容的空虚，文字的丑恶，都不见得比从前好了几多，反而从前所幸有的努力于表现的一种纯洁的态度已经无处可寻。磅礴着在的，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本来我们的文艺界自从国语文学运动以来，仅在黎明时期

有过纯粹努力于表现的一个时候；那时候的作品虽然不免幼稚，但是大家的努力，就好象许久被人把口封住了的——一旦得了自由的一样，都是集中在自我的表现的。不过这个时期统共还不上二三年，大家的表现力就被一阵小诗的手淫消耗了一大部。自从经过了这小诗的手淫之后，我早就叹息那些时髦的作家太早把精力乱费了一个干净，早就预料他们没有恢复表现力的可能，没有振作的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早就堕落到趣味的一条绝路上去的。

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实在太早了。年青的我们，我们应有热烈的感情，应有热爱真理的勇气；我们应努力于自我的表现，我们应当阐明真理。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的玩意，我们年青的作家太早就堕落到这个地步，这真是出人意表的怪状。

最奇怪的是同样被趣味麻醉着的评坛的瞎说。新近看到的几种小刊物里头，时常有些奇怪的文字使你不得不哑然失笑。在他们的评论的字里行间，真理好象是过于微细，致被筛了出去。每个评论者是一个暴君，每篇评论是一部律令。谁能不服从他？谁胆敢加以反驳？然而他们的背后其实仍是趣味这怪物在捣鬼，就好象每个军阀后面必有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捣鬼一样。

趣味这东西含有对于某种事物有特别嗜好的意义。这是必然的，因为普遍的趣味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称，而趣味如果普遍化，也就不能成为趣味。

但是一个创作家，或一个读者，或一个批评家，他如果保有特别的嗜好，他是不能为适当的观察，或不能容真实的感受，或不能为正确的评论。

我想只要是能够反省的人，当他遇着趣味这种臭气，或则在趣味的氛围气中徬徨了一阵之后，一定要发出三个疑问来：

一、这是文艺的正轨吗？

二、这是在中国文学进化的过程上应该如是的吗？

三、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这样的文学？

我想只要是能够反省而对于文艺有相当的理解，对于时代有真正的认识的人，我想他对于这三个疑问的解答一定是三个相同的“不是”。

文艺是生活基调的反映，我们由文艺可以知道产生这种文艺的生活基调，就如我们由工业制品可以知道产生这种工业制品的人民的人情风俗。我们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换句话说，就是必有一种有特别嗜好成为了一种共同的生活基调，才有了这样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而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事实上我们现在寻得着这文艺上的三宝，看到他们所谓趣味的真相，而他们的福地我们访得着是那个讨赤的首都，一个白化的都会。那儿有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 Cycle，那儿有我们的北新书局，那儿有我们的无数的、没有课上的大学堂里念书的未来的文人学士。景象萧条的白都，连学校的门都是紧闭着的，城外的战云是密布着，城内的居民是僵尸般的呆望着。这时候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带了他的 Cycle 悠然而来，扬着十目所视的手儿高叫道：

“做小诗罢！俳句罢！

使心灵去冒险罢！

读古事记罢！徒然草罢！

.....

.....”

这时候刘半农博士不知道几时跑了回来，扬着鞭儿，敲着他的《瓦釜》，大叫了一声：

“读《何典》罢！”

在这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而我们的西澧先生却在说他那《闲话》。北新书局呢，老板不消说是在忙着编纂，排印工人不消说是在黑黢黢的铅字房里钻动。大学堂里念书的呢，他们是在耽读着，著述着，时时仍在仰着头等待什么人再给他们一点天启。这些光景我们都不难想象。

现在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是这样发源出来，是这样合流着，以至于有今日的泛滥。我们已经看见有许多不成话的小刊物钻了出来效颦，甚至一种刊物非以趣味为中心不能使读者满足。

至于评论一门，素来就多是瞎说的，但从前的瞎说多半是因为幼稚无知、很老实地信口胡说，而近来的瞎说却多在趣味这美名之下的胡说八道。“我喜欢这种作品”，“我不喜欢他的作风”，这样的话便是评论的根据。本来批评家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种动物，对于一种东西自己喜欢不喜欢，他是没有自决的自由。他是好象一个天秤，黄金要称量，粪土也要称量的。现在我们的批评的揭竿起来，高叫“还我自由”，这种革命比什么为自由解放的斗争的功劳还要伟大，我们的批评家的勇气真是可钦可爱。假如我将来要做一个批评家，我是要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的。

但是我们站在文艺的立脚点，看清楚我们的时代，并且意识着文艺进化的过程，深自反省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荒淫后的荒淫究竟能不能予以肯定？

疲倦后一时的优游，长途上一时的驻足，对于这些，趣味常有生理上更新的效力；然而假使是长期的晏安，这便是永远的堕落。我们知道鸦片与 Cocaine 有一时兴奋的效用，但是朝夕与它们接近的时候，可以使你成为一个烟鬼。凡所谓趣味都是这样的，它是路旁的一个迷魂阵。

我们的文学界几时紧张过来以至于要有一时的休息？在新文艺进化的过程上我们为什么要钻入迷魂阵中去自己骗自己？我们现在的时代许不许我们效颦于 Bourgeois 强自舞文弄墨呢？我们怎样能够问心无愧？专就文艺而论，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文艺的修行者所应走的正路？

北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 Cycle，北新书局及大学堂里念书的，他们的生活也许本来就奏着那样的 Rhythm 才有那样的文艺出现。对于他们的生活，我们是不宜过问。但是没有趣味的我们，而且不幸而吸不着北京那种空气的我们，我们是不能不有所反省。

但是我们只要一加反省，就一定对于那些趣味家的态度感着不满。第一，他们的态度是游玩的，不诚实的；这是由趣味那东西的本性可以明白的。第二，他们常把自己没入于琐碎的现象之中而以感着所谓趣味为目的，他们不能把一个个的现象就整个的全体观察，所以他们的态度是非艺术的。

我们同着小朋友游行过的人，每每会感到一种偶然的不快，就是遇着街上有什么特别事故的时候，小朋友总要钻进里面去游玩半天，把你撇在街头不理，一定过些时候才欣欣然跑出来。

小朋友是在寻找趣味,他是不知道观察的方法,他是忘记了一切,当然也忘记了他的老朋友。这种态度是享乐的而不是艺术的。

至于那些胡说八道的批评,做那些文字的人根本是没有艺术的良心的。他们只是凭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凭自己劣等的感情,出出风头,报报恩怨的。这种行为毕竟是无益于己,无损于人,时间到临的时候,他们终于须抱头鼠窜,隐跡吞声的。

综观数年来的新文学,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我们纷扰不宁的国事,因为二者都是不曾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不曾找着一个目标,天天总是在崎岖的荒郊中乱窜乱走。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起来革命的时候!

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不应该尽管在崎岖的荒郊中乱走乱窜。我们要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找着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明白我们以前把可惜的光阴在荒淫中虚掷了,我们不曾去求过目标,我们简直不曾努力过。我们现在是应当努力,努力本身便是有价值的,不努力便是堕落,便是死。

我们应当反省。我们不应当自己骗自己,也不应当受他人的骗。我们要拿出勇气来打倒这种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这几年来在荒淫中把精力消耗了的我们,应当向着目标加倍的努力。我们应当恢复纯粹的表现的要求,我们应当仍努力于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之创造。

真诚的同志们!永远的同道者!我们起来,打倒一切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我们要看清楚时代的要求,要不忘记文艺的本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

(附白)关于本文如有讨论,作者极愿领教,但讥漫讽骂之文字恕不答复。

(原载1927年1月《洪水》3卷25期)

打倒低级的趣味

趣味有高低之别，这句话在纯粹主观的论者或许会摇头反对起来，但是只要稍能反省的人，我想总不至于全然否认。不过趣味有高低却不一定与社会阶级的高低为比例。反之，就一般而论，越是在社会生活上阶级较高的人们，他们的趣味越是低级，比较那些阶级较低的人们更要低级。我们的军阀官僚、议员政客不必说了，常常有许多大学教授；专门学者，他们的低级的趣味常常使人见了瞠目，大学学生更不必论。这里面的原因，当然要数这一个，但是，他们的全心身已经为种种欲望所薰融，他们的全心身已经俗化，所以低级的趣味恰合了他们的脾胃。所以趣味的高低与阶级的高低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进化程度的高低显然使趣味生出高低之别。（当然这又是客观的说法，若就主观的说时，人固自乐其乐。）在进化程度相同的同一民族，趣味的高低与各人的教养有大关系。大抵趣味的高低可以暗示各人所受的教养是不是完善。

所以趣味的高低与资产阶级Bourgeois对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问题无甚关系。在这两种对立的阶级之中，趣味的高低毫无必然的关系存在；他们间的趣味的不同是在性质与种类方面。各阶级的趣味大抵种类不同，至少各阶级的中心趣味是绝少同类；偶然种类相同，性质绝少同样；偶然性质相同，这趣味的高低也毫无必然的关系。大抵资产阶级的趣味多豪华的种

类，而无产阶级的趣味多醇朴的种类；它们的性质，一是虚伪的、游玩的，而一是诚实的、认真的。

决定趣味的高低问题的主要因子是各人所受的教养是不是完善。有人会说现在无产阶级既然没有受教养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趣味必定会比资产阶级为低。这种说法错在没有把我们现在的教育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情看得明白。我们现在的教育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教育只会养成虚伪的资本主义的趣味；我们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也只配养成种种低级的趣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极不完善的，它的成绩不过使一些虚伪的所谓教育家成了名，同时把一些无识的青年割了势，成为一些小资产阶级者Petit-Bourgeois。社会是极伟大的一个教养的势力，但它的机关，旧的已无须说，新的如青年会之流也只能养成一些浮在社会表面的徇男女。

所以现在资产阶级的教养是虚伪的不完善的，它的趣味全体是低级的。而它的趣味的种种特征之中最使人痛恨的是奢侈与独占。这种奢侈欲与独占欲便是资产阶级的趣味之一种。一句话，现在的资产阶级的趣味是低级的，现在的资产阶级完全生不起优美的心情，感不到崇高的共感。

优美的心情与崇高的共感，这些是要有完善的教养才能养成的。现在的资产阶级不足语此，而随流扬波的大学教授、专门学者亦不足以语此。

高级的趣味需要完善的教养，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一切低级趣味打倒。

一切低级的趣味，它们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虚伪的与游玩的。这两种低级趣味的特征最显明地表现在时下的出版物作品上。这是正当地反映着时代，是适合时代的要求的。饱食暖衣

的阶级与时髦的青年说说新式的清谈，写写游戏的文字，这是国家承平无事之秋解暑消闲的妙品，虽不是我们所需求，要不失为适合时代的盛事。

但是觉悟了的青年，我相信不久就会感到这里面的矛盾而起来拒绝这种低级的趣味。觉悟了的青年将要努力修养，培植优美的心情而感受崇高的共感。觉悟了的青年将要从新兴的阶级学得诚实的、认真的态度，而打倒一切低级的趣味。

（原载1927年2月《洪水》3卷26期）

文艺战的认识

苏俄决定了他们的外交政策及经济政策的时候，同时他们也决定了一种艺术政策。他们认定了文艺为第三战线的主力。听说他们这第三战线也已经充实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的政策已经着着成功，数年来的文艺作品的成绩已经大有可观了。

文艺在人类社会素来有一种伟大的势力，这种事实从前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不过这种事实是不论那一个时代都很明显的。现在我们是应该看清这一点，应该用了充分的意识来发挥这种伟大的势力。

但是这第三战线的战略与目标是与第一第二战线上的完全不同的。我们这种征战的目的不仅在击破而在于获得，我们要获得人类一颗颗的赤心。这是我们这种文艺战的特色，也是它所以能有如此伟大的势力的缘故。

我们要获得人类一颗颗的赤心，我们是在为达此目的而作战。但是我们应如何下手，我们用什么去达到这个目的——这里我们遇着了-一个当面的难题。

当然，我们要先击破这旧的世界，扫除一切的障碍，我们要尽量吸取着自由的空气，保持自由的精神。而且我们也要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也要洒入大众恢复大众的意识。

然而这些仍不免是枝叶的。我们是要以我们的赤心去获得人类一颗颗的赤心。我们是再无别的方法，也无别的工具。这

是对的，我们的使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必然达到的结论，而且我们前进愈深愈会确信不疑的。

只有心能够获得心。我们的艺术要以我们的心之鼓动为原动力。一切舞文弄墨从头脑而非从赤心出来的制作，我们要加以鄙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应当如何去努力修养，应当在什么地方用力。

我们要看清楚第三战线的目标，要明白我们的着力处。

（原载1927年3月《洪水》3卷28期）

读了《广州事情》

近来因为事务繁忙，所以新出的《洪水》第二十五期，虽然带了一部回来，仍只看了一看题目。今天在路上遇着了一位朋友，他很急促的对我说道：

“怎的，你们竟登了一篇大骂广州政界的文章？”

他这一问把我问得真是莫名其妙。他那张皇的情状尤其使我瞪着两眼说不出话来。他在这沉默中吐了两口气之后，才告诉了他所指的就是《洪水》上的《广州事情》一篇文章，才说出了他找了我几回，很想问问我关于这件事的底蕴。

我对于这件事情毫无所知，结果，我只得答应了他等回家后看了再说。但是当我回家来从头看下去的时候，我才觉得这篇文字真有点不可解。我现在以我在广州的资格，对于曰归君的这篇文章在这里略述我的意见。不过我不想，也无暇逐项细说，我只笼统的说几句，这一点是要先请大家原谅的。

第一，就我所知道的说，曰归君所举的几宗多不是事实。譬如广州的马路，第一次计划是六七年前完成的，占有现在的广州市的马路的大部分，修筑时有没有弊端，不干国民政府的事。这一点曰归君未免患了时代错误的毛病。又如政府中人兼差一事，“一二千元一月的夫马费和办公费”，现在当然没有，就是从前也不一定就是这样。

第二，我们中国的官场(?)——也许不仅官场如是罢——素来总是黑幕重重的。国民政府承历年祸乱之后，想要人人守

法，事事合理，是万难办到的。但是一年来澄清的结果，已经很有可观，这是谁也不能不承认的。若依现在的速度预测，不久定会澄清到底的。曰归君对于这一点未免过于责难了。

第三，由文字看来，曰归君对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是抱着热烈的希望的。但是他把话说左了。他的主张，我们可以由最后的一段看得出来，但这一段文字分量太少，所以他的真意倒被前面的一大堆文字埋没了。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世界上常有一种妙人，他喜欢说别人的不是，但是说到尽头他却证明了他们是好朋友。这种人是不可解的，若就他的说话看去，他责善未成，颠倒近于扬恶了。世界上的女子，据我的经验，颇有点近于这一类的人物。曰归君的说法也有点象这种妙人的说法。总而言之，我们如果看清楚了我们的去路，这种旁观的闲话式的说法，我们是应当禁绝的。

第四，目前是反动势力横行的时候，在我们的眼底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我们的友人，第二种便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暂时不应该问是非，我们只问谁是友人，谁是仇敌。这也许可以说是革命者的苦恼的源泉罢。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革命家如果没有苦恼，他决不能是伟大。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去路，我们的命运是定了的！曰归君大约还没有尽除 *Petit Bourgeois* 的根性。

我对于曰归君的《广州事情》的意见约略如上。我觉得曰归君的毛病，一在于观察不切实，二在于意识不明瞭，三在于对革命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认识，四在于没有除尽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至于这篇文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曰归君尤为不能不负全责。我愿曰归君痛改。

最后，我对于《洪水》登载此文，不能不说几句。《洪水》

的使命是在领导青年群众上我们所应该去的道路。我们的旗帜是鲜明的。数月以来，因为几个同人都忙于实际工作，所以暂由病弱的达夫兼任编辑。这次登载这篇文章，直接的责任当然应由达夫担负。但达夫为什么误登此类文章，及日归君究竟是甚么人，这两个问题在别人或者喜欢问问，然而到了现在已经是挽回不及，我只在这里预告一声《洪水》将要特别注意选稿，我宁愿它马上停刊，不愿它再有此类文字登出。

三月一日，广州

（原载1927年3月《洪水》3卷28期）

中国文学家成仿吾鲁迅等 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这个宣言是我们一种忍无可忍时的表示。本文已经译成英文，直接寄往欧洲了。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所以特别郑重，凡本人在远处的，都由他的朋友负责代为签名。我们很希望能得到英国方面的回信，同时更希望国内多有些同志来参加。

我们从事于中国无产阶级国民革命的文学家等今致书于英国的无产阶级，Intelligentsia及一切工人，想对你们表示些意见和希望。

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通书的事，恐怕这次才算第一次。因为向来只有“英国皇家陛下”致国书于中国皇帝陛下（现在已没有了）或军阀所推戴的大总统阁下等事。那种文书虽表面上用许多敬语称呼中国的皇帝或大总统，里面却包含许多使中国人民不能生活的恶毒的条件。那种文书虽能欺骗一皇帝一个大总统或信用这个皇帝或大总统的人民，但一旦人民不信用皇帝或大总统而自己觉醒的时候，那种文书便是引起我们对于英国人生极端的恶感的東西，——自然，我们所仇视的不独是英国一国。但一方面被我们仇视的英国人，也不过一小部分的人才直接受那些文书的恩惠。大部分的英国人不但没有接受那些文书的恩惠，并且倘没有我们提起那些文书的事，恐你们从没有知道过

英国和中国之间有那些无聊的文书。我们深知英国人的大部分也为了那些文书直接或间接地牺牲了不少的生命与不少的劳动而并没有得到相当的报酬的。

你们想，那些文书，虽在表面上以种种敬语互相称呼，事实上，除了引起我们的反感之外，有什么别的效果？那种文书不但不能为两国人民谋好感，谋幸福，并且使两国人民没有接近握手之一日。资本主义天天想把航路缩短，航速增高，用了种种奸诈的方法，表面上对我们予以称扬，暗中却任性抢掠；因之民族感情反天天隔离了。这就是现在我们对你们要表示意见的原因。

我们究竟能让这快要崩解的恶毒的资本帝国主义来离间我们两国的民众么？我们不甘心如此，想你们也不甘心如此。

我们的文书决不象皇帝和大总统两下所结的**权利买卖条约**。我们没有什么权利送给你们，想你们也不要我们的权利。并且我们深信你们能痛感你们的支配阶级不替民众造福，专为自己的利益起见而侵略殖民地，甚至引起世界的被侵略民族群起仇视你们之处，你们一定能自觉起来，以严格的态度攻击你们政府的侵略手段而使政府放弃一切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特殊权利和地位。你们倘不这样攻击你们的支配者，你们便不得不负一个“直接或间接帮助帝国主义来压迫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污名！但我们深信，英国先驱的无产阶级，你们决不情愿做一个盲目的爱国者而蔑视人类的感情。

我们知道不能再让这离间者介在我们两民族之间了。我们这封信便想尽这个职能。我们想和你们及世界的一切无产民众握手。我们不愿你们的支配者来和我们的军阀握手，因为他们的握手简直是卖我们两方的民众的。

我们这样说了，那些资本主义者或者又要这样说：“我看你们真能握手么？”

2 实在的，我们能握手！我们最近就有一个好例，想你们也已经接到报告了。在这两个礼拜之中，我们广州市欢迎英法美国际工友代表的光景，正是应该载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事件。无论那一次的欢迎会，为了三位工友代表而群集的民众总是十数万。他们只是要知道欧美的无产民众对我们的友谊，只是要亲自听见欧美民众代表给我们的约束和安慰，只是要得和欧美民众握手的机会，遂把无论何种广场都挤满了。他们对于这三位远来的工友代表竟表示无条件的欢迎。无论什么时候，群众只要一看见这三位工友代表时，他们便举手扬旗欢呼呐喊以吐露他们不能用言语表示的情感。对于这种光景，倘不下泪，也不不得不起一种严肃的尊敬。这完全是一个精神的合一（Communion of Souls）。不但是英法美工友代表和广州的民众的精神合一，这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合一。——这种光景，完全是合众一致Collectivity的Extasy。我们从三位代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可以想到欧美无产民众的感情和意义——我们看见三位的后背有无形的一大群无产民众站着——我们遂禁不住向着三位代表后边看不见的大众高呼！

实在的，现在我们能联合起来！现在确是民众和民众不得不联合的时候到了。世界无产民众赶快联合起来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欧洲、美洲，以及澳洲、非洲、印度的无产民众，我们现在对你们公言，希望你们大家团结，也和我们团结——希望你们知道承认我们无产民众的中国是你们的Kamarade，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在中国的Kamarade有几万万！我们希望你们在中国的几万万Kamarade当做你们和资本帝国主义战斗的联合战

线的战友！

实在的，我们是在东方极力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我们的组织虽没有象你们的完善，经验虽没有象你们的十分充足，但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表示到十分之七八了。我们知道孤独的作战是很不容易制胜的。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一在我们自己的斗争组织之不完全，二在我们不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民众结合。但这种失败，想我们在西方备尝辛苦的Kamarades很可以同情我们的，并且你们一定想到倘和我们共同作战，在西方应援我们时，我们或不至于十分失败。我们也如此：倘你们的总罢工，我们东方的无产民众——虽还不能表示充分的威力——遥遥地应援你们时，你们或者也可以多得些意外的勇气和希望。但这都不过是过去的悔恨。以后我们决定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来帮助你们。想你们也可以如我们所愿，尽你们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训练和组织，虽还没有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成功，但我们的意志确有建设无产社会的可能。外国来的无知的绅士们到香港、上海、广东、汉口等处观览的时候，他们傲慢的眼光所见的只不过是许多苦力，但是我们的工人，虽在这些绅士们的眼光中看来是苦力，却都是总工会的会员；虽在平时默默无言地劳动，倘一旦总工会表示全体意志的时候，他们的团体意识，他们的团体行动决不是那些傲慢的绅士们所能预料的。我们平时看见工人在货物自动车上、在马路上奔驰时，我们已经觉得将来建设新社会的是他们，但我们更看见他们的团体行动的时候，我们便更觉得他们将来的威力。不管那些向后倒退的帝国主义者向“未来的支配者”怎样开炮，但“未来”究竟是他们的。

我们无产民众的组织、运动意识等正在向前前进，但榨取

我们的外国资本家却天天在那儿后退。譬如，香港一岛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但察其文化状态则我们敢断言，香港的英国人断不能理解他们本国的现在的倾向和将来的形势。老实说，他们已经和本国的现代潮流隔绝了，他们已经不能顺应他们本国的进向了。这自然他们所谓殖民地的进向，他们一定更不愿意顺应，也无能力来顺应。他们的倒退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迟早都是要被淘汰的了。但是他们帝国主义的自己崇拜却依然如故，依然以从前陈腐的眼光来轻蔑我们，说我们没有造高级文化的能力。在这盲目的自己崇拜的昏睡之间世界形势进展了，等到他们睁开睡眼向外边一看时，他们以为不能创造高级文化的民族竟弄起社会运动的Demonstration来了！

“杀！杀！放机关炮！”退后的帝国主义意识便变成Terrorism，张开它的毒牙了！

它不亲自张牙舞爪的时候，便更有阴险的策略。这一次上海总罢工，军阀孙传芳屠杀我们的工友时，倘不得英国人和法国人暗中或竟公然帮助，决不至于那样残酷！上海军阀之杀人是应该英国人和法国人负责的。他们是借刀杀人！他们嗾使了军阀来残杀我们，他们还在那儿冷笑旁观！他们这些险恶的人类！我们现在虽不能支持我们流血的罢工，但对他们的阴险，我们总不能忘记，我们总要和他們算一次人类的总账！

无论怎么样，现在，没有民众支持的军阀总被打倒的。那时候我们的战线一定和帝国主义直接接触。我们也预知帝国主义一定会用种种阴谋来和我们作战，一定会设法惨杀我们，但对于这种Terrorism，我们已有全体的决心。我们决不因帝国主义的Terrorism而退却。我们现在专等候敌人的态度，我们是决不辞一切的斗争的。我们的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

义，我们只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也再没有别的生路。我们希望英国的无产阶级以满胸的同情来和我们以及全世界的无产民众合作起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此后我们再向东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反抗的时候，希望英国的无产民众也响应我们，在你们自己的国内向帝国主义进攻。

我们现在第一要为了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而团结，将来把资本帝国主义打倒之后，我们更可以为世界的生活发展而互相扶助。以后我们和你们交往的时候，必定渐渐增多！你们必能有真确的消息而不被新闻记者所欺骗。我们有种种地方要希望你们把你们的经验和技能指教给我们。现在我们的生产组织还没有确定，故支配生产组织的技能和经验还缺乏。我们将来总想设法派工人到欧美去求你们的指教。也望你们常常派人来指教我们和我们合作。总之世界的无产民众在此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不由的不团结起来。孤独的抵抗是容易失败的！我们只要联合起来，我们一点没有损失，我们只有利益！我们希望英国的无产民众和无产的知识阶级联合起来给我们一个同情的回答。

签名者：成仿吾 鲁迅 王独清 何畏等。

（原载1927年4月《洪水》3卷30期）

文学革命与趣味

——复远中逊君

大约是半年多以前的事了。我因为有所感触，接连写了三篇关于我们文艺界现况的文字，交达夫带往上海在《洪水》上发表了。当初颇有人以为会掀起一阵风波来，但自发表以来，到现在又已过了有几个月，差不多还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回响；事过境迁，连我自己也已经丢到了九霄云外。这真是不能不感谢我们的国民革命，因为在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急剧的行动与由这行动而变化的利害关系，这些占据了全民众意识的中心，所以我这次抛出的小石头所应诱起的微波，得以逃出多数人的注意。

但这儿篇文字却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回响。对于《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已有苏觉先、远中逊二君发表过意见。其余散见于私人间谈话的更是不少。二君的文词，虽然好象没有把当面的问题深思，有许多处竟是没有看清我的文意，但对于我是不少点醒之处，也是使我高兴在这里再来申述一番的张本。

凡讨论一个问题，有两件极要注意的事。第一，我们应明白什么是我们的对象；第二，我们应把这问题里面的重要的概念弄清楚。关于第一点，譬如我们应明白我们的问题是关于文学的，我们的文学在它的发展上是如此如此，我们的讨论可发展到什么地步。关于第二点，譬如原作者所谓文学革命的意义

究竟为何，他所谓趣味究竟是什么。

假如我们能够这样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我所谓文学革命，在我的意思以为是毫无疑义，指的是数十年来无意识地发动，十余年来才有意识地运动起来的，我们民族觉醒运动中的一部分的工作。这是十余年来继续下来的一个一贯的运动。我以为这简直无证明之必要（其实我在原文中有几处地方曾稍说及），而远君则谓我“要来作文学革命”以赶出趣味为文学革命，这不仅证明他没有看清楚我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简直要证明他关于“文学革命”没有做过何等精密的思考。碰到这种论法，做论说的人真可谓晦气之至。我那篇文字里头，假使“文学革命”要加注解才能通过，那就“文学”二字都恐怕非加注解不可。这是人力以上的事。

又譬如关于“趣味”的问题，远君说他同我一样反对趣味文学（只限于反对趣味文学），但他又说：“但我们不能说在文学之中根本不准有趣味，我觉得文学里完全排斥了趣味的时候，文学特有的美便立刻会失掉，使我们读到文学作品和读代数、英文一样的干燥。”这里他把“趣味”代替了美感与美的情绪。这种代替法是完全错误的。恕我引一个稍嫌刻薄然而很相似的比喻，就如一个不高明的数学科学生乱扯一个数值代入了公式里面以求得出一个结果。结果是得着了，然而根本是错误的。

这几处的误会与由此而生的种种误解，都是因为远君没有满足这种讨论所必需的预备的条件。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对于“文学革命”、“趣味”等的意见再来说说。

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跃进。文学上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

的青年文学家这十余年来，在有些方面（因为内的要求与外的刺激）已经用跃进的方法打倒了旧日的文学（它的内容与形式）。在最初的几年，仅仅凭了一股朝气，产出了许多内容与形式两都缺乏的文字。但他们对于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努力太微弱了，太不留意了，所以旧的宫殿崩溃之后，新的基础总是弄不出来。朝气渐退之后，一时愈见消沉，一般徬徨失路之辈就陷入了“趣味”这个迷魂阵。所以我们的文学革命才走了几步就跑上了歧路。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

趣味离不了“异常abnormal”这个概念。文学鉴赏上的趣味多由于事件进展的异常与叙述方法的异常。譬如爱情是一种美的情绪。从自然的进展与述法，我们只能得到一种美感；进展与叙述的方法异常时，才有所谓趣味。一树梅花生成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因为“趣味”的原故把它扭曲起来成一些无意义的弯曲；一个女人生成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也因为“趣味”的原故把她的脚缠成一些高次的曲面。这便是我们中国人所谓趣味，与这趣味对于艺术品的贡献！

趣味大约可以分为二种。第一种的动力是“好玩”，第二种的姑且叫做“清雅”。第一种的人物是社会上的寄生虫，第二种的姑且叫做遁世者。不论它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一件事是很明白的，他们所能享乐的趣味处处在反映着一种与我们这些流俗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是这种生活，我们应该先行打倒。

再就创作与批评两方面观察趣味的作用时，我们可以说：在创作心理上，趣味即特殊嗜好的满足；在批评上，趣味即既成法则的应用。这些都是戕害人类的自由精神的，在以自由为燃料

的文学尤不应有此。这所谓趣味的里面究竟是什么，我们最要明白。

我们新兴的文学，在创作心理上应该是纯粹的表现的要求，在批评上应该是一种建设的努力。我们努力表现新的内容，创造新的形式，我们努力于批评的建设。我们尤其应该注重新的精神与新的生活。在生活上，我们打倒一切的Canon，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及Petit Bourgeois的趣味，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做一番彻底的革命。

至关于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我们不是缺少一般的Category但具体的计划是不合理的。这些地方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不说天才）。我们要努力，我们不可放松一点，而最要紧的是个人的生活革命与思想革命。

关于文学与革命，请远君查阅月刊上几篇文章及《洪水》第二十八期我的《文艺战的认识》。关于“预备如何来建设新的文学，建设什么样的文学”，我以为应该多做批评的工作，促起作者的反省，使更认真、更努力，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至将来成为什么样的文学，这是要看大家的努力如何才能决定的。不过至低限度要摆脱一切不合法的既成法则与既成形式，打倒一切浅薄无聊的趣味，以诚挚的态度深入人性之根源的、自我表现的文学。

六月二十三日于广州

（原载1927年5月《洪水》3卷33期）

《使命》序

朋友们时常劝我把自己数年来关于文艺的论说汇成专册，但我自己却从来不作此想。也许有人怀疑我在现在这样大家喜欢印行专册的时代故意高蹈，这也未免冤枉了我。其实，这里面的原因是明白的。第一，我是不喜，或者说不能，多写的人，这几篇勉强写出应付一时的文字，既没有什么高深独到的佳言要旨，而在当时已遭辱骂，现在时过境迁，尤不值大方君子的一览，最好还是藏拙。第二，近年以来，更因惯性的作用，懒于动笔，所以我所能印行的东西都是曾经发表过的，实在没有再劳印刷所工人诸君的必要。第三，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对于以前所写的各种文字之中已经有许多地方不能满意；自己所不能满意的文字再使流入人间，于自己为不诚实，于他人亦恐有害无益。

所以我至今不曾作过印行专册的妄想，拒绝了许多朋友的热诚的诱劝。这回由绍宗的好意把我这几篇一钱不值的文字集好寄来广州，却使我陷入了不能不放弃前此主张的绝境。我决然放弃了；得曼华之助，在约莫一小时之内，我就在广州分部把次序大概分定了。独清见我还没有命名，因为第一篇是《新文学的使命》，就给它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我放弃了从前的主张，我为什么？似乎不可以不一说。一个人跑到外国学了几年工业回来，无端却在新发现的所谓文学界这个鬼窟混了几年，本来就是谁也梦想不到的事。然而在当

时激于一时的愤怒，不惜与群鬼打做一团，至少我自己曾出了几口恶气，而我们文学界也减少了一些恶魔，或者稍微清净了一点；但是事过境迁，对于当时那种幼稚病的对症药既经达到了一部分的目的，而我也回国日久，觉得可愤可怒的事正多，这些群鬼的瞎闹真不值得愤怒，所以我这种反射般的言论现在已是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上面说的是关于我这几篇论说本身的原因；这里面还有关于我个人的一个。“自家今年三十岁了”，这是达夫刊行全集的第一句话。我从来不说颓废的话，我也决不因为快要三十岁了而赶着出什么专集。不过一个人快三十岁了还不能彻底觉悟一番，这才是一个悲剧。从今以后，我不说要为党国建功立业，为人类祝福增光，至少也应该更加认真，认真就本质上思索，在实质上努力。为这个原故我也应该把以前的种种告一个结束。

这里所收集的以关于文艺批评的为多，虽然有许多是讲解前人陈说，专医幼稚病的东西，但是我相信自己不曾忘记暗示我对于文艺批评的意见。我至今相信文艺批评为一种再反省的努力，而关于文艺批评的考究第三次的反省。反省的作用是无穷的，但是我们的反省常受 *Zweckmaessigkeit* 合目的性及 *Gueltigkeit* 妥当性的规定，所以反省的结果决不是无穷的，最后我们必能达到一个同一的结果。这种追求便是我所谓建设的努力。我相信由这种努力可以解决文艺批评上种种纷纭的议论。

国事如此，专门研究这种问题，未免问心有愧，但是文艺批评是我喜欢思索的一门东西，同好之士加以指点，使我多有考察的时机，仍是我所最感谢而最希望的。

1926年7月30夜于沪滨旅社

（原载《使命》，创造出版社1927年7月16日初版）

文学家与个人主义

文学家这种动物在我们国中，大约是从天生最初的一个以来，就被世人当做了特别的种类的。被当做了“特别的”，原没有什么不好，可哀的是这个“特别的”一形容词的含义中，恶意的成分多，好意的成分反而很少。“文学家”这个名称怕还是最近以来才流行起来的罢，本来“文人”才是他们世袭的称号。就是没有成见的我们，听到了“文人”这个称号是多么感着卑鄙与羞辱啊！“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等与这个尊称紧相关联的词句，就如罪人们的永远洗磨不去的烙印，永远显现在他们的头上，丝毫不能遮掩。

文艺在我们古人的眼中是载道的器具，是雕虫小技。这些旧观念保持着原形遗传下来，它们对于这里的 *raison d'être* 是有一部分的关系的。古时生活与艺术是团结在一起的，后来文化进步，渐有专治一艺的人出来，最重现实生活的我们中国人，对于这种在生活之外努力的人，当然不免要有一番轻视的表示。但是近代以来，文化愈进，一方面艺术更与生活分离，他方面艺术自身的发展促成了艺术家的存在。这种艺术家，对于他艺术即生活，他以他的特长与努力贡献于人类，在人类生活之中稍微注加些艺术，使生活与艺术仍然团结在一起，就是由功利主义的立脚点看来，这总不能说是全然不配人类去干的事。外国人对于这方面稍觉宽大一点。然而我们中国人却依然保持着那种传统的旧观念，这是使我们的“文人”显映得很卑

鄙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只是一个外面的原因，最大的原因还是在“文人”本身的里面。艺术与生活渐次分离以来，文艺以外的姊妹艺术也各有各的工匠们，然而他们在人类生活的激流的岸旁，大抵是很艰难地维持着自己“艺术即生活”的生活，他们从不曾有大溢于人们，总不曾有过害处，有过可以使人们厌弃或轻视的地方。只有以“雕虫小技”为职业，啖人类唾余的所谓“文人”，他们除了极少数忠实的使徒之外，多数只知道舞文弄墨，干些谗谄讥诮、诬诈誇诱的勾当；实在是“无行”已极，还要加上些“文人相轻”之类的卑鄙的心机！老实说，这些东西简直是文艺的叛徒，他们是应该受一般人的贱视，而我们忠于文艺，抱着以文艺联系全人类的信仰的人们，尤应把这丑恶的浊流洗刷净尽。

我们的“文人”为什么是这样丑恶，这样卑鄙？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而且我们既要做一番洗刷的工作，那就更非检察一番不可。

据Lombroso等近代病理学家所说，艺术家大抵是变质者。如果这是一个定则，我们的“文人”当然也不能独异，不过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文人是“这样坏”。我们若想明白这一点，我以为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民族性及我们的文人素来所占有的特殊的地位。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一种最爱平和的民族，数千年来总是在专制政体的车轮下辗转，他们对于民权的观念素来很少培植的机会，就是对于一些当然应得到的东西都还要觉得或是皇恩，或是天赐。所以在这种柔驯的民族里头，擅长“雕虫小技”的特殊阶级能够恣所欲为，是不足多怪的。并且国教的关系及科举的制度等，都使文人占有特殊的地位，

有作恶的可能。但这特殊的地位同时又在文人里面诱起竞争，造成“文人相轻”的风气，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不过除了这些特殊的情形之外，我们还应当特别举出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顽恶的个人主义。我们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大概是很著名的罢，你若不信，你只要想想为什么在这样内忧外患交逼的今日，我们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没有团结的可能性。对于我们中国人，个人超越一切之上，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妨危害他人以及社会的利益的。就是对于文艺，他们也不过献他们一部分的忠诚，大多数把它当做了实用的或消遣的工具。

上面所说，没有标出哪一个时代的中国文人，是我故意就中国文人一般说的。若就现代的文人说话，那么，我们的说法还应当有点两样。各方面，一切都颓废了、堕落了的老大民族，它的学术文艺一概已经扫地、扫尽，没有一点阴火，简直是伤心惨目。它的文艺的使徒们呢，摹仿，假造，鸦片烟，一切的作恶。不过，幸而因袭的道德观念多少还留有残灰，还没有象我们现在一部分不觉悟的文人那样堕落。现在，啊现在，旧的因袭的是完全消灭了，新的信仰，新的道德律，对于我们现在的文人，好象是不曾启齿。

我们现在的许多新旧的文人们是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亲眼看见的我们大概不用多费文字来指证。约言之，在旧的破坏了而新的没有建设起来的过渡时代，个人主义益发伸着翅膀，在纵横地驰骤，转瞬间我们已经发觉我们在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中。

新文学运动的当初，暂时之间，我们也曾有过觉悟的表现。纯粹表现的要求，国语文学的创造，这些在当时确曾有过

一番蓬蓬勃勃的朝气，纵然有许多专以出出风头为事的浮夸之徒，不久就证实了他们不是文艺的忠实的使者。但是现在呢？当年的朝气已经雾散冰消，剩下的已经只是些斜阳暮霭！文学革命的精神已经不再存在，浅薄的趣味与无聊的消遣弥漫了整个的文学界。有许多不成器的东西竟在旧文人的队伍间摇头摆尾地狂跳，转瞬之间也成了一些小文妖，真不知天地间有羞耻事。

离开作品说文人这群“人”的时候，我更要替他们觉得可耻。“文人相轻”是已经有了重重的证实的烙印的，不成问题。就是全社会里面，“文人”也不是好member，不是好同志，不是好朋友——一句话，不是“人”。古来文人间的许多优美的轶事，对于我们有如《天方夜谭》中的奇谈异事一般，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们所能耳闻目睹的。伟大的文学家们的交情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涉，我们现在的文人间只有肉与肉的表面交际，而且虚荣与贪利的心肠比普通的人还要厉害十倍。就是我们现在贫弱的文学界已经有不少的败类演出了不少的臭史。呵，这些“文人无行”的重重的烙印！

我们为什么不能稍微伟大一点？为什么不能以赤裸裸的心灵相见？忠实的文艺的使徒，勇敢的革命的战士，我们齐来把这个个人主义的魔宫推倒！

现在，晨鸡已经高鸣，东天已经薄明，已是我们应该恢复意识——社会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不把常在我们后面操着黑线的鬼蜮腰斩？它是离间我们的巨奸，离间我们与人类的顽强的墙壁。我们受它的离间已经太深，它们离间我们与人类已经太远，我们要努力才能互以心灵相见，要努力才能与全人类复为一体。我们不再为人类中的畸形儿，不再为游闲的同

伴者；也不再以过敏的神经纤微的感觉来涂改自然与人类的原形，我们要同感于全人类的真挚的感情而为他们的忠实的歌者。——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努力。

让我们稳步在永远的途上，让理智与良心永远任我们的前驱，而感情与名利永不再为我们的叛逆者！

忠实的文艺的使徒，永远的革命的战士！我们努力！把这个个人主义的妖魔屠倒！

（原载1927年9月《洪水》3卷34期）

祝 词

一睡千余年的我们，睁眼醒来，凡事落在他人很远很远的后面。

百余年来的世界上，我们“中华大国”只是被榨取与被笑骂的对象；一叶一叶的历史上堆着的，尽是我们全民族说不出的耻辱与痛苦。

这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来算一笔总帐。

但是，干什么？从哪里干起来？

“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

现社会的构成，现世界的趋向，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形势——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明了的问题。

问题的简化，问题的把握，在动的状态中——这些尤其是我们必须有的努力。

《文化批判》当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绘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哪里干起。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分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

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

全国觉悟的青年，大家起来拥护《文化批判》！

（原载《文化批判》1号，1928年1月）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一、文学革命的社会根据

一个社会的现象必定有它所以必然发生的社会的根据。那么，我们这十余年来的文学革命的社会根据究在哪里？

据我的考察，应该是这样的：

A. 辛亥革命，民主主义对于封建势力的革命的失败，及帝国主义的急近的压迫，使一部分与世界潮流已经接触着的所谓知识阶级一心努力于启蒙思想的运动（所谓新文化运动）。

B. 这种启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势必要求一种新的表现的手段（国语文学运动）。

但是，当时那种有闲阶级的“印贴利更追亚”（intelligentsia = 知识的阶级）对于时代既没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思想亦没有彻底的了解，而且大部分还是些文学方面的人物，所以他们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而他们的努力多在于新文学一方面。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几乎与新文学运动合一，几乎被文学运动遮盖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就可见的成绩说，也只有文学留有些微的隐约的光耀。

二、文学革命的历史的意义

历史的发展必然地取辩证法的方法（dialektische method-

e)。因经济的基础的变动，人类生活样式及一切的意识形态皆随而变革；结果是旧的生活样式及意识形态等皆被扬弃（Aufheben奥伏赫变），而新的出现。

近代的资本主义急潮的来侵，早把我们旧日的经济的基础破坏，欧战中我们更有了近代式的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印贴利更迫亚”。文学这意识形态的革命渐不能免，而解决这一切的关键也已伏在“文”和“语”的对立关系。

文学在古时和当时的语言没有分离互异的道理。后来渐由修词的功夫、因袭的固执与特创的废话（如秦始皇之“朕”等）等的合作，“文”和“语”才逐渐分离至于互异。但是“语”的成份及它在“古文”以外的势力是不可抹杀的。

佛典的翻译，大约是因为问答法和普及的关系，使语体显然形成了一大流派。后来更由词曲的发达与小说的勃兴，使这里的“质的变化”的发生只缺少了些微的“量的变化”。他方面，文体逐渐发展到了尽头，对于新的内容的表现成了一种桎梏，只坐待时钟的高响——文体永远被“奥伏赫变”的时刻。

最后这些微的量来了，由外国文与新思想的方面；于是这桎梏被粉碎了。新发展的内容取新的形式翱翔于新开的天地。

三、文学革命的经过

文学革命的史实可以不须在这里多写。我现在只略述大概的经过，而且与新文化运动对照着，因为前者在理论上是后者的一个分野，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趋向。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种工作为旧思想的否定（Negation），第二种工作为新思想的介绍。但这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从事这两种工作的人们对于旧思想的否定不完全，

而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更不负责。我们只要一说运动开始不久就有所谓国学运动的出现，胡适之流才叫喊了几声就好象力竭声嘶般的逃回了老巢，猛吸着破旧的酒瓶想获得一点生命的力。其余一些半死的大妖小怪也跟着一齐乱喊，我们只要一看研究共学社张东荪等所翻译的那些要通不通的译本，我们只要一看梁漱溟著的不三不四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但是最不幸的是这些“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货色。这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不上三五年就好象寿终正寝的缘故。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觉悟的青年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迷药，他们本应该背着药笼到资本主义安定的国家去讨饭吃的呀！

文学运动在它的初期大致与新文化运动有同样的倾向。胡适之流始终不能摆脱旧的腔调，文学研究会的翻译也大可与共学社媲美。与“国学运动”相对的有“新式标点派”，其实他们只是乱点。

维持文学革命的运动使它不至于跟着新文化运动同归于尽的是民十以后的创作方面的努力。这时候，创造社已正式登台，不断地与恶劣的环境奋斗。它的诸作家以他们的反抗的精神，以他们的新鲜的作风，四五年之内在文学界养成了一种独创的精神，对一般青年给予了不少的激刺。他们指导了文学革命的方针，率先走向前去，他们扫荡了一切假的文艺批评，他们驱逐了一些蹩脚的翻译。他们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定最为完全，他们以真挚的热诚与批判的态度为全文学运动奋斗。

有人说创造社的特色为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这只是部分的观察。据我的考察，创造社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 (Petit bou-

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在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

是这种创作方面的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创造社以反抗的精神，真挚的热诚，批判的态度与不断的努力，一方面给予觉悟的青年以鼓励与安慰，他方面不息地努力完成我们的语体。由创造社的激励，全国的“印贴利更追亚”常在继续地奋斗，文学革命的巨火至今在燃，新文化运动幸而保存了一个分野。

四、文学革命的现阶段

我们的文学革命现在究竟进展到了怎样的阶段？

A. 我们的文学运动现在的主体：

主体——知识阶级的一部。

B. 我们的文学运动现在的实况：

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Ideologie意德沃罗基)；

媒质——语体，但与现实的语言相去尚远；

形式——小说与诗居多数，戏剧甚少。

实地分析的结果如此，理论上亦应如此。这都是由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发源出来的。

创造社素来对于完成我们的语体非常努力，它的作家们没有一刻忘记这一方面的努力，实际上他们的成功由于这一方面的努力的亦不少。但他们以前的三个方针：

A. 极力求合于文法。

B. 极力采用成语，增造语汇。

C. 试用复杂的构造。

他们在应用这三个方针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与现实的语言相离那么远！

离开文学本身，在文学可以影响的范围内，也有几宗现象可以注意：

A. 各大书店现在还出文言教科书。

B. 许多国语教科书尚多不通的语句。

C. 新式标点还在流行，依旧在乱点。

关于文学革命的现阶段的考察还有北京一部分的特殊现象必须一说。这是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

五、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

由以上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决定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么？

不，这断乎不可以。

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部建筑之一，离开全体我们不能理想一个个的部分，我们必须就社会的全构造考究文学这一部分，才能得到真确的理解。

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要明白我们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必须从事

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的合理的批判（经济过程的批判，政治过程的批判，意识过程的批判），把握着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明白历史的必然的进展。

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申述：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在整个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二重压迫下的我们，也已经曳着跛脚开始了我们的国民革命，而我们的文学运动——全解放运动的一个分野——却还睁着双眼，在青天白日里找寻已往的迷离的残梦。

我们远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在以一个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为主体，以它的“意德沃罗基”为内容，创造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的恶劣的根性。

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换一句话，我们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六、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团结起来！

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前进！你们没有听见这雄壮的呼声么？

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

莫只追随，更不要再落在后面，自觉地参加这社会变革的历史的过程！

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它将给你以正当的指导，示你以必胜的战术。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腥羶”的农工大众！

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莫忘记了，你是站在全战线的一个分野！

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殊勋，你将不愧为一个战士。

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业”团结起来，莫愁丧失了你们的镣铐！

27.11.16.于修善寺

（原载1928年2月《创造月刊》1卷9期）

全部的批判之必要

——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

革命运动停顿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有些人以为这是投机，也有些人以为这是堕落。这两种人的见解虽然不同，但他们不明白历史的必然性却是一样的。

当然，不论那一种运动总免不了有多少投机的分子与蹩脚的追随派，而在运动的初期也免不了有幼稚的分子与不良的成绩。不过这正是历史的必然的经过。

文学的变革过程应由意识形态与表现方法两方面联合说明。

“随经济的基础之变动，巨大的上层建筑之全部或稍徐徐，或较激烈地变革。”

一种表现的方法，在它已经发展到了尽头的时候，必被高级的表现方法所扬弃（*aufheben*）。

我们的经济的基础之变动已经决定文学这意识形态的必然的变革。只有变革的迟速可以由表现方法的发展去决定。

由这样的考究，我们不仅可以明白我们的革命文学的必然的发生并且还可以附带地答复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的革命文学为什么落在革命运动这样远的后面？

有人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革命运动发展得太速，致使一般的作者没有考察（？）的时间，因而落在了后面。不过这可以

说是一个答案么？他不过把问题申述了一遍，说这个跑的太快，所以那个没有赶的上。这是一定的，甲在乙的前面一定是甲跑的快而乙跑的慢。这种回答只可以骗过三尺的孩子。那么，这个现象的所以然究在那里？

我们的革命的发展，因为有以下三种事情，进展非常顺利。

第一，我们的革命是一种国民的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与走狗军阀是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布尔乔亚与农工大众皆在同一战线上。

第二，我们的旧布尔乔亚的政治的能力非常薄弱；近代的布尔乔亚的年龄与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不相上下，但是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与封建势力的重压，却使我们这新兴的布尔乔亚夭折了。布尔乔亚的无力与早天使普罗列塔利亚特自然而然成为革命的指导者（普罗列塔利亚特的Hegemony）。

第三，俄国革命的成功给我们以不少的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残骸的斗争容易发展。

有了这种种事情，我们的革命才能在仅仅一二年之内有这样长足的进展。

但是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却在最近一二年才渐渐入了固定的过程；表现手段才渐渐确立，表现样式才渐渐园熟，还有人相信它的更丰饶的收获。

一种运动非在已经发展无余之后，决不消亡；并且更高级的运动非有可以实现的条件在旧的运动中怀胎而且发达到相当的程度，是决无从实现的。这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所昭告我们的。

我们的新文学在最近半年以前已经发展无余了么？创造社在十五年春已经高唱革命文学的口号，但是就能成为了一种运动么？

实在，我们的新文学，除了《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之外，直到最近一年才渐渐显出了衰惫的形容，表现内容才渐渐陈旧，表现样式才渐渐陈腐。并且社会的条件也直至最近才尖锐化，神经迟钝的文人方在十字街头建起象牙的高塔。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如果希望革命的文学出现，我们反而应该得到相反的结果。

但是我们却又时有一二断片的革命的诗歌，时有幼稚而热烈的革命的作品——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作者个人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之外，还可以提出两个答案。

第一，在世界上文明的国家之中，我们的这个古国，我们的这群生人可以说是受愚昧与贫困的刑罚最是惨痛。不仅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象吸血鬼一样吸取我们的鲜血，而我们本国的资本家的生产的不能发展，也使我们加倍的受愚昧与贫困的答罚。不仅近代的贫困迫我们，而且时代错误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也在压迫我们，不仅国内的封建势力、军阀、地主迫害我们，而且帝国主义的长枪短剑在屠杀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偶发的革命的作品是不足多怪的。

其次我们应该褒奖文艺理论方面的努力。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才渐渐入了固定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有理论上的提倡，使作者有了激励而读者能够接受，这也是对于革命的文艺作品的发生有极重大的关系的。

关于这一点——文艺理论方面的努力，有不少的人不曾了

解。他们以这种努力为不足轻重；在他们的意思，革命文艺的作品运动才是今日的急务。

这种议论的荒谬，我们先就现在这样的黎明时分一说。在现在这样——社会的条件已经尖锐化而表现的方法才渐入固定的过程的时分，我们应该由批判的努力，将布尔乔亚意识形态（Ideologie）与旧的表现样式奥伏赫变。这是作者与读者同样不可少的努力。作者没有这种努力，便不能向上发展；读者没有这种努力，便不能完全接受。替作者与读者充向导的，就是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的人。

农夫在播种之先，必定把田土翻过一次，这是他的批判的努力，假使他有更高的知识的时候，他还应该把去年的收成与今春的雨量等等考究一番，那么，他便可以完全达到批判的目的。

文艺的田土，在旧的表现内容与样式没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清算——批判一次；在旧的内容与样式才开始固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由批判把它奥伏赫变。必有批判的努力，旧的才能奥伏赫变至于新的——才有革命。

我们更就正在发展中的文艺运动说时，批判的重要也丝毫不会减少。批判指出一种文艺的必然的发展与必然的没落，并且阐明它的内在特质。由这种批判的努力的结果，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历史的必然的发展，认识它的必然性；我们可以自由地走向我们的目的（“必然”向“自由”的辩证法的转化）。由这种努力，文艺可以脱离“自然生长”的发展样式而有意识地——革命。

这种轻视批判——文艺理论一般的荒谬的议论，我们时常可以耳闻目见。也正因为这种轻视，我们的文艺运动才在饱受许

多无知与反动的言论的病毒。这许是当面的受罚！

有许多的人在口口声声高呼着“革命的情绪”。他们以为这就是革命文学家所应该努力修养的Alpha与Omega。这是怎样的无知，怎样的肤浅！

这种人，老实说，既不曾究明什么是革命，也不曾了解什么是情绪。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很激昂的说这样的话，他说：我要不把人当人。在这种人的见解，这大约也是革命的情绪的结晶吧。这种高呼老实实在地是反唯物论的unmarxistisch，而反动的。

又有许多的人，（譬如最近的《泰东月刊》）还在提起“革命文学家到民间去”的口号，在我们的革命的急速的发展中，我们的文艺界，同我们的政界一样，真有不少的人在很远的后边气喘喘地追着。他们有时候昏倒途中，会发出些奇怪的议论来使你莫名其妙，这种可怜的追随派，他们的艰难的追随，我们不难想象，也不难谅解。

但这是怎么弄起来的？这便是他们轻视理论的当然应受的刑罚。假使他们的意识稍微明了，多少做过批判的努力，他们可以不至于走向反动的阵营，也可以不至于这样追随不上。

不过我们从前的理论还只是一些讨论与提倡，还没有尽批判的能事。这是无从隐讳的；而且正因为这个原故，我们的文艺运动迟至今日才有转换方向的可能性；也正因为这个原故，我们才不能不赶做全部的批判。

我们目前所要的批判必然地是我们的文艺的良心的总结算。没有这种全部的总结算，我们的文艺的方向转换是不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批判？要通过如何的过

程才能做到？

我们要知道这种全部的批判所应完了的诸过程，我们得先明白文艺这对象所由构成的诸过程。

“依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样式而形成‘社会的关系’的人，又依他们的社会的关系而形成诸原则，观念，范畴。”

所以文艺这种精神的生产过程可以简单的表示如下：

1. 纯经济过程（物质的生产过程）。
2. 生活过程（政治过程，精神的生活过程一般）。
3. 意识过程（精神的生产过程）。
4. 这些过程的再生产。

社会的下部建筑的矛盾之发展终必出现于意识，这矛盾被意识着到一定程度时，先起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要求终要下降到经济过程的批判。在经济过程的批判完了之后，从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被修正，深化而形成一种轮廓。再经生活过程的批判与意识过程的批判，这轮廓的内容逐渐充实而决定。

我们的批判要完了这种种的过程才能是全部的批判。但是除了这种文艺——意识形态的批判之外，我们也要顾到文艺的特殊性——表现手段与表现样式等；这些当然也是社会的关系，所以也是物质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不过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是有自己的发展的法则的。

现在，社会的下部建筑的矛盾已经尖锐化，我们现在的文艺已经不合于革命的知识阶级的要求（新兴的革命的阶级我们素来不曾接近，现在愈加隔膜），越发证明了它不是革命民众的生活的反映；我们要究明文艺发展的过程，阐明它的历史的关系，对于一定的时代的必然性，与它的必然没落的所以然，

也要知道革命的民众现在趋向什么地方，对于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批判要求的内容。

由这样的批判的要求，我们首先要就文艺的分野做一番批判的工作，但是最后我们的这种批判非沉入有产者社会的批判不可，就是终非一度沉潜到经济过程的批判不可。在经济过程的批判之中，最初的批判才获得全面性的修正与深化而成为整个的。再上升经生活过程与意识过程的批判，这整体的内容才逐渐充实。

这意识形态的全面的批判再加一番表现方法的批判的考究，我们的全部的批判才完结了它所应该完了的诸过程。

我们的文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实行方向转换的阶段。在这个分野认定自己的天职的人们应该起来做一次文艺的良心的总结算，而获得革命的意识。

过去的十余年中，在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的使命（在历史的必然性的观点上）。但是一切都是自然生长的。今后，我们应该由不断地批判的努力，有意识地促进文艺的进展，在文艺本身上，由自然生长的成为目的意识的，在社会变革的战术上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

文艺决不能与社会的关系分离，也决不应止于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为文艺的文艺是布尔乔亚的麻醉药，在十字街头竖起象牙之塔的人是有产者社会的走狗。

我们应该由批判的努力，消灭这种布尔乔亚的麻醉药在青年中的影响，打倒一切的象牙与犬牙之塔在革命中的障碍。

这是千载一时的辰光。我们现在急起直追已嫌不早，我们决不能再踌躇犹豫，我们由批判的努力把旧的意识形态奥伏赫

变，把旧的表现样式奥伏赫变，我们有意识的革命。

我们已经是过于迟钝了。不革命的人，我们让他去没落。我们要求大家做一番全部的批判。反对这种工作的人，我们给他以当头的一击。

（原载1928年3月《创造月刊》1卷10期）

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

塞北的愁风尽管不断地吹来，天空尽管是低压而暗怛，和暖的阳春终有到来的时候。

民众信仰革命的成功，就如他们信仰阳春的必到。他们不象小资产阶级那样多疑，那样不定。

这是普罗搭利亚特的社会认识的特质所在，只有他们能够有这样的透澈的认识，而他们也不得不如此。

但是在前线的战士们，他们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生与死的搏战和表面上的孤单，紧紧地，重重地压迫着他们的心身，这是怎样悲惨的苦痛的恶斗！我们能不给他们以一种声援吗？

我们要给他们以声援，尤其在北风凛烈的现阶段。革命的文艺家要振作起来，巩固我们的阵营，支持我们的革命。

但是文艺家本身先要充实起来；他自己没有获得的东西，他是无从给与民众，他必对于时代的坚决的信仰。要这样，他才能够遂行他的重要的任务。

和暖的阳春终必到来，新的时代终必带来新的果实；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

（原载《文化批判》3号，1928年3月署名厚生）

知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我们在背着三重的十字架奔走。

因为我们在熬受着，第一，封建势力的余焰；第二，产业落后的痛苦；第三，帝国主义的压迫。

这种种反映在意德沃罗基上面就是：第一，封建思想的束缚；第二，意德沃罗基的落后；第三，全民族的颓废化。

时代的车轮转到了我们应该宣告摔坏这三重的十字架的时候。

农工大众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解放运动，已经就了各自的阵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一切的活动尖锐化起来，尤不能不把一切意德沃罗基的工作紧张起来——这是知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应该担负起来的历史的任务。

我们目前的阶段应由经济及政治的斗争，扩大到意德沃罗基的斗争。

农工大众的长成——长成到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解放，必须有文化的相当的成熟；为这个目的，由封建思想的解放，意德沃罗基的注入，与全民族的奋兴是绝对必要的。

他方面，对于压迫阶级（封建余孽、资产者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勾结）的意德沃罗基加以尖锐的一斧，这本身就是旧社会组织的部分破坏。由上层建筑对于下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我们更可以收到莫大的效果。

知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应该是意德沃罗基战线上的先锋队。

我们如不能及时地奋发起来，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恕的过失。
我们在阶级意识之下，构成这部分的战野！
知识阶级的战斗分子团结起来！

（原载《文化批判》4号，1928年4月）

编辑后记

独清的“神经虚弱”近来越发“到了高度”，致本刊十一期的编辑的责任忽然推到了我的身上。这事情本不打紧，但它顿使我们感觉有在文学部内组织委员会的必要。于是这个委员会在前礼拜产生了，从下期起，本刊就由文学部委员会编辑。以后的投稿也由这个委员会处置，投稿请写明“文学部委员会收”。

本期除续稿几篇之外，克昂的《桌子的跳舞》，怀素的《波浪》，冰庐的《黎明之前》等都是近来的努力的结晶。冰庐曾在《文化批判》上发表过几篇创作，但是在本刊还是第一次。他从前是一个矿山的Salary man，近从北方归来，在教育工人子弟，他是一个很努力的青年，至于他的性格，我请读者诸君从他的作品中看取。

《波浪》描写革命时期的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踌躇不决与对于目前一切的不满。这是不觉悟的小有产者最困险的通病。他们对于外界一切的现象不满，但是又没有决心自己去干。不去革命吗，又觉得不可；去革命吗，又觉得目前的一切都不如意。于是对于什么都取“不管”主义，对于什么都是La ssez-faire，责任到了身上时，就只有一走了事。这种小有产者是绝对干不了什么的，迟早要被弃绝的，而且他的最后的解决不是无耻的虚无主义，就只有屈服于波流的招诱。知识阶级多少含有这种成分，不把这种成分克服，知识阶级是不能遂行他的历史的

任务的。作者这种重大的使命，时代委给了我们。我们要为这种使命而奋战！一时的战败利钝，我们不用多管。纵或我们一时不免于失败，也让我们奋斗着前往，使信仰人生的人们知道此土此时也还有以真勇奋斗的人而得些安慰罢！

（原载《创造月刊》1卷11期，1928年5月1日署名石厚生）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我们这次的前进，在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当然的事，但是在素来与我们背道而驰的人，这一定不免要说是“突变”——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我们一方面预期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必定起来参加，同时他方面我们也静候着那些守旧的、蒙昧的及开倒车的份子的无耻的明枪暗箭的齐下。

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乌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啊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瑞吉诃德)——瑞鲁迅！

也罢，听他唱来，听这位英勇的骑士唱来！但是，他才唱出些什么！

他唱了一句《醉眼中的朦胧》，他的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然而它的各段的内容，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在哪儿呢？“由我看来”，却在我们中国的瑞吉诃德的特殊性上。

我们中国的瑞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做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听说瑞鲁迅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他注意到时下的报纸杂志，是因为要知道什么人怎样礼赞而什么人怎样失礼；而且一次触了他的眼膜，“竟象一板斧劈着了”他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再也不会忘记，而且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

从前听人说过有一种菩萨，他的事情绝少，他只每日坐在殿上享受人间的香火而注意它们的数量。我们的瑞鲁迅大概有点近乎此。

所以我们中国的瑞吉诃德不仅是一位骑士，同时还是一尊小菩萨。这儿有我们中国的瑞吉诃德的特殊性，“醉眼中的朦胧”的朦胧之发祥地就在这里。

为什么这种特殊性必然地在“醉眼中”引起朦胧来呢？是因为他坐在宝殿之上每天所要注意的只是自己的毁誉，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些是大概一定了的。大多数的人要在他面前顶礼；只有少数的人（大抵是稍微明白的青年们）撮转头不睬他，或竟说出几句不好听的话，这时候我们的小神必定把冷酷的面孔更加变得冷酷起来，说一声：“年轻人这般傲慢！”“而象一板斧劈着了”“记忆中枢似的，从此”这种青年的可恶的小影永远留在瑞鲁迅的脑中，而瑞鲁迅的面孔越发一天天的冷酷下去。不幸的是瑞鲁迅究竟还赶不上孔二先生，他究竟没有方法处治这种可恶的青年，也没有方法可以防范。

但是这些毁誉，在一定的时期，总和与百分比大概是一定了的。于是每天只注意这些的我们的的小神就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使他构成“时间”这个观念。于是对于我们的的小神，时间好象破旧的钟表永远停了摆动似的。于是空间尽管变化，北自北京，南至岭表，终于也跑来“坐在半租界里”，然而时间还是静水

般停止着，洪宪以来，不知有曹三，无论国民革命与什么革命了。

这就是珙鲁迅的朦胧的发祥地。因为他的头脑无法可以构成时间这形式，所以他不能观察事物在它们的动的状态上，在它们发展的必然性上；“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在那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

假使能够长久这般，那是多么美满的一回事！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珙鲁迅！我们已知道这梦游的人道主义者，因环境的关系，一天天的冷酷下去了。现在，因为对他的毁誉之总和与百分比之急剧的变化，他更不得不悲叹自己为环境所作用了。于是，他不得已开始把自己清算起来。他有时候“颇也觉得危险了”，但是有时候却又“有些放心”，结果还是“照旧讲趣味”。所以，结果还是“留着一点朦胧”，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出时代落伍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自暴自弃。这里面当然有阶级的关系存在，不过我们的 Don Quixote，因为他的特殊性的原故，不能认识时代，也就终于不能悔悟，“终于不免朦胧”——这不要多劳思索才能理解。

我们现在试把他所唱的《醉眼中的朦胧》检讨一下。

在第一段里，我们的珙鲁迅对于期刊“纷纷而出”的“突变”叙述他的惊异，并且提出了一种观念论者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现象。就在这一段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不可救药的朦胧来。他的说明：“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这是绝好的观念论者的理由。但是，理由虽然“要而言之”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这“突变”和“伟大或尊严的名目”

又如何说明呢？

第二段里说：“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并说及“这朦胧的发祥地”“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因为和他们“有瓜葛的”，“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但是“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在那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这种说话，在他自己一定以为搔着了他人的痒处，但是，我们的珙吉诃德呀，你又在欺骗自己了！并且，依你自己的说法，你自己的朦胧到底又是属于那一类的？

“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在第三段里，我们的人道主义者很得意地骂着。我们知道，人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阶级支配下都很得意的，因为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总是支配阶级的走狗。所以，我们的珙吉诃德呀，你的得意不过露出了你的马脚！并且，在革命运动的现阶段，社会的内在的矛盾已经尖锐化了的时候，一切的抗争不得不由阶级意识出发，人道主义者的假哭佯啼直是拙劣的丑角，可以招人冷笑罢了。

在这第四段里，我们的珙鲁迅感慨难禁似的说：“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我写到这里，也不禁要说：可惜略迟了一点，珙鲁迅前年抄小说，去年在广东，今年才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们已经知道珙鲁迅是无法构成时间这观念的，他认为现在仍是那美好的中世纪，在他的意思，他是可以当十字军大劫略时广东的，去年才“在”过一时，真是“可惜略迟了一点”。这在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不必多管；他说我们投机，这在他看来大约也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也不必多管；不过他在下一段

“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我以为这问题应改为：倘若……，你能不去吗？我以为问题要是这样才有研究的可能性。

以后有瑯鲁迅自叙他自己清算的经过的几段，结果他“自己是照旧讲趣味”。还有关于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考据，这一点我不敢轻信我们的瑯鲁迅，因为讲趣味是这“老生”的专门，讲到考据，恐怕终要让吾家博士适之坐坐上席。这当然是我的猜想，不过我终不敢轻信。

末尾几段详述他对于所谓“武器的艺术”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无讨论的必要，因为瑯鲁迅全然缺少理解。他不曾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谓武器的艺术，就如他不曾理解“奥伏赫变”与“否定的否定”。他冷嘲《文化批判》介绍Sinclair而《创造月刊》继续介绍Vigny。这儿实在有绝大的矛盾；不过Vigny的介绍是去年以来的续稿，而《文化批判》介绍Sinclair也绝对不能是把他“拖住”的，这可以说是十分明显。我们的文学界正在方向转换的过程中，对症的理论的指导与优秀的旧技巧的介绍都是必要的，不过同时我们要维持批判的态度，也要提醒读者大众取批判的态度。就是，一方面介绍它们，同时他方面还得克服它们——在这一点，我们不免有可以非难之处，虽然将来是要而且也不难补救的。但是瑯鲁迅以为“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这却又是他把现在永久化，面把社会固定化了的结果。

最后，我们的瑯鲁迅预言了“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并且对于“中国的最近的将来”给了一个暗示，虽然是很朦胧的。我以为我们应该相信这是瑯鲁迅趋向革命的披露，我们应该“预致革命的敬礼”。

由以上的检讨，我们可以明白瑯鲁迅的朦胧的程度。这里

当然有阶级（他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自己说过的了）的关系，也有时代的关系。不过“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你看他是怎样明白！这儿却又“想要朦胧而终于透露色彩”了。

但是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以外的中国，人道主义的欺瞒也多是无意识的行动，人道主义者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行动有什么意义。——我很愿意这样想，并且希望我们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中国之社会的国际的特殊情势，能够对于眼前的现象加以正确的分析而停止“卑污的说教”。

对于我们的当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他的悔改，同 Don Quixote 一样，是可能的。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论争可以助真理的显露。在这样暗怛的前夜，真有话要说，而同时想要对于时代有点贡献的人们，应该努力理论斗争的吧。一切规避理论的文字及一切冷嘲，毒骂与谗诬的恶声都是不愿真理显露，或竟想埋没真理的勾当；这后者直是走狗们夹尾图逃时回头的无赖的狂吠，他们还要叫个不住的，但这有什么好处呢？

（原载1928年5月《创造月刊》第1卷11期。署名石厚生）

革命文学的展望

近来革命文学的声势忽然高涨起来，虽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然而在这种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之下，实在已经是盛极一时了。当然，声势尽管高涨，内容终不易马上充实；指导的理论未经确立与把握，作品行动的幼稚而狭隘——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希望成功的。而且构成分子的复杂，我们的文学界比那一国都要厉害，一样口唱革命文学的人们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随意识明显的程度，自微温的反抗以至于社会狂热 Social chauvinism，终至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我们可以看取无数的等级。

这是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所规定的必然的过程。这些等级，各有各的必然发生的理由，也各有各的历史的任务，最后，也各有各的或长或短的生命。

构成分子这样复杂的，我们的文学界究将走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现在有做一番合理的展望之可能吗？

可能的；而且正因为构成分子的复杂，我们也有这种的必要。

我们前期的文学革命是与我们的布尔乔亚革命紧相关联的，我们的布尔乔亚派的衰颓（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军阀官僚的摧残）及它由革命战线的无耻叛变，决定了我们文学运动的全经过。1927年以来的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很急剧地催促了我们再为一步的前进。

但是，1927年到革命文学的方向转换的追迹，及今后向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进展，我在这里暂不多述，这前者是已经很鲜明，这后者也是必然的。不过许多的人说，我们离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还差一万八千里远。这种说话，错在不明白下面的两件事实：

第一，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确定，而我们的文学的发展也已经硬化，急促地进了衰老的过程。

第二，普罗列塔利亚的国家出现，促进了全世界先进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产生；我们也必定立刻感受影响而能创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

抽象的论断是无用的。客观的及主观的条件之精确的评价与全面的观察——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就差一万八千里；也还不是很远的地方。我们的现在是一个飞跃的时代。

我们的文学必然进展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这已是可以看取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促进它的实现？

这问题的考察必然地引起作者与读者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养成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者？要怎样获得大众？

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者，不论是普罗列塔利亚或是非普罗列塔利亚，他必须高扬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为这个原故，意德沃罗基的相当成熟是必要的。

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品必须得民众理解与欢爱。为这个原故，用语的通俗化是绝对必要的。

作者的意德沃罗基的修养及用语的接近大众，这些实是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目前最要之急务。

关于这两点，观念论者常有不同的意见。一方面他们以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终须由普罗列塔利亚自己创造出来，因为小

有产者终不能完全获得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而他方面他们以为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程度极其幼稚的现在，大众日常的用语决不够表现的使用，终须输入些大众所不明白的字句，特别是语法。

这种意见，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很能动人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预定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是如何如何的东西，便也不能说必须普罗列塔利亚自己创制出来。因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毕竟只是向社会主义文学的过渡期的产物，非普罗列塔利亚层的作者能以适宜的技巧完成文学在解放斗争中的任务。——就是结合大众的思想、感情与意志而加以高扬，那便可以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的使命，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已经存在。

至关于用语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状况，倒不是向大众的用语内输入些新的分子，而是由非大众的接近大众的，在大众方面看起来，却是输出。在目前的阶段，只有一方面由大众的文化培养，他方面由作者向大众的无限的接近的努力，由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才能完成它的任务。随大众的文化成长，大众日常用语也必然地变化上去，把它当做固定的东西是全然错误的。

一方面意德沃罗基的培养，他方面用语向大众的无限的接近，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建设，这些是绝对必要的。

在文学的见地上，用语必然地成为各种问题的中心。我们要促进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产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忽略我们的用语，这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要获得大众。这“获得大众”并不是醉眼陶然的老朽所误解的“于万民”，而是结合大众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加

以高扬，使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

我们的文学，如果不能获得大众，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东西呢？结局，还是小有产者的手淫呢。

我们要获得大众，我们的文学必须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欢爱。

五月八日

（原载1928年5月《我们》创刊号，署名石厚生）

东方艺术研究会 春季习作展览会印象记

前月十八日东方艺术研究会开了一个春季习作展览会，先期朋友给了我们一个招待状，所以我于头一天便与沫若达夫去参观了一趟。那天因有他事，没有仔细过目，而朋友要我做点批评，所以我于第二天又邀沫若达夫去看了一次。我对于绘画完全是一个外行，原说不到做评论，纵有一二零碎感想，也不过是根据艺术的一般原理所得，而且后来又因为别的事情搁了这久，除了达夫那天顺手写下来的一点笔记，差不多已经唤不起生动的印象了。所以我现在所要写的话，只限于我当时看了便油然而生、至今还没有全忘的感想。

我们的艺术上的创作，不论是哪一种，一样还是很幼稚，真的创作可以说是还不多有，所以现在大多数的作品，总不外是由模仿得来而形体略具。绘画比较上更易于模仿，而模仿的惯性与流毒也最是厉害。我从去年到上海来，看过的展览会，约摸已经有了三五次，我每回看了，只觉得这种趋向很不好，极希望我们的艺术家早自拔出。这回东方艺术研究会的习作品，在这方面却很使我得到了一种可感激的欣喜。由偏重模仿的人看起来，也许有人说他们的模写——由自然与标本的模写还未到堂，然而正因为是这般，他们的面前才有宏远的将来辉闪着，而且他们确实已经有了不少的作品，在证明他们的天才将

从此发展。一个作家最怕以模仿自足了。模仿易于成功，而且对于俗人总是Something，然而在艺术上是没有价值的。

我在前面所说的模仿，是不限于技术的。我认客观的写生与裸体的临写，都是模仿的一类。我们现在的艺术家所最喜欢描写的对象，不出外的自然与裸体女人的两种，而皆不外以强烈的色彩，为色彩的不调和的舞蹈。由色彩的舞蹈而能创出一种意境，那是恰与艺术之目的相符合；若仅堆着一些色彩，或仅摄下了一个肖像，那便是徒劳了。而且我们现在所能供给画家的模特儿Model，总有一些把身体滥用（Misuse）过的可怜的人物，很难得着纯洁的美的标本。裸体美是美中的杰作，然而滥用过的人体，却是再丑没有了的。固然，由这种丑的描写，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关于社会的罪恶的意识，而丑中也未必便无真美，然而我们现在的艺术家似乎还没有一人去开垦这新鲜的境地。

艺术的真的生命，不在它所露出的小部分，而在由这小部分所暗示给我们的全部。这小部分不是艺术的真目的。我们求这小部分的完全，是以对于全部暗示之程度为标准。浅薄的自然主义，硬要和盘画了出来，那真是劳而无功的事。我们的文艺界，全体有被这种自然主义误了的样子。

本来我们现在就是扯住一个诗人，说他的诗里面应当有诗，他还会疑你在同他说梦，所以我们想在小说或绘画里面探出诗来，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的艺术家还是在忙于自然的临写，还顾不到“画外的画”。一件艺术作品，总要能是模写爱上的一件东西；要这样才是真美的创造。诗——诗意与诗境，这是艺术家所不可一刻忘怀的。那是诗，那使我们兴起一种美的情调，使我们没入一个新的世界的。那是诗，那使这种情调

与这个世界永远是我们的。征服一去不还的时间使它永存，征服茫不可捉的空间使它活现，是一切艺术的精髓。啊，给我们以永存的活跃的音律Rhythm,高的，低的，层出无穷的灵语！

我们现在的艺术家所以还没有诗给我们，所以只有一些一眼看完，便无余味的作品给我们的原因，是在想象力的缺乏。是因为想象力缺乏，他们才自己画地为牢，不离形似的模写。不论是取材，是笔触，是色彩，他们总不想于死的实在以外表出一点活的暗示。一根线只是一件东西的轮廓，一种色只是一个形体的色彩，我们丝毫寻不出线的意态与色的调子，与他们内存的意义。我疑我们现在的艺术家没有感到想象的重要与它的价值。

这回东方艺术研究会的习作品之中，油画与水彩差不多占了一大部。他们的傅衫很有点象一个小羊仔在草地上活跃的地方。不过大部分有点过于浓艳，色彩间的变化有点过于鲜明，很引起了我的反感。幸之君取材Thema甚妙，可惜色彩太鲜艳了。某君的《雨后》没有表出雨后的色彩。雨后的色彩是最难表现之一，既不是强烈的阳光，也不是袭人的暗淡，全体是带湿的微光的波动。画六法中有随类赋彩之一法，这大约就是说要随一个情景赋以特别的彩色。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我想它们纵不赋彩，是很了解此中真味的。雨后的情景，我以为带湿的彩色最为紧要，而长瘦的柱，也是一种极好的象征。凡一个情景总有特别把它象征出来的物象与特别作它活现出来的色彩。使我以为艺术家所最要注意的，是在求出这种特别的物象与色彩。

其次我所最不满意的是倒影。差不多水中的倒影，都是与实物同样浓厚，或更赛过了。我觉得象中无必定如是理由。

幸之君的《天光》是最浪漫的作品。然而那一束微弱的天光倒把一只无处投奔的小鸟，只是停留空际；下界还是沉沦在黑暗里。我不知作者自己是一种怎样的感兴。吴人文君的《灯光》与《影》是表现近代生活，带有近代色彩Moderne Tendenz的仅有的创作。只他这种打破风景与裸体画的努力，便已经值得称赞，不过《灯光》里面的光线之来路不大分明，《影》里面的床的浓绿色有点刺眼，是使我觉得很可惜的。幸之君的《母与子》、《落霞》及其他都好，吴君的素描与静物都很可观，两君的才思，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周勤豪君有一大幅叫做《观画》，规模广大，描写精详，实在确是很平淡无味。陈晓江君的《灯下》，从花朵朵一样光明，我疑是陈列室的光线不好。此外倪贻德君的素描，沈在鏞君的肖像，柳圃青、张德荣诸君的努力都可称赏，篇幅无多，不复详记。

国画陈子颖君独力作数十种，大可惊叹。国画与洋画毕竟不同，一入国画陈列室，情绪便自不同了。我对于国画，一样是外行，而且我的眼福不佳，我们古代的名画，少有看过，所以陈君的画学的是哪一宗，我一句也说不出。不过我素来觉得我们中国人赏玩书画，太把宗派看重了，我还是由普遍的概念出发。

国画中我最以为没有道理的是飞禽走兽。大凡运动中的东西，在我们的眼膜上是很模糊的。所以即使没有保留Persistence的作用，而我们要把一个动的东西与它静止的时候一样看得清楚，那除非我们自己眼睛的开闭有比它更大或相等的速度；那时候它才是相对的静止。一秒中飞五百米的子弹，我们如果摄一个比较清楚的写真，那么，写真机器的露出时间总要比一秒

的千分之一还小。理论上如是，实验上也是如是，所以未来派的画家主张走马应当画二十只脚。我们的国画却不管这些，不问它怎样跑得快，只使它把脚伸直作一个象征，而一丝一发写得精详，与静止时更无毫厘之爽！这种似是而非的真，我以为是滑稽已极。陈君这回也有这类的作品，我虽然早经见惯，不以为奇，却也忍不住要说这几句话了。

写得过长，我将于此搁笔。这回的展览会我觉得成绩尚好，而且我很欢喜，因为我已经感到一种新进气锐的表现的要求已经在我们青年朋友们之中磅礴。关于我所觉得不满足的地方，我是指艺术界全体而说，决不是指的一人或一团体，请大家不要误会。至于我是一个外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所说的不必都对，不过是我一个人的见解，还请大家不吝指教。

六月十六日

（原载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8号）

纪念鲁迅

现在大家似乎更加沉痛地想起鲁迅来。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特别他在最后一个时期中的奋斗，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引起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着民族这样危急的时候，一个这样爱国的、革命的作家是值得我们纪念与学习的。

当然，我们对于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还没有见到完全正确的结论，但是，我想以下几点是可以确定的吧。

一、“五四”以前，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鲁迅是勇敢地迎接了这一光明的第一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众的怨哀，没有希望。

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他因为反抗北方军阀，而被迫回到南方，开始与中国的革命潮流接触，在失望与压迫中间毕竟认识了革命的真理，创造一种新的小品文，用了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始终站在最前线反对一切民族敌人，鼓励着中国人民前进。

三、在他痛骂托派汉奸的著作中，表现了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他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准。当着现在还有不少的政治家不明白托派汉奸对民族的危害，甚至还想利用他们的卑鄙手段来企图削弱共产党的时候，非共产党员的鲁迅，一个文学家，凭了他的爱国的良心，已经痛骂托派汉奸“违犯中国人做人的道德”。他在这里超过了中国的国界，

超过了无数的好作家，进入了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

总之，这几点已经可以证明鲁迅的划时代的功绩。

纵然，他的文学与写作都不通俗，不易为一般所了解，但是在鲁迅自己是选择了最好的形式，最巧妙地运用文学产生了一种生动的力量。在他的方式上完成了前进作家的任务。

今天，我们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完成与中国文学的进步，坚决前进。要拿起鲁迅的精神反对汉奸亲日派与托派汉奸，这伙丧尽天良的奸徒，今天已经从“不阻碍日本战全中国”变到了完全成为敌人的走狗来积极进攻中华民族。鲁迅永远宣布了他们的罪状，我们应该将它公布到全国的各个地方，各种民众中间去。

同时，我们的作家，应该拿起鲁迅的精神，创造出新的形式来适应今天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应该大大地大众化，使文学由少数人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的武器。

关于过去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问题，今天已经没有再提起的必要了。

自一九三三年以来，我们是完全一致了，我们成为战友了。我们的和好，可以说是团结统一的模范，同时，从此他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最英勇的战士。一九三三年底我与他在上海见面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什么隔阂了。

在民族危急的目前，我们中国的每个文化人应该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统一团结起来，担负起战时任务。每个中国人应该发扬鲁迅牺牲一切执行统一战线的伟大精神，用一切力量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我们民族的彻底解放。

作于一九三六年十月

（原载上海《鲁迅风》杂志特稿，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写 什 么

每个中国人处在一个严重的、但是伟大的时代。

一方面，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要灭亡中国，它凶狠地不顾中国人民的反抗，排挤着欧美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要把中国独占。在这个二十世纪最可耻的一种罪恶行为中，它利用着中国的一部分封建残余势力和一部分买办做它的工具，同时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也甘心做它的走狗，最忠实地帮助它向中国民众进攻。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已经日益感到一种沉重的苦痛，愤怒在积聚着，每个忠诚的黄帝的子孙要求着抗战，他们宁愿牺牲一切来回答日本强盗的不能容忍的侮辱与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最优秀的正在奔走呼号，要求团结御侮，因此有些正在受着汉奸亲日派的诬蔑、压迫与屠杀，全民族在苦闷着，在集结着力量为独立解放与民族自由而战斗。抗战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无疑义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该写什么呢？

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应该拿全部的力量来写这样一个时代，写出我们中国人的要求、痛苦与斗争。我们应该高呼抗战、宣传抗战，描写人民的抗战，描写一致抗战的英勇斗争，描写我们的民族英雄，写为国牺牲的烈士。

一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在觉醒中，在开始怒

吼，在开始革命的行动，谁能够把这里的现实生活的一角具体地写出来，他就创造了好的作品。

写吧！写出兽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怎样野蛮地压迫与侮辱我们的同胞，把它的种种可耻可恨的行为公布在全世界的工人农民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前面。

写吧！写出那些亲日派、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行为，把他们的卑污丑恶的心理暴露出来给大家知道。

写吧！写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怎样英勇地斗争，怎样为民族的利益而流最后一滴血，写我们全民族的伟大的抗敌运动，使每个战斗，通过我们的文字，给每个中国人以最大的兴奋。

写吧！用文字的方式号召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们应该是民族抗战中的勇敢的号兵、确实的情报部与严正的法官（不是要起诉爱国领袖，而是要裁判汉奸卖国贼），当然在文艺的形式上，用着我们的笔。

这样的文学叫什么名字，我想这不是重要的事情。“国防文学”已经很普通，它最明确地说明了今天的中国文学的要点。这个名字是可以采用的。不过关于这个名字，沫若的说法是不完全的。他说：“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的标帜。”我想正确地说，应该是：“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的标帜，又是作品原则的标帜。”因为作家关系是和作品原则不能分离的，作家关系是通过作品原则而实现的。抽象的作家关系是不存在的。

我们今天的作家中间还存在着一些“滴仙”，在殖民地奴隶化过程中的今天，我很难找出更深刻的讽刺。

时代规定了我们今天的作品原则的标帜。违反这个原则的作品，我想是不真实的，譬如写春花秋月吧。今天的春花是在

疮痍满目中，今天的秋月是在照着中国人民受日本强盗的残酷压迫。

我们今天需要“国防文学”。我们要写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要做民族抗战中的号兵、情报部与法官。不要忘记呀，我们应该帮助形成一支伟大的民族抗战的军队！

1937年五一深夜

（原载1937年5月11日《解放》第一卷三期）

祝沫若五十寿辰

沫若五十岁了，过去二十多年中间，他对于中国新文化的贡献是大的。付给中国的文化界很多优秀的创作与翻译，这些都是中国青年最爱护的东西，后起的作家们的最好的滋养料。十年以来他对于我中国历史的研究与考古，也有了积极的贡献。并且在他开始文艺活动的当时，他已经用民族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精神激荡了不少青年们的心；后来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抗战爆发，当时他从敌人的罗网里逃出来，回到祖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更加鼓舞了文化界团结抗战的热潮。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的文化战士，必须积极地参加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今日抗日的斗争；同时也说明了沫若是中国的进步的文化人中间的一个优秀的代表，他是一个勇敢民族的战士。今天我们的民族民主的斗争，已经猛烈的展开，我们的文化运动已经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开始燃烧了。但是这伟大的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严重的，我们的道路是很长远的，我们今后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我希望沫若今后更加倍奋斗，继续前进，希望他今后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民大众有更大与更多的贡献。同时我希望我们的文化界，今后更团结与进步，沫若能够起更大的推动的作用。沫若，全中国的文化战士们，我们更加靠拢些，在民族民主的战斗进行中更勇敢、更坚决的前进罢。

1941年11月于滹沱河边

（原载1941年12月3日《解放日报》）

在北岳区党的 文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边区的文艺工作，成绩还是很大的，并且进步很快。无论是音乐、戏剧、美术、文学都有了进步，但不平衡。文学部门中诗是最差的。抗战后，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对边区文艺运动的促进作用是很大的。

不过从前年以来，从晚会中看出，许多节目，脱离现实太远，而且感到节目太少。演“大鼻子”戏，曾有一个高潮时期。前些时，我因某种机会，曾查阅了边区的戏剧，据说较好的、最受欢迎的只有一个独幕剧。今天许多同志在发言中，已提到文艺工作脱离现实的问题。其他“化大众”的问题，我今天才听到。如果有这种思想存在，则作品的恐慌，不能克服。

文艺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其主要原因是脱离实际。许多文艺工作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初从外面来，有饱满的热情，有较熟练的技巧，故初期的成绩很好。但由于脱离现实，内容便不免抽象。以后，就没有产生很好的作品，一九四一年便发生了作品的恐慌。下面有许多富有实际经验的人，但技巧不好，也写不出好作品来。所以从四一年到现在，形成一个过渡时期。这次中央提出当前文艺工作的方针来，对克服这种现象是最好的办法。这是当前文艺工作者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认真地参加实际工作，文艺工作者的前途是光明的。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还是抽象的说法，法西斯也是政治。应该更具体些：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服务。这样可以避免许多误会，如“功利主义”之类的不妥当的看法。

我们边区的许多艺术工作中，歌咏比较大众化，其次是戏剧与美术，再次是文学，诗歌最差。《诗建设》出这许多期，同志们的努力很好，但成绩不大。报纸上登长诗，许多人因看不懂，感到可惜。我们应检讨自己。我感到我们有些同志写诗太随便，有些诗简直就是散文，不过分成长短行来写而已；有些诗句太欧化。

很多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很同意。不过有人提到文艺团体成为业余组织的问题，我认为专门的文艺团体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如果不脱离现实，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拿文艺作斗争的武器，这种文艺家是可以存在而且需要的。

（原载1943年5月21日《晋察冀报》）

《北方文化》创刊的话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北方曾经有过伟大的“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它放出了长远的光辉。

这是在一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今天，中国人民最凶狠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强盗被打败了。几十年来他用尽心机想灭亡中国，但是我们东北与华北的人民凭着赤手空拳抵抗了他，在艰难的八年抗战中，拖住了这野兽的后腿，给了他严重的打击，终于配合友军与盟军制伏了他，因而挽救了自己与我们的祖国。在这样险恶的生死斗争中，北方的人民显出了雄伟的力量。日本人、汉奸与亲日派等等给全国人民上了多年的课，人民也就学乖了一些。

因此，今天的历史条件，和二十多年前又不同了。北方更要担负起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大的责任。

这个刊物就是适应这样的时机而产生的。它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多年，长期在国内战争中过日子，结果日本法西斯强盗打了进来，不论国民经济或文化部门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到处是“疮痍满目”。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厌恶内战。今天和平的局面是已经实现了，人民在抚着伤痕向它欢呼，但是和平的敌人随时在企图破坏它来反对人民。因此全国人民都要努力巩固国内和平，而这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二，用民主改选我们国家是全国人民多年以来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国内和平的必要条件。全国人民迫切需要政治的民主、经济的民主以及文化的民主。这种民主的改造越是迅速、越是彻底，对国家、对人民就越是有利。因此我们愿为全国各方面的民主改革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为了使这个刊物为更多的读者服务，它将是综合性的半月刊。

它将登载时事评论与政治论文，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时事与政治问题。

它将发表一些专门的论述，供大家做专门研究的参考。

它将搜集人民在实现民主改革中的生动事实与斗争经验，介绍给读者。

它将供给读者以文学与艺术的滋养品。

这个刊物的各种著作，力求合乎科学真理，态度务求客观切实。

我们愿意与全国文化界携手并进，为人民、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共同奋斗。我们热诚欢迎各界读者的合作。

（原载《北方文化》1946年第1卷第1期）

中国青年要走自己的道路

几千年来，中国的反动的统治阶级总是把青年带上错误的道路。

封建时代，不论是科举也好，或其他的形式也好，反动的统治阶级把青年们的生命力消磨在咬文嚼字中间，这给了我们民族极大的损失。

二十世纪以来，反动统治者们在愚弄青年方面更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兼有了古今中外反动派的一切阴险与毒辣，从秦始皇到袁世凯，从路易十四到希特勒，封建的野蛮加上了法西斯的残暴。

反动派的一切努力首先在于欺骗青年。为了这个目的，一切文化教育工具被利用了，比如他们的学校、报纸、书籍、电影，无非是重复反动派的反动滥调的留声机。反动的统治集团垄断了一切文化机关，每天从各方面向青年们的眼睛与耳朵里灌注他们的麻醉药。他们蒙蔽青年们的耳目，封锁青年们，使青年们的脑子逐渐僵化。他们向青年们武断宣传，颠倒是非，凭空胡说。他们唯恐青年们与实际接触，最害怕青年们自由思想。他们之中更巧妙的往往装出一副“大公无私”的面孔，甚至挂起“民主”的招牌，以便更多的青年们落入他们的圈套。

反动派的另一种手段，对于他们更有利的一种方法，便是利诱。他们常常花很少一点钞票去收买青年中的少数败类，给他们做爪牙，以便他们获得比这一点钞票大过无数万倍的利益。

他们不一定只用钞票，凡是他们那种社会的商品，从物品直到官衔与美人，都被利用为香饵，以勾引一些最不成器的青年，这种青年往往被改变到毫无廉耻的地步，把青年人的纯洁精神丧失得干干净净。

在欺骗利诱都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时候，反动派便采用威胁的办法，刺刀、手枪、逮捕甚至暗杀。集中营把无数人的青春消磨在阴沉的黑暗里面。对于不甘屈服的人们，反动派采取消灭肉体的办法。反动派的法庭永远是谋害青年的凶手。

国民党反动派在二十年的血腥统治期间，对中国青年施行了这一切罪行。他们的残酷阴险，异民族的日本法西斯也不过如是。反动派对于青年的这一切罪行，无非为了维持他们少数人的专制，以便保护他们的官僚资本和他们的主人——帝国主义者们的利益。

中国法西斯匪徒的祖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曾经为了克虏伯、蒂森之流的利益，欺骗了德国和意大利的青年，使他们腐败，监禁或屠杀了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这些流氓们颠倒是非，把民族精华摧残干净，结果使德意两国人民在昏昧无知中遭受到无穷的灾祸。我们中国的反动派走了“德意路线”，对于中国青年也进行了这些罪行以后，几乎闹得亡国灭种，在人民英勇抗战与盟国积极援助中，还只落得了一个“惨胜”。

战争教育了人民，特别是青年，为民主的斗争现在是高涨起来了。中国的反动派为了维持他们少数人的专制，现在更加疯狂了。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在敌人进攻面前躲在峨眉山观战，无时不想妥协投降；现在敌人投降了，他们却趾高气扬地从峨眉山下来，到处去“接收”胜利的果实了。为了独占胜利的果实，他们对于自己多灾多难的同胞进行无情的屠杀了。而

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欺骗行为也花样翻新了，从来卖国残民的法西斯徒孙们导演出“爱国游行”来了，满车的点心代替了希特勒的啤酒，而美国造的刀枪代替了克虏伯式的大炮。

可是这一切并不表示反动派力量的强大，他们是在极大的恐惧中，他们脚底下的大地在开始震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老百姓在炮火中永远觉醒过来了。他们开始主张自己主人翁的权利了，开始执行这种权利了。专制独裁将要永远地成为过去的鬼话了。

中国青年目前的任务是勇敢地站在民主队伍的先头，坚决奋斗，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与人民的全部自由。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欺骗造谣，决不上他们的当，不受他们的利诱，不怕他们任何的威胁。

中国青年要走自己的道路——人民自由解放的大道。

1946年

（原载1946年《北方文化》第一卷第五期）

中国著名作家丁玲肖三成仿吾等

致电美文化界呼吁美国友人

制止援蒋法案

辛克莱、斯坦伯格、赛珍珠、休士、果兰德、斯莱德利、斯诺、爱金生、福尔曼并请转美国文化界、文学界、艺术界、新闻界人士：

我们中国解放城市——张家口作家向你们紧急呼吁：请你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起来制止美国反动分子帮助中国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

美国供给蒋介石军火，驻华美军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最近美国国务卿提出军事援蒋法案，如此继续援助坚持内战与独裁的蒋介石政府，只有更加大大的鼓励着中国好战分子，使其爆发全面和长期的内战。中国人民在打退了日本“奴隶主”之后，决不愿再作任何人的奴隶。美国反动分子有意要使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或保护国，中国人民绝不能忍受，一定要誓死反对。

为了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为了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为了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增进，我们要求你们说公道话，号召美国广大人民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一致起来反对军事援蒋法案，反对美国对蒋介石的一切军事援助，制止美国反动分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立即撤回驻华美军。

丁玲肖三成仿吾等

（原载1946年7月3日《解放日报》）

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 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

1959年9月29日，成仿吾同志在山东大学接待了在我国北京大学学习的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的来访。在访问中，彼德罗夫提出了关于创造社、1928年的文学论争，以及成仿吾同志个人生平等问题，成仿吾同志作了回答。谈话直接用汉语，进行了约两个小时。下面是当时整理的谈话要点。

彼德罗夫问：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但对左联前后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感到不够明确，尤其是关于创造社的一些情况，想请您帮助解答，可以吗？

成仿吾答：可以。

问：请您谈谈左联前夕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论争的情况？当时《创造月刊》上刊登了克兴、杜荃的攻击鲁迅的文章，态度很偏激，他们是怎样的人？

答：在当时中国文坛上，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的成员是后一辈。这二者曾有过一些矛盾，但创造社与鲁迅并不是对立的。创造社不满于鲁迅之处，主要是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纷纷离开广州，而鲁迅却继续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没有与我们同离广州。这一点，我们对他有意见。后来创造社的成员，例如李初梨写文章批评鲁迅，主要就针对了这一点。

但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却是偏激的，他们“左”的厉害，否定鲁迅，与鲁迅对立起来。钱杏邨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攻击鲁迅，当时我们是并不同意的。当然，钱杏邨是个好同志。太阳社对鲁迅的态度是错误的。太阳社有几个成员，当时就有不少缺点，如蒋光慈这个人，基本上是倾向革命的，但自高自大。我当时对鲁迅的批评也有些偏激。

太阳社攻击鲁迅，鲁迅进行了反击。但这时鲁迅竟把我们创造社的人同太阳社混在一起，在1931年时说我们都是“流氓”。实际上这时我们都已经入党，从事革命工作。当然，现在看来，1928年的文学论争，是一个误会。

1931年以后，鲁迅对我们好了起来。1933年，我们在湖北苏区打游击，与党中央断了联系，组织上派我到上海接关系。到上海后，见到鲁迅，都很高兴。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正是由于鲁迅的帮助，我们才找到了党中央。去年我在北京见到许广平同志，还曾向她表示感谢鲁迅当时给我的帮助。

关于在《创造月刊》上写文章攻击鲁迅的克兴、杜荃两个人的情况。克兴，当时也算是创造社成员，但实际上他只是个“同路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沦陷区当教授。1949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今年我去南京大学时，知道他在那里中文系当教授，但我没有见他。杜荃，这是一个假名，是谁的假名，我始终不知道。我只知道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如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都没有用过这个假名。我自己呢？也只用过“石厚生”这样一个假名。

问：为什么1928年您在自己的文章里正式提出了“革命文学”这个口号？您提出这个口号的基础是什么？

答：1927年大革命虽然在表面上看来遭到失败，但我们并

不认为革命真正失败了，我们感觉到革命又要掀起新的高潮，而文学必须跟上这个高潮，为革命服务。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后来，革命形势更加高涨，到左联时期，就进一步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

还有，这时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很有兴趣，如创造社的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都积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当时我们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方面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还应提出的，大革命之后，大批革命文艺干部集中到上海，这也促使了“革命文学”运动能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开展起来。

问：请你谈谈创造社后期的情况。王独清、叶灵凤、周全平等是否参加过创造社？他们怎样变坏的？

答：创造社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我和张资平（田汉是我们的朋友但未参加创造社）。后期主要成员有彭康、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等。前后两个时期相隔四、五年。

在创造社后期，由于大革命失败，郭沫若不能留在中国，本拟去苏联，但因国民党的阻碍未去成，而改去日本。我也不能留在中国，而在1928年离开中国去法国、德国住了四年。创造社后期留在上海的骨干只有彭康、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等人，他们坚持创造社的工作。1929年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时，李初梨、彭康都被逮捕，坐了七、八年牢。朱镜我因病回乡休养，没有被捕。冯乃超因有岳丈家庇护，躲了起来。

王独清是创造社前后期之间加入创造社的。他家里很有钱，

是个公子少爷，曾留学法国。这个人思想混乱，当时我们并不称他“王独清”，而称他“王独疯”。1928年至1929年间，陈独秀的托派组织，王独清也参加了，成为托派的宣传部长。创造社被查封时许多成员被捕，但王独清却很自由，国民党并不抓他。这个人1940年死去。

叶灵凤当时是画画的，现在还在香港画颓废派的图画。

周全平当时是创造社出版部的一个干部，当会计，结果却把创造社的钱偷偷拐跑了。上海解放后，抓住了他，送去劳动改造。

问：请谈谈您个人的经历，因为我在研究创造社情况时，很需要得到这方面的材料。

答：我个人的经历没有什么好谈的。

我是湖南新化人，1897年生于地主家庭。1910年十三岁便去日本读书，在日本读了一年中学，后因受“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学习。在日本与郭沫若是同学，我们爱好相同，都喜欢跑图书馆去读书，什么书都读，文学、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都看。

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与日本帝国主义缔结卖国的“二十一条”。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很大，决定不读书，而回祖国。我离开中国时，还是小孩，这次回国才见到上海殖民社会的黑暗景象，很觉气愤。这时我决定改行从事文学，与郭沫若等想办刊物，但当时书店老板看我们都是穷青年，不帮助我们。这也是当时我们与文学研究会有分歧的原因之一，因为文研会是有资本家、老板支持的。最后才得到泰东书局的合作，忍受他们老板的剥削，出版了《创造季刊》与创造社丛书。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我在国

内留不住了，便于1928年去法国住一年，因法国政府警察的干扰，又去德国住了三年。在法国巴黎，我负责编辑党的刊物《赤光》，这是周恩来同志原来在法国创办的。共同编辑出版这个刊物的还有章文晋（现任外交部司长，当时负责刻蜡纸，写得一手好字）、廖承志等同志。我们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同时也是自己秘密投寄。法国环境不好，到德国继续出版《赤光》，半月或一月出一次，四年中从未中断过。我离开德国后，他们仍继续搞。

1928年我在法国参加了党，以后去德国。当时我们与德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我们是他们的一个东方支部，得到了不少帮助。

我从1928年以后，就不搞文学活动，而从事政治活动。1931年前“九一八”的前几天，我回到上海。不久我去湖北苏区打游击，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1933年我们与党中央断了联系，组织派我到上海找中央，见到鲁迅，得到他的帮助，找到了党中央。我从上海又去瑞金，在中央党校教书，教政治。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我们在1935年到达陕北。我曾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1937年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年任华北联大校长。

1959年9月29日于济南

郭沫若《英诗译稿》序

这是日本的一个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教授山宫允选译的英美短诗集，经他送给沫若，又由沫若译成中文新诗的集子。山宫允在前言中曾经说明，他选的是英美文学中平易、有趣的、短的抒情诗，是早有定评的世界著名的部分诗人的佳作。把这样的短的抒情诗从英文译成中文，当然是困难的。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沫若是费了一番力气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同样的大诗人间的几次摔跤吧。

从外国文译成中文诗，沫若可说是最有磨练的，把歌德的巨著《浮士德》译成中文，当然是惊人的努力的成就，其他如歌德、海涅的短诗，英国拜伦、雪莱等人的诗，以至《鲁拜集》等译品，该给了他多丰富的经验啊！把中国古诗变成新诗，如果没有译诗的锻炼，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

我们从这本英美的抒情诗选的译诗可以看出，他的手法是多么高超；我想如果原作者本人能看到，大概也应该惊叹与佩服的。

沫若在诗的创作方面是经历了极其曲折而艰险的道路的。从青年时代的奔放不拘的自由体转到严格的各种律诗以至各种词曲，真是丰富多采。

在他将近晚年的时候回到翻译这种短的抒情诗，虽然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他的这种经历中得出某些可能的推理吗？

我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提到过他关于诗的意见或者感受之类的东西。但是，从他最后竟翻译了这样的抒情诗，是否至少他主张，不管你叙景或叙事，总要重视内在的节奏，并且有脚韵。

五四以来，我们的诗也经过了很不平凡的道路，从真正的“白话诗”转到了五、七言以至词曲，真是百花齐放。而大放异彩的要数我们那些一起爬雪山草地的老同志（当然他们有那末深厚的情感要表现出来），居然大写起五、七绝与长诗来，但不免有些“诘屈聱牙”，真是可惜。

从沫若所走过的诗的道路，特别在这本诗集中表现出来的技巧与感情中，我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吸取某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1980年4月

人生的开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年时代，尽管各人的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感受也不一样，但毕竟是自己人生的开始，总会引起一些亲切的回忆。

此刻，我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想起了别人的青年时代。

我稍稍懂得一点人世间的事，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那时，腐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志士仁人纷纷行动起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起义、刺杀、自杀，一时成风。给我感受最深的有湘赣边境的萍乡、醴陵、浏阳起义，有潮州、惠州、钦州、廉州起义，还有中越边界的镇南关起义。也是在这段时期，还发生了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满清政府的安徽巡抚恩铭，秋瑾在浙江刺杀绍兴知府贵福的事件。在我们家乡湖南新化更出现了谭人凤、陈天华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

谭人凤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高涨的时候，开始从事反清革命，曾在新化县创办革命机关福田小学，召集江湖党友，活动在湘西一带。他有两个儿子，与我同辈，我们常有些接触。陈天华那时在日本留学，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又是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所写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品，在我们家乡传阅一时，起过很大的鼓动作用。190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布了“取缔清韩留日

学生规则”，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对，决定罢学回国，不在日本求学受辱。陈天华在激愤之下，蹈海自杀，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坚持斗争。他临死前还写了一篇《绝命辞》，谆谆告诫留日学生必须奋起斗争。消息传到湖南长沙、新化等地，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之后，我的大哥成勳吾他们把陈天华的尸体从日本运回长沙，埋葬在岳麓山下，群众的激烈情绪更是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我就是这样的环境中走向人生的道路。虽然这些激昂慷慨的行动，并没有给我多么高深的革命理论和正确的革命方法，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不久，我抱着富国强兵的思想，和我的大哥一道，挂帆东渡，到了日本，那时我才十三、四岁。

到日本以后，我进了名古屋第五中学，与日本孩子在一起学习。虽然我们的学习成绩不错，可是国家贫穷落后，受人轻视。我记得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同班有一个日本男同学常常在我面前挖苦、讥笑我们中国人。有一天，他指着我说：“哈哈，你们中国人，男人梳小辫，女人裹小脚。”我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就警告他说：“你再说，我对你不起！”他不听，又嚷嚷开了，我上去打了他一记耳光。从此以后，他见到我就躲开。在第五中学读了不到一年，我对这个学校很反感，就去东京。经过补习，考上了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是一个大学预备学校，在这里遇见了郭沫若，他比我大三岁，学级却晚我一年，他学医，我学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外语课份量很重，而且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加上我从小对旧文艺书籍有些涉猎，二年级时又与郭沫若来往密切，于是慢慢地在我心中滋长了一种对文学的兴趣。尽管如此，富国强兵的思想还是把对文

学的爱好压了下去。离开六高，我选中了东京帝国大学的造兵科，和大炮、鱼雷打上了交道。

过了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我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掀起了一次很剧烈的风潮。许多留学生抱着满腔热血，回国请愿。我们也在一个姓阮的带领下，到了上海。我们在小客栈里住了几天，上海的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到哪里去请愿？到哪里去说理？那个姓阮的自己当官去了，把我们几个穷学生丢在一边。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使我看清了反动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富什么国？强什么兵？我感到失望、苦闷。正在这时，一个姓陈的同乡要到日本去治病，让我陪他当翻译，我于是又到了日本的福冈，与郭沫若一家人住在一起。他那时也很苦恼，感到医学救不了中国，也想以文学来唤起民众的觉悟。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是“二十一条”使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以后的事，只要提一提就可以了。过了一、两年，郭沫若、郁达夫和我组织了“创造社”，真正开始了文学活动。后来到了广州，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任教。接着在法国参加了共产党，在德国编辑《赤光报》。然后到了鄂豫皖，参加了长征，又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大到中国人民大学。我之所以这样简单地叙述，因为这段经历已经不是青年时代的经历了。但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却结识了不少有为的青年，每每想起他们，我总有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我以为，他们才是青年人的榜样，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这些青年人中，我首先想到了杨展、李在田和倪淑英。杨展是杨开慧烈士的侄女，一九三〇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杀

害，当时年仅十岁的杨展听说姑姑陈尸刑场，哭着要把姑姑背回来。杨展幼年时同杨开慧一起生活过，姑母的壮烈牺牲，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杨展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在党组织的教育影响下，团结进步同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杨展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周南女中的党支部书记。

为了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培养大批抗战干部，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调我担任校长。我们通过各地的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全国公开发布招生启事。入学的青年大都是先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一批一批地介绍到延安来。一时西安至延安六百多里的大路上，穿着各式服装，操着不同口音的青年，络绎不绝。一九三八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闹反共磨擦，阻拦革命青年到延安来学习，甚至用扣行李、扣路费、逮捕等卑劣的手法截留到陕公来的青年。另外，这时延安人口剧增，粮食供应也很紧张。可是前方还是不断向延安要干部。于是中央毅然决定要进一步发展，陕公到五百里外的关中分区去办分校，那里接近陇海铁路和西安，青年学生进入边区比较方便，同时关中是个粮仓，比较富庶，可以解决粮食问题。陕公分校校部设在栒邑县看花宫，这里有许多名胜古迹，传说是杨贵妃看花的地方。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陕公分校正式开学。

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杨展到达陕北公学栒邑分校。不久陕公总校和分校合并，我也从延安到看花宫主持工作。杨展在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刻苦地学政治、学军事，参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和大生产运动。一九三九年春夏，国难已经逼到了

眉睫，日寇企图西渡黄河，国民党顽固派也增兵关中，党中央号召延安的青年学生“到敌人后方去”，决定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挺进敌后，坚持华北抗战，开展国防教育。杨展这时已在分校结业，我曾想让她到延安马列学院继续学习，但她坚决要上前线，去参加艰苦的斗争。这时毛泽东同志带信给我，让我把杨展带到延安。记得是七月十一日晚上，党中央为我们举行欢送晚会。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差不多都来了，毛泽东同志也来了。他坐下后，问我：“杨展来了没有？”我们把杨展引进来，毛泽东同志叫她坐在自己身边，拉着她的手，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家乡的情况怎样？谈了许久。晚会开始，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一起看节目。但是周恩来同志还没有到。忽然，有一个警卫员匆匆忙忙地跑进会场报告说：“周副主席的马滑下沟里，周副主席的右臂摔伤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同志急着去看恩来同志，晚会草草结束了。第二天拂晓，我们从延安出发，挺进敌后。

我们的行军序列是，罗瑞卿同志带抗大两个梯队先行，华北联大独立旅作为第三梯队跟进。我们先渡黄河，接着翻越吕梁山、云中山，突破敌人一层层封锁线，最后到达晋察冀。杨展先后在联大政治部组织科、教育科和校部党委工作。她对党忠诚，工作认真，生活朴素，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当选为模范妇女，一九四一年被评为学习模范。

一九四一年八月，日寇集中十三万兵力，进攻我晋察冀边区北线，企图把我军主力围歼于长城两侧。九月，联大校部向平山北部、灵寿西部腹地转移。当我们行至平山北部的崇山峻岭滚龙沟区的大岭沟时，突然遭到日寇的包围攻击。于是，我

们立即分散，分路突围。在紧急突围中，山高路陡，杨展不幸失足坠崖，头部撞在岩石上，血流如注，同志们赶来抢救，她微微睁开眼睛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去照顾别的同志吧！”这位刚满二十二岁的青年，就这样牺牲在晋察冀的山岗上。

一九七七年春，我到了长沙东乡板仓，在一间杨展住过的房间里，挂着她入党那年的照片，两道充满英气的微微向上挑起的眉毛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又展现在我的眼前。

使我不能忘怀的还有李在田。

李在田（李学礼）是广东澄海人，在中学读书时，就喜爱文学，同情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并参与了一些革命工作，写诗反对贪官污吏鱼肉人民：

昭彰恶迹已难忘，
团队横行遍一方。
暗运米粮辋敌寇，
尽收地税入私囊。

一九四〇年初，李在田曾在南侨中学的革命刊物《文化堡垒》第一期上发表抗日诗作《望》，借怀念故乡之情，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他写道：

……

也许你是炮火洗荡了的战场，
也许敌机正不断地在你头上飞翔，
也许今日铁蹄踏过汕樟公路，
比破坏了的昔日更要荒凉。

……

一样的云山烟景，骚意诗肠，
可是无情的战争啊！
再不许我和故乡相见。
残酷的敌人使我异地流亡，
我是不是依旧行吟歌哭？
是不是只有感慨悲伤？
看！烽烟已弥漫潮汕，
抗战的旗帜正在飘扬。
伟大，壮烈，是谁的血在飞溅？
是谁的吼声唤出了震天的音响？
懦怯变成了坚强，
是谁啊，从象牙之塔跑上了火线！
别再犹豫吧！
不要退缩——为了故乡！
为了可爱的故乡，
起来啊！看我们来一个搏斗的吼喊！

一九四三年，李在田毅然离开了家庭和年青的妻子，取道广西到重庆，由于杜国庠同志的介绍找到郭沫若同志，一度在郭老那里工作。抗战后期，郭老把他介绍到延安来找我，记得信中称他是“诗人李在田同志”。他确实是一位热情的诗人，心中充满了对革命的热忱和对延安的向往。从西安出来后，一路走一路问：边区到了吗？边区到了吗？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我们的哨兵对他说，从这里起就是边区的土地了。李在田伏下身来，吻着脚下的土地，说：“可爱的土地哟！全中国只剩下这一片干净的地方了！”后来，他坚决要求参军，要到东江纵队去。我们写了介绍信并派了两个通讯员，送他到烟台去。他

临别时，感情依依。那时途中常有国民党残匪骚扰，这位年青的诗人一去杳无音讯。解放后，郭老想找他，我们也想找他，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我想起这些可爱的青年时，他的爱国之心，他的诗句总常常使我流下眼泪。

我常想，在这些青年人身上是什么东西叫人如此怀念，使人感动不已呢？是他们的爱国热忱，是他们的革命意志，还有，是他们团结友爱的精神。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倪淑英。

倪淑英是华北联大的妇女干部。一九四三年九月，敌人集中四万兵力对我北岳中心区发动毁灭性的秋季大“扫荡”。这时倪淑英在军区组织部工作，因怀孕在身，隐蔽在神仙山中炭灰铺村后一个小村庄的山沟里。敌人知道这一带隐蔽着我军后方机关的一些干部，在天不亮时就闯进这条山沟“清剿”，故意在队伍前面赶了一群羊伪装起来。倪淑英发现敌人时，敌人已经逼近。她赶紧烧文件，叫勤务员快跑，勤务员不走，帮她一起烧文件。敌人冲上来，乱枪齐放，倪淑英用自己有孕的身体伏在勤务员身上，自己中弹牺牲。勤务员受伤躺在倪淑英的身子底下，敌人以为他也死了，躲过了敌人。这样，一位年青的母亲和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为了我们可爱的中国，长眠在恒山脚下。

一九三八年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一次讲演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他是把希望寄托于青年的。因为当时在延安、在陕公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努力学习，埋头苦干。几十年了，现在我的耳边仿佛还响着他

的歌声：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地学习！
努力，努力，
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昂头看那边，
胜利就在前面！

回忆是为了纪念，在我，更是为了前进！

我愿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来自勉。

也愿向今天的青年说：你们要珍惜自己的青年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振兴我们中国的重任担在双肩，以坚实、刚毅的步伐踏上人生的道路。

1981年于北京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们是怎样走上人生之路的》）

《张闻天早年译剧选》序

选编张闻天同志早年译剧选的几个同志带了剧本来，要我写序。对这些译剧，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进而到直接参加社会革命、武装斗争，这段曲折艰难的前进道路，我是同闻天同志一道走过来的。

我与闻天同志是神交在先，谋面在后。他在美国勤工俭学，我们书信往还，但没有见过面。那时他对旧中国、旧社会非常不满，认为非改造不行。他从封建罗网中冲了出来。但究竟怎样前进，怎样救中国，他还没有找到答案，虽然这时他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曾经作过介绍。美国的社会制度，美国的生活方式，使他非常失望。他亲身体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没有出路，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是办法。这样，他转而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4年初，他从旧金山回到上海，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我们的看法相同。他也是热心革命文学的一个。

闻天同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勤工俭学，生活是很贫苦的。他一面在图书馆自修，一面到报馆译编稿子，后来还在饭馆里做临时工。这些剧本就是在那时翻译的。五四时期的文学青年很多都不是学文的，郭沫若学医，我学的是造枪炮，张闻天是学河海工程的。但因为中文有基础，又掌握了外语，所以能创作能翻译，运用自如。大约就是在译了这几个剧本之后，他又创作了《青春的梦》寄给我。我给他提了意见。第二年回

上海以后他大改了一遍发表。他的剧本反映五四青年愤恨激扬的情绪，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比安特列夫、倍那文德当然要积极得多，但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要真正推翻旧社会，还得靠马列主义，靠共产党，靠武装斗争。

闻天同志入党以后不久就到莫斯科学习去了。1928年我去巴黎，途经莫斯科，特地去看望他和他的弟弟健尔。健尔是个热情天真的青年，在学习搞电影，可惜早逝了。

与闻天同志再一次见面，是在“九一八”事变前个把月。我从德国回到上海。他当时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他很关心我，跟我说，上海很紧张，认识你的人多，你还是到苏区去吧。他于是派我同徐以新等同志一道到鄂豫皖。我们到达鄂豫皖的那天刚好是苏联十月革命节。

1933年10月，我只身离开鄂豫皖到上海找临时中央。那时中央早已迁往江西。最后还是通过鲁迅找到党的关系，终于在1934年1月11日赶到瑞金。这时六届五中全会刚开两天，我列席了会议。在会议的第四天，我作了5分钟的发言，简要汇报张国焘带了主力部队与全部电台西撤，把根据地撇下的情况，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前往鄂豫皖。不想话刚说完，就有人站起来指斥我是右倾机会主义，空气很坏。这时洛甫（即张闻天）在主席台上摆摆手说，鄂豫皖的问题回头单独谈。要不是张闻天同志“包庇”，我这次难免不挨斗争。事后单独组织了会议听我详细汇报，不久就决定派程子华同志去鄂豫皖指挥作战。

由于恶性疟疾发作，我一连病了8个月。长征开始时，我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征途中闻天同志见到我，让我骑了他的牲口。到陕北以后，每次我到中央去，都在他家落座。我们是老朋友。洛甫的那个窑洞给我留下许多亲切的回忆。

戏剧出版社重印闻天同志早年的译剧选集，作为对已故领导人的纪念，供后人参考，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从安特列夫的阴冷，倍那文德的热烈，从他们对问题的思索，对黑暗的揭露，可以认识二十世纪初俄国、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启迪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可批判吸收。但这些译作，毕竟是在追求光明途程中的产物。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搬用那时的认识与情调来对待今天的现实生活。还应看到，闻天同志以他的著译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那还不过是他的革命生涯的初阶。更加值得学习与发扬的还是在后面，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确立共产主义理想，是在为了改造中国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是在为了达到理论与实际结合、主观与客观统一，从必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所作的毕生追求。

（原载1982年2月1日《人民日报》）

怀念郭沫若

今天，大家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做为他的老朋友，我的心是很不平静的。几年来，我心中积蓄了对沫若的深切怀念。六十多年的相处和友谊，好象电影的镜头，一幅幅在我脑中闪现，往事历历，恍如昨日。

我同沫若相识在一九一五年夏天。那时，我只有十七八岁，他也只有二十岁出头。我们都在日本冈山一所大学预科学校里学习，准备升入大学，我们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他学医，我学工。两人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我们一见面就很要好。在冈山，我们住在一起，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我还记得两人共同拍浪击水，在海里一次游出十几里之远，然后再游回海边。他常说大海能唤起他的激情，一看见海，什么忧郁和烦闷都没有了。我们四个人住一小套房子，我的房间稍大，大家常聚在我那儿，天南海北地谈论。有一次，我们作对句玩，每人对一句七言的顺口溜，轮流说。记得我先说“两千米达三千步”（指散步的距离），沫若立刻指着大家说“一个房间四个人”。

以后，我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沫若入了福岡的九州帝国大学学医。五四运动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我们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沫若因此不想学医，我也不想再学原来的学科。一九二一年四月，我们相约

一块回国从事文学活动。记得那次我们又共同欣赏了蓝色的大海和飞翔着的白鸥，沫若兴奋地说，大海在演奏生命的颂歌。

六十多年来，我们一块儿享受了许多战斗的欢乐，也一块儿经受了許多艰难困苦的考验。我们有着无数次相聚和分别。此刻，我脑中浮现出在海边多次接送沫若的场面：在黄浦江畔，我接他从日本回国，又送他到日本去；在珠海之滨，我接他到广州，然后共同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大革命失败后，沫若成了被敌人通缉的“要犯”，他从香港秘密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周恩来同志很关心他，决定让他全家到苏联去。船票也订了。沫若突然得了斑疹伤寒，几乎死去。就这样误了去苏联的行期，最后恩来同志不得不安排他转往日本。他走那天夜里，敌人正计划捉他，我们两人由内山先生引着，在一个日本人开的旅馆里躲了一夜。次日晨，沫若上船，我却不能公开送行，只能暗中看着他走。这是一次不能送行的离别，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抗日战争开始，沫若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回到了祖国，以后他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我在延安接到他从重庆带来的衬衣、毛衣和钢笔。那支派克笔我一直随身带着，它跟我在敌人后方辗转了好多年。

开国之后，沫若喜欢到全国各地走走。他赞美祖国的锦绣河山，也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及时向中央反映。一次，他同于立群同志到杭州，我同老伴儿张琳也在杭州，大家在这儿不期而遇，心里分外高兴。事情也巧，我同沫若第一次游西湖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那时，我俩带着馒头和豆腐干，象刘姥姥进大观园，走了许多冤枉路。事隔四十年，想不到又是故人游故地。触景生情，我们自然无限感慨地回忆起了青年时代那次

“壮游”。这次游西湖，是乘的汽船，同船的还有画家傅抱石夫妇、潘天寿夫妇。汽船后边带一只小小的拖船。有这么一种奇妙的现象很有趣：湖水被汽船激起了浪花，闪闪发光的银色鱼儿先是随浪高高地跳起，然后又一条条地落到小拖船里；到了船里，它们还不停地跳着、舞着，上下扑腾着。大家都看得笑了起来。午饭时，大家饱餐了西湖鲜美的活鱼。这些鱼，给我们的相聚更增添了欢乐的气氛，是我们畅游西湖的一个小插曲。

以后，“文化大革命”——革文化的“大革命”来了。我们天各一方地受冲击、挨批斗，彼此都很苦。那时大家说话都变得很谨慎，怕有人杀回马枪，唯独在知己的老朋友面前，可以思想解放，无话不谈。记得我同沫若谈到现状，都感到苦闷，但谈到将来又都充满信心。我们坚信在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停顿，坚信“四人帮”的统治不会长久。

我写了一本书《长征回忆录》，送他时，他立刻翻着读了起来，对我说：“仿吾，你什么时候不声不响写了这么本好书？”以后，于立群同志和秘书都告诉我，沫若最后离开家到医院时还说：“带着仿吾那本书。”沫若逝世时，这本书还压在他的枕头下。沫若、沫若，你对我的友谊真象海一样的深呵！

沫若离开我们四年多了。四年多来，我们的事业有很大发展。沫若如有灵，一定会非常高兴。

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一定能实现！

（原载1982年11月21日《文汇报》）

二、小 说

一个流浪人的新年

一

基督圣诞节也过了。那小的街大的街，一天一天的都活泼起来了。我们若借用他几句现存的话，那么这繁华的都市，在没入于一个梦境，一天深似一天的，那梦境的氛氲，一天浓似一天的。

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指给我们看那一大堆模模糊糊的建筑，雾一般的青烟，和着蒙蒙的水蒸气，好象一重柔软的薄幕一般，把她轻轻的遮住了；有时又好象天女拖着的霓裳，受着舞后的余波，还在颤动不已。那些市街，好象晓雾包中的一朵鲜花，时时反射着微弱的光芒，其实她正在贪她的酣梦。

从那苍白色的低空里，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庄严的交响乐！一切的东西，好象受了大自然的命令，都在参加她的交响乐。在这伟大的鼓动中，他们一个一个的，倒好象在守着他们的沉默。在这慈母的谐音中，小儿在贪他的酣梦。

松树和几种常青树以外，随便到那里，都只看见一样的空枝，间或有两三片枯叶，都是战战兢兢的在那里摇摆，只等他们最后的宣告。他——一个多年的流浪人——每天踏着噉噉噉的枯叶，跑到街上干完了他的事，又噉噉噉的跑回他住的地方，也知道这一年又剩不到几天了。不过他的感想就尽于这一句话。因为他过的是那么样单调的生活，他知道冬天去了，又是春天；夏天去了，少不得又是秋天。大自然在他眼里，也

好象不过在奉行故事，同他一般。过年这事情，对于他的生活的影响，就是乘着年假，休息几天，有时候这几天年假，反使他无聊的不堪。他随便到那里，都只一个人。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国，但是他老早就不想他们的事了。他想：我想他们的事，就有什么好处？只落得一身的烦恼罢。他也不知道到这地方几年了。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报，他定会把年月都弄不清楚。他的脸总带着一种惨黄色；他的眼睛，好象被什么东西压住，开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称他长瘦的脸；并且时常注视他的前面，好象在默想什么似的。

二

这一天已经是二十八了。他望着市内行去，走到了坐电车的地方，他就跳上一条电车坐下。那两边的街都已经装饰好了。他走马观灯的一般，看了一些红红绿绿的东西，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闭着眼睛，让电车拖着他去。

他坐到一个地方，跳下车来，望着人道里面一挤，梦一般的，任他的两只脚拉着他跑。

市内的空气，浓得差不多连呼吸都很困难。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装饰，和那陈列台上的物品，对他好象没有什么引力的一般。这不是因为他的感受力不灵敏。他觉得去年的冬天，好象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他们也曾把这些市街，红红绿绿的装饰了一遍，没有几天，又把它都撤了。他到如今还不知道为的什么缘故。所以这些装饰，都好象前几天见过的东西；也唤不起他的好奇心，也没有什么奇怪。

他不解他们为的过一个年，何以就忙到这般田地。那街上走路的人，睁着两只小眼，都好象到那里去抢饭吃的饥民一

样。无数的汽车，野兽一般的，狂号怒吼，跑去跑来，光景惊心得很。电车的声响，管理汽车的怪声，脚踏车的铃子，和人的呼号，喧扰得更不可耐。但是他只低着头往前走，倒象聋子一般；好象这些声音，在地球上互相消杀，他反听不见什么声音。

他想过年这个事情，不过说地球围着太阳跑了一个圈子。但是地球的轨道，是一个椭圆。谁知道她最初是从那里跑起的？或者我们过年的时候，地球已经跑过了她那出发点几十天；或竟还差几十天，也谁知道？若说是人类想革新他们的生活，任意把这一天作一个起点，他不信人类这样的生活，还可以革新。他想这样的革新手段，恰足增他们的疲倦，因为连这手段，都早变成了一个公式。

三

银白色的雪花，纷纷飞落，不到一个早晨的功夫，早把一个暗淡的世界，用一层流动的光明包好了。他想起他一个朋友所作的诗，有这么一首，他念了又念：

“一个白银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象要化为了光明流去，

啊，Open Secret哟！”

那街上的雪，也慢慢地增高起来。那天已经是三十一号，街上的人更多，一个个的身上都添了几片雪，象花样一般。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气，在那冷空气中，半晌才能消灭。

那晚他坐着电车回家里去，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气蒙蔽了。外面通是漆黑的，只见无数的电灯，好象一群的小星一样，一个个在放它们球状的辐射线。它们的光波，一伏一起，好象可以指点得出。

他同住的几个朋友，——都与他大同小异的——约他那一晚大家守岁。他们预备了几瓶酒，几碟菜，围着几个小火盆，一面闲谈，一面嗑酒。也有述这几天的见闻的；也有追忆过去的事情了的事情的，但他们谈话的中心，总离不了过年的事。有的说他去年怎么样过年，有的说他某年过年的时候的趣事，但是他们这些话，又每不期然而然的，归到他们本国的追想。他们小时候在本国过年如何快活；除夕他们在家里如何欢喜；过了年后，一直到元宵，那些小孩们如何玩耍；以及种种琐碎的事。每年到那一天晚上，他们说了又说的事，都好象有把他们全体的注意，集中于那说话的人的一举一动的引力。但是这些追忆愈进去的深，他们与现实的对照愈加深刻，愈不可耐。满屋的追忆的情调中，和他们回想的眼光里，都有说不出的凄凉景况，他们自己都能知道。就有劝人喝酒的人，有时插些笑话，来岔转他们的话头的。但是，这种种的努力与手段，不唯不能把这悲哀的情调稀释起来；这些手段用得太过强的时候，反增他们寂寞的痛苦，与因为无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灭的悲哀。

他们几只眼睛，眼光光地所守着的那座小钟，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点钟了。他们话也不说了。他们都眼光光地注视那个长针，看它一步一步的移。听他一声一声的响，好象期待什么东西似的。

那钟到十二点钟只差三分了，两分了，一分了。隔壁的一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好象十分高兴的一般，在那里响。那屋子里的空气紧张到十二分了。谁也不敢作一声。他们听见屋檐边的水滴和他们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些好象都在含着这两座钟的嘀嗒嘀嗒的音响。到头来，隔壁那座大钟一下一下的打起来了。他们好象听什么天启一般，把耳朵竖起，把头偏向那一

边，好象怕听漏了什么似的。

那钟一下一下地打完了，仍依它的老调子，嘀嗒嘀嗒的响起来了。他们慢慢地把头偏过来，把他们的耳朵解放了。但是他们的眼睛，有的好象在说：“去了！去了！”有的好象在说：“来了！来了！”

四

初一倒是好天气。他清早起来，吃了照例的早饭后，独自一个人，望着那用白银盖好了的平原行去。他前回过年也是那么样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地方去拜年。他想起前回的正月初一，他如何也在那里散步；他如何看见几个小孩在放风筝儿；如何看见远远的那条小路上，七八个人的葬列，慢慢的前往；如何那些人只埋着头，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声息都无，那边的小孩们却在高呼狂笑。他看见几个小孩儿，又在那里放风筝。他们在雪里面乱跑。闲着手的，有的在丢雪球儿玩，有的把雪拿来，堆成了一匹胖狗。这些小艺术家在批评他们的创造物哩！

那些街上，都没有几个人行走。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倒象暴雨狂风过去了后的光景。他看见了一行行的街树，空着在那里站班。他从前在那人的河流里面漂流的时候，好象没有看见过她们一般。对着他来的电车，远远的早就听见。那些野兽一般的汽车，去的远了，还能听见它们在那里狂哮，那街上是这般沉静。

前几天那么忙碌，这一天那么清闲，他真不解一些人为的什么那么样忙，现在又都到那里去了。许多的商店，早把它们的铺门关起来了，间或吃醉了的人，东倒西歪的，在那里一个人说什么。他想：或者他们关着门在家里喝酒去了罢，但是他不信这就是他们前几天那么忙碌的目的。

到了夜间，那街上更加清静起来了。远远的看去，只见一路上的街灯，在闪着他们微弱的光芒，照着那些冷清的装饰。几个走路的人，好象都知道暴风雨已经去得远了，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一般，一步步的在那里走，有时浴着灯光，有时没在树荫里。

五

这一天是初三，那些街上，比前两天活泼得多了。在街上行礼的人，差不多也没有了。只是那些装饰，饱受着冬天的冷风，还在那里一阵阵的颤动。

他跑到一个公园里，那里的人，倒比平素还多。许多的小孩子，前前后后的，跟着他们同来的大人，你呼我应的，在那里有说有笑。他们都穿着最新的时装。一个个红着脸，跑去跑来，倒象是一个小孩子的展览会，十分热闹。

那些树都是空着枝，在那青色的湿的空气中，时常把头儿摇摆几下，好象是在说：阳春还没有归来。一池黄绿色的水，在吹起它的涟漪。几个金鱼，在争那些小孩子给他们的东西，时常耀着他们赤的鳞甲，用他们的尾在水上划几个弧状的波，又慢慢地沉下水去，急得那些小孩子赶快又丢东西。

那全市街渐渐地由懒惰醒来了。这天已经是初八，他的事情又忙起来了。他仍和从前一个样，清早坐电车到市内去，晚上又从那电车的终点，一步一步的走回他住的地方；休息了一晚又到市内去，晚上又跑回来。一天去了，两天去了，一个月去了，两个月去了，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几多时，那只有上帝知道。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改作

（原载1922年3月《创造季刊》1卷1期）

深林的月夜

中印度摩揭陀王宫的宴饮，正在兴高采烈。远远地只见灯烛辉煌，照耀犹如白日。万岁的高呼，佩剑相击的声音，以及击节声，欢笑声，传彻了王宫内外。战胜的欢喜，差不多把全国的人民，弄的如狂似醉。王的善战的将军与忠勇的臣下，尤其是狂喜。壮丽的王宫里头，好象是一夜春来，百花齐放的光景。

这一夜，国王也全副披挂，高升宝座，受了许多臣下的敬礼。有的俯伏王前，默祷圣寿；有的吻着王履，感极泪流。礼毕后国王赐群臣酒，群臣也多捧觞上寿。直到兕觥交错，欢喜愈浓，国王才觉得有点疲倦，独自跑出来了。

玲珑的月儿，已经高挂天际。夜色已深，只远远微闻不断的歌笑。国王伫立殿前，吸着新鲜的空气，默赏着沉沉的夜景。不尽的河山，正在月光里面动摇着。

“好壮丽的河山！”国王不由得感叹起来，同时一种感激的情绪胀痛了他的雄伟的胸部。

“我感激……我真感激……哦，我这可爱的……”

国王的双颊，不住地有热腾腾的泪珠流着。他这才知道他的河山是这般壮丽。他觉得好象新得了这满眼的河山——这般壮丽的珍宝。他愉快，他欢喜。可是他渐渐地又感到悲哀。他想这壮丽的河山，原是他祖先的，但是他的祖先，如今往那里去了？他想这原是他父亲的，但是他的父亲，如今往那里去

了？他渐渐地害怕起来。

他觉得好象有个什么东西，隐隐在他的身后，伸手要夺他这新得的壮丽的珍宝，要夺他的生命。他急回顾，可是又没有看见什么。这东西只是在他的身后，好象乘机要攻击他。他害怕，他狂跳。他好象看见了一个黑的东西，把他吓得毛发直竖；他往外跑，可是这黑东西总是在他的背后。他快，这黑东西也快；他慢，这黑东西也慢。他急了。梦一般的，他走出了宫门，跌倒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跑。渐渐地这东西的手，好象接近了他的耳朵，他越拼命地往前飞奔。

最后他跌了一大跤，才发现他自己在一个森林里面。他前面跌坐着一个穿白袍的利西。他不禁高呼：“救命！利西！哦！救命！”

静坐着的利西徐徐开了他的双眼，但他却只反问国王说：

“国王！在你身后的是什么，你知道么？”

他急回头看，却又不见有什么。他不知如何答利西的话。他只是叩头求救。只听见这利西又说：

“国王！你真不知道么？那么，我给你看罢。”

这利西从身旁的一棵树下，拿了一个东西向着他一丢，几乎打着了他的前额。他也没有看得清楚，只是吓得不由得往旁一跳。他的头碰在一棵树上，他的身子往下一沉，就躺着不动了。

他的眼睛帘垂下来了。他的口唇也合拢来了。银白的月光把他们都封住了。树枝的影儿倒映了一些在他的身上，把他全身画成了无数的小部分，可是一点也不移动。森林好象沉醉了似的。只有明月的光波，在林间波涌着。

少停，利西向后面低声说：

“大弟子！这里死了一个人。拿点白布来把他盖好罢。”

树后转出了一个同样穿白袍的弟子来，静穆地用白布把国王盖了。

这弟子转出林后，复带了一些穿白袍的出来，口里都唱着：

摩揭陀的国王，
眠在这里！
盖着半匹白布，
——纯洁的白布。
天地做他的棺椁，
宇宙做他的坟墓。
永不再醒，
空是春闺梦里的人。

这歌声响彻了森林内外，木叶也共鸣了一阵飒飒的清响。可是转瞬之间，这森林又恢复了他固有的沉静，依旧浴着玲珑的月光，从新贪享他的酣梦起来了。一切都好象是死了一般的，其实一切都在尽量吸着生命的美酒，用了十分的自我意识与一切的意识。在这大海一般深的“沉静”里面，月慢慢地沉下地平线下去了。圆盖一般的苍天，也渐渐地剩不到几颗明星了。

这时候利西向他的弟子们说：

“天快亮了！这满城的俳優，今天不知道又要排演一些什么，我们准备进去玩玩罢。”

弟子们都是沉默着。四围都是沉默着。只有林外的老鸦“呀！”的一声答应了。

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夜

补注

利西是贤人或学者的意思。

这短篇的情节，在一般的中国人，或许过于是浪漫的 romantic 了，国王之死，也许是不大自然。但是国王与利西的对照，王宫与森林的对照，国王的恐怖与利西的享乐的对照，都是很好的材料，恐怕作者力量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国王的恐怖，虽然可笑，然而他的态度是很诚实的。本来这主人公，可以用一个中国人，不过中国人少有这种认真的态度，印度人与俄国人常有这种态度，中国人却少有。这短篇能不能说是这种态度的写照，尚是疑问，但这短篇最初的动机，不过是想把这样的森林，描写一下，因为作者素来是喜欢这种森林的。

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夜

（原载1926年6月《创造月刊》1卷4期）

灰色的鸟

(一)

我与可爱的颜碧湘女士将要结婚了，可是我的老朋友丁伯兰却还是很孤独地，很凄凉地，在扯那无情的日历的一页页。

他和我自从中学三年级同学以来，一直同到了大学毕业。他在我许多同学之中，是最富有特性的一个，也是我最亲密的一个。自从相识以来，他给了我多少知识上与精神上的援助；从他的人格，他给了我多大的力量！可是除我之外，他也没有别的亲近的朋友，只有我最详细地知道他的家世，他的性情，他的思想，他的一切。记得有一回他偶因家事请假到汉口去了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封很热忱的信，内里有一段这般说：

“……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两个很活泼的青年，手牵手，笑谈着从我的身旁过去了。我暂时凝望着他们，不能离去。呵，佩帙，他们是何等的快活！世间的事情，真教我烦厌极了！我怎么要来这可厌的地方，偏不能也同你畅游，没入于自然的怀里，忘怀世间一切的苦痛，当这等和悦的风光，这般明朗的月夜？……”

记得他初来和我同学的时候，（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了，啊，时间是这般跑得快的！）那时候他虽然初从偏僻的地方出来，初离他的父母兄弟，他是很快活的一个学生，读书之外，他最喜欢同我和几个朋友踢踢高球，他并且顶热心公益。后来他每从家里到学校来，便至少也有两个礼拜不快活，从进了

大学的那一年，他便每每对着我，说他心里很寂寞。

我们一个人生在世界上，清夜里把自己同外务“绝缘”，归到真的自我的时候，谁又能不感觉一种惊心的忍不住的寂寞呢！我们总要互相安慰，互相援助才好。然而我是素来要丁君的援助的，我应当如何才可以援助他呢？有时我劝他看小说，或邀他去游公园，他只用一种很凄惨的笑脸对我说：“谢谢你，有你这般亲切的朋友，我心里好过得许多了。”

他的家庭逼着要他订婚，他的父母问他要孙子抱，这种功利的机械的要求，赤裸裸地把旧式的家庭洗剥了在他的前面，伤了他自己的理想，使他切实感觉了人生之无意义。——这确是丁君的悲哀之起源，可是决不能说是近年以来使丁君深感寂寞的病菌。这是我所能断言的。可是这病菌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却是到了最近我才知道的。

约莫两年之间，他每每竟是坐卧不安似的；有时候他忽问我：“如何才好？”及我问他为什么事情，他已经伏在桌上哭他的去了。有一回他忽然对我说：“我要改了。我这种癫狂似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可是不到几分钟，他又很悲酸地对我说：“但是道德是什么呢？宗教是什么呢？艺术是什么呢？呵，都不过是美观的虚伪罢！”

梦一般的，我们毕业以来，又是一年多了！他总是这般被一种浓厚的沉哀围绕着。可是他对于朋友是热诚的，他爱他们，愿他们都好，对于碧湘与我，尤其是这样。

初夏的一天，我同碧湘顺便到他住的地方，想看看他，并且替他们介绍。他等碧湘说过几句客气话之后，很诚恳地对我们俩说：“你们很好，我愿你们很好，我愿你们长是这般好！”我们辞他出来的时候，他又含着微笑，把这几句话重说了一回，

可是他的脸色与声音，总不免是很凄凉的。

(二)

碧湘是一个很美的女孩儿。(我这样称她，因为她是那般天真烂漫的!)可是她的美不是那一见便能使人惊倒的那种，不是那见了便要求我们惊叹的那种，也不是那太阳一般，使我们不能正视的那种。她的生理的发达是很调和的，很合音节的；她的美不在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的特别的发达，而在她全身的曲面与色彩的合奏，她脸上那丰满的肉与匀润的微红，时常带着肥美的微笑，反映着她内心的纯美；不宽不厚的腰围，很圆满的小腿，与那多一分过长、少一分过短的天足，看了使我时常觉得一种动力的快感，痉挛一般地在我身中飞跃。她的行动是很活泼的，她的声音是很动听的，她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平和的。所以，我从她那澄碧的眼睛，可以看出一个更美的宇宙，更深的存在——她的美是这般的。她与我所学的东西虽然不同，可是她不仅对于我的专门科学有充分的理解，她还对于儿童的教育，颇有独到的地方。我们的人生观更是相近的；我于未订婚约之先，曾要求她不可逼我去争名利，因为人生一切的不幸，都是为的这两匹劣马，而多少不幸的事情，是因为一种蒙着面的黑暗的势力，把这两匹顽恶的劣马解放了才发生的！可是碧湘很快活地对我说：“我们要什么名呢？要什么利呢？我们率性往乡里耕田去罢！你在田里耕田，我在旁边种菜，你讲一个故事，我唱一个歌儿，好不好？”近来我们每回会着，所谈的无非将来的计划。碧湘有极大的想象力，与极敏的理解力，可是绝没有自夸的态度。

“丁先生怎的总是这等伤心呢？这盛装的地球不是很可观

么？这飞鸣的黄鸟不是很快活么？”晴朗的五月的一天，当我与碧湘在破坏了一半的长沙城上游玩，她忽然很同情地这般问我。一路行来，我只顾贪看波涛一般的岳麓，与一带萦回的湘江；只顾贪听碧湘很饶风味的谈笑，与很有次序的论理，把可怜的我的老友，完全丢在脑后了，她这一问，陡把可怜的伯兰，又提到了我的心上。

“佩帙！他那本诗集里面的一首叫做杜鹃的诗，你还记得么？”

“我不大记得了。”

“那么我念给你听罢：

“夜深了，
你怎么只是悲啼，
教我好不难过？
我也想哭几声，
——不知为什么
只是我不知应该对着那一个。
我倒羡慕你，
你在‘深夜’的胸上伏着；
她肯听你，
她会懂得你。”

“丁先生是多么悲哀哟！怎的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会没有一个知心的痛他的人儿呢？一个人生在世界上孤孤单单地，独自抱着冷清清的心儿，没有一个人容他分说，永教他抱着一块笨重的石头一天天望着万丈的深渊沉下，这是何等悲惨的事啊！佩帙我们应当救济他才好呢！”

“我们自然是要帮他，不过我真不知道应当从什么地方下

手才是，你说密司刘对于伯兰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是呀！我想对于丁先生那样的悲观的人，密司刘是绝好的一剂调和药。我深信她有这种力量。”

“那么，你信一个人的性情，是可以代数式的加法来加减的么？”

碧湘这种单纯幼稚的痴想，几乎没有使我把含在口中的烟卷喷出。我看他一路指手划脚地说来，尤其是不禁要笑出来了。可是我由她那深思的眸子与悲楚的眉峰，知道她是很热忱地在同我讨论。

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于我心里，在反映着密司刘的思想、言论与行动；因为她们俩虽然都是很美，根本上很有许多不同之处。密司刘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女子，她的聪明，与碧湘不相上下，可是她的思想要精密些，不似碧湘那般的专任想象；所以我们若说碧湘的主义是理想主义，那么密司刘可以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丁先生自从结识了密司刘以来，笑也居然能够笑了，艺术也信起来了，近来连道德都很相信起来了呢。我信这是丁先生的一大转机，所以我求过密司刘要她援助我们把他救出。”

“但是你相信密司刘有永远救济他的意思么？”

“我相信可以有，为什么不可以有呢？”

“可是密司刘对于财政厅的胡惟白是怎样的呢？”

“这胡先生不是结过了婚的么？”碧湘很惊讶地向着我。

“痴孩子！你这种简单的论理，终是要失败的。这胡惟白也是和我同过学的，他的内底生活，虽然是腐败不堪，可是带了一副好看的小白脸；并且他的财产，他的势力，不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诱惑么？”

可爱的碧湘虽然对于我这种悬空的理论，似乎不大相信，但是她只露着一种表示不赞成的微笑，并不反对我的言语。她是这般可爱的。长沙的古城渐次拆毁了，多少曾游的地方，早已莫由寻觅！她的明眸，也象在反映着追怀的流水。可是长沙的故城虽则亡了，爱与美与欢情，是永不能亡的！

（三）

晴朗的六月的一天，我的小客房里，有很风雅的谈话进行着。

密司刘在翻阅碧湘的长沙风景画，伯兰在凝望着青海色的空里，我最可爱的未婚妻，在替我跑来跑去地张罗一切，我在背着手踱来踱去的来往。

“人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傅立哀级数，大约是很复杂的罢。”突来的清风一般，伯兰回过头来，这般说了，很鲜明地显出适才在他思潮中所吹起的涟漪。

“那么，你也信了运命主义么？”碧湘从那房门旁边，很惊讶地回过脸来，望了伯兰一眼，这般说着，却又转望我与密司刘，似乎想征求我们两人的意见的样子。

“我虽然不信什么运命主义，但是人生的现象，多是盲目的，偶然的，却是实在的了。”

“可是同时又是很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广漠的生活的平原，把我们的运命开展着，创造着去。”密司刘说着，把几束惊愕的光线之交点，用她右手的五指，带住她的右边画一大弧，表示生活的平原之广漠。说完了，却转身望着我，似乎要求我的同意。然而我还没有开口，伯兰已经抢着说道：

“但是这种自由，是有限制的，是低度的，不是高度的。”

“可是我们只要利用这低度的自由，就可以开拓我们的运命。”密司刘很从容地答复。

“把什么做目标呢？”碧湘很热心地插着说。

“把我们生活的向上哟！”

“可是我对于这种自由的范围，觉得很可悲观，对于这种自由的价值，也觉得很可怀疑呢。并且生活的平原，依密司刘所说，虽然是广漠的。但是我们真能够自由地往这平原里把我们的运命开拓么？”伯兰这般说着，把撑起来了的半身，又崩山似地倒向摇椅中去了。

“这种自由的范围，我们不能不说是很小，可是他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自己去创造的呢。人性中有一种对于环境极大的顺应性，丁先生莫非把他看得太轻了罢。照丁先生那样说，人人譬如是一条盲目的河流，我们是在这河流中浮游着。可是我们一方面顺应着潮流，一方面仍能够慢慢地取我们想取的方向，仍能够慢慢地游到我们想往的地方，或竟爬上我们想达到的彼岸呢。这都是很自由的。并且我们的顺应性，也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各个人与环境的背上，都背着一部很厚的历史在这里呢。人生现象中，多少不幸事的起源，是因为不去顺应这盲目的，不可抗的河流才发生的！所以若是想我们的生活向上发展，我们只要有坚强的意志，一方面顺应着潮流，一方面仍向广漠的、生活的平原里，去开拓自己的运命，我想意志也是自由的呢……”

密司刘的层出不穷的雄谈，似乎还有滔滔不尽的形势。我只瞪着目、竖着耳很惊喜地谨听着，可是伯兰与碧湘却似很不同以为然的样子。可怜的伯兰，已经渐次地复往悲郁的深渊沉下

去了。他眼前新得的微弱的光明，这时候又恍惚徐徐地消亡了，犹如那昏冥的薄暮，他的眼眶里，好象泛着有一层火一般热的红液。他只垂着头，再没有勇气来凝望那无边的天际了——那依然是海青色的。

碧湘是很有艺术家的天才的。密司刘常说她是享乐主义者，本来她所取的，是一种观照的态度。所以她对于密司刘这种现世的、唯物的、功利的、盲目的性情与思想，是根本反对的。可是她虽然听了很不满足，却也不把来放在心里；因为我们不久就要结婚了，她心里所怀着的希望与欢喜多着呢。

(四)

我与碧湘结婚几天了。

我感谢我们比麻还乱的国家。我很感谢，因为滔天的洪水之后，她还给我与碧湘，留有这等安闲的一块乐土。

我常常一个人心里这般想，当我于工作的中途，暂任我的回想振翼飞腾的时候：

——多少的人们，为的想扩张自己一人的势力，不惜把四万万万的同胞全都鏖杀了！

——多少的人们，为的想谋自己一个的利益，不惜把国家的利权、同胞的命脉全都断送了！

——多少的人们，为的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黄金与威力下匍匐了，不惜给他们为走狗，为贱妾！

——丑恶的人们哟！污秽了的是你们的良心罢！

——我真不能不感谢，不能不诚心地感谢，感谢我的环境，感谢我可怜的、无辜的同胞，关于我这卑微的，同时却很平和的生活。

——我是何等平和哟！我的良心是何等轻快哟！一切的诱惑，望见了我的门墙，是要往后退却的。

——我是何等幸福哟！可爱的碧湘是这般美的！

一个人生在世间，假使忠心于自己的工作，能够不为无益的外物所诱，很卑微地，却很平和地、切实地生活着，本来还有什么更可希望的事情呢？当我倦了归来，碧湘抚琴低唱，用一种慰安的、爽人的清音，把我疲倦了的神经，从新洗涤了的时候，我又何能不兴起满腔的感谢呢？

可是在我多少的欢情中，一天都忘怀不了的，是我可怜的老朋友。他是悲哀的冢子，爱的嫡嗣。爱是孤独的，悲哀的。爱犹如黄昏时鸣鸟，是要求一枝栖息的。可是他终究不曾求得着，倒被悲哀迷住了。

可怜的是伯兰。他的爱过于是伟大，他们不能了解。他们把更伟大的丢了不顾，甘心去偷做那乞丐的妓女的生活呢！

仲秋的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碧湘很欢喜地迎着我，递一封信给我说道：

“丁先生来了信呢。”

我听说是伯兰的来信，也很欢喜地接过来开了。那信上写的是：“别来又是几星期，你们大约已经在创造新的苦痛了，因为‘生活’给我们的只是苦痛，新的生活便是新的苦痛呢！可是你们也不要为我这几句语言伤感，我愿你们好好生活着去！我现在复归到故乡来了，悲哀在我的身后推着，在我的胸上压着。故乡虽不是那般冰冷，但是他们在讥笑我，讥笑在‘生活’在‘爱’都战败回来了的我呢！他们所赞美的，所要求的，是更多的金银，更多的罪恶呢！可是我还是感谢我们的祖国与人类全部，因为我已经寻着了现世的一个小小天国了。我最可爱

的楼梯一般排着的侄儿们，小朋友们，在高扬着手欢迎我们呢！他们虽然多少被恶浊的社会染坏了，然而他们仍是未来的光明，未来的珠玉。佩韦！还是那句很简单的话有至深的哲理啊，就是，‘由教育到心的改造！’堕落了的人们，把他们作为不曾生存的罢！我们祖国与全人类的真的光明，还是要我们牺牲一切去创造。我虽然这般弱小，我愿把我的全身心，往这方面做去。……”

我看到了这地方，我心里不知不觉地好象减轻了一个什么。我暂时凝神祷告了。可是当我想再看下去的时候，碧湘又递一封信给我，很不高兴地说道：

“密司刘说她已经与胡先生订婚了，教我们欢喜呢。”

十一、十、四。于上海

（原载1922年12月《创造季刊》1卷3期）

牧 夫

“乐山！他们决定请你去教书了。”刘志刚把他的半白的头由两手捧持着的报纸里抬起来，向着默然坐在他对面的青年如是说。这位亲切的老人的和颜，说时充满了热诚的欣慰，好象朋友的好消息同时真是他自己的了。

时候已经将近中秋，晴空是一碧万顷。晨风吹来，立刻令人神爽，如可飞去。稻田中黄熟了的禾苗，时为一种缓而长的波动，同时并传来一阵阵的低语。上海市外的乡村，虽则都市的喧声，如可隐约听出，到底是这般宁静而清新。

“是的。报上登出来了吗？昨天晚上接到了王教务长的一封信，叫我马上去商量钟点与功课的。”正在领略那良晨美景的朱乐山，听了老人给他的好消息，只简单地答了数语，虽然心里有无限的悲喜一时全涌上来，虽然有万千的心事待说。

同他要好的朋友替他在N大学进言，已经不止一次，一回没有结果，两回没有结果，直到暑期将尽，还没有好消息来。他以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昨天接到教务长的信，他以为还是没有决定的一回事，而他的拙于交际与四围的仇人也决不肯容他成功，终要把他的事情破坏的。然而现在居然在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求不到职业，零落不堪的他，放弃自己专门的科学，仅靠着做些无聊的文字苟延残喘的他，飘零无所寄托，幸蒙这亲切的老人收容座末的他，现在居然可以得到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了！他见了对面的老朋友那欣喜的容颜，只觉心房激

动，苍瘦的脸上滚下两行灼热的清泪来。

“他们请你去教科学，幸而不是请你去教文学呢。”他的老朋友想利用他近来对于文学界的反感，把在他心中激动了的感情缓和下去。

“啊，文学，我们的文学界，我今誓与你永远分离了！”想起了两年来文学界所给他的委屈，他心里不觉有万千的愤恨燃起。

无知的群小所盘踞的文学界，万恶的政界一般的文学界！这是他对于两年来的文学界的题词。他自与几个朋友从事文学运动以来，几无日不在与四围的恶魔对垒。嫉妒他们的人不是说他们的作品无聊，便是说它们浅薄；无知无识的人不是讥他们的颓废，便是骂他们复古。反观这些嫉妒他们的人与无知无识的人，不是拾起外国的一二废物来大吹特吹，便是挟一部字典来乱翻乱译，而都朋比为奸，利用政党式的组织，欲以离奇的介绍与错误的翻译书来垄断一个时代。他偶然愤不可已，写了几篇批评的文字，便犹如离经叛道的人一般，被他的敌人多方毒打，旁边的人竟无一人敢出来为他说一句话！

——科学界的朋友们！我把你们误解了。我以前嫌你们只埋头于你们的研究，不能作人生的观赏，便跳出来想在文学界找出更同调的伴侣，更从容的旅伴，而今我所发见的只是一些鸡鹜般的争逐，与狐狸般的欺狡。我真大错而特错！你们毕竟是自然的肖子。我将复归到你们队里去。……

“那么，你马上去罢！现在到上海去一趟，回来还不迟。我恭喜你！”这是亲切的老人把他的思潮打断了；他们俩恳挚地握手而别。

残暑依然猛烈，他坐在一轮小车上，只觉背上在发烧。车

夫的上衣已经湿透，脸上的汗珠如雨。他因为左膝的关节有病，不能多走，所以想坐到吴淞，再坐火车往上海。但他坐在车上只觉心中不安，而小径的凸凹所给车夫的困苦，他由车夫肩上的筋肉的变化，也不由得感到几分，同时不由得觉到一股针刺一般的震痛，从心窝里发出来，在他的全身一阵阵地传走。

终于到他毅然跳下车来，他心里才觉得轻快而平静了。虽然还不到半途，他却给了车价的全部，还另给了车夫几个铜子。他与车夫叮宁话别之后，顿觉大自然慈惠而澄美，也忘记了他的蹩脚，只管前进，一面想念这可怜的车夫不已。

——他不是生来给人拉车的，他一样是人的儿子，可怜的车夫！象我这样的寄生虫，我真不知道有什么面目与他相见。我真远不如他！至少他能自食其力，而我只是一个无能的寄食者！

他在他的老朋友刘志刚家里寄食，虽然是出自老人的好心，虽然他每天自告奋勇为老人去放马牧牛，有时还办些家庭的琐事，这些都不能为他寄食他人的辩解。而最使他自已禁不起内心的苛责的，便是他所素有的对于文艺的怀疑。

——我所做的东西，除了对于自己多少有点意义之外，对于世人究竟有什么贡献没有？我的作品不是没人喜欢，我的批评不是被人称为捣乱了吗？即使这些话全不足信，可是我的作品对于人类究有什么好处？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吗？我的作品未免过于是主我的了。能使他们增进生活的意识吗？我的才思未免在生活的面前过于无能了。对于人类既无所贡献，而我的寄生倒先给了善良的人类不少的负担。这可怜的车夫所备尝的生活的痛楚，一部分怕是应当归咎于我的罢。

“好了。”他想起现在在他面前闪耀着的新的希望来：“好了，我现在至少可以减去我所加给你们的这一部分的负担了，可怜的车夫！可怜的人子！可怜的我白发的母亲！”

他想起了去年冬天回家省亲的时候的事。

“儿呀！你在外边干什么事？怎么还没有做官？你看别的人多好！”

他只低着头不能回答。

是的，别的人都好。他家里的裁缝，革命之后，进了一个三个月毕业的政法速成，现在已经做过了几任的县长。他家里的厨房，也只这几年的光阴，居然在军队里面做了团长，他在津浦车上还遇见过不只一次的。他家门口驾渡船的曾大头，也不知在那里弄到了一点钱，三四年前，买到了一个厘金局长，自去年来，用了十八万元买通了省政府，买通了省议会，买通了各报馆，居然把一省金融的总机关造币厂一手包办，自己做了厂长。……

这些都是革命以来人民所得到的的好处。只有他呢，虽然把他的双手十指凑拢来，还不够计他在外国留学的年数，他却是穷不能以自存，归国以来，终日在为衣食奔走。

然而，可怜的白发的母亲！你现在可以对人高谈：“我们家里的乐山，也做了大学堂的教习了！”可怜的母亲！大学是最高级的学堂，大学的学生是一些最优秀的分子，大学的教员是一些最著名的博学。

他在这样幻想之中，不觉已经到了吴淞镇口。

N大学的校址在上海市的北东，地点虽然不佳，建筑倒还宏壮。一进大门，便有铺满了绿茵的操场一片，使才从恶浊的街市走进来的人，油然感觉一种美感，不由得要被引进了到一个

别的境地里面去。

“请跟我来。”学校的号房向他点一点头，便转身向里面行去，一直把他带到一间挂有“教务长室”的牌子的房间前面。由半开着的门，已经可以看见窗前桌上，有一个中年人在那里埋着头写字。号房先进去说了一声，只见他立起身来，摇摇摆摆地直朝房门突进，门还未全打开，便听见他口里嚷着：

“哦，密司忒朱！多年不见了。”

这说话的声音，不仅是故乡的土音，而且确是曾听见过的；这胖胖的脸与惨白的一双眼睛，也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朱乐山不由得只管瞪着这位教务长先生发呆。但同时只觉耳膜微响：

“我便是王继忠，我们是老同学，你忘记了么？”

“哦，你几时来这里的？我一听你的声音，就觉得有点奇怪。”

“说来很长，请你进来坐下。”

他依主人的招待就坐，才觉得由疑惑与惊异恢复了。室中的陈设很简单，书架上只有些薄册横陈着。

“我们这大学原来是一所高等师范学堂，不，原来是一所中学升到高等师范学堂，再由高等升到大学的。我与校长何先生同是这学堂的创办者。我自在中学闹事出来之后，流浪了些时，就跑到这里来与何先生创办了这所学堂的。你的消息，我常听见他们说起，在报纸杂志上我也时常看见你的名字的。还是你们拼命研究学问的好，象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也弄不出来的。”

主人说到此地，举杯吞一口茶，暂时凝神之后，继续说下去：

“我们是老同学，用不着客气。老实讲，我们现在只有几

个教国文的老先生，与几个预备去当买办的教会学堂的什么学士，科学方面的好一点的教员是一个也没有。所以前几天开校务会议时，我极力荐你为科学的主任教员，决定请你来办理一切。”

主人的话似乎已经约略说完，所以他开始在摇椅中前后摇摆。朱乐山听了这一大篇的话，知道了教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了教员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顿觉这朱楹白璧的华堂，犹如一座除了木人土偶、空无一物的禅院。

“你们为什么不多请几位好一点的教员呢？”

“何尝不请？有的嫌薪水太少，有的嫌学生程度太低。”主人暂时把摇摆停住。

“你们招生时，把什么程度做标准？”

“名义上要中学毕业，但事实上却不能如此。若选择过严，现在这班学生，实在没几个够入学的资格。”

阳光已经打斜，把一株半秃了的梧桐映在西边的玻璃窗上来往；微风悠悠吹着，送来一阵阵秋蝉的单调的声音，益发觉得是空林深院的情景。

“我便是牧牛牧马，寄食人家，也犯不着来这禅院骗人骗鬼。”朱乐山这般自己对自己说。

“回来了，学校的情形怎样？”他的老朋友诚恳地接着他。

“我决计不去同他们入禅院骗人骗鬼。”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见老人很惊讶，便很简单地把N大学的内容说了。末了还接着说：

“象这样，从事教育的人只管务虚名，丝毫不重实学，致

使一般青年学子也只慕大学的美名，同来欺人欺己——象这样，我们中国的教育，绝对不能进步，我们的社会也万无改良的可能。我恨不能把这一团魔鬼一拳打得粉碎。我是饿死都不同他们去鬼混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仍复把他的草帽戴上了。

“你还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到田里去看看马与牛来。办那样的教育，不如去教牛马还要心安些。”说着，他便转身出去了。

暂时之后，只闻远处吹起了一片牧牛者的歌儿。

八月二十一日

（原载1923年9月《创造周报》17号）

三、诗 歌

诗 十 六 首

海 上 吟

(一)

背负朝阳，
树林里行来处，
遥听得潮声低起，
遥望见青青无垠；
一笔长天如划断，
孤帆若鸢乘风驶。
片片浮云，
愈现出水明山美。
渔家掩映绿林间，
万象静来如死，
浪翻雪，起仍灭，
人在晴光里。

(二)

我步儿漫移，
你潮声低咽。
年来失去的自然，
重逢更加情切，
山腹横霞顶流翠，

对此令人神悦。
低头处，潮来往，
新痕灭旧痕，却肠结。

(三)

汝神秘之象征，
汝无穷之创造。
汝宇宙之一毛，
吾又汝千山之一草，
草！可怜的草！
汝乌知汝生之所自来，
与汝生之所宜趣，
遂随秋色而终老！

(四)

我心随潮上下，
我血如波潜跃。
遥碧海茫茫，
遥平林漠漠；
难道都是梦中幻影？
又难道昔年情景，
是今年的空中楼阁？
Demiurge，你好顽恶，
你总要我忘不了，
生之烦恼与现实之不乐！

(五)

小小清流的河口，
一年年被沙堆封住。

这潮的威力可怖！
我今觉得你可惧，
但我心只是如沙，
任你淘去淘来，推打万度，
只不失我的微光，
如清宵之冷露。

房州寄沫若

写给昔日的同游，
此地的风光依然如故。
一湾沉静的碧海，
不枉他的名儿唤做镜浦。
一望明沙的后面，
几路滴翠的松林，
夹着一层层的田垄……凝绿。
只是你千万不要误认了，
以为仍是他旧时的衣服。
他是年年更换的，他换了几回了！
若问他往年的衣裳那里去寻！
却谁也不知道——也无人能够。

归东京时车上

清流一般美的，
甘露一般甜的，

梦一般的光阴，
飞一般的，
啊，又完全消失了！

梦一般的

(一)

梦一般的，
经过了地方多少。
我随着人生无限的潮流，
早漂到这里来了。
我累了，要暂时停住，
啊，你怎么只是流去？

(二)

忙迫的生活，
今天虑着明天的事，
晴天又愁着下雨的时候，
一刻也不能安息。
啊，不尽的潮流，
你要把我推到几时才肯留？

(三)

茫茫的行路，
不住的梦中飞度。
倦了醒来，
醒来仍是梦。
啊，我们的劳动，

都是为的这梦。

静 夜

(一)

死一般的静夜！
我好象在空中浮起，
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
不住地低声潜跃，
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

我漂着，
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
我跟着他的音波，
我把他轻轻吻着，
我也飞起轻轻的。

我 想

(一)

我想作一个长行客，
朝从东山发，
夜到西河歇，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山啊，水啊，空气啊！
好好唱你们的奇歌；
使我长愉悦。

(二)

我想望着白云行，
梦一般的静景，
会使我的病魂飞起轻轻；
轻轻，吸着玉液一般的清气，
背着祥和的光明。
去啊，去啊，无穷的烦恼，
开啊，开啊，低迷的远道，
好好让吾行。

(三)

若是天下雨，
这莽莽的乾坤，
会只听见天公亲语；
他那源源而来的雄谈，
要使我腾空欢舞，
要使我心灵的微光，
和枝上明珠一般的琳琅，
长向云间吐。

(四)

我们住的这个小屋，
都是我们的逆旅，
还有什么家庭？

我只有我的亲母，
——就是我的心灵。

我还有什么亲人？

啊，这都是从前的迷因，
我今如梦醒。

(五)

啊，让我作一个Wanderer！
我这有限的生涯，
不能长为社会的马牛而终老。
啊，不尽的潮流！
我不堪再同你跑；
我要于你的范围以外，
求我的真存在；
啊，让我作一个Wanderer！

秋 暮

(一)

淡灰色的圆天，
衰黄色的原野；
萧条，沉默，悲哀，
我梦的一般前去，
我心里紧被压住。

(二)

日暮，
一天的宴欢，

又早酒阑人散。
西风里切切的，
一声声哀响：
“他去了……
不复还。”

白 云

(一)

大块白云的里面，
露着一个深湛的青天，
哦，我怎么样想跳进你
这井里面，
解我无穷的烦恼！

(二)

海青色的天空里，
漂着一块冰一般的轻云，
哦，我怎么样想把你
一口气吞下，
消我胸中的炎火！

哦，我的灵魂！

(一)

哦，我的好孩儿！
我教你莫啼，

你又哭不出什么来，
你怎么只是这般爹呀爹呀的？

(二)

哦，我的好孩儿！
我知道你正伤心，
但是说给我听，
人家把你怎么样了？

(三)

我知道这现实的压迫，
你自然是一天都不能甘受。
我们这一天一天，
过的是一些屈辱的生活！

(四)

我也心念故乡的青山，
和它明镜一般的流水，
它那海一般的天空，
这时候都恍惚，
深深映在你光明的眼中！

(五)

你只催说不如归去，
归去当然是不可缓。
但是我们受罪还只十年，
还有一年未滿。

(六)

你不要悲前途辽远，
你要知道你还是幸福，

只要你长能伏在我的怀中，
我长能吻着你的前额
——和现在一般。

(七)

哦，我的好孩儿！
你不要哀号，
上帝会来保佑，
你是这般好！

疲倦了的行路

(一)

疲倦了的行路！
我还要注定前途，
和着勇敢的军歌，
不住的前往。

(二)

我想我就会倒下来，
这下面的第一步。
因为我清早起来，
就是这般昏昏沉沉的。

(三)

我觉得全身火一般的烧着，
一刻一刻的在分解。
只等那最后的爆发，
——那破坏一切的。

故 乡

(Religious emotion)

(一)

无限的路程，
走的我眼眩足痛！
啊！天色早黄昏，
我怎么一步也难动？

(二)

啊！故乡何处？
让我回去了罢！
一个人行路无依，
我心凄惨，我愁，我怕！

(三)

万事都是徒劳的，
况身心正疲倦处。
故乡虽说雨打风吹，
啊！让我回去！

冬 天

(一)

唉！一年的光阴又要流尽了，
北风吹得早凄凉极了，
也不管我心潮狂跳！

一片黄瘦的草和枯叶，
琐琐细细都向我愁说。

(二)

青天分外的加高，
光辉减的多了！
这空中惨淡的风潮，
一刻一刻的险似，
使我梦想世界的末日。

(三)

我心被压得重重，
我疑我的血液已不流动。
堤上空枝同我阵阵的战栗，
就是不老的青松，
也怪暗淡的！

(四)

一个渔夫驾只船儿弱小，
这风潮险恶如何得了？
身心久已疲极了，
上下四方一看——
唉，哪边是岸！

残 雪

(一)

啊，美的末路！
啊，善的残骸！

Apollo的神箭，
射得你莫容存在。
空剩有血流荒野，
空剩有泪如珠下。
也不知要流到几时，
啊，这是真的真知？

(二)

啊，我想起你当初的元气哟！
要把这衰残了的宇宙，
霎时间完全美化了。
我如何的喜欢！
我如何的感激！
啊，谁知这都是运命的游戏！
最高的善，
最后的美，
也就无容身的余地。
使我心哀，
使我心灰。

冬的别辞

(一)

啊，我的好朋友！
你今听我言，
我将住不久。
人间将见阳春重到了，

小孩们都唱着歌，挡着手。
我们暂时要别离，
啊，我的好朋友！

(二)

啊，我的好朋友！
你还听我言，
但是春光也住不久。
你见了那最初的落叶，
那便是这世界将归我有。
这莽莽的世界……
啊，我的好朋友！

(三)

啊，我的好朋友！
我纵然去了，
我不是尽管闲着手！
我于无影无形中，
推着世界飞的一般前走。
流动才是世界的真相，
啊，我的好朋友！

(四)

啊，我的好朋友！
你却不要，
只管痴醉人间的晕浪，
那四季的名花会问你，
你寻着了你的幸福没有？
你最心醉的幸福？

啊，我的好朋友！

（五）

啊，我的好朋友！

他们会问你，

你怎枉自做奴隶许久？

他人的，家庭的，社会的，

似乎更将如此白首，

你这现在青青的，

啊，我的好朋友！

（六）

啊，我的好朋友！

他们会问你，

你怎这般形枯面垢，

好象风前的微光，

好象陈尸一般病朽。

往日之灵光那里去了？

啊，我的好朋友！

（七）

啊，我的好朋友！

他们会问你，

你怎把你心灵的羽翼辜负，

不教他飞腾太空，

将他慈母的和光享受。

却为何死咬着土？

啊，我的好朋友！

(八)

啊，我的好朋友！
你可以醒来，
阳春笑着在向你招手！
彩云飞舞你的面前！
神乐来从你的身后！
你可以醒来，
啊，我的好朋友！

春 树

(一)

我一见你新鲜的枝叶，
我如梦初醒，
我全身的热血，
忽忽的奔腾。
啊，生命的火，
你到底还是燃着了！

(二)

我看见你的柔枝，
活泼泼地正在风前跳舞着。
你还唱着清歌，
同轻妙的鸟声相和，
使我的魂清魄清，
使我的心轻骨轻。

(三)

啊，可爱的枝枝！
可爱的叶叶！
使我们司享生命的青春，
他的荣光，他的欢乐！
使我的心灵吻着你，
合着大自然的谐音，同你欢跃！

一 刻 ·

(一)

我把我的功课停作一刻，
我回想一切，
大自然正奏着它的Symphony。
啊，我刚才恰只梦的一霎
为他奏了他极微小的一部分，
啊，我将来永远——永远
这要为他尽我的情勤！

(二)

最奇怪的，
我虽然敬了，
他的Symphony，
依旧庄严雄厚，
好象是对我的一种讥刺，
你真可有可无，
你好微弱，你好纤小。

(三)

啊，凄惨的命运！
啊，绝望的人生！
他送强大，我不能惜。
他送尊贵，我不能爱
但我那能不爱？
我是他的土做成的，
我还要复归他的土里。

(四)

罢了！让我的血流，
还为他倾泻，
让他的赞歌，
还弥漫宇下。
因为万事都是他的过程，
也就是我的过程，
向无穷的过程。

(原载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1卷1期)

长沙寄沫若（外一首）

沫若！

我们酷肖两块浮萍，
飘摇无定的。
多年别离后，
我与你携手同归，
柳暗花明的时候。
同游上海不久我又溯江，
又不久你也东去。
回想起来，
犹如前天的一个梦！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我想起我们归航的时候，
海水只是茫茫，
归心空自如箭。
可是我们的心窝里，
充满了无穷的欢悦，
因为海水的一波一波，
不住地把我们推进祖国。

我们那曾梦想
只有Dis Illusion的悲哀，
等着在我们前面。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江水茫茫，
原野青黄，
平和之乡！
哦，我们心潮的震荡！
你倚船念你的新诗，
我只是感极无辞。
这是我们入扬子江的情况。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可是这种欢情，
注定了是不能长久的。
我们重履故土，
最初的印象，
就使我们大失所望。
我们梦中的故乡，
不是这般的。
锦绣一般的河山，

只见些长闲的尸，
淫露的肉。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我们怀着鬼胎，
望着西湖前去。
春季的西子，
曙光眩耀空际。
可是污浊的先锋，
已经压到了西湖的边上，
相离恰只一线。
那边翠峰林立，
在不断地把轻霞徐吐。
恶浊的世界当中，
这算是一杯净土。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我们从柳浪闻莺，
步行到雷峰塔下。
柳丝缓舞，
莺歌清唱，
可不知这声家藏在那层。

四周都是岑岑寂寂的。
澄清的空气在反映一些，
草木新生的欢意。
远远地一个老头儿，
在锄些什么。
他做一刻功夫，
又倚锄默领些湖山秀气。
我见了这旧时代的遗骸，
便想问问他：
“你们知道么？
你们把中国弄到什么田地了？”
你说：
你想跪下去抱着他的脚儿，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污泥，
舔个干净。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我们第一天跑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改作了舟游。
经过冯苏秋瑾诸墓，
一直来到岳坟。
我见了那种寥落的光景，
不由得心窝酸痛。

我见了你也恭恭敬敬的，
脱了帽子。
我们从那里又舟行到三潭印月，
那时候已经有了微雨。
从那里到孤山，
进西湖公园躲雨，
那边来了几个写生的女郎，
你说：
可是Unschoen。
从公园到图书馆，
只见些空空洞洞的房屋，
后来发现了你的同乡，
一个人在那里翻阅什么，
名字可记不出了。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第三天因为天气不好，
在旅馆困守了半日，
你整好了你新得的诗。
那天下午我们乘火车回沪。
你在车中作了，
你那“司春的女神去了。”
你嫌你那，
“可惜如今的诗人还在吃奶。”

我说：这是事实！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不久我就离了上海，
冲破那黄绢一般的长江，
归到了屈贾行吟之地。
岳麓山的春色方阑，
水陆洲正新添云气。
可是长沙是一些死人的都市，
我天天好象在死尸堆里行走。
我比在外国还觉得寂寞，
一望都是污浊，
他们在作一切的恶。
我本想便离长沙，
或竟往深山里住，
只是到如今还未曾去。
长沙的生活倦厌了，
生命的琴弦吱极了，
我想要痛哭一场，
哭到生命的琴弦复活。
我可不知该向那个，
这里可也没有一个，
有个住在海的那边，
我可不能飞过。

这都是我同你写过的，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
我离上海的时候，
你说要来游洞庭，
俾灵均与湘灵。
你不曾来，
我不能去。
两个凄切的游魂儿，
一个远在天涯，
一个飘零地角，
相命人谓我今年难过，
我因不信运命。
只是人类的一生，
若长是这般疲倦，
就死了也无足惜。
不过把这恶浊的世界，
丢给这些恶人罢了。
哦，只是我们那欢乐的时候！
茫茫已长过，
何由可寻获？
哦，梦一般的欢乐！
你还记得么？
哦沫若！

沫若！这是我十一月中旬所作的，早就想寄给你，只是我有点怕难抄，所以一直挨到今日。

又要过起年来了，岁月真比什么还快！

岁暮长沙城晚眺

只是这般一天一天的！

残秋去了！

几天又将冬尽！

天只是这般青青的！

地只是这般蒙蒙的！

人只是这般昏昏的！

登城晚眺，

极目伤怀。

我心悒悒，

曳杖归来。

十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1922年9月《创造季刊》1卷2期）

诗 三 首

啊，笨重的乌云呀！

啊，笨重的乌云呀！
来！
请来压在我的心儿上，
莫教悲哀逃遁出来了！

啊，笨重的乌云呀！
请来为我封住，
这比欢乐还甜美的，
陶醉的悲哀呀！

我买一朵蔷薇花

我买一朵蔷薇花，
把来插在花瓶里；
鲜艳的蔷薇花，
开着胸怀在欢喜。

“伴我这几个时辰罢，
莫教流光空过了，

美丽的蔷薇花！
当你还不曾也谢了！

“若是你的时辰敲到了。
也欢喜地去来罢！
诗与欢情在我心窝埋着你，
永是一朵可爱的蔷薇花。”

读Rubaiyat之后

时间破不了的，
是这层疑窟；
时间流不尽的，
是这宗歌哭。
朋友，——陶师呀！陶器呀！
能饮一杯不？

（原载1922年12月《创造季刊》1卷3号）

白 云

白云一朵朵，
从我头上经过；
衰黄的枯叶，
在轻舞而徐歌。

落叶依于枯草，
时反侧而嘻呵；
虫声唧唧在哀鸣，
也不知未从何处。

我遥凝着白云，
想到海上孤征的亲友；
我们别来已昨日，
白云哟，你去，去为他的孤侣！

百年聚首几时，
此别尤多惆怅；
朋友哟！努力永远的前程，
我们千里遥相望。

达夫北上后一日于曹家渡公园作

（原载《创造日汇刊》，1923）

海上的悲歌

潮水断续地悲鸣，
海湾如象死一般的宁静，
只有碎了的心儿啊，
在为他最后的激震！

“她”毕竟死了。
运命的神啊，
终不轻轻放松了，
这可哀的两个！

他那理想主义的心儿，
不时在梦想未来的幸福，
与一可爱的人儿，
——自己全心身的补足。

然而运命的神啊，
那强迫一切的，
强迫他容忍别的一人，
他不曾相识的。

是他那理想主义的心儿，

把“她”拒绝了，
反抗一切的教条，
把成文毁弃了。

但是运命的神啊，
终不曾让他超度；
他也知道在他的面前，
早排好了三条死路：

“假使我与‘她’轻结了，
没有爱的婚姻；
这不是我与‘她’手携手，
进了开了口的坟墓？”

“假使我与‘她’脱离了，
他们偏不容‘她’存在；
那不是我的心儿，
终于要被‘她’粉碎？”

“假使我与‘她’脱离了，
‘她’幸而还能生活，
然而象我不能爱人，
人们也会不能爱我！”

运命的神在他面前，
排好了这三条死路。

任他挑选一条，
只不容他超度。

“她”毕竟病死了，
脱离还没有多时；
他的心儿碎了，
海鸥来啄来渐。

也许不是由他而死，
然而他的心儿啊，
忍不住要如那片孤云——
一霎时碎成了几朵。

可是碎了的云片，
几时还可以聚拢来；
只有碎了的心啊，
永不能再成一块！

在她的死尸上，
海鸥在啄在撕；
心血淋漓四下，
不知要流到几时。

他闭了的眼前，
幻影般显现着一番往事，
是他把个半死的女尸，
刀剖，斧劈，以至于死。

是运命驱使了，
他的社会与家庭，
共演这悲惨的一剧，
强他做了主人翁。

他尽力的反抗了，
有如那不屈的海潮，
想涌上岸来，
终于是曳兵而逃。

在运命的掌中，
海在扬声哀哭；
穿着灰色的衣裳，
发蓬蓬把脸儿遮覆。

海洋想用自己的泪珠，
为他把血流洗了去；
然而泪珠还没有触着血流，
早已红了起去。

潮水断续地悲鸣，
海湾在倾耳而听，——
碎了的心儿啊，
在为他最后的激震。

十二年一月作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2卷1期）

诗人的恋歌

一

我要把歌儿举首高吟，
如象一片孤云，娉娉婷婷，
要在一个甜美的心琴上，
招起同情的热烈的交鸣。

二

歌儿，啊，凄切的歌儿呀！
为我往长空高升高升罢！
请把我的孤独与我的悲哀，
化朵花儿敷在她的脚下！

三

如果她肯愉快地歌舞起来，
请把我的孤独与我的悲哀，
化阵风儿把她的翅儿扛起，
使她可以如意地飞绕旋回。

四

如果她心里忧愁，或是恍惚，
请把我的悲哀与我的孤独，
化片巾儿由她把一切揩了，
不论心里的微霞，明眸的雨露。

五

啊，痛呀！当我这般想时！
这些都是梦想，我不曾知；

我的歌儿如个黄昏的飞鸟，
飞去飞来，只不曾寻着一枝！

六

是狂风把我的歌儿逼了？
是长夜漫漫东天犹未晓？
还是我的歌儿力弱声微，
不能飞近她的身旁环绕？

七

啊，可爱的石头般的人儿哟！
我应当如何把歌儿琢磨，
才能合你的心，如你的意，
才肯倾你的耳，吟你的歌？

八

歌儿，啊，凄切的歌儿呀！
为我往海洋的深渊沉下！
请在一个一望渺茫的地方，
使海洋为你抑郁而悲歌罢！

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早初稿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2卷1期）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
我飘然降临了这纷扰的人世；
从不可知的缥渺的地方，
往不可知的地方的途次。

我无端做了人的爱儿，
人的亲爱的小兄弟，
这短短的二十八年之中，
却玩过了运命无穷的游戏。

家国的愤火五内如焚，
身世的烦忧不可终息，
慈祥的父母早已先我而偕亡，
亲爱的一人也已入土而长寂。（注）

如今我是孑然一身，
我的良友呀，孤独与哀情；
秋来怎如是的匆促？
我在熬受我的人生。

（注）前年长兄病歿。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
我飘然降临了这纷扰的人世，
从不可知的缥渺的地方，
往不可知的地方的途次。

十四年八月

（原载《流浪》，创造社出版部，1927）

不朽的人豪

——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

大地在昏朦里悲惨地颠簸，
群星微露着凄清的泪眼，
宇宙新披了黑色的缁裳，
伤此一人哟，已弃人群而去远。

二

他是一颗明星，一团熊熊的炬火，
他的光芒曾把四百余州普照，
曾把专制魔王的镣铐熔化成灰，
曾在頹园铸出自由的鲜花一朵。

三

但可是神明之胃早已病入膏肓，
明星照临时他们是沉沉未觉，
一朝醒来他们已失去了南针，
他们如今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走！

四

这许是千古人豪的离奇的命运，
也许是他的光荣，人群的羞耻！
他的光芒纵不曾及时为人群所感受，
他的精神是永在人群的心头——不死。

五

四十年间为软弱的民族入死出生，
有如和风在残枝上吹起嫩芽摇摆，
也曾遗下累万的文字指示迷津，
然而他的精神远在文字之外！

六

亲爱的哟！你们爱他，你们从他，
请从他的精神向着永远的前程猛进！
他的光芒的余焰犹若与世而长存，
请步着他的后尘戮力同心而共驰！

七

悲惨的命运！在这微明的时代！
歌唱安琪儿还在母怀未起；
我的献诗只是我的一片微忱，
不朽的人豪须有不朽的名诗赞美。

十五年三月为广东大学孙中山纪念册作

（原载1926年6月1日《洪水》2卷18号）

《流浪》序诗

(一)

我生如一颗流星，
不知要流往何处；
我只不住地狂奔，
曳着一时显现的微明，
人纵不知我心中焦灼如许。

是何等辽阔的天空！
又是何等清爽！
我摇摇而奋奔，
我耀耀而遥征，
回顾长空而中心怅惘。

这是何等的运命——
这短短的一生，
尽流浪而凋零，
莫或与我相亲，
永远永远孤独而凄清！

人纵在愁苦之中，
皆能强笑而为乐，

欢情的火焰熊熊，
悲哀的幕影犹可潜踪，
我连这种欢情也无从得着。

啊，这是何等的运命——
在这无涯的怅惘，
曳着瞬息的微明，
抱着惨痛的凄情，
我还要不住地奋进而遥往。

啊，我生如一颗流星，
不知要流往何处；
我只不住地狂奔，
曳着一时显现的微明，
人纵不知我心中焦灼如许。

(二)

这是我的残骸！
凋零的我呀，早已不知所在。
亲爱的远方的朋友哟，
请莫惜，请莫忘你的怜爱！

便是我这缥渺的生涯，
也曾梦想过幻美的纯爱；
可如今百合的花时过了，

空剩了这片残骸。

但这虽是我的残骸，
我的音容呀，或许仍然未改。
亲爱的远方的朋友哟，
请莫惜，请莫忘你的怜爱！

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原载《流浪》，创造社出版部，1927）

清明时节（外二首）

一片橙黄的净土，
掩埋着一个多情的人。
微雨纷纷的清明时节，
我与你凭吊孤魂。

北郊的山水清幽，
路上行人无语；
只时有鞭爆遥鸣，
纸钱在冢丛间翻舞。

我们都默默前行，
好象是被人驱赶；
为一个无名的女人，
诗人们不胜哀感。

她是一个多情的人，
她的短短的一生，
有如百合在开花的时节，
被风雨打入了这座坟莹。

请莫问她生前的情史，

更休言她死时的哀艳；
妍丑与贫富殊流同归，
华美的墓碑又何足羨？

我们围绕在她的坟边，
暂时喧语，终还沉默，
我们俯视埋香的土尘，
我们仰望浮云的天末。

这儿是她的头颅，
这儿是她的双足，
这儿是她的美好的心，
再鼓动呀，她已永不。

此处四围有低山环绕，
是绝好的一座坟茔；
远望有一条迂缓的石路，
是人生无限的行程。

或许有过路的行人，
从这死与生的国境，
暂停住疲倦了的行路，
遥望丛冢而长叹一声。

亦许有多情的山鸟，
时从远近的林木飞临，

用了动人悲楚的歌唱，
流出些深藏地底的哀情。

但是这儿有宁静与和平，
常有多情的旧友探问殷勤。
也许再有不相知的游客，
你我一样的流浪的人。

一片橙黄的净土，
掩埋着一个多情的人。
微雨纷纷的清明时节，
我与你凭吊孤魂。

June 9, 1927

悔 恨

青春时代的甘芳的简篇将闭！
呵，可爱的青春，幻美的青春！
呵，我的幻梦般的青春已不可再，
再也不能回复我青春时代的心情！

一切都如幻影，一切都如梦中，
我便在昏朦之中早把青春断送。
呵，倘若我能把我的幻影追踪。
倘若我能把青春的甘醇痛吻！

Feb. 1927

当我忽地从梦中醒来

当我忽地从梦中醒来，
从梦的迷离与缥缈，
我低头自语道：
我把我的青春误了。

那是何等美丽的时期，
整个人生的精粹！
过此以后的人生呀，
何异于凄凉的荒地？

但是啊，当我忽地醒来，
我已远离那儿的国境，
再回那光荣的国土呀，
不能，啊，永不再能！

我仰望人生的高峰，
我的泪珠如雨；
啊，悲剧的人生呀，
人生的悲剧！

June, 4, 1927

（原载《流浪》，创造社出版部，1927）

早春及其他九首

早 春

虽然是乳浊的天空，
却已有和荡的阳光充满着。
鸟儿已在低鸣，
好象是预告阳春将到了。

枯树在朔风之前战惊，
秋来的甜梦微醒；
全身充满了更新的生力，
只待好春的到来。

忏悔的冬裳已将退尽，
Persephones 在地底欠伸；
只我个凄切的游魂哟，
何年才有更生的荣幸？

春

到底是春天的景色，
是生气澎湃着在了！

乳白色的低空里，
有微弱的光芒闪着，
是才醒了的“时辰”，
半开炮的睡眠了！

断 片

我心只是凄凄切切地，
漫无着落地驰骤。
你为甚使我这等悲哀？
啊，你无涯的天海！

小 坐

飘摇，
我在跟着人群飘摇。
这悠永的日日，
我只是飘摇，飘摇。

人生已饱和着疲劳，
于我太荒凉而冷酷。
我无狂热为欢，
也无热忱可以歌哭。

在这飘摇的生活之中，
只这时候我心清冲，

当我偷闲小坐，
坐着生命之流涌去匆匆。

生命之流涌去匆匆，
群动在狂拥而昏昏，
我飘摇着，
在群动飘摇之中。

昨日检点行篋，偶落旧纸一方于地；今早拾起来一看却是一篇短诗。题下仅书十二月二十五夜，已经不知是何年写的。返湘以来，生机绝尽，偶读此诗，觉流浪上海时之心绪犹为难得。

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梦 见

梦见一个美好的人，
我郑重地亲了她的芳唇，
梦中的亲吻哟，
我，可恋的梦中的亲吻！

徬 徨

汽车从我前面奔来，
汽车从我身后驰过，

装了些桃红的人面，
流了些高声的笑语，
 与沉醉的欢歌。
呵，人面，笑语，欢歌！
小墙阴处。
一对人儿在呢呢私语。
啊，我愿，
我愿我能立刻
化成一个痴立的石柱！

醉 醒

是谁把我推出来了，
由这一重重的门户？
我踉跄着出来了，
可我不知当往何处。
哦，请不用再把我推往外边，
我将倚户而眠！

April 1923

雨

欲停还雨，
我立窗前，
默默无语。

半角天空如乳。
冥濛的雨中，
斜烟在凝眸。

April 16, 1923

当我复归到了自我的时候

当我复归到了自我的时候，
我只觉得我生太幸福了，
世界是这般阔大而光明，
全不是往时那般暗，那般小。

当我复归到了自我的时候，
然而我又未免油然惨伤，
想起了我生如一个孤影，
凄切地在荒原之上彷徨。

March 17, 1924

微 礼

哦，可爱的年轻的姑娘们！
请受我这无言的微礼！
充分地快活而欢呼罢，

在我们地球母亲的怀里！

不行春风已经来到水面，
已经来到枝上，林间：
你们的活泼的娇姿，
已使我感激的泪珠盈眼？

可爱的年轻的少女们哟！
春光一去，永不复回，
充分地快活而翱翔罢，
莫更迟疑与忧悔！

March 16 1924

（原载《流浪》创造出版社，1927）

陕北公学校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也学习！
努力，努力，
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昂头看那边，
胜利就在前面！

1937年冬作于延安

给毕业的同学们

我们是民族的忠实的儿女们，
在这儿锻炼了我们的身心。
要拿起我们的武器走上前线，
为了祖国的命运与光荣。

我们要用我们的血和肉，
写下一篇优美壮烈的史诗。
这篇史诗要记录民族的复活，
要洗净我们一百年来的国耻。

最后的胜利终归我们——
同志们！把握住这样的自信！
清醒地认识我们的使命，
英勇地坚决地——前进！

1938年1月30日

爱 国 犯

他们这些人——是所谓爱国犯，
这可不是千古未闻的奇案！
翻破古今中外所有的法典，
找出这样个罪名——你可困难。

我敢断言，并且用我的一切的保证，
他们没有敢咀咒什么神明，
他们都是些安分守己的绅士，
也不会冒犯全世界那一帝君。

如此说明，由南京传来的广播：
他们主张御侮救亡各党联合，
他们因此违反了三民主义，
他们危害了国家——因为他们爱国！

几个月来，他们被锁在监牢，
六十多岁的老人也“王法难逃”：
他们要被官判，要被严重处分，
不管全国人民的悲愤与呼号。

他们不该痴爱这危亡的国家，

不该宣传与讨论救亡的方法，
不该表白他们对于祖国的忠诚，
不该，不该把汉奸亲日派辱骂！

这可不是千古未闻的奇案？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多少忧患！
爱国的运动被无情地镇压与摧残，
先进的战士们要克服更多的磨难。

可是“天罗地网”阻不住爱国的共鸣，
铁的镣铐锁不住救亡的斗争：
一天民众的愤怒终要轰然一声，
把没心肝的镇压者炸做微尘。

奋斗到底呵，你们，伟大的爱国犯！
你们放着比殉道者更大的光芒。
听呵，全国人民激昂的歌唱：
团结御侮，中华民族不亡！

1938年6月3日

（原载1938年6月《解放周刊》1卷7期）

毕业上前线

这是时候了，
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纵或有点儿留恋。
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
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国难已经逼到了眉睫，
谁有心意长期钻研！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已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赶上来吧，
我们手牵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
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别了，别了，
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1938年10月于延安

华北联合大学校歌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
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
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
到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
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
同志们我们团结，
我们前进，
我们刻苦，
我们坚定！
国土要收复，
人民要自由，
新社会要创造，
我们要担任！
努力学习革命理论，
培养我们的革命品质。
我们誓死决不妥协投降，
战斗啊，
胜利就在明日！

1939年秋作于晋察冀边区

山东大学校歌

东临黄海，
南望泰山，
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
共产党和人民给了我们一切，
教我们发展德智体，
又红又专。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学习马列主义与科学知识，
要彻底改造思想，
服务于人民，
要永远朝气蓬勃革命到底。
奋斗啊，
奋斗啊，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
奋斗啊，
奋斗啊，
为了人类解放事业，
我们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62年作于山东大学

八十自述

人生八十古来稀，
喜见妖邪又剥皮。
阴谋欲毁英雄业，
丑类终遭历史讥。
涉乱反正人同愿，
创新局面世所期。
老头贡献虽渐少，
敢与中青迈步齐。

1977年八十生日有感

徐冰同志追悼会车中口占

合译《宣言》三八春，
延安痛饮未忘情。
可怜酒鬼多仙去，
“才子流氓”今独存。

1979年8月27日

中国人民大学校歌

记取，
祖国的儿女们，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难，
从四方八面冲破封锁，
团聚到可爱的延水河边。
忠诚，团结，
活泼，紧张，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
八年抗战，
血染华北峻岭与平原。
前进，
人民的大学！
继承先烈的革命模范，
艰苦奋斗，勇于登攀，
为新中国做出最大贡献。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
克服非无产阶级错误流传。

我们永远前进，
前进，
信守忠于人民的誓言，
奋勇前进，
争取共产主义的明天。

1980年春

人民大学校庆偶感

小股侏儒两脚兽，
汹汹气焰比豺狼。
万目睽睽光日月，
人间何世割喉忙。

亿万同仇挥热泪，
誓傲凶犯慰忠魂。
昔日“四人帮”干将，
不应依旧笑东风。

1980年10月3日写于人大校庆

为圆明园倡议题诗

名园遭毁灭，
敌寇罪行明。
复兹昭后代，
强盛应力争。

1980年10月13日

稻草人

做官第一老方针，
国计民生不用心。
若有事情出差错，
上推下卸总多门。

不辞对上献殷勤，
首长嘲讪无限亲。
长官意志惟遵旨，
三尺阿谀稻草人。

1981年

鄂豫皖纪行

一、红安

一别红安五十春，
重来如梦到山城。
多少英豪赴国难，
犹记倚门长叹声。

二、长冲

叛徒走后记长冲，
联络各方大有功。
劫后重来多不识，
花生一束慰老翁。

三、黄柴畈

炮火连天黄柴畈，
会议讨论军行踪。
叛徒一去全颠倒，
那记当年西与东。

四、天台山

此地一别太匆促，
重来风雨四十年。
但愿天台长健美，
山青水秀在人间。

五、鄂豫皖

三年战斗在此地，
劫后重来无故人。
多少英雄尽瘁去，
山河依旧露深情。

六、新集

新集曾经留盛迹，
旧居如梦记当年。
山河依旧惟人老，
文采留传天地间。

1982年5月4日—8日

为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题诗

创业艰难忆昔贤，
登临凭吊想当年。
惟希万代后来者，
远胜从前开路砖。

1982年5月25日上午

为荆州地区博物馆题诗

屈原故里何处寻？
江水悠悠无回音。
诗人一去逾千载，
芳草萋萋满别情。

1982年6月6日于武汉东湖

为湖北省博物馆所编

《董必武传》题诗

楚天风雨纪先驱，
备尝艰苦忆良模。
对党忠诚与坦率，
同侪敬佩共欢呼。

1982年7月15日

为纪念红军巧渡金沙江

48周年而作

巧渡金沙江，
胜利放光芒。
战略高一着，
威名镇四方。

1983年4月15日

四、散 文

东 京

自从九月一号的东京的大地震喧传以来，差不多大小各报纸每天登的都是关于这次天灾的消息。我每天格外提早起床，匆匆洗漱之后，便背着手独在斗室中围着一只圆桌徐行，等待那天的报纸到来饱我的眼福。有时候我的听官故意揶揄我，捏出一些似乎象叫报的声音，骗我到后门去张望；等我到那里去倾听时，却又听不出什么来，只有上海各弄堂里特有的刷马桶的永远的声响，带有一般鼻官所不欢迎的气味齐来，每把我的最后的知觉全窒息了。这时候我每每愤恨地关了门进来，心里埋怨送报的人不和我一般早起。直到“申报！新闻报！”的叫声由远而近，渐次响亮起来，我才把满腹的不平放下，急去收受我所特定的报纸。

真的，新闻纸上满纸的大大小的黑棒舞得太好看了，我由它们的舞蹈，不由得也要被它们拉了到我所不高兴再去了的烟雾冲天的东京去。地震的次数，火灾的蔓延，最后那死伤的人数！今天十万，明天二十万；这里十万，那里十万，那里二十万，假使我的加法不错，约莫早有一千多万了。号称五千万，实际只有男的千五百万、女的二千万的我们的东邻，假使死伤了一千万，那真应当死亡枕藉了。我为这种壮观所压服，只觉寻不出适当的文字来赞美。

我是前年春天从东京回来的，我自恨没有再等两年，致把千载一时的一个机会坐失了。我羡慕那些生存的人，因为他们

身尝大地震的陶醉，目睹大火灾的壮观，尽量享乐了。我也羡慕那些遭难的人，因为死神对于他们特别慈爱，没有使不必要的死之恐怖与痛苦来恼他们，便让他们进国门去了；而且他们之中的政治家，永远解放了政争中的患得患失之心；资本家永远解放了打算盘的手指与吸血的刺；劳动者永远解放了不平的愤恨；大学者也永远解放了浮士德博士一样的心焦；文学家更永远由众愚的冷遇和无聊的文人们的嫉妬与才毁解放了——这些都是他们所切要的，死神运用他的全神，一举为他们包办了。

小小的地震在日本是与三餐茶饭一样寻常，每月总有好几次。地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虽然对于我们的乘舟的作怪，微抱一种不安的心情，然而他方面那种醉人的荡摇，是具有酗酒以上的力量的。我每窃喜可以省几个买酒钱而忘怀一切去乐享这种神奇的陶醉。真的，这是一种神妙的境地。那时候，便是不会饮酒的俗人，身心不洁的尘物，便是怎样不可救药了的人，也不由得要感到一种平常或素来所不会尝过的快感。而且这种快感不是谁一个人独有的，如用现在的时髦文学家所喜欢用的文字说出来，那便是“民众的”。那时候，不仅自己恍惚翱翔于一个神奇的妙境，而且由半开的醉眼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邻人也在沉沉痛醉。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都蹒跚着很热心地在合奏一种雄厚的音乐。真的，那种魅人的情景，不是我们醒后所能描出万一的。

火灾又是日本特有的一宗出产，专就东京而论，每天至少也得有好几处地方。这又是一种极壮丽的光景，我们只要想起怎样火焰一哄而烧完数十百家的纸壁与薄板，怎样这些纸壁与薄板一吹吹到空中，化为一队队的火球，学群鸦或群星的飞舞，

或则怎样那些草席始而郁郁腾烟，树无数的黑柱，继而光辉焕发，照彻云霄，终乃散为流星，乘风直捣他人的巢穴，转瞬之间，又辟一块赤化的新土——我们只要把这样的光景想象一番，便可以知道东京的火灾是怎样富有诗意。我还记得十年前到东京不久，住在中国青年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火神在我们后面不远的一家旅馆得了手，转瞬之间，就拔了黑帜，易了赤帜。我所住的是三层楼由后数第二的房间，后部是一座露台，底下便是餐室。我从高处俯视火神一步步占了优势，他那轻巧的身躯，我至今不知道怎样便缘上了我们的餐室。我见他用轻软的红舌头，一路舔着餐室的木板，轻轻跑到了我的前面。在这不短的期间，我是始终完全为他所压服了——为他的轻巧与他的美丽。那时候一个朋友拔出了一根水管，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对准了火神的头脸淋下。当时我是怎样想阻住那个朋友，或则对着他的脸吐一口愤恨的痰去，当我看见火神的红的脸淋得不断地向两边躲避的时候！然而没有等我做出这种事来，水龙的使者早恶狠狠地把火神推了下去。我亲眼见了这种幻影消灭的悲哀，便再也无心在家里久留，一溜烟跑了出去。然而等我走出前门一望，我的面前才又是一片烽火，原来这边得到了那边的一个火球，早已响应了。在这边火神比较得意，他杀得高兴起来，便赤着膊放出万丈的霞光来，只一抹把这一带的人家全都抹倒了。第二天火神归去了之后，我去踏查战后的形势时，我在一望茫茫的瓦砾之中，几乎把路途都迷失了。这是我自己遇到的一回火灾，其余我从远外望见或在报纸中见过详细纪事的确是不少，他们的情状与结果虽或微有不同，总而言之，他们的轰轰烈烈的燃烧与诗歌般的情调，是我所不能描写然而决不能忘记的。

我可以这样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与火灾。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喜欢日本是因为他喜欢日本的女人，喜欢她们易于到手与喜欢她们身体与肥胖。关于女人我是外行，我是什么也不能说，然而就只提起地震与火灾，已经可以叫我听到这次的天灾而惆怅了。

这次的天灾是大地震与大火灾的合唱。我仅由报纸的传闻，已经觉得有点醉意了。至于我们的穷寒的政府居然象孤注一掷似的，把最后的一个铜板也拿了出来充账；与我们各界的名人一个个手持人道主义的旗帜，也一沐三握发，一食三吐哺，忙着筹荒，他们目的究在那儿，虽非我这种愚昧的头脑所能想到，然而他们的努力与大阪传来的新闻，对于我好象含有同量的酒精分，却是我所不能不感谢的。而且这些酒精分合作的结果，我愈觉得精神恍惚；如置身火焰齐天的东京市中了。

地震时的光景如象在我眼前。我们的不忠实的船儿，忽然作怪起来了。摇荡，倾斜，覆灭，警愕的叫喊，这是何等醉人心魄的活动影戏！狂奔，脱险，呆立，号哭，这又是何等催人沉醉的情景！我如适逢其盛，我定蹒跚而奔，教男人用白布缠头，提起木鞋飞跑，教女人卷起长袍，露着腿儿乱窜。于是我将自造一种解释，当他们在酣醉而轻歌妙舞；看花时节的猖狂，当能助我证明我的观察之不误。

这时候，火灾已经突起一方，渐次指东京的腹中乱刺，骄傲的人类的子孙当更赤着眼睛而狂乱起来了。我好象亲见一些被火神舐丧了胆的人们，或在负着笨重的草席而乱钻，或在裹着钢铁甲板Steel armour plate一般的棉被而狂涌。人类在忙乱的时候，每颠倒轻重，只顾把不要紧的东西救出来，倒把重要的财产丢了。然而这时候如果有人点醒他们的错误，我定要吐

他满脸的痰，或则到上海来请一个会吐痰的人去为我施行这种惩罚。真的，假如在火灾的当中，有人携着贵重的财货飞跑，他必是一个恶徒，一个乘机盗窃的强盗，我们应当击杀他。反之，那些正直的人，不怕他所携出来的只是一只敝屣，是值得称赞。我如在火灾中遇见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是千万人中一见的——我定要称赞他的旷达，定要为他携着敝屣，同对此景尽醉而欢跃。

东京这回的天灾真给了我不少的陶醉的享乐，然而东京对于我殊不能便止于是，我与它的关系太深了。真的，我在东京至少住了七八年，统观我国留学的全时期，只高等学堂的三年是在南方的一个小都市过了的。除了我的少小长离的故乡之外，我住了如此久的地方，算只有东京了。固然，我少年时代最快活的时期是在高等学校时代过的，那时候我还只十八九岁，那南方的小都市的气候既好，大学又如在我们的目前，不断地在激发我们的知识欲，而一种少年时代所特有的自负与骄矜又无时不在使我们自满，那时候我的心目中真只有春朝的宴欢与生之陶醉了。然而欢乐如彼雪花，一去不返；人生一世中，比较起来，还只有悲哀肯在我们心中留住。我回到东京入了大学后，虽也没有什么可哀的事情来扰我，然自那年初次回国，便深深感到了幻影消灭的悲哀，我去国时年小，不曾知道中国的事情，自那年回来，我才猛然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国家的国民了。素来瞧不起日本人的我，自从那次回国一游以来，不禁羞愧与愤恨齐生，终于暂时使我在悲哀的荒原彷徨了。在这时期内，除了学校的教室与实验室之外，我的足迹最繁的地方，是东京市外的几处原林与市内的几个图书馆。所以这次天灾的传来，我便不由得想起了这几处地方，同时我当时把我的多少悲

哀寄下来了了的林木与书堆，突然在我心中显现，而我那些寄下来了了的悲哀，似乎因为失了寄身之处，便又飘然归来了。世上没有可以写得出来的悲哀，纵然写出，然在他人眼底，也不过供人下饭的滑稽，所以请恕我略去不写。

有人听了东京的天灾，便想起了他在东京时爱过的妇女。我不曾爱过什么女人，然而这回女人死的一定不少，却也不免使人觉得可惜。而且混乱之中，多少美丽的“弱者”为鸡一般淫的男人所毁坏了，尤足使人愤恨。不过她们至少可以与那些穷无所归的女人去以皮肉维持生活，或竟组成娘子军，远去他乡，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这倒是对于我们的东邻极可欣赞的事。

资平的一篇小说里面有一位章君，是一个极痛快的朋友。他只要说上两句话，必有几个“痛快”在里头。我不知道同他痛快地饮过多少回酒，他每酒酣耳热，必更痛快地高呼“痛快”起来。他不仅对于酒很痛快，我回国之后，听说他对于女人也很痛快。这次天灾之后，在我的朋友之中，我第一个想起这位朋友。我不知他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怎么也打听不出他的消息来，心中很不痛快。如果他痛痛快快地死了，我想资平或者能够痛痛快快地做篇纪念他的痛快的小说。

约莫一旬之间，我每天只是这样开着眼睛作梦而遐想。然而好事多磨，不出十天的工夫，报纸上的电文渐次有些不对了，从前一个地方死伤了十万的，渐次七万五万的减了下来，还不知要减到那里。我见我眼前的对象，有如晓日之前的朝雾一般，渐渐淡薄下来了，我于是急忙停止了看报的一番工作。

后来一个朋友从东京回来了，我才知道怎样的一个内容。我于是想起了地震中的内阁会议一定有以下的三项议决案：

(1) 尽力宣传，(2) 乘机屠杀韩人，(3) 杀尽社会主义者。朋友说东京的改造计划前几年早已完备，只差一笔拆毁的费用，这回地球——我们的母亲振臂为她的幸运儿代办了。我于是想起了地震中日本政府是怎样开颜大笑。

我于是想起了日本的炮舰怎样在长沙上陆而猖狂，我于是想起了台湾人怎样在厦门肆行无忌，最后我想起了一些慈善大家怎样为日灾筹赈。我真十分佩服我们同胞的大国民气慨，我真十二分佩服我们的慈善大家；我所敬爱的我们的慈善大家哟！象你们这样抛头露面，还怕不声誉远闻？

然而我依然能够想起地震荡摇而微醉，我依然能够想起火灾的壮丽而神驰，因为幸好我趁早丢下新闻没有看了。而且我相信地震的乐谱与火灾的影象，已经刻上了我的深心，我是随时可以使它们再现出来的。

十月十日

(原载1923年10月《创造周报》第23号)

太湖纪游

“仅仅几分钟的工夫，就能使我们由龌龊的都市逃出，投到纯朴的大自然的怀里来，我们是不能不感谢发明蒸汽机关的人，我们是不能不感谢Watt。”

我心里这样想着，我的双眼不住地在一望无涯的平原之中狂驰。远方的树木在同我们赛跑，近处的田畴在为我们后退；大地好像分做了两半边在我们的两边旋转：左边的与钟表的双针同一方向，右边的却恰恰相反。我把全身靠在车上月台的后壁（因为我们始终不曾得着一个坐位，直到我们的目的地），眼睛跟着电线的Catenary 在玻璃窗上波动：有时电线低到与我们齐肩，有时直涌出车窗以上。无尽藏的电柱一根根把我们一瞥便过去了。

无锡的梅园与太湖的风景，去年此节便有友人Y君与K君约过我去游玩。那时候，一因不得闲暇，二因游兴不佳，终于不曾实现。这回又是两君来信劝诱，爱牟首先心动，他好像打算一件重大的事情一般，用了回想的神气说道：

“明天是礼拜六，还有大学的筹备会议要去来；后天恰是礼拜日，他们正可以引导我们去探访。后天我们早点起来，乘早班火车去，我们可以玩一天整的。第二天他们有功课，我们可以自己去游玩。”

N也是无可无不可，于是我们便决定了采用爱牟的计划。

我从长沙来到上海，不觉已经一年有半，我常常对江浙的

朋友们诉我这一年余还不曾感到江南的情调。他们之中有些说：这是因为我总是个南方人；然而大多数都责我不应长在上海不去游玩。我知道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杭州与苏州我曾去过，结果是使我失望了，我更不知尚有何处可去，我也不曾有过许多的余闲。

我常常这般想：我们如果要领略江南的情调，我们不应当向俗人麇集的地方去寻，我们应当向时人罕识的赤裸裸的大自然中去欣赏。因为审美观念尚未发达的一般的中国人，当他们破坏一切美的事物的时候，他们实比恶魔还要凶狠。

无锡是一个小小县治，太湖尤是强盗出没之所，他们或能使我感到江南的情调。我这样想，所以爱牟提议坐三等车的时候，我还笑说坐四等车都不要紧。

昨晚有人请我们吃饭，爱牟高兴起来，便拉着大家饮了不少的酒。结果是他喝得大醉了。我护他回来睡下之后，因为还有点事故，便又坐了电车往上海的中央部来，但我也饮了不少的酒，不知不觉之间，我在电车上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我已坐过了约莫有两倍多的路。

今早我从醉梦中醒来。从衣袋里抽出表来看时，已经是七点了！不仅早班已过，七点半的第二班车也已来不及了。我急忙穿了衣服来看爱牟时，他兀自酣睡未醒！

我们幸而赶上第三班快车了。虽然没有得着坐位，然而一到这久阔的另一世界之中，我们便什么苦痛都忘记了。

现在在我们面前展开着的是一片一望茫茫的旷野。我们远望浑浊的层云，我们近看澄清的流水，我们看远树，看近村，看阡陌上的行人来往。

在这爽人神魄的慈惠的自然之中，有使我们看了不快的，

那便是在田亩中散着的棺材与高塚。这是人为的破坏之一例。我觉得好像有唤人复归现实的呼声在响，又觉得好像在葛雷的《墓畔哀歌》的世界，大地顿如一片荒坟在眼中高高涌起。我把带来的《季刊》二卷二号中爱牟所译的这首名诗翻出来低吟了几遍，心中不觉起了一阵不可遏的悲响。

到处只是一样的树木，一样的人家与一样的田亩，上海到无锡的旅程毋宁说是单调已极。在这样的单调之中，多少可以给人一点新的刺激的，只是崑山天平山与苏州的城廓。然而以这点新的刺激来破极端的单调，未免太微弱了，我们终于在这种单调之中到了无锡。

Y君与K君在出月台的地方引领观望，我们在人群之中挣扎着，相望而点首。他们显然是很愉快；他们是从九点钟以来钉在这里。

无锡是这样大的一个都市，这事情便先使我噤住了。惠泉山形似长沙的岳麓山尤使我惊喜。我们在一个馆子里吃了一点点便饭之后，便雇车直赴惠山。

我把惠泉与岳麓并提，不过是就山的外形说。若就山的外观与内容说，到底不能同日而语。岳麓前临湘江，湘江不是运河所可比拟；岳麓有葱郁的树林，有深幽的禅院，有醉人的钟声，有滴滴的泉水——这些都是惠泉所无的。岳麓虽与长沙城只隔着湘江，然而湘江既甚广阔，中间尚有一洲（即古长沙，今已成为陆地，有居民不少），我们从长沙望此洲，已经好像是海中的仙岛，我们更由此洲望岳麓寄我的遐想，便是遥趋岳麓，避城市的喧嚣。在死城一般的长沙，我能在死尸的堆中住至一年以上，实是因为有了岳麓。

我在长沙一年余的生活电影似的显出在我的眼膜，多少事

使我悲酸，又多少事使我苦笑不已！成败是什么？荣辱又是什么？只要是此心所安，那便是天国的实现。浅薄无聊的世人哟！不可救药的群盲哟！……当我这般热狂起来，我们已经到了惠山脚下。

我们在寄畅园与淮军昭忠祠走了一转，看了所谓天下第二泉之后，便直取向梅园的路走去。这条路说是梅园的主人荣某所修的，路的两旁差不多尽是一样高的桑树。间有勤劳的农夫在田中一根一根的丁字处理。我常在路的两边行，便有媚人的小枝时常把我的衣袖牵住。我幻想到采桑的时节应当是如何明媚的一片风景。美妙的年轻的姑娘，艳阳的天气，含烟吐翠的桑园，欲绝还飞的低唱。我想大抵要这样才是真的江南的情景。

同是一样的行路，然而一个哲学家可以没入玄妙的思想，一个科学家可以感受自然的启示，一个诗人可以翱翔于美妙的诗境，一个社会学者可以聚神于生活的观察。我既不是这些人中之这一种人，也不能说是那一种。在上海禁锢了年余以来，我的心情已经失了它旧时的微妙的感受性了。三年前与爱牟同游西湖时，我重见了故国的好水好山，便想起了不少的童时的情景；我恍惚童时有过一双健强的羽翼。然而三年后的现在的我，只觉童时的我已如幻想中的安琪儿一般，已经渺不可即；便是三年前的我，也好像从我手里放去了的一只鸟儿，只是望着那没有边际的天空在飞，已经无法可以呼唤转来了！

在我的心眼之中尚能隐约查看出来的，只是年余以前的长沙的情景。我们绕着惠山行动时，多少有点相像的岳麓山便也徐徐在我眼中旋转。今天因为是礼拜日，有许多年青的学生成群结队而来，他们是看花回来了。他们的笑语飞扬在乳浊的恼人的低空，他们的红颜照耀在晶明的柔和的桑树。他们的朴质

的服装是何等轻快而皎洁，他们的青春的四肢是何等柔软而活泼！我注视着他们的丰实的神气与他们的澄明的眼睛，不禁要流出感激的眼泪来了。

带路的Y君与K君忽然把我们带上了大路右边的一条小径，我们现在是对准山洼在前进了。去年夏天我们极想移到乡下来住，两君写信来说有一个风景极佳的房子，只是我们终于不曾来过。现在我们是往这个地方。

路旁有一个私立的小学，虽然狭小，却很清洁。小径从这里右转，一池碧玉般的静水首先牵住了我们的视线。接着便是左右两条雪白的小桥，与对岸的一个两层的洁白的亭子。稍远处便是一栋矮而明洁的红漆的小屋。我们加了速度，看看左面的池水，又左右看看路旁的梅花，高兴得什么似的前进。有时梅花的香气飞来，我们也不禁为它暂时停止。桥旁的柳树下有三五个小儿在喧叫。我们轻轻地走上桥来，似乎把他们吓了一跳。小屋共三间，还没有人住。我们从阶下回顾望远，隐隐有连山在那边的天际横卧着。亭子建在屋前的假山上，中有长椅，可以坐看这自然清绝的小天地。屋右的林中时有萧萧的风声在响。我们大家倾耳而听，大地顿如沉入了静默的深渊，只闻风声在太空之中消涨，世界在静默之中推移，我们好像超然物外，独立自在的样子。

理智命令我们离开了此处，也不管我们是怎样依依不舍。回到大路上来时，我们还是偷偷地频频回首，我们口里不断地说要移来，虽然心里明明知道世事鲜如人意，明朝的事谁也不能断定在先。

因为怕我的痛脚不好多走，大家改坐了车。归来的游客渐渐增多，他们显然是已经在赶他们的归路。欢乐使他们忘了一

日的疲劳，他们的笑语欢呼，依然在低空中跳跃。梅园的梅花在低垣上静悄悄地探望。门前的车夫在向门内张罗着等候游人归去。我们因为要先往太湖，便飞一般的过去了。墙内有尖锐的笑声飞扬，春游的欢愉的情绪顿涨。

翻过一座小山，前面已经有了一片澄明的清水。

“这是五里湖。”K君回过头来说，他的眼镜上有湖光在辉闪。

湖水好象在绕着几个远岛飞旋；不多远的路，便转到了我们的脚底。我们弃车直下水滨，恰巧有只小船在等着。

我们曾从车上望见有几片孤帆在远处的水天之间倾倚，但是湖边的水却很平静。湖中的鼃头渚在招引我们，犹如神怪小说中的仙岛。当我们离开湖边的时候，我们觉得好象是能够离开了这现在的世界，向着一个新的可惊异的世界在走；我们被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希望萦绕着，舟子的橹声是异常轻快而果敢。

转瞬之间，我们已经发现了自己完全在一个水的世界，我们刚才所离开的岸与岸上的湖神庙已经远隔着浮在那边。我们是在水天之间徙倚。我环顾湖山，日本濑户内海的风景无端又显出在我的前面。那是七八年前的事。在一个春假中，我与爱牟曾在这明湖一般的内海畅游过一次。那明媚的风光，至今还不时来入我的清梦，只是鲜明的程度一年不如一年了。我竭力想捕住当年的情景，然而在我眼中显出的，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幻想。清风徐来，把我眼中的幻象也吹得象湖水一样激荡不宁，却使我想起了哥德的《湖上Auf dem See》：

Uud frische Nahrung, neues Blut,

Saug' ich aus freier Welt;

Wie ist Natur so hold und gut,
Die mich am Busen haelt!
Die welle wieget unserm kahn
Im Rudertakt hinauf,
Und Berge, wolkig himmelan,
Beegnen unserm Lanf.

Aug', mein Aug', was sinkst du nieder?
Goldne Traeume, kommt ihr wieder?
Weg, du Traum! so gold du bist;
Hier auch Lieb' und Leben ist.

新的营养，新的血涛，
我由太空之中吮吸；
自然是怎样惠好，
这拥我于怀的！
微波荡摇我们的小船，
常与棹声相和，
连山耸入云间，
遥遥在迎你我。

眼哟，我的眼哟，你为何下垂？
黄金般的好梦，于今再回？
去罢，梦哟！你虽则美如黄金；
这里也有爱情，也有生命。

我默念到这里时，怎么也不能再念下去。哥德真是太幸福

了。他虽是辞别了心爱的人而来，然而他的澄明的心境常能从大自然中发现新的爱情与新的生命。到处飘流的我却只能在朝雾一般消残了的梦境中搜寻我的营养。爱情与生命是给 Tantalus 的两种最惨酷的刑罚。

隐忧一来，我眼前的世界忽然杳无痕迹了。一片茫漠的“虚无”逼近我来，我如一只小鸟在昏暗之中升沉，又如一片孤帆在荒海之上漂泊。一种突然的震动把我惊醒时，多谢舟子们，他们把我由荒海之上救到鼇头渚了。

我们一个个奋勇先登，好象战胜了的骑兵争先占领城地一样。我们已从渚上面对着汪汪的太湖了。Y君抢着到水边的岩石上去听潮声，但是今天的太湖好象正在甜眠，只不住地在把层岩轻舐。

我遥瞰着太湖，徐徐吞吐新鲜的呼吸；觉得神清气爽，好象可以振翼飞去。这时候夕阳已将下山，好象一个将溺的人红着脸独在云海之中奋斗。东边的连山映在夕照中，显出了它们的色彩的变化之丰富。N是一个画家，便从衣袋中抽出一个小簿子来临写。我们一齐抬头仰看Apollo的车骑在云海之中动摇；金鞭指处，一片灿烂的金光射来，暂时辉耀不已。

渚的高处有亭，亭的那边尚有一座花神庙。我们匆匆跑过一遍时，渚下的舟子已经在招我们归去。我们同夕阳一步步往下行来，我们下得船来时，夕阳也已经沉下去了。

连山与我们之间，渐渐垂下了一重重的帘幕；山洼岛上慢慢吐出一片片的青烟。天空越发低下来了。

我们在沉默之中登了岸，又入岸上的古项王庙看了一回；庙中的人已经在吃晚饭，我们便匆匆出来了。车夫好像已经等得不耐，见我们出来，便一个个活跃起来了。

我们在昏冥之中，还从车上不住回头远望。我们自恨没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同太湖诚恳地约了再会。太湖哟！永远的太湖哟！我们虽是乍见便要分离，我们是永远不能忘你！

过梅园时，门前已经没有人影，我们入园约略跑了一遍，人为的风景总觉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来。一堆堆绰约的梅花空在晚风之中把她们的清香徐吐。

一路犬吠声把我们送出门来，四周已经打成了一片无缝的黑暗。我在车上不禁又想起了《墓畔哀歌》中的诗句：

“把全盘的世界剩给我与黄昏。”

三月九日脱稿

（原载1924年3月24日《创造周报》45号）

江南的春讯

达夫：

前几天接读了你的《北国的微音》，今天又接到了你的一封信，信虽很短，然而我们看了之后只觉半晌说不出话。

我们各人写了几句简单的回信之后，沫若只是在那边默默地踱去踱来，只让他的急促的步声略告他的悲伤的心境，我只呆呆地注视着你的来信。

现在沫若跑下楼去了，他的步声虽然没有刚才那样高，然而依然是很急促。他现在高声吟唱起来了。他念诗的声音你是很知道的。我时常觉得他的声音于激越之中含有不尽的悲哀，于悲哀之中又含有几分的激越。我知道他此刻正在为你悽楚，也在为自己悲伤。我听了他从楼下送来的动人的声音，不觉更加了几分悲伤。想起了你在《北国的微音》中所说的话，不禁磨起墨来，想同你笔谈一阵了。

一个人生在世间，本来只是孤孤单单地在走各人的路；纵然眼见有许多的人同自己在一起，好像是自己的同伴，然而仔细看起来，自己与别人的中间实有一个无限大的空域。一个人就好像物质构造上的一个分子，只能任自己的微细的躯体在自己的孤寂的世界之内盘旋，永远不能跳出一步。一个人只要复归到了自己，便没有不痛切地感到这种“孤独感”的，实在也只有这种感觉是人类最后的实感。

所以你说的“牢牢捉住这‘孤单’的感觉”，实是文艺创

作上的要诀，因为什么可以称为最高艺术，除了“生之实感”？

不过你说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由这“孤单”的感觉催发出来，我以为不如说都是为的反抗这种“孤单”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闯进人生的宴会上来的恶魔，人类自有始以来便与它在不断地狠斗。未受文明的流毒的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生活没有我们今日这等困难，他们都有闲暇的时候，这种感觉便也最频繁地使他们烦恼。他们驰逐于山林，他们漂流于海上，无非是反抗这位狠毒的闯入者。世渐进化，生活渐难，人类忙于维持自己的存在，便把自己的身神没入于生存竞争，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后来更只无意识地反抗了。所以我以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反抗这种“孤单”的感觉。

人类的生活，我以为是一部反抗的历史。不仅从古以来经过了无数反抗的激战，即每一个人生下地来便不能不与气候斗，与疾病斗，与他人斗，与习俗斗。人类是反抗着而存在。

有许多古昔的贤哲为自己的虚构而斗争，而反抗；他们不仅反抗他人，而且反抗自己。他们的反抗纵令失败了，然而他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反抗便是生活。

人类是在反抗着而生活；而这种种的反抗都是一个一贯的，对于孤独感的反抗的分枝，全体的不变的目标是在反抗这种人生的孤独感。

讲到了反抗，达夫！我觉得不可不把近来时常在我心里的几句话同你谈谈了。再过两三天，我回到中国来就要满三周岁。我抱了反抗的宗旨回到中国来，你是知道的。这三年中间，我的反抗有时虽然也成了功，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弄得几乎无处可以立足，不仅多年的朋友渐渐把我看得不值一钱，便是在我自己并没有野心想要加入的文学界——在这样的文学界，我也

不仅遭了许多名人硕学的倾陷，甚至一些无知识的群盲也群起而骂我是黑旋风，骂我是匹疯狗。可是我对于这些天天增加的倾陷与毒骂者，我只觉得他们不过是跑来在我的反抗的炉火上加一些煤炭与木材，使火势不至于消灭。当然我的反抗决不是对向他们，我反而觉得他们有怜悯的必要；我的反抗是对向酿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全体。有时候，因为人类已经不可救药，我也不免时抱悲观，然而当我否认了一切之后，我到底把反抗肯定了。

从小深处僻地的家中，全然没有与闻世事，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了的我，早已知道自己不适于今日的中国，也曾痛哭过命运的悲惨，然而近来更觉我与社会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我要做人的生活，社会便强我苟且自欺；我要依我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这样的状态是不可以须臾容忍的，而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们自拔出来；在这样的穷境中，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了！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

古来有多少善人贤哲，为了一种空想或理想，闹了多少的斗争。他们是与自己的影子在争斗，所以总没有过战胜的一天。我们的对象不是什么空想或理想，我们是面对现在的社会，我们要把现在这社会的咽喉扼住，把它向地下摔倒。

我们要随时随地与社会战争；以前继续下来的反抗的工作，我们要更加用了充分的意识做下去。有些人宣传我们的本来不值一钱的文字为“为艺术而艺术”，称我们为颓废派，一些以耳代目的人便也一齐向我们乱指；专门诬害他人的小人们哟！让你们的良心从黑暗的囚牢里跑出来；以耳代目的盲人们哟！把

你们的眼睛从狭小的眼眶里放出来，你们再看看我们以往的文字，也看看我们将来的作品罢；你们把你们惯会拿来诬人或惯会盲从瞎闹的文字丢开，看看显而易见的彼此行为罢！

达夫！我想起了现在满目皆是的这些小人与盲人来，不觉我的反抗的炉火又加了一番火势。最近又有许多以社会主义号召的人也似乎隐隐约约地说了些关于我们的话。我真不解他们几时从什么地方得了专卖特许权，能够说别人所卖的不是与自己的同种。打“只此一家”的招牌，还不过犯了狡猾的商人的恶习，然而诬陷别人，惑人欺世，正义到那里去了？这也是要有以耳代目的群盲的中华民国才有的事。他们只知信任自己的耳鼓，别人在他们的耳鼓边乱吹一阵，便也肯信而不疑。我愿扯住他们的耳叫醒他们，教他们张开自己的双眼，亲眼看看彼此的行为的实际。我以为文艺与社会运动素来是取同一方向的，打出了社会运动家的聪明人哟，你们也不要因为不曾看见，便诬他人不是同你们在一个方向走！

写来不觉很长了，达夫！你说孤独感“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我现在提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的反抗这种孤独感”的一个议案。不过我所谓反抗只含有争斗的意义，没有灭绝的意思。因为这种孤独感是不能灭绝的，反而我们愈反抗，它便也愈逼近拢来，我们纵然一时把它打退了，它仍要取更凶的威势扑来的。所以归根起来，它仍如你所说，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

达夫！在我回国后这三年之间，我的全身神差不多要被悲愤烧毁了。这两种激荡不宁的感情就好像两条恶狠狠的火蛇，只是牢牢地缠住我不肯松放。奄奄待毙的国家，龌龊的社会，虚伪的人们，渺茫的身世，无处不使人一想起了便要悲愤起

来。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愈是坏人，便愈能卓立，愈是无知无识的流氓，便愈能成为伟大的名人学者，我偶然愤不可遏，骂了出来，那些名人学者固然千般倾陷，便是一般的群盲，也就张开大嘴大呼奇事，甚或要加我一些不当的称号。我想起了这种不可救药的社会，想起了这种忘恩负义的群盲，有时也觉得全心都已灰烬，然而我现在悲愤的深渊之中发现了“反抗”这条真理，我从此以后更要反抗，反抗，反抗！孤独的朋友呀！我们仍来继续我们的反抗，反抗到那尽头，要死便一齐同死！

关于我结婚的事，我以为你此后倒可以不要再为我忧愁，因为我只要听到了女人二字，就好像看得见一张红得可厌的嘴在徐徐翻动着向着我说：“你虽也还年轻，不过相貌太不好，你的袋里也没有几多的钱。”托尔斯泰生得丑陋，每以为苦，但是他颇有钱，所以倒也痛饮过青春的欢乐。像我这样赤条条的人，我以为决不会有什么女人来缠绕，对于一个Misogamist，这倒也不是怎样坏的境遇。

春光又回到江南来了，梅花已经反抗着春风，登场演了她的一回手势戏。再过些时，龙华的桃花就要开了。黄埔江的浊水常在激荡着反抗它们的命运。新落成的欧战纪念塔上的女神常在放着光反抗旁边的高塔的威压。在一间破陋而漫无秩序的长方形的房子里，三个方正的男子常在商量周报周年后改良的方法，预备反抗一切未来的困苦。达夫！你如能回到南边来，就早点来也好，我们需要你呢！

三月二十八日

（原载《创造周报》第48号，1924年4月13日）

矮丑的说道者

人类的最大的缺陷，便是各人只生有两只眼，而且都是向着别人的。

假使一个人忽然之间生出了第三的一只眼，我想第一件他应当惊异的现象是世人欢喜倾听他人的瞎说。

假使一个人忽然之间生出了第三的一只眼，我想第二件他应当惊异的现象是世人之中越是不懂的人越是喜欢瞎说。

我带着我的小狗在街上闲游的时候，远远望见那边有一群人麇集在那里，宏亮的说话声在空中波涌着。

我的小狗在人世活了不少的年头，也沾染了人世的不少的恶习，便也象那些人一样，只顾向里边挤。我生怕我的小狗伤了，牵着绳子跟在后边，转瞬之间也被挤到了里面。

一个矮丑而带眼镜的人站在高处说话，他常从眼角边观察他的听众。

“所以，听我的话，常把你们的眼睛注视别人！”

天下事，没有比攻击他人还能给你更多的快乐的。

把莫须有的罪名先一日加给你的敌人罢，那便不论你怎样把他说得禽兽不如，世人也要一齐信你。

不要想用证据去证实敌人的罪名，反而只要在你的言论中认为已经证实，认为一件事实，世人便也要一齐信你。

不要为道德而踌躇？不要为正义而沮丧；因为道德只是骗人的一个法门，正义也早已不再跛行而随你。

然而当你攻击他人的时候，莫使他人见你的真身，也莫使见你的尖锋罢！

让你的言说如妇女们的花言巧语，让你的姿态如僧道们的端庄敬重，因为你的攻击纵然失败，世人还要为你的言说与姿态而称赏你。”

我无端听到了这样的几句话，这时候，我的小狗忽然与旁边的一个人争闹起来。我的小狗究竟弱小，只恨恨地瞅着它的敌人，回骂了不少的话，就自己离开了，虽然它装着不服，几次三番要再往碰命。

我带着我的小狗离开了那地方之后，深喜我的小狗没有贪听这一类的言语。

我想，假使对于人类的改造我有什么希求，我希望人类能加生一只慧眼，而且对向内面开着。

四月九日

（原载1924年4月《创造周报》第48号）

春 游

近来我对于自己的游惰，渐次发生了一种极强烈的反感。最初，我还只觉得闲着手不做事不象样；其次，我渐渐觉得我这个人真不中用，真可鄙弃；最后我近来开始自己轻视自己起来了。这种自己轻视自己的感情，我只在学生时代有过几次。那时代，或是因为偷懒，或是因为神经病发作，或是因为要特别准备考试，不得不向学校请假的时候，虽然也喜欢暂时可以不做机械式的苦工，然而心里总有点觉得不大好过，有点怕见别人。在别的学生全体在课堂上课的时间，一个人独在家里闲居。或穿着制服在街上跑，这实是比什么苦工还要苦的工作。家里的，窗壁器具显出一些使人发汗的冷齿来，街上的行人的眼睛好像是专为猜疑一个离群的学生而生的，就是那素来极老实的太阳，他也迟迟不进，故意要使人烦恼。这时候，不论自己怎样辩护自己，总不免要觉得惭愧，更由惭愧而渐渐轻视自己。

我坐的人力车把我从齷齪的市中向龙华拖去的时候，这种感情又开始来缠绕我。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当我要去探春的今天，好像比平日要勤快一倍的样子。虽然我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忙，然而我从他们中间通过的时候，我只觉得好像我面前有一团熊熊的烈火。这个车夫好奇怪，他的跑法与别的车夫完全不同；别的车夫总是一耸一踊的跑，他却把全身当做了一个螺旋，在向空间螺进。我很惊讶地凝视着这个螺旋，心

中却不住地把我与他的不同的两个世界在比较。一样的往龙华，偏有这样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状况与不同的心境！我打量他的身体，不像有什么缺点使他不能算一个人，他一样也是人的儿子！我这样想起来，恨不得马上跳下来让他坐上，我们来轮流拖着车跑。然而——纵不论及我的左脚有病，就只这被些少的知识去了势的我啊，恐怕拖不上两步，就要把我车上的乘客倾倒。我越想越觉得心里烦乱起来，我倒羡慕这车夫的平和的心境。

自从爱车去了之后，我心里更加寂寞起来。又因为病卧了几天的缘故，我只觉得异常烦恼。回国以来恰恰三年了，我的有限的光阴，总是这样任它流去的吗？这只给我失望的痛苦的文学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纵忍痛含羞而不足惜的吗？我非去与一切的门阀讲和不可吗？我将听从我们那些可敬的社会运动家的话，也做些“干呀！干呀！”的文字印在纸上，使那些正在读书时代的，热心社会运动的青年拿去叹赏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常在我的心头来往，我的神经病时常待发作，犹如在寻觅出路的一团高压的烈火。

今早嚼着面包看报的时候，看见了泰戈尔欢迎准备会的一则纪事，我心里大不以为然起来，我向T这样讲：

“这些人比我还要闲着不做事，我都觉得可以在他们脸上吐一脸的痰。”

“你以为他们闲着吗？他们是忙着想博一点小小的名誉。”

“那就更该死了。”

我狠狠地把报纸丢向一边，却抬起头来观看窗外的天色。在我窗子的上半部横着一片长方形的天空，浊得像牛乳一样；只右边的一角，露出一个好像无底的澄碧的深井。一方面低迷的天空好像要压到身上来，他方面那一角闲静的青天，又好像美

女的明眸一般，在把我勾引，使我恨不得便向这无底的深井中一跳。据我自己的经验，这种恼人的春天是决不许人坐在家里心平气和地做事的。我于是想起了病中不曾去看的龙华的桃花来了。

前礼拜扑一个空，扫兴回来了的N说：现在该开齐了罢。

开齐与不开齐，我可无暇多管。住在上海好像坐牢，孤独的我又没有什么娱乐，在外人庇荫下嘻嘻恣欲的狗男女又使我心头作呕。外国人办的几个公园，都红着脸去游过多次，半淞园又那样浅薄无聊，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住？——我心里这样乱想时，我们都已穿好了衣服。

刚下了楼，邮差送来了一束信件。约略把要紧的信看了。信以外的是一些投稿和新出来书籍，杂志与报纸附刊之类的东西。近来我渐次欢喜看外国的名家小说起来，我最怕看给我们寄来的这些物件；一半是怕增加失望的痛苦，一半是因为我近来痛恨这种糟踏好纸、迫害排印工人的无聊的出版物，我把一部杂志扯破，分给了N和T，叫他们如厕时利用。我自己带了几张什么周刊附刊；留下的两张却屈它们代替了一个鞋刷子。

“谢谢。”

N和T一时猜不着我在向谁说，呆住了。我近来因为痛恨游惰的缘故，时常痛骂我所认为游惰的人。对于这种专门写些无聊的文字出风头的闲人，我的愤怒便再也按不下去了，不管T怎样向我申说这是可以伤那些作者的感情的。

我们渐次离开了窒息的尘烟，渐次走上了田间的上路，我在车上不住的乱想，但是我前面的螺旋，常把我回想的眼光扭了过来，使我想不起有系统的思想，我想起今天是来游春，我决定不再乱想了。我开始注意路旁的桑树，开始注意田间的

人家，开始注意远方的缓舞风前的弱柳。

乳浊的低空里，渐次有成群的矮树在吐着淡青色的轻霞，望去好像一个小儿方从梦中微醒过来的样子。看，它因为准备起来跳跃，已经开始徐徐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了！

游人好像渐渐增加起来，汽车蓦地从身旁过去，惟在一阵突起的飞尘中留下一声可以截铁的、锐利的笑语。马车得得赶上我们来，得意的年青的男儿，骄傲的美妙的少女，很高傲地望了我们几回，便扬长而去了。

我们尽在沙尘中苦煞，我的螺旋好像不能前进的样子，富儿们的车马却早已流水一般的过去。我的脸似乎被沙尘披满了。骄傲的有钱的男女们！你们在华丽的大货店或大菜馆装点门面好了，为什么要来虐待路上的行人，轻侮这失意彷徨的我？

渐渐有一株一株盛开的桃树掩映在陌上人家了。游人都左顾右盼，指点相呼，好像全然沉灭在桃花的观赏了。只有汗流浹背的车夫，却仍在一心猛进。

右手边有了一片泛着红潮的桃树，但我们的车还是前进不止。又走了不少的路，我们才到了龙华。游客已经来得不少，一座高塔先牵住了我的注意，回头一看，却在一片车马的那边发见了一所寺院。N把我们引进了这寺院里。这是“龙华古寺”。游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了。妇女们在忙着烧香，男人却只是东奔西走。寺的建筑并不佳，两侧都有丘八住着，苍白的和尚使人看了作呕，除了丑恶的木偶之外，似乎没有一点可以使人发生宗教的情感。一些艳装的妇女在到处烧香跪拜，我从前只知道大绸缎店与大洋货店是她们最有用的地点，现在却发见了她们还有这一种用处。我们在人丛中混了一阵，觉得烟雾难当，便让N殿后，匆匆逃窜出来了。

“看桃花去罢。”——我的这个提议使N呆住了，他看了看我，知道我不是被烟雾薰得神经错乱了，才告诉我这里的桃花不甚多，我们一路行来所见的已经不少。我听了他的话，几乎笑了出来，因为以桃花著名的龙华只有这寥寥的几株，实在未免近于滑稽了。

我们想极力避开这些浅薄的男女们，便取了一条僻静的路走去。转几个弯，我们已经离开他们了，打破了一切的障蔽，自己诚忌地投到大自然中来时，世界要比平时光明几倍。我现在觉得我的脚步轻快起来了。勤快的农夫，质朴的农妇，他们在从事种种迟钝而平和的工作，孜孜不息。这光景又使我愧恨自己游惰起来了。一个连长带了一队步兵从田中绕过，我心里暗想这也是些闲人，我们的民族全被这种种闲人弄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僵尸了。

也不知道要往那里去，偶然走到一条溪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石桥上乱喊。我们急忙走近，依他的视线看下去时，水里面隐约有一个小人头在上下。我想向溪边跑下去，却早看见一个农夫“扑通”一声，跳下去了。溪水并不深，转瞬之间，这个不幸的小儿已经被抱上了彼岸。我们掉转头去看那边泛起一片红霞的桃林时，便对N与T说：这个男人是我们的社会运动家的代表。

绕过一个人家时，先锋N忽然站住了。几个年青的姑娘在那里写生。N轻轻告诉我这是他母校的学生，顶前面的便是他曾说过的D姑娘。我们轻轻走过去。D姑娘笑向N点首。她们好像才来，画面还是些白纸。我们怕她们不好意思，便徐徐踱过去了。我心里想着N对我说过的话，觉得D姑娘她的红颊美过桃花，她的心情更是优美无比。

到处有一种醉人的香气，我深深吸入胸中，自己觉得快要醉了。我想起日本西行的一首和歌来：

年轻的生命，我愿在好花下边，与春俱谢了，
当那阳春二月间，明月团圆的时候。

心中忽然起了一种悲感。我遥望着远处，那边渺不可即的远处，但愿我能够颓然倾倒。

一个小小村落前有一片鲜美的红霞。我们从田间的小径走到了它的前面。我们在桃花下立了一回，觉得彼此的脸上都有点红了。迎着春风走来，又寻到了盛开的几树。溪那边有一所私人的亭园，我们寻着一条小桥跑过去，叩开门，在园内走了几转。

我的病脚到底易疲，我渐次落在后面了。N和T见我这种情状，便也提议早点回家。我不愿打断他们的游兴，反而要他们多跑了几处地方。我们再从石桥经过时，日已西斜，写生的姑娘们已经不知何处去了。

疲倦毕竟逼我坐了车回家。我心里自问：我的一生便只能这样游惰的吗？我向两边的桃花告别，桃花也好像入了一种反省的心境。这回的车夫不像那个螺旋，只是一跳一耸。我的脑中充满了桃花，烟、雾，写生的姑娘，民众，运动家的代表……

（原载1924年5月《创造周报》第51号）

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千里雪山中

干部团在卓克基休息了几天之后，又开始前进。路过马尔康，有一个大喇嘛寺，大家进去参观了一下。外面的结构规模宏大，大灯笼、大鼓等，陈设堂皇。进到礼堂，大概能容纳数百人，周围悬挂几丈长的黄绸，显得很庄严，但有点阴森的气氛。前台长桌上摆着很多供品，都是黄油制成。喇嘛还没回来，我们的部队好象也没驻扎过。

这一带地形非常险要，周围许多山上都有积雪，又时常下雨，河流错综复杂，遇到森林，古柏苍松遮蔽了天日。部队总是在河流边过来过去，森林密的不知有多深，常有敌人从密林中放来冷枪，我时有伤亡，但亦无法搜索。这次干部团整队前进，敌人一枪击中我前队一人，抢救无效，敌人渺无踪迹。

八十里路过梭磨，走得很疲劳，有的单位深夜才到。梭磨有一座能容纳几千人的大喇嘛庙，总司令部的直属单位驻在里面。周围有一些村子，都不大，许多单位挤在一起。又走了七十里路到马塘，只有几家小商店，平时专门收买附近的药材、羊毛等货。所以部队的绝大部分都露营，夜间又雨雪纷飞，弄得大家的衣服被毯全部湿透，根本无法睡觉。在马塘休息了一天，把衣服烤干，第二天拂晓出发，翻过高约五十里路的马塘梁子，在山顶饱受风雪，夜间才到马河坝。沿路未见藏民，房

屋也都是空的。在马河坝休息两天之后，进到则格、黑水、芦花等地，总是沿着河流左右迂回前进，遇到雨后的水流暴发，波涛汹涌，就不能徒涉，只好等到大雨退去。汉族军阀与当地反动派曾经给藏民订了严格的“惩治条例”，如帮助红军带路、当通司，或卖给粮食者，均处死刑；不执行坚壁清野，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不同红军作战，亦按“叛逆”治罪。这种反动纪律逼得藏民不得不逃避，但是更深入藏族地区，汉族军阀的反动势力就逐渐减弱，藏民也有陆续回家的。

这时已经是七月初，这一带的青稞麦已经带淡黄色，勉强可以收割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们只好割麦子煮熟吃，同已经回来的藏民研究，按当地的粮价，付给现款，或请他们转给那些尚未回来的藏民。于是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除伤病员外，大家都参加割麦，除各单位自己食用外，还得供应担任勤务的部队。总部考虑到前面粮食更加困难，并命令各单位储粮秣十天，所以割麦成了当时的紧急任务。

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整队向能够收割的麦地出发，红色指战员一群一群地奔向指定地区，投入割麦的劳动。大家虽然腹内是一个半饱的状态，但都是兴致勃勃，歌声不断地响遍田野。

朱总司令也走过来同战士们一起割麦。他素来爱好劳动，在井冈山时期，他用那条“朱德的扁担”同战士们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食。现在虽然又添了几岁，但是仍不甘示弱，他把麦子割下以后，还从一、二十里路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的模范行动对大家影响极大，有些干部只挑回四、五十斤，对比之下都感到不好意思。当时年纪最老的徐特立同志也来帮助弄麦子。因为等着下锅，所以有时麦子挑回来之后，大家用

双手把麦穗简单地搓几下，就煮着吃。青稞麦不好消化，往往吃进去是麦子，拉出来还是麦子。

周副主席是搓米的能手。还在贵州地区，他就带头用两块瓦片搓谷子，保证了部队有饭吃。他虽然工作很忙，这次也抢着弄麦子，对大家鼓舞很大。

黑水、芦花还算比较有粮食的地区，我们在这一带，除了自给之外，还供应前线部队。如有的团远远伸出，靠近敌区，在雪山上粮尽，挨饿受冻，已至山穷水尽，急电求援，就必须组织力量，冒着风雨赶运粮食去。军委在芦花城设了一个筹粮委员会，担任筹集六十万斤粮食的任务。为此，组织了人力，在几个出产粮食的地区，分头筹粮。

由芦花城沿黑水东下，经过三天路程，到达瓦布梁子。这是一条很高的山岭，周围有十多个村庄，共有藏民数百户，是黑水、芦花一带较富庶的地区，出产大麦、小麦、荞麦、洋芋、萝卜、猪、牛、羊等，并产盐。这里离汉人居住的地区较近，懂汉语的人颇多。四方面军一部曾经过这里进入芦花，当时藏民都逃避一空，后来找到了曾到过成都的通司，由于他们努力宣传，藏民回来了一部分。这次筹粮委员会的工作队，更使用大力作了争取藏民群众的工作。出了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的田地插了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侵犯，对回家的藏民每家发了保护证。工作队还派人到各村去召开藏民群众会，经过通司翻译给藏民听，详细宣传红军的主张。藏民回来的更多了，对我们的态度更好了，不但不怕我们，而且喜欢和工作队接近，常找工作队谈话，问这问那，毫无拘束。他们已经晓得共产党、红军对他们很好，愿意帮助我们作事。我们一两个工作人员，在这地区来来往往，也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我们在藏民中的影响已经扩大，我们和藏民的关系已经改善，我们就广泛地宣传，号召藏民起来反对汉官、军阀的压迫，组织藏民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这一次宣传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护，我们就开始召开各地藏民大会，成立藏族人民政府，在这一地区前后组织了六个乡的藏族人民政府，都是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了代表及主席。这些代表和主席当选后，都感到很荣耀，努力作好各种工作，积极帮助红军。最后工作队召集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于是瓦布梁子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

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在瓦布梁子筹集了不少的粮食。一方面，我们发动藏民割那些群众痛恨的恶霸的麦子，由群众与红军各分一半，另一方面，向那些豪富大户借粮。约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计划。除了筹粮外，我们还在这里分三个地区熬盐，每天能出点盐，也解决了部队的一些困难。

这许多粮食，我们组织了藏民运粮队，运到芦花，或其他需要的地方。参加运粮队的藏民都很积极，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吃。我们离开瓦布梁子时，把旧区乡衙门的粮食发给了藏民群众，许多藏民从远道来背粮食，群众都不愿意我们离开，依依不舍。我们从黑水、芦花一带陆续向仓德打鼓区移动，行程约一百数十里，要爬过仓德梁子这座大雪山。这个雪山在这一带大概是最高的山，由山下至山顶约六十多里。我们选了比较好的天气，没有下雪，也没有大风，但空气还是很稀薄，个别同志牺牲了。由于近来给养困难，大家总感到腿软无力，前进十分艰难，但大家都是互相搀扶，互相鼓励，这座大雪山终于被我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毅力克服了。

打鼓分上中下打鼓三个村，约有百数十家，藏民都被反动

派胁迫逃走了。由于地势较高，麦子还未成熟，田野还是一片青绿色。从此我们主要靠吃豌豆尖、野菜等过日子。各单位每天轮流派一些人去找野菜，这里豌豆种得多，就把叶子当粮食吃。炊事班在一大锅豌豆尖里面，按每人每天三两青稞麦的比例，抓几把青稞麦子放进去。有时我们打一桶“饭”回来，尽是青菜，若想弄几粒麦子，要象河里捞鱼那样，费力大而收效少。大家肚子里经常叽哩咕噜，一人开始，大家就共鸣起来。

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到山上与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过去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

离开打鼓，向沙窝移动，路程约一百里。出了村子，就看见路边有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上午九时后，不准前进！”大家就知道前面还有大雪山，中间没有人烟，出发太迟，当天不能到达。但是大家经过了许多雪山，对雪山也司空见惯了。虽然感到身体瘦弱了一些，意气仍不减当初，一个个奋勇前进。走到距山顶还有二十里的地方，大家的呼吸开始短促起来了，脚步也不知不觉地缓慢下来了。但是越发鼓起劲来，逐渐爬上了山顶。大家已经藐视了“山神”，在山顶上回顾四周，洋洋自得。干部团的陈赓、肖劲光等同志大赏雪景。有人提议吃雪，从雪层中扒出一碗，问谁有糖精，就有人拿出一小纸包好糖精来共享，许多人就大吃起来。也有人反对，说：“你们不要看它外表洁白，上它的当，若把它煮开，本来是又黑又脏的污水呀！”大家还你一缸、我一碗地吃着，有人甚至夸奖它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冰淇淋还美，别的人批评他替冠生园作义务宣

传，争论起来。最后有人说，等我们解放了上海再做结论吧。

几天后从沙窝又移驻在毛儿盖。

过 草 地

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是草地。右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出发，他们带有藏民向导，但这些向导也不是很熟悉草地的。这里阴雨天多，太阳不常见面，不能依靠它来辨别方向，我们主要的还是靠了指北针走路。刚走进草地时，右边还有山坡，斜坡上有几条平行的浅沟，可以想见平时牛羊成几路纵队并行前进的景象。更远望可以看见岷山山脉蜿蜒层叠，直接苍穹。

第一天走路不多，可以说是在草地的边缘，宿营地还能找到一些树木，被雨淋湿的上衣与在水草中行进时被溅湿的裤腿，还可以用柴火烤干。每人带有一根短棍，结合这些树木，搭起帐篷来也很半靠。更为宝贵的是，总可以找到一些干柴，或小的树枝，来烧开水，甚至煮饭，这样可以不要硬吞炒麦或面粉。草地的地面总是湿的，但是有树木的地方，一般地势较高，还可以找到比较干的地方睡觉。

第二天天刚亮，大多数单位还煮了麦子饭吃。我们已经完全深入了草地，环顾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青草，草多是浸在水中，浸水的地方形成长满青草的小陆地或小斜坡。几乎看不见树林，人烟更不用提了。我们总是一个紧跟一个地小心踏着有青草的地方走去，有些地方没长青草，多是泥潭，往往是无底洞。“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骡马，有时只顾吃草，脱离队伍，竟掉进泥潭，忙乱地想爬起来，结果越陷越深，人也无法

搭救，很快就完全没顶。可恶的泥潭却又若无其事地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草地天常阴暗，不定什么时候忽然来过一阵雨，风吹雨打，世界就剩下眼前一片。雨过天也不晴，太阳不知道躲在哪里。大家总是埋头走路，但这样的路走不多远，天也就黑了。先头部队选了适宜的地方搭了一些棚子，有些还能利用，或稍加修理还能蔽风雨，有些里面还躺着病号，等待恢复体力再前进。许多单位已经只能够烧点开水吃干粮，就躺在油布上睡觉，用热水洗脚早已没人指望了。

经过了两天的草地生活，好象一切都已经习惯了。无非是走路“嚓……嚓……”的响声，无非是一阵雨来，叫你湿上加湿，无非是湿地上露营，无非是冻醒过来冷战一阵等等，如此而已。草地有很多条不知何去何来的小河，大家互相搀扶着渡过去，有的被流水冲倒了，立刻被拉起来。饿了就抓一把炒米或面粉往嘴里送，几乎每一个人嘴边满是白胡子。第三天早晨淋了一阵大雨后，走了十多里路，草地上先头部队树立了一个木牌，写着“分水岭”三个大字。这里地势较高，站在这里，真可以说是“眼中无物”。傍晚到了一条河沟边，有些矮树，大家尽量把棚子搭好一些，煮了麦面疙瘩吃，肚子美美地享受了一顿饱餐。夜里没下雨，还见到了几颗疏星，算是过草地的良宵美景。

第四天黎明起来，发现了一个病重的同志已经停止了呼吸。大家非常悲痛，有的同志发出声音来：“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尽了最后的力量！”旁边的马上接着：“不要紧，你的任务我们来完成！”“我们一定为中国的独立、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家默默地从牺牲了的同志的身

边走过，又走上了极目青青的草原。天空不见飞鸟，地下不闻虫声。蒋介石靠了卖国换来的飞机也不来探望我们了。据说昨夜有一股藏族反动派的骑兵来袭击我们，经我们开枪射击，就抱头鼠窜了。下午到色箕坝，这是三岔路口，右边通松潘，左边到班佑。这里有很多树棚，是走在前面的部队搭的，有些经过数次加工，用树叶盖得又结实，又稠密，后续部队省了很多力气。大家在蒙蒙细雨中烧开水，冲炒麦粉吃。夜间倒是晴朗，但是风很大，非常冷。

草地已经过了一半多，大家当初的疑惧不安的心情完全没有了。第五天天气又很坏，一阵雨，一阵风，但是大家想起快要到班佑，就可以结束这样的生活，一个个精神振奋，双腿好象增添了新的力量。早晨因为炊事班感到柴火不够，不能煮麦米饭，还是各班自己烧点开水吃炒面粉，或者啃炒麦子。糟糕的是，每人背的炒熟了的青稞麦粉或麦粒，几天来被雨淋湿，炒面粉成了疙瘩，只好用开水或凉水冲成糊糊来吃，炒麦米更不好办，有点象橡皮胶，吃二三两，就弄得牙齿疲惫不堪。如果走路时跌了一跤，把干粮袋掉到脏水里，就没法再吃，只好由大家另行分给一些。很多人找各种可以吃的野菜煮着吃，有的把自己的皮带煮熟吃了。这一天老是下雨，越下越大。傍晚，找到有树棚的地方，就把油布和半已破旧的斗笠加在上面，作为一夜的“安身之地”。

自从我们进入草地以来，每天总有一些同志不能赶到宿营地，他们都是由于饥寒疾病，在某个地方倒下了。所有的牲口主要用来运了病号，担架队每天劳累不堪，都不能解决病号的问题。第六天一天，许多同志在出发时就已经很艰难地跨步，纵有人随行帮助，天黑时有些人终于没有跟上来。大家对他们

非常悼念，革命的壮志未酬，竟被疾病折磨而死。这一天的行军显得更加吃力，天气老是那样阴沉，不时下雨。远处发现藏族反动派的骑兵在行进，但他们怕我火力，不敢靠近我们，见我们已经发现，就仓惶逃窜了。大家想到草地的行军快结束了，对周围的景象倒愿意仔细观察一番，以便留作将来的纪念。想着，想着，也就到了宿营地。

草地行军的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天气倒不坏，不仅没下雨，天空好象明亮一些。一早出发，走不多久，右边远处显出了隐约的山峰，渐渐又望见了雄伟的岷山山脉，终于又走上了漫长的山坡。前面传来了捷报，胡宗南在班佑堵截我们的部队已被我先头部队解决，并说巴西和阿西有很多的房子可以宿营，同时麦子已经成熟可以补充粮食。听了这些好消息，大家欢呼起来。本来疲惫不堪的身体，顿时精神抖擞，脚步忽然加快了。但是山坡上的狭长的浅沟，使你高一脚，低一脚，很不好走。往前看总望不见村落，又走了约三十里路，还是一望无边。忽然在右前方山坡下冒起几缕青烟，但是仍然看不到房屋。逐渐接近那冒烟的地方，先看到几堆什么东西，有点象内地的稻草堆，但又不是稻草。正疑惑间，前面的人说，这就是班佑。仔细观望，确实有几十座象蒙古包式的矮房子。决定在这里宿营，大家高兴，纷纷往矮房子里面参观，却又不象住人的地方，没有任何家具，除几堆牛屎外，一无所有。大家叫它“牛屎房”，墙是牛屎筑成的，但并不臭。晚上外面下着大雨，大家在“牛屎房”里面，烧着牛屎，围拢来烤干衣服，有的背靠背地睡着了，一片热气腾腾，鼾声呼应，似乎高楼大厦未必比这更好些。

我军已经进驻巴西、阿西一带。胡宗南在巴西附近的高山

上筑有碉堡群，但守敌均已逃跑。胡部防守着松潘、樟腊、包座一线，企图阻止我军东出四川与继续北进。巴西离包座一百二十里，房屋全是木造，有一所宏大的喇嘛庙，内部用红漆粉饰，雕刻贴上金箔，正中坐着一个数丈高的大佛像，其他小佛像无数。这里的藏民也已经受到了反动宣传，全部逃跑。但麦子已经成熟，还有萝卜、胡豆，我们的生活算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还在右路军进入草地之前，在毛儿盖，毛主席即已经命令三十军占领包座，打破胡宗南军的堵截计划。三十军的领导同志，由徐向前同志引进，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同这些同志一一握手之后，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各种情况，如各团、连有多少人，掉队的多少，战士们的情绪高不高，部队生活怎样，休息了几天，是否恢复了疲劳，粮食困难是否克服了，打仗准备了给养没有，等等。然后毛主席把手里拿着的北上路线略图铺在地上，就他们将要执行的战斗任务作了重要指示，并谈到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指出全国抗日高潮即将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

三十军的领导人接受了毛主席给予的任务与指示后，就立即着手组织领导包座的战役。全军怀着必胜的信心跨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五天之后，就迎击着从包座出来的敌人，把它打得抱头鼠窜，乘势包围了包座。这里的敌人是胡宗南的一个旅，旅部住在大喇嘛寺内，紧靠着一座五六百公尺高的大山，控制了制高点。前面有一条小河，只有两丈宽，但正值雨季，河水深而湍急，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在外面，敌人建立了六个碉堡，向我军射击。

军领导根据侦察组的报告与俘虏的口供，绘制了包座守敌情况与增援部队路线图，并亲自去查看地形，乘月夜摸到包座

前面，又勘察了敌增援部队的来路。敌人的增援部队是四十九师，是一支生力军，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兵力约一万二千多人。而我们三十军不是全部，当时兵力较敌人少，装备差，要歼灭这股装备比较优良的敌人，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我三十军除用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包座外，主力则布置在敌援军必经之路的东西两侧山上。据俘虏口供，敌增援部队预定下午到达，但拖至次日中午，才从松潘到包座的道路上大摇大摆地走来。敌人十分狡猾，先用一部分兵力搜索前进。我军领导命令山上的主力部队隐蔽好，只以正面一个团，在一些次要的小山头上抗击，给敌人大量杀伤后，就节节撤退，诱敌大胆深入。

敌主力进入我埋伏圈后，我军居高临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把敌人拦腰截成了三段，战士们用手榴弹、刺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我军终于把斩成三段的敌人一段段地啃掉了。敌师长伍诚仁重伤后跳河自杀了，大量敌军官兵做了俘虏。围攻包座的我军，也向喇嘛寺的敌人发动了猛攻。夜间，除少数乘大雾逃跑外，全部就歼。我军完成了占领包座的任务，为继续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政治部派了一批干部作俘虏工作，征求他们的意见，宣布：“愿当红军的站到左边，愿回家的站到右边，依各人家乡的远近发给路费。”结果，愿当红军的占十分之七，愿回家的占十分之三。俘虏中有的原来在十九路军同日本人打过仗，有的对红军有些认识，许多人从武汉出发时，受欺骗说是开去打日本。俘虏兵一致痛骂反动官长压迫士兵、污蔑红军，并大量揭发了军阀军队的腐败与黑暗的情况。

（本文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同志所著《长征回忆录》中的一章）

五、剧本

欢迎会（话剧）

人物：

张克勤：工程师，年二十六岁。

刘景明：女学生，年十九岁。

刘启明：中学生，景明弟，年十五岁。

刘德明：女博士，景明姊，年二十七岁。

刘 母：景明母，年五十岁。

刘敦廉：富绅，景明父，年五十二岁。

刘思明：博士，景明兄，年二十二岁。

王永芳：博士，德明夫，未登场。

时代：民国十一年秋天的月夜

地方：上海

布景：

刘公馆客厅。后壁左侧有三分之一为玻璃窗，窗外为花园。窗下有风琴一架。左侧有门通书房。右侧有门通外门及别室。右壁下有书桌一，室中央有一方桌，皆有抽屉。左壁下有一沙发。外有椅子数件。

幕启时，刘景明正弹风琴，上身浸在月光里。张克勤倚琴而和。

刘：（弹琴）

张：（倚琴而歌）人生忽如寄，

你请爱呀，处女！

花的芳香轻吐的时候
你的明眸澄美的时候，
啊，
你请爱呀，处女！

（余音袅袅之中，刘弟启明由左侧门上）

刘弟：二姊总是喜欢月光的，又在月下弹琴了。我把电灯开了，好吗？（说话之间，室中已经照得通亮。）哦，张先生几时来的。

张：（向刘弟点头）才来不久。

刘弟：把你的帽子给我，等我把它挂起来。（取张帽挂于衣架）

刘：（回过脸来，倚琴而坐。）

张：（向刘弟）启明！近来学校的功课怎么样了？你来同我坐下谈谈。

刘弟：（懊恼之状）唉！你莫说起，说起来真要我的命。（同坐沙发上）我们在学校里，今天忙的也是试验，明天忙的也是试验。你想那么试验几回，就可以决定这一个人读书读得好，那一个人读得不好么？那全是假的。占便宜的是那些狡猾的人，他们预先把先生喜欢出的问题，打听得十二分清楚，等到试验的前几天，把那些地方一看，也照例到讲堂上去画几张。所以发表出来，总是他们跑在前面。张先生！你想这事情对不对呀？最可恶的是那些教英文的先生们。我喜欢数学，在我们同学里头，讲数学我是第一个。那些教英文的先生们，偏说数学好也是不行的，非把英文弄好不行。最讨厌的是那个教英文会话的先生。人家说他除了几句不通的英语之外，什

么也不懂的，偏偏能够装出那样的神气来，真是讨厌。过几天就要试验了。我还一点也没有准备。家里明天又要开什么欢迎会，闹得一团糟。读书的心思，也不知道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再过几天……

张：（微笑）你的哥哥才从外国回来了，难道还不该开一个会欢迎欢迎吗？

刘弟：不是那么的话，他们闹得太厉害了，因为再过几天又要举行大姊的结婚式呢。

张：是的，你的大姊与王永芳博士的结婚式。

刘弟：这张先生，这真是笑话。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笑话。（刘姊西装从左侧门上）

刘姊：（见张）啊，密司忒张来了。

张：（起立）是的，王博士许久没有见面了，近来还好吗？

刘姊：谢谢，近来还好。（问刘）密司忒张来了，怎么茶也没有叫他们倒来？（向刘弟）启明，你去叫他们倒茶来罢。

刘：啊，真的！等我自己去来。（下）

刘姊：（向刘弟）你在这里同张先生说什么笑话？

刘弟：真是笑话。

张：没有什么话。

刘弟：就是讲你的结婚式的笑话。

刘姊：这有什么笑话。

刘弟：这真是笑话。

刘姊：小孩子不去念书，在这里胡说。

刘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七八年前在轮船上……

刘姊：（脸红，隐忍的怒容可见）胡说，你知道什么东西。

刘弟：我知道王永芳是一头狗，不是一个人。

刘姊：慢慢瞧，我不叫爸爸抽你的腿。

刘弟：哼哼，我与爸爸是不会碰着的。早晨我起来，他没有起来，白天我在学校里，晚上不是别人请他，就是他请别人吃饭，夜里他回来，我已经睡了。

刘姊：讨厌的！这么多的闲话。还不给我滚去呀？（做欲捻腿状）

刘弟：（起避）我滚去就是。不过我可以滚去，我随时也可以滚来的。

（从右侧门下）

（刘捧茶点上）

刘姊：讨厌的小孩子，这么小小的年纪，偏有这多的话说。

（向张）密司忒张，你请多坐一坐。

张：请不要客气。

（刘姊从右侧门下）

刘：（递茶点）克勤，刚才启明说过什么话来？

张：就是结婚式的话。

刘弟：（从左侧门上，目注视右侧门）哼！我说我可以滚去，也可以滚来的。现在还不是又滚回来了？

刘：启明，你不要总是这般同大姊闹。

刘弟：我怕她什么？她以为我不知道她同那个什么王博士——那个忘八蛋七八年前在轮船上干的事情。本来谁不知道？倒是她自己不知道人家知道罢了。

刘：（失望之状）哦！

刘弟：（冷静地继续着）如今过了七八年，还来举行什么结婚式。真是笑话！不知道是欺人，还是在自欺呢？（愤怒）

可恶的是那个忘八蛋，偷偷摸摸地把大姊弄到了手里，就来问我父亲要钱，把他也送到西洋留学去，如今公然也捞着一个什么博士的头衔回来了，公然大吹特吹，只等北京打电报来请他做总长去。假使那些博士，那些总长，尽是一些这么样的东西，我们非把这样的社会，全然革命不可。不是的，假使我们的社会，能够默认这样的一个忘八博士存在社会里面，我们就非把他彻底地革命不可！

张：（起握刘弟手）哦，我赞成你的话，好个未来的社会革命者！

刘：哦，说虽是这般说，你不要过于使大姊为难才好。

刘弟：你以为她就是个好人吗？跟着那个忘八蛋，跑了这么几年，还要举行什么结婚式来一手掩盖天下的耳目，尽是些伪君子！

刘：哦，说起怪不好过的。不要再说了，你去念你的书罢。

刘弟：不高兴念书。

刘：你去逛一会来罢。

刘弟：我也不高兴去逛。

刘：（忧郁）今天晚上好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样子。

张：你不要这样自寻烦恼，（向刘弟）启明，你哥哥到什么地方去了？

刘弟：他到朋友家里去了，说就回来的。

刘：那么，好弟弟，你去早点睡了罢。

刘弟：（似不愿意，但又徐徐往左边走，下）

刘：哦，讨厌的事情！

张：（徐往刘侧）不要烦恼，这样的事情多得很呢！

刘：你不觉得奇怪吗？

张：不象你那般觉得奇怪。

刘：（嬉戏之状）那么，你也干得出来吗？

张：（微笑）怎么干不出来。

刘：（惊愕，后退）哦，你也干得出来吗？

张：要干什么干不出来，一个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不过我纵要干，也不是他们这般卑怯的办法。

刘：那么，依你要怎样办呢？

张：（毅然）我的办法就是公开，不再举行什么结婚式。

刘：哦，你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张：不是的，我最可恶那些理想主义者。我的意思，不过说假想我们自己不谨慎，像他们那样干出来了的时候的话。最好是我们自己谨慎，自己对于自己负责任，也对于人家负责任。

刘：你这话我最赞成，现在的青年对于他自己做的事情，太不负责任了。

张：是的，他们干出了这样的事情来，便是他们自己不负责任，纯被一时的兽性冲动了的结果。他们也一定没有什么爱情，因为若是真有爱情，便不必那般鬼鬼祟祟的怕人言语，因为爱情是什么也不怕，死都不怕的。他们因为觉得自己的行为，完全是一时的肉欲，才觉得自己错了，没有面目对人。但错了的事情，可以以错补错的吗？那不过错上加错罢了。

刘：你的话很对。（微笑）不过象你这样说起来你也不象真有爱情的人了。

- 张： 你这话怎么说？
- 刘： 真有爱情的人，依你说是什么也不怕的。（娇羞）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意思向我父母提议？
- 张： （叹息）哦，我们这样的男子汉，是不好轻易向人提议的。人家一口气答应了，那是没有话说；人家若是拒绝了，那便是最后的决裂。所以，我只愿你把你父母的意思探得出来。不知道……
- 刘： （叹息）哦，我父母的意思，我想你也大抵是知道的。
（悲容）我真不知道应当怎样办才好。
- 张： （安慰）你不要伤心，再等几时总有法子可想的，我不愿你为我悲伤，我只愿我能为你的幸福，牺牲了一切。我没有别的痴想，我也不敢那样。
- 刘： 哦，我也愿为你牺牲一切。
- 张： 哦，那是决不可以的。我很怀疑我不能使你幸福，我还不知道我应不应当同你说及将来的事。我现在心里烦闷的，也就是这一点。假如我知道我不应当，那么，把以前的一切都丢了，我也是情愿的。（声缓而颤）
- 刘： （激昂）克勤，啊，你不能说这样的话的。以后再不准说这样的话了，你同我约好！（作要求态）
- 张： 啊，这真不是可以轻易决定的。象我这样的人，只有孤苦一生罢了。你的爱情，对于我是过分的，过分的幸福。那真是过分的。
- 刘： （抚慰）啊，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慢慢地可以想法子的。
- 张： 是，我们慢慢地想法子罢。
- 刘： 昨天我问过妈妈。她只是摇头，不……（刘弟手拿一张

报纸从左侧门上)

刘弟：你们看了今天的报纸吗？我念给你们听听。（捧报纸朗诵）：

“刘思明博士之欢迎会，

刘思明博士新从英国留学归来，已志昨报。

刻闻博士之父刘敦廉氏已遍邀戚友于二十三号在静安寺路公馆开一欢迎之宴会，届时博士将有长篇之讲演，必有一番盛况也。

又讯，刘敦廉氏之长女公子德明博士，已与王永芳博士订婚，将于本月底在某教会举行结婚式。两博士在美同学多年，甚形相得，结婚后将往日本为蜜月之旅行云。”

哈哈，我们中国的报纸，尽是些这样的骗人的话，我刚才一看，几乎把肠子都笑断了。

刘：好弟弟，少笑些，仔细大姊捻你的腿呢。（刘母在内说话之声）妈妈在那边说话，你去念你的书呀！

（刘弟扫兴不欢，徐徐由左侧门下）

（刘母从右侧门上）

刘母：（见张）张先生，你近来好吗？

张：（起立）多谢，近来很好。你老人家好吗？

刘母：人到还好，只是被一些的事情，闹得天翻地覆了。（向刘）启明这孩子这几天来书也不念，刚才又在这里鬼混吗？

刘：他说你们闹得他念书不进，是我逼着他去了。

刘母：你看见明天请客的单子吗？你爸爸回来了，要拿去查一查，看丢了什么人没有呢。（查各抽屉）

刘：（目视张，复向母）妈妈！（低头）

刘母：（抬头）什么事？（复埋头查看）

刘：（脸微红）……妈妈！

刘母：（急抬头）什么事？

刘：（低着头，合掌腮下）……妈妈，昨……昨天我问你的话，你怎样……怎样答我？

刘母：（思索）……什么话？

刘：（双手搁刘母肩上，头钻入刘母怀中）妈妈，你不要故意装做不知道的。

刘母：还是三岁的小孩子一样的。看张先生见了笑话。啊，我知道了。这话问你爸爸和你哥哥罢。（推刘）还不起来？这样的丫头，不知道谁要你哩。（关上抽屉）

刘：（起立）（撒娇）讨厌的妈。

刘母：（烦躁）这叫人到那里去找呢？（向张）张先生请坐罢。（从右侧门下）

刘：（视张）啊，我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才好。

张：啊，你不要这般烦躁。

刘：（苦闷状）啊……

张：过几天开过欢迎会之后，我同你哥哥谈谈再说。

刘：我哥哥也未见得就不反对呢。

张：我想他总容易通过。

刘：（摇头）你不知道。（室内有男人言语，随后有脚步声）

刘父：（尚在屋内）我自己来找一找，看它飞去了不成。（从右侧门上）

（刘父为一五十前后的人，有须，头发剪得极短，杂以

白发。目光锐利，颊肉丰富而粗硬。骄色凌人，脚步沉重）

（目视张，往桌旁行去）

刘父：克勤，工厂的事情，近来还好吗？

（查看各抽屉）

张：（起立）不过是天天去做几点钟的事情罢了。也因为经济困难，什么大一点的计划都不能行。

刘父：不论什么事情，没有钱总不行的。

张：……是……

刘父：（寻着单子）不是在这里吗？放在这里的東西，寻了半天，还寻不着。（从右侧门下）

刘：（梦一般的）左也是钱，右也是钱，嘴里说的是钱，心里想的也是钱。

张：（轻击刘肩，微笑）现在的人谁又不是这样呢？有了钱便爵位也可以买，名誉也可以买，爱情都可以买呢！

刘：啊，这丑恶的社会！

张：（挽刘坐下）不要这样悲观，我们总有法子想的。（坐下）你到外国去留学的事情，到底怎么办呢？

刘：大姊主张我往美国，哥哥主张我往欧洲，我真不知道到底往哪一国的好。

张：我还是赞成你往欧洲去，因为到美国去求学，纵多只能学到他的拜金主义罢了。若想求到一点精神上的知识，那是办不到的。并且你既喜欢美术与音乐，那么，你应当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去，简直不成问题。

刘：我也是这般想。只有大姊反对最厉害。她是我父亲的孝女，她同我父亲一样的意见。她说“现在人家都到美国

去”。

张：他们都是去学拜金主义的。你直截地回复你大姊，说你不高兴跑到外国去学拜金主义就是呀。

刘：她劝我到美国去，还有一个理由啊。

张：啊，还有别的理由，那我真不知道。

刘：她说是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啊。

张：更重要的。哼！

刘：（迟疑）她说有钱的人家的子弟，现在到美国去读书，所以她劝我去结识一个，将来好……啊（掩面）……

张：啊……

刘：（抬头）她还说将来我们中国，不论那一方面，美国留学生总要占最大的势力的。

张：啊，拜金主义的势力，现在已经不很小了。

刘：我总反对拜金主义。

张：那是因为你是一个美术家。

刘：我想只要是一个人，便应当反对这种主义的。

张：（微笑）我问你：你还是研究音乐呢？还是研究绘画呢？

刘：到德国去研究音乐，我早就决定了的。啊，哥哥回来了。

（刘兄从外归来，匆匆上）

刘兄：（见张）啊，密斯张！几时来的？（握手）

张：（起立握手）八点多钟来的。

刘：（起为兄将衣帽安置）

刘兄：（于桌旁坐下）（向刘笑话）你们刚才好象在高谈雄辩，到底谈论些什么？我也得加入啊。

刘： 就是讲我留学的事情。

刘兄：（向张）密司忒张！你替景明想想，往那一国好呢？

张： 假使我替令妹想，还是往欧洲大陆的好罢。

刘兄：（拍掌）那么，我又多得了一票。（作忽忆出之状）啊，密司忒张！你今晚来，不是要讨你的回信？

张：（微有惊色）是的……

刘兄：关于这件事情，密司忒张！我们是老同学，用不着客气，我想家父无论如何是不会许可的。老实说，我为景明的将来的幸福起见，也不能轻易赞成她和你结婚。

刘：（失望之色）

张：（失望，唯故持镇静）做父兄的不许可，那自然无话可说，不过不知道你能把你不可许可的理由，也使我知道吗？

刘兄：家父的意思，不用说是因为我们的境况相差太远。就是我自己也望得自己的妹子，总要嫁一个境况好一点的男人，才对于她的将来，可以把心放下。我也极希望她嫁给一个留学生呢。

张：啊，原来这样！这样说来，我简直一点资格也没有了。本来我自己还没有达到向令妹求婚的决心，昨天不知道怎样同她谈到这地方了。其实我自己很疑我不应当说到这地方去，很疑我自己没有资格呢。不过我的所谓没有资格，是关于我自己一个人的，与家产境况，毫不相干。若讲到我境况不好，没有到外国去留过学，那不是我的不好，（激愤）那不过是因为我的父亲没有做强盗打劫，没有祸国殃民罢！假使我的父亲也做强盗打劫，也祸国殃民，那么我这时候，不也是一个贵公子，不也

是一个外国回来的博士吗？啊，这也要算是我的罪过吗？

刘兄：密司忒张！你不要这样兴奋。这样的话，不是可以随随便便说着玩的。依你说起来，我们到外国留过学的人，我们的父亲，一定都是些做强盗打劫，祸国殃民的人了，假如人家要你拿证据出来你怎么办？

张：岂不是拿些证据给他们，就够了吗？这算什么难事？

刘兄：（稍带怒容）那么，我就请你把我的父亲做强盗打劫，祸国殃民的证据给我。

张：（冷然）不要假装不知道。十年前的那几次卖国借款，那几次的战争，哪一次你的父亲没有在里面殃民祸国？你的父亲做官发财，哪一回不是由祸国殃民得来的？你以为他还有什么别的本领？其余他做厘金局长、海关监督、盐运使等等的时候，无形中做强盗打劫，真不知把无辜的良民害死了多少！凡有耳目的人，谁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人家知道罢了。

刘兄：（惊愕，悲哀）密司忒张！啊，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张：谁还来骗你？我张克勤从来不说半句慌话的。

刘兄：（悲极）啊，真有这样的事！听你这样讲起来，我倒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以双手搔首披发，高声）啊，真有这样的事！真有这样的事！

刘：（始而惊，继面悲）啊，真有这样的事！

刘兄：（俯首桌上，悲痛，搔首）啊，啊啊，啊……

（刘父手持客单急由左侧门上，刘母随后）

刘父：（睹刘兄状）你这是干什么事？

刘兄：（抬头，见父，大声）我先问你，你干下什么事了？

(刘母惊往后退，刘走依张)

刘父：(惊愕，大怒)你怎……怎么了？你疯了？

刘母：(驰往刘兄侧)不要这样高声大叫。

刘兄：(直视刘父)我今天才把我自己所处的地盘证明白了。我今天才把你的真像也看清楚。我以前枉自在你面前，画了无穷的梦想，我现在才好象从梦里醒转来一样明白了。……你把我养大，送我读了这多年的书，我感激你；只是你不应该做强盗打劫，祸国殃民来把我养大，来送我读书。我此刻觉得我的全身，我的灵魂，都充满了你的罪恶，都被你的罪恶污坏了。啊，我情愿没有学问，我情愿什么也没有！

刘父：(怒)你这话从哪里来的？我几时做强盗打劫来？我几时祸国殃民来？

(刘姊从右，刘弟从左齐上)

刘兄：你不必问我，你自己问你的良心罢！

刘父：(切齿不能言)

刘兄：你把我养育在一个罪恶的污沟里，啊，这是多么悲惨的命运！我情愿没有学问，我情愿什么也没有……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的身体，都是做强盗打劫的结果，都是祸国殃民的结果……我在享受这不尽的罪恶结果……啊，在罪恶的污沟里所吸收的污泥，我不知道要到几时才能把它吐个干净。……我非把我所吸收的污泥，一口一口地吐出来不可，非把它从我全身的纤维中绞出来不可！纵使我的心肝吐出来，把我的生命绞出来，我也衷心甘愿！啊，我还是活在这个罪恶的污沟里！啊，我要永远离开这个罪恶的污沟！（离桌踉跄，将去）

刘母：（牵住刘兄）啊，你想把父母兄弟丢了到什么地方去？

刘兄：（冷然）你们能够把罪恶当茶饭吃，我不能呀！我们此后各人把自己的污泥吐出来罢！我现在要去把我自己的吐出来了！（拂衣竟去）啊，谁来同我去？（从右侧门下）

刘、张：（齐声）我们同你去呀！（追去）（下）

刘弟：（急追）我也同你去呀！

刘兄：（在室内）谁同我去呀？

刘、张：（在室内）我们同你去！

刘弟：（下）我也同你去！

（刘父瞪目直视，刘母失神，刘姊惊愕）

（室内闭门之声）

刘父：啊，奇事！啊，奇事！（手扬客单）啊，明天的欢迎会！

（幕落）

（原载1923年5月《创造季刊》2卷1期）

编 后

成仿吾同志是我国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是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写了许多评论和作品，对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文学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些评论和作品，散见在过去的报刊上，有的虽然在二十年代后期出过专集，解放后则未曾再版过。由于时间较久，现在成仿吾同志的文学评论和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少。一些同志建议，重新出版成仿吾同志早期的文学评论和作品，以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和研究现代文学之用。成仿吾同志接受了这一建议，同意编选一本《成仿吾文集》。这本文集的编选出版，对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成仿吾同志当年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成仿吾同志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同创造社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道，创建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社具有鲜明的创造精神，它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第二，成仿吾同志在创造社期间，发表了许多论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文章，响亮地提出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口号；他在二十年代后期所写的文章，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来论述新文学运动。

第三，在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22年3月起，创造社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十多种刊物，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四，通过革命文学的实践活动，创造社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如郭沫若、成仿吾、阳翰笙、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潘汉年、夏征农、郑伯奇、李一氓等。成仿吾同志晚年回顾创造社所走的道路时说，他们“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创造社的这些历史功绩，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成仿吾同志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本《成仿吾文集》，我们是根据下列原则进行编选的：一、主要收编成仿吾同志二十年代在创造社时期公开发表的评论、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作品，也收编了三十年代以来的部分诗文，其中晚年的一些诗作，是首次发表的。翻译作品不在其内。至于成仿吾同志的教育论文，已另编《成仿吾教育文集》，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仿吾同志早期的部分书信，则编入《成仿吾研究资料》中。二、为了尊重历史，保留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对成仿吾同志发表的评论和作品，只作个别文字的校订，不作内容的改动。过去文章中习惯引用的外语，也保留原样。在发表过的每一篇文章后面，注明了出处，以便读者查找。三、在编排体例上，我们按评论、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的次序编排，每一部分又按写作和发表年月排列。四、行文一律使用现行的简化汉字和标点符号。

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山东大学成立了《成仿吾文集》

编辑委员会，由吴富恒校长领导这一工作，有关同志为编委，史若平、王启新同志具体负责编辑工作。遗憾的是，这本书还未及出版，成仿吾同志竟与世长辞了！今天，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加紧工作，使本书早日出版，来纪念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

丁玲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特致深切的谢意。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图书馆、资料室，以及有关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一并致谢。

《成仿吾文集》编辑委员会

1984年9月